

南京

史志

国内外发行



太平天国史学家

论太平天国运动

六朝史专家研究六朝史

洪秀全的后代

可能逃到日本

美军飞行员

脱险记

彭湃被捕及牺牲详情

『皖南事变』策划内幕

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抗暴经过

是是非非歌舞厅

NAN JING LOCAL HISTORY

1991年第3期及增刊
CN32-1024

南京金陵制药厂



脉络宁注射液

血栓病的克星

—脉络宁注射液

原名“797”，是江苏省卫生厅、江苏省中医药研究所与我厂共同研制的重点科研产品，曾荣获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奖，是国内首创的独家产品。“脉络宁”系采用名贵中药、经科学精制提炼而成的纯中药复方制剂，专治脑血栓后遗症、心血管疾病、静脉血栓、大动脉血栓、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的疾病。该产品1990年被评为军优产品、并再获国家“神农杯”银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
南京金陵制药厂

厂长：江中银

厂址：南京市黄埔路三号（南京军区机关大院内）

电话：厂部645047；供销科642435

邮编：210016；电挂：1365

柴酮片

小儿呼吸道感染
的新药

—柴酮片

科研产品柴酮片在1988年“全国百病克星大奖赛”中获铜牌奖。是治疗小儿呼吸道感染的一种新药，与青霉素对照，疗效与之相似，却无任何毒副作用。



南京市志叢書

彭冲

卷首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彭冲为丛书题写书名。

今年恰逢三大周年纪念日,即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四十周年,本刊本着“以史资政,以志育人”,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宗旨,将发表系列研究文章,以纪念,以缅怀,以继承,以光大。

本期发表的“史学家论太平天国运动”专栏文章,有党政领导和著名学者及研究人员写的专稿,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和“反侵略的伟大精神”,并披露了一批新的史料,颇为珍贵,值得一读。

同期还合印了“六朝史研究”增刊,这是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与本刊编辑部联合组织编发的。这批史稿是由苏、赣、皖、浙、京、津、沪、秦等十多个省市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反映了六朝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一页”,从中会得到莫大的启示。

本刊今年将在资料性与学术性上刻意追求,同时不放松可读性的有机结合,做到雅俗共赏,让读者在轻松的氛围中得益。

南京史志

1991年第三期及增刊

(总第46、47期)

统一刊号:CN32—1024

本期增刊号:(JS)22号

全年订价7.20元

本期订价2.40元

地址:南京市政府大院

邮码:210008

南京史志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

顾 问 郑凤翔 张治宗
杨之水 姚文烈
主 编 王能伟
常务副主编 陈济民
特 约 编 辑 乐华云

●论太平天国运动●

纪念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	孙家正	6
纪念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伟大精神	罗尔纲	8
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 ——中国近代传统的集中代表	茅家琦	10
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	沈嘉荣	12
太平天国革命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	经盛鸿	14
南京举行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纪念会	余安民	4
洪秀全得胜县得胜	臧筱春	9
洪秀全的后代可能逃到日本	益人摘	47
太平天国的图书机构	徐 健	16
太平天国的画匠与画工	蒯 伟	22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门牌及其价值	章义平	18
园馆合璧的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施善萍	20

●人 物 春 秋●

彭湃被捕及牺牲经过	程堂发	27
-----------	-----	----

●神 州 风 云●

美军飞行员脱险记	张 衡 吴雪晴	24
----------	---------	----

●史 海 钩 沉●

国民党当局策划皖南事变内幕	钱建明	29
女大学生沈崇事件抗暴斗争经过	夏 蓓	34

●六 朝 史 研 究●

六朝军事史最新研究成果的交流	卞孝萱	37
六朝南北战争性质论	周伟洲	38
孙吴“保有江东”基本国策分析	简修炜	41
东吴军事思想述略	余大吉	44
东晋南北朝中军补说	邱 敏	48
赤壁之战拾遗	万绳楠	52
六朝水军与水战	钟立飞	56
东吴之舟师及作战特点	周兆望	60
东晋末年建康攻守战	刘曼春	64
后赵“浮海抄略”散论	张学锋	66
“元嘉之治”及其北伐	王永平	68
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和六朝时期防御政策	罗宗真	74
战争频仍中的六朝江南城市	张 南	70
东晋的西府及其战略地位	孙永如	86
刘宋政权的崛起与北府兵的兴亡	杨在年	82
宜兴周氏与六朝军事	叶聚森	76

●方 志 研 究●

博采中觅宝 传统中创新	吴孝桐 许振民	78
增设索引 方便利用	何晓宁	81

编辑部主任 庄淑玉
副主任 汤惠兰
责任编辑 董宁宁 卢海鸣
发行 胡星侠 李哲民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内订购 本刊发行部
印刷 光华电脑排版印刷中心
广告许可证 宁广字第 56 号

● 南 京 经 济 ●

新穀是南京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开端	徐金元	84
利用有利自然条件 发挥综合开发作用	戈仁泉	63
南京医药工业的新星金陵制药厂	孙斌	92
城市环境卫生的卫士	吴纪岫	90

● 白 下 艺 文 ●

是是非非歌舞厅	叶舟	李石	94
张大千与《韩熙载夜宴图》	王能伟	卢海鸣	88
明太祖朱元璋的一封家书		阮仓笃秀	105
邵力子题字		邵黎黎	55

● 金 陵 文 教 ●

华东军政大学的创办	钱家赵	91
江苏最大的县级儿童图书馆	王宏	109
江南图书馆开馆日期辨误	王玲	104

● 争 鸣 园 地 ●

也谈曹操与三国	周正章	100
曹操当为何时人	蒋作初	101

● 古 都 研 究 ●

建康何处东府城	王少华	106
---------	-----	-----

● 三 江 揽 胜 ●

石巢园、湘园与陶衡川	凌昕	110
和平公园的“还都塔”	霁明	112
世间奇绝的枯枝牡丹	杨志萍	59

● 地 名 探 源 ●

地名二则：细柳巷、教敷营	陆永贵	99
就《小重山》词中地名答读者问	陆良庚	33

● 白 门 掌 故 ●

孙中山与复旦大学	张学恕	108
用贖金创办图书馆	魏希德	73
蒋介石在南京的几处别墅	季智洲	102
汪精卫在南京的两处公馆	远秋	23
抗战前南京举办过牲禽比赛会	王长喜	28

● 志 苑 信 息 ●

《著作权法》关于报刊用稿的规定	36
加价回收《南京史志》精装本	80

封面：历史的沉思(丁卫)，封二：金陵制药厂
封三：南京鼓楼区环卫所，封底：南京玄武区城镇建设开发总公司

弘扬革命历史传统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江苏省暨南京市纪念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座谈会侧记

1月10日,南京的气温已降到零下5度,寒气袭人。但在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当年太平天国东王府内,却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省、市委宣传、省社科联和市文化局正在这里联合召开座谈会,纪念太平天国金田起义140周年,(1月9日,南京市还举行了报告会,有300多人参加)。座谈会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虞煜星主持。省委副书记孙家正,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马鉴伯,市文化局局长查双禄、副局长魏正瑾,以及茅家琦、沈嘉荣、方之光等20多位太平天国史研究

专家一起参加了座谈。

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也是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至今还较好地保存着太平天国的旧址和大量实物、资料。与会同志在这里座谈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功绩、革命历史传统及其历史局限性,如身临其境,倍感亲切。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团成员、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嘉荣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本刊另发)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主席成员、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茅家琦说,从“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外来侵略,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本刊另发)

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方之光,对太平天国后期颁布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作了分析。他认为,《资政新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实现中国近代化的政纲,与《天朝田亩制度》在反对封建制度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同的是,《天朝田亩制度》要建立的是农民绝对平均的理想天国,而《资政新篇》要建立的是以西方国家为蓝图的近代化中国。这无疑集中反映了洪仁轩、洪秀全向西方国家摸索中国富强道路的强烈愿望,是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一个救国方案。但这个方案的缺陷是,只字未提土地问题、没有满足农民的要求,对西方列强存在幻想、没有明确提到反侵略的问题。他说,今天纪念太平天国运动,除了继承弘扬





右：省宣传部副部长 马莹伯
中：省委副书记 孙家正
左：市宣传部长 虞煜星

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的“顽强奋战”的爱国主义精神外，特别要继承和发扬天国农民改革开放的“革故鼎新”的精神。

围绕太平天国的武装斗争，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研究员舒翼，从太平天国军队建设规范化、战略思想稳定化、作战模式多样化、武器装备趋同化等方面作了具体剖析。解放军南京政院历史系主任张应生认为，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然而，农民战争由于得不到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不能摆脱单纯农民战争的羁绊。太平天国所处的时代，主要还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立，还不可能得到先进阶级的领导。因此，在近代条件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刚从北京举办《太平天国历史巡回展览》，赶回来参加座谈会的南京市文管会副研究员韩品峰、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馆长谭剑，简要介绍了太平天国

历史在京展出情况，并带来了 90 岁高龄的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为《南京日报》撰写的《纪念太平天国起义 140 周年》和为《南京史志》撰写的《纪念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伟大精神》二文。

孙家正同志在谈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功绩和经验教训后，深刻指出：我们纪念太平天国运动，宣传它的伟大业绩，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传统，弘扬革命先驱者的爱国主义精神，向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进行近代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增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意识，把爱国热忱及时引导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而奋斗中去；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升华为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把个人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团结奋斗，艰苦努力，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前进。（全文经整理文本刊另发）

dfz. nanjing. gov. cn

纪念太平天国运动 140 周年

●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 孙家正

太平天国起义至今已有 140 周年了,今天来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就如何纪念太平天国运动,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要充分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大力弘扬革命历史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起义。它发生在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是我国旧式农民革命的顶峰,也是中国人民近代反帝爱国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和外国侵略者,在近代中国史上,它和其后发生的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我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奋斗历程。太平天国运动中体现的反封建专制的民主精神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大义,中国人民将永远引以为自豪。

我们江苏尤其是南京,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揭竿而起之后仅两年多时间就东进南京建都,前后达 11 年,并以南京为大本营进行了西征和北伐,取得辉煌的战绩,建立并一度巩固了农民政权,以《天朝田亩制度》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革命纲领,以及其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也都是在南京制定、颁布和实施的。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后期,面对当时占优势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太平军浴血江苏大地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864 年 7 月的“天京保卫战”,更是演就了一幕动天地、泣鬼神的活剧。太平天国英雄们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今天,在他们浴血奋战、光荣捐躯的江苏和南京,我们对近代中国反封

建、反侵略先驱者们的怀念,也就格外真切、格外意义重大。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爱国壮举将彪炳青史、千古永存。

我们纪念太平天国运动,宣传它的伟大业绩,就是要弘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传统,弘扬革命先驱者的爱国主义精神。目前,我们正面临着纷纭复杂的国际环境,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任务,迫切需要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太平天国运动所体现的革命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正是我们团结人民,激励人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财富。因此,我们要运用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近代历史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增强中华民族自信、自立、自强意识,并且把爱国热忱及时引导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而奋斗中去,在自己岗位上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

二、要认真总结太平天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中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历时 14 年,席卷 18 个省取得了辉煌战绩,但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绞杀下,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失败了,这其中有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中国近代农民的爱国理想和救国方案为什么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呢?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近代的工人阶级,太平天国革命仍旧是一个没有先进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三、要通过纪念太平天国运动,进一步振奋精神,凝聚力量,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

新年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科学规划了“八五”期间和今后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和措施,是指引全国人民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纲领性文献。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胜利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在九十年代巩固和发展八十年代取得的成就,大力促进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今年是“八五”计划的头一年,也是继续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要继续专心致志地抓好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巩固和发展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生产力的发展,继续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和道德素质,任务格外繁重和艰巨。除了太平天国运动140周年外,我们还将迎来建党70周年,辛亥革命80周年等革命历史纪念日。要充分利用这些时机,教育广大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贯彻执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埋头苦干,为胜利实现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宏伟任务而努力奋斗!

责任编辑 霁明

(总119) · 7 ·

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而农民阶级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不可能制定明确的革命纲领,不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不可能长期地维持革命的纪律;他们缺乏用科学的方法总结革命经验,并用这些经验来指导革命实践的能力,因而不能将自己的爱国行动引上正确的道路;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虽然表达了亿万农民要求推翻封建统治的强烈愿望,但是把小农自然经济理想化,要求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制度,这显然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只能陷于空想。悲壮的太平天国革命以血的事实说明:农民的救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民仍然在黑暗和挫折中痛苦地摸索。

太平天国革命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都提出了自己阶级的爱国理想,设计过自己阶级的救国方案,但由于找不到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遭到了同太平天国一样的历史厄运。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组成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爱国革命斗争才发生了历史性飞跃,走上了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近、现代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历史,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不是什么人的主观臆断,而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我们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深刻经验教训,就要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前,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使得在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突出起来。近一年来,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和面向基层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并且发展势头很好,但要深入坚持下去。我们要利用纪念太平天国运动140周年这个极好的时机,通过总结太平天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来充实社会主义教育的具体内容,更加扎实、富有成效地深入开展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进一步热爱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把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升华为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把个人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

纪念太平天国反侵略的伟大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罗尔纲
著名太平天国史学家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1年1月11日,今年是太平天国起义140周年纪念。

太平天国革命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农民为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为争取自身的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改变而进行革命战争,是史不绝书的。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起义是与以前的农民战争相同的。但是太平天国起义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敌人。因此,太平天国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如同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那样担负起反封建的任务之外,还要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保卫中华民族的新任务。

当今世界风云变幻激荡,我们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不仅要发扬她反封建的精神,更要发扬她反抗侵略的精神。

早在金田起义之前,洪秀全就曾明确地提出:世界各国之间应当“各自保管其自有的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我们将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①。这表明了太平天国主张国与国之间友好相处、反对殖民侵略和民族压迫,并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互通有无的鲜明原则。

建都天京后,英、法、美三国公使先后到天京访问,要挟太平天国承认他们与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并以诉诸武力相威胁。太平天国领导人态度坚决,拒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怒斥侵略者贩卖鸦片的罪行,告诫他们不要帮助清政府,严正地宣布了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万国皆通商”,“害人之物为禁”,“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准到镇江焦山下,听守镇江大员办理”^②。太平天国对于擅自闯进境内的外国兵舰,立即开炮轰击,对于走私贸易的商船加以制裁,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革命精神。

辛酉十一年(1861年)冬,英国侵略者在清政府方面取得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准备大规模干涉太平天国革命之前,还用利诱、威胁的手段,要挟太平天国答应与它平分中国、帮助打倒清朝,否则采取行动。太平天国赫然震怒,立即进军上海,传檄外国侵略者,倘敢“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③。上海是中国的领土,而外国侵略者竟然阻挠太平天国收复上海,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太平天国毫不动摇地采取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在这种场合所唯一可能而且必须采取的办法向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攻击。这就是太平天国的反侵略的决策。

在反侵略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受到了太平天国军队的重大膺惩。《李秀成自述原稿》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其即败”。李鸿章报告清政府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敢出击贼”^④。左宗棠复曾国藩信说:“青浦、嘉定二处,发逆靡至,夷兵遽退,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⑤。当时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把外国侵略者打得一败再败,以至于战则即败,不敢见仗,显示出中国人民无比坚强的反侵略的力量,在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业绩,鼓舞了千秋万载的中国人民!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 ①据韩山文(T·Hamburg)《太平天国起义记》第九章。
- ②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告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谕》。
- ③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告尚海松江人民清朝兵勇及外国侵略者谕》。
- ④《李文忠公奏稿》卷一《西兵退出嘉定折》。
- ⑤见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十六清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议复印度兵助剿折》引左宗棠信。

洪秀全得胜县得胜

● 臧筱春

一百多年前,天王洪秀全将两千多年沿袭旧名的秦置古城益阳县,竟改为“得胜县”,这是什么原因呢?据《益阳县志·地理·祥异》篇载:“道咸间,洪杨军自县舣舟南下,与向荣军曾作战于县南。然为时未久,洪军且易名为得胜,以作纪念”等语,但未把事情说清,使人不甚了了。

经查有关史料,得知原委:清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太平军进据湖南,平道州,下郴、桂,一路势如破竹。而当时湖南的“天地会”,因政治主张吻合,也闻风附义,自此太平军更为强大。七月,西王萧朝贵轻骑袭长沙,日久围城不下,且遭炮击身亡。天王洪秀全怒不可遏,率军离郴州直扑长沙,专意替萧报仇,虽多次强攻,却未能攻破,只得放弃省城。乃于十月十九(阳历为11月30日)深夜,冒雨抢搭浮桥,摸黑渡过湘江,到西区与翼王石达开部会合。闹夜行军,翻山越岭,疾趋宁乡,急捣益阳。与此同时,还组织小队人马,摇旗呐喊,佯击湘乡。果然诱得清将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大军尾追至湘潭,从而牵制了敌人的主力。十月二十二下午未刻,东王杨秀清的前锋部队抵达益阳,知县李瀚章闻风远遁,不知去向。太平军探知城东资江南岩千家洲头(今益阳县赫山镇团洲村)刘公滩水浅,于是凫水过河,直奔县城东门。太平军在东门外起春亭见张有都司“安民榜”,遂纵火焚亭,然后进城。东王为迎接天王,征得大小木船,编为浮梁,以待大军横渡资江。

这时,洪秀全、石达开大队人马到县南沧水铺,听得捷报即开大会庆祝,天王亲登讲坛,宣讲太平军的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世界。百姓听后,欢声雷动,当场要求入伍者上千人。第二天,天王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益阳城。

清廷责成追剿太平军的广西提督向荣,于二十三日率军赶至益阳,驻河南陆贾山(今地区齿轮厂后)紧逼县城,隔江相峙。常德总兵纪律亦受召增援来益,与向荣部两军会合,雄踞江南,声势浩大。天王在江北县城内获悉敌情,立请诸将计议,决意将向荣纪律杀个下马威。诸将授得“先分后合,轰炮掩杀”密计,遂挥旗率众抢渡资水。兵分三路:中由龙洲书院

(现益阳市第二中学)前,右绕桃花仑侧,左径三里桥后,围击陆贾山。向荣遣先锋迎战于山下,败于太平军前部,直追杀到碧津渡,刺毙多名。及至太平军取齐,登上桃花仑,与陆贾山逼近,施放无数轰天巨炮,打得清兵七零八落,势不能支,全军大溃。总兵纪律慌不择路,拨马落荒逃走,被太平军截死于茶亭街桥下,其首级当即悬竿示众。清军眼见丧帅,大伙抱头鼠窜;太平军趁势掩杀,向荣拔营东逃。自三里桥至石头铺十来里的路段内,杀死清兵800多人。而提督向荣被追杀得魂飞魄散,龟缩在离城20多里的宁家铺,再也不敢下山。次日,太平军打扫战场,将沿驿道的清军尸体,集中掩埋到羊舞岭的一个土丘边,当时叫做“千家坟”。后来,由土语转音称为“天子坟”。连文学家周立波写作的《山乡巨变》,也书成“天子坟”;不过,他连忙在书后声明:要“让考古学家去查证”吧。

太平军打败向荣、击毙纪律、得胜回城,满街军民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天王洪秀全传下谕旨“改益阳为得胜县”以志庆。太平军本“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以夺天下”计,在益阳县城仅往四个昼夜,日间大力号召县民献船,募得几千余艘,适值资江发水,陡涨数尺,于是决议挥师岳州(今岳阳市),东征武昌,战取南京。

十月二十六早大雾。太平军主力乘舟沿江顺流直下。天王到沙头(益阳辖地,距县城30里),住宿一宵。翌日登岸,在陈家祠堂门首(今沙头邮局前坪)开了大会,又接收参军者数百人。然后拔锚启航,朝洞庭湖进发。十一月初三,进驻岳州城。

后来,太平天国编著的《天情道理书》中写道:“如在长沙驻扎日久,则益阳等处江河船户不免为妖魔哄吓,远遁他方,我百万雄师何由得舟楫之便而沿流以破武昌乎?”可见,益阳一战,既挫败了追随堵击的清军,又征募了大批兵勇,尤其是获得了几千艘船只,对当时只有旱路人马的太平军,从毫无基础到建立强大的水师,能够顺利地破武昌、夺南京,其作用重大、影响深远。天王喜名得胜县,名符其实。

(责任编辑 霁明)

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

——中国近代革命传统的集中代表

● 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茅家琦

任何一位革命家都同时是改革家。通过革命推翻政权，建立新政权，推行和旧政权不同的改革。

鸦片战争使中国少数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要求改革。但是，腐朽的清王朝统治集团昏睡不醒，不思改革，成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阻力。社会要发展，国家要振兴，非要推翻它不可。洪秀全适应这个历史发展的需要，发动了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洪秀全是一位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改革家。他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封建土地制度问题；他同意《资政新篇》以解决中国近代化问题。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两年，1866年，孙中山诞生了。幼年时代的孙中山受到太平天国革命传统的教育和影响。据说，他的启蒙塾师就是一位太平天国老战士。稍长，孙中山努力“搜索太平天国逸事”，阅读有关太平天国的书籍，对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将领所指挥的战役，十分熟悉。他十分佩服洪秀全，称之为“反清第一英雄”。他经常谈论洪秀全，因此在香港读书时，同学们就称他为“洪秀全”。孙中山也引以为荣，自居“洪秀全第二”。他把自己的革命事业和继承洪秀全的未竟事业联系起来了。

1902年，孙中山提请留日学生刘成禺（汉公）撰写太平天国历史。次年书成，名曰《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亲自为它作序。刘成禺回忆这部书写作缘起时说：

“一日，先生与犬养在红叶馆闲谈，招予至座。有七十翁海军大使曾根俊虎，曾参李秀成太平天国军幕，著有《满清记事》一书，凡三十万言，皆记当时满清太平十一年战绩，间及逸事。予至，先生曰：‘适与犬养先生论及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曾根先生所著《满清记事》专载太平战事，且系目击。吾予子搜罗遗闻，撰著成

书，以《满清记事》为基本，再参以欧美人所著史籍，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于是，曾根出《满清记事》，先生出英人吟喇所著太平天国二巨册，图凡百幅。犬养亦出英人著Taiping Rebellion。曰：‘此吾党不朽之盛业，予宜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细大皆录之。’壬寅授书，癸卯书成，凡十六卷，先印六卷，先生序之余未出版。”^①

孙中山继承了太平天国的革命传统，也批判了太平天国存在的严重错误，并在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有了创新，例如，他批判了太平天国的帝王思想。孙中山曾指出：

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皇帝，闭起门来自相残杀。第一是杨秀清和洪秀全争权。洪秀全既做皇帝，杨秀清也想做皇帝。……韦昌辉把杨秀清杀了之后，也专横起来，又和洪秀全争权……。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的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道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后来到了南京，经过杨秀清、韦昌辉内乱之后，便想不再封王了。后因李秀成、陈玉成屡立大功，有不得不封之势，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他们或靠不住，于是又封了三、四十个王，使他们彼此位号相等，可以互相牵制。但是，从此以后，李秀成、陈玉成等对于各王便不能调动。故洪秀全便因此失败。所以，那种失败，完全由于大家想做皇帝。”^②

孙中山在批判太平天国帝王思想的同时，宣传“人民来做皇帝”的民主共和思想，在推翻清王朝统治以后，他要对中国社会进行资本主义共和国的改造。

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孙中山的

未竟事业。毛泽东誉孙中山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革命先行者，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是后继者。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曾经宣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又说：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①

毛泽东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同时也发展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把中国推向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由此可见，洪秀全——孙中山——毛泽东，集中代表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传统。后一代继承了前一代的革命和改革事业，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中国革命和改革事业。我们从这个传统出发，可以更完整地认识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①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见《国史馆馆刊》，创刊号。据考，曾根俊虎为海军大尉，非大佐，亦未入李秀成幕；

②《孙中山选集》，第676页；

③《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33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39页。

《史志文萃》征订启事

《史志文萃》系湖北大学主办，自1985年创刊以来，一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订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在学术问题上，本刊坚持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一切从修志实际出发，对不同的学术见解，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讨论，提高认识，以保证志书质量。

《史志文萃》根据修志工作的实际需要，设置《史志研究》、《史志编写》、《争鸣园地》、《史志撷英》、《档案管理》、《年鉴编纂》、《史志动态》、《历史教学》等栏目，供广大修志人员和教学人员参考深受读者欢迎。

本刊为双月刊，逢双月出版，每期80页码，定价1.75元，另加包装邮寄费0.15元，共计1.90元。全年6期，合计11.40元。

本刊尚有下列存刊，欢迎一并订阅：

一、1990年合订本，每本定价14.50元(含包装邮寄费，下同)；

二、1989年合订本，每本定价13.50元；

三、1988年第4期，每本定价1.16元；

四、1987年合订本，每本定价8.00元；

五、1986年第2期，每本定价1.45元。

订阅以上书刊敬请由邮局汇来。邮汇地址为：

武汉市武昌保集安

湖北大学《史志文萃》杂志社发行处

邮政编码：430062

订阅30份以上者，款也可以由银行汇来，但订户卡需另从邮局寄来。信汇帐号为：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徐家棚办事处

户名：湖北大学 帐号：2489——2

湖北大学《史志文萃》杂志社

南京地方志 挖掘宝库——金属探测器

我厂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制出TJ89型及TJ76型金属探测器，它能识别地下5米、2米内任何金属物的准确位置。如遇金属物时此机即发出报警讯号，适应公安海关、地质探矿，及帮助人们“透视”发现藏于地下的金银珠宝等。据数百家用户反映，使用我厂生产的金属探测器都能得到较高的经济价值和满意的效果。TJ89型1780元/台，TJ76型675元/台。本厂并办理邮购业务(请勿电汇)，质量三包，欢迎来人来函选购。资料备索，需要请邮款2元，款到即付(含邮件费)，邮政编码537200。

法定代表(厂长)郑生。业务联系：单海东，广西桂平县瑞端电器厂。

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



●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 研究员 沈嘉荣

140年前,洪秀全、杨秀清等英雄,率领山村农民、矿工,在广西金田村高高举起“太平天国”这面光辉的旗帜,跨二湖,过三江,仅仅用两年多时间,就攻克了江南重镇——南京,从此在这里建都立国,同内外反动势力斗争达10多年之久。怎样评估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我想应当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则,即“判断历史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从对待外国侵略者的态度,与同时代的清政府比较。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时打时和,举棋不定,对林则徐等禁烟派时奖时惩,喜怒无常。其思想根源是对世界情势两眼一摸黑,起初以天朝上国自居,夜郎自大,视外国为蛮夷之邦,真正打起来,又被洋枪洋炮所威摄,只得屈膝求降。太平天国高明之处在于:既坚持反侵略斗争的原则立场,又在斗争中注重发展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其主张开展正常贸易,反对鸦片入口。东王杨秀清宣布:“平时时不唯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②还说:“凡食洋烟、水旱等烟……皆我主天王遵天父圣旨斩邪不赦也”^③后期洪仁玕执政时也严正宣布:禁“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绝其栽种之源,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走私者杀无赦。”^④在当时,对鸦片烟的态度问题,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政治立场问题。在交往中,太平天国领导人欢迎外国人到天京参观访问,但坚持必须履行一定手续,反对暗助清妖。1853年4月28日,太平军镇江守军致濮享的文书中称:

为通晓礼制,令仰远方兄弟知照事:

天父皇上帝派遣吾主临凡即为天下万国之真主。天下臣民有愿来朝者,对于礼制必须严格遵守。彼等必须具文奏明,自为何人,所操何业,来自何处,先行具奏,始准朝见,此谕。^⑤

在另一份由罗大纲署名的照会中,揭露了侵略者暗助清妖的卑劣行径:

兹前者贵邦船至,随后则有伪清妖船,今贵邦复有船来,而清妖船又于后。在贵邦以诚信待人,弟处亦不疑及。惟目下天人应顺,正兴(汉)灭满之时,谅诸明公通达气运,不待询之。今弟处非阻通商,终以两下交兵,恐其往来不便。依揆情势,须俟三两月之间,天尽妖清,庶贵邦之往来不受伪清之欺侮也,不亦宜乎?

该照会又附一注:“昨日贵请愿书无印,兹亦略而不用”^⑥。可见,太平天国对来天京的外国人,先得在镇江停靠、登记、通报、查明“何人,所操何业,来自何处”,始准放行,象不加盖印章的请愿书,则不予接待。可谓有理有节。太平天国领导人还严正驳斥了列强妄图侵占中国领土的无耻要求。1861年12月,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偕参赞巴夏礼至天京觐见洪秀全,提出欲助太平军打倒清朝,事成后平分中国,天王义正辞严指出:“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⑦

当侵略者撕下“中立”伪装,太平天国将士,敢于用土枪土炮与侵略者搏斗,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精神。在江浙战场上,击毙侵略

军头目卜罗德、法尔思德、华尔、勒伯勒东等多人，使敌人丧胆，连曾国藩都哀叹：“夷人畏长毛，亦与我同”^①。可贵的还在于，太平军在斗争中，深化了对侵略者危害性的认识，李秀成总结出“防鬼反为先”的思想，洪仁玕认为：“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从先前称作“洋兄弟”到后来斥之为“鬼”，反映了认识上的飞跃。更加可贵的是，太平军一面与侵略者兵戎相见，一面又不断通过购买、缴获和仿造，逐步用洋枪洋炮武装自己。如青浦之战，太平军从华尔洋枪队手中缴获洋枪 2000 余条，大炮千余尊，洋庄（洋铁炮）100 余尊。正如李秀成所说：“取到其炮，取到车炮架，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我在太仓抢得炮样，业经制与其一样无差，今南京城内上（尚）有此种。”^②

从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水平上，与历代农民起义相比。太平天国把旧式农民起义推到了高峰，其规模之壮阔，纲领之完备，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无法比拟的。其一，太平天国已经从旧式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中逐步摆脱出来，重视根据地的建设，基层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等。其二，太平天国注重政策，起义之初，主要用“打先锋”来解决队伍给养，即剥夺地主浮财。天京政权建立以后，便明确“照旧交粮纳税”，这不仅是赋税制度，而且是农村基本经济政策，以利于安定民心，稳定大局。其三，从“口号”发展为纲领。如秦末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试图以“有道”伐“无道”，绿林起义军劫富济贫，唐末农民起义明确提出“平均”口号，宋代农民起义进而提出“平等”，明末农民起义军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只有太平天国订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书面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试图平均分配土地和消费资料，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暖”的极乐境界。尽管这个纲领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反映了农民的理想，对群众有鼓舞。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打击是沉重的。孙中山就以洪秀全第二自诩，继承太平天国遗志，终于距太平天国失败后不到半个世纪，就推倒了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统治。

从推进中国近代化，与洋务派及维新派比较。1859 年，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任太平天国干王，主持朝政，根据他在香港广泛接触到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会，撰成《资政新篇》，提出了

中国近代化的蓝图，具有开拓性的历史价值；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力，他汲取欧美近代化的经验，提出优先发展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工业，开办银行和发行纸币，而且明确生产资料私有制，承认贫富差别。奖励创造发明，保护专利权，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材，“凡外帮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也。”为了发展工商业，提倡“富民”、“有财者”投资兴办实业，并雇用“穷民”、“贫民”让其“自食其力”，“自养其身”。在政治上，主张革故鼎新，对西方“写票公选”的制度颇为推崇，主张中央集权，反对“朋党之弊”，实现“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惩治贪污，“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使每个官员将领做到“护国卫民，除奸保良”。在思想上，革除传统的“重本抑末”的观念，把“士农工商”的顺序，改为“商贾士民”，而且政府给予多方支持。对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进行更新，“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知、亲爱等意”。在风俗习惯上，革除封建性的陈腐习俗，如禁烟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禁溺子女；禁演戏修斋建醮；革阴阳八煞之谬；除九流，改造游手偷闲的惰民；革男子长指甲，女子裹脚。兴办一些有利于民众的公共事业，如医院、礼拜堂、学馆、四民院、四疾院，等等。《资政新篇》的问世，说明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或多或少地看到了自身所处的历史大转折时代，试图顺应历史潮流，变贫困积弱的中国为繁荣富强的中国。《资政新篇》的意义，比后来的仅仅在“船坚炮利”上打主意的洋务派，比抱住一个傀儡皇帝搞变法的维新派，不仅时间早，而且内容上更具有全面性和彻底性。

太平天国运动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运动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但从上述比较看出，其功绩是第一位的。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 ①《列宁全集》第二卷第 150 页；
- ②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第 300 页；
- ③《太平天国史译丛》第 1 辑第 110 页；
- ④《太平天国史料》第 42 页；
- ⑤《太平天国》（六）第 907 页；
- ⑥《李秀成自述》；
- ⑦《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6。

毛泽东的思想认识 太平天国革命与

●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经盛鸿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毛泽东同志对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认真的研究。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评价与精辟见解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即青少年时期与确立马列主义世界观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时期。

1920年以前是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在这时期,由于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十分了解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因而他从小就同情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座大山重压下的广大农民的不幸,支持贫苦农民起来反抗,还立志长大后要为农民写书。^{〔1〕}在这个时期,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未接受马列主义,还不能从理性上正确认识中国历次农民革命运动及其伟大作用,特别是对太平

天国有偏颇的看法。毛泽东的外婆家在湘乡,这里正是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的发源地,曾国藩就是湘乡人。还由于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所敬爱的杨昌济老师的影响,使得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十分推崇湘军的“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等人。1915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向杨昌济求学。杨昌济在4月5日日记中曾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2〕}青年毛泽东深受杨昌济的影响,认真研读曾国藩的著作。在1917年8月23日他给友人黎锦熙的信中就写道:“愚意所谓本源者(曾国藩语),倡学而已矣。……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3〕}充分表露了他对曾国藩的高度敬仰。再如对胡林翼、胡字润之,青年毛泽东也字润之,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左宗棠在早年自撰的一副对联,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之句,志向远大的青年毛泽东将这句名言移植过来,改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二者之间更有着显然的思想联系。从这些史料可以粗略地看出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对太平天国运动(“洪杨”)的偏颇与不成熟的看法。

在1920年以后,毛泽东开始确立起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在以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立场、心胸与眼光,除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注重社会调查与投身革命实践斗争外,还始终重视研究历史。他根据革命的需要,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论,对太平天国这场伟大的农民革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不仅摆脱了早期的一些偏颇看法,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光辉的论述。

首先,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革命精神。他指出了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的必然性,“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4〕}他十分赞赏农民的革命精神,说:“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的伟大作用,他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还指出,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

农民起义,它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生的,因而带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他还将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一道,誉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对太平天国革命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联合绞杀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说:“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字里行间,表露了毛泽东对太平天国先烈们的无限敬仰与怀念之情。

第二,毛泽东从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及其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认清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领导阶级与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毛泽东正是从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经验教训中,从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与中国农村的调查中,认识到“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时,他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正确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指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搞城市暴动的经验,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发动农民,搞土地革命,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军队与农村革命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就是光辉的井冈山道路。毛泽东从农民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也认识到农民阶级虽然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中国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阶级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思想教育,这不仅是由各阶级的特点所决定,也为中国近代历史事实所证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第三,毛泽东从太平天国千百万革命农民为之浴血奋斗与不懈追求的“天国理想”中,既看到了中国广大农民千百年来向往的没有剥削与压迫、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的合理内核,又看到了这种农业社会主义脱离生产力水平、片面鼓吹绝对平均主义的落后性与空想性。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及其他许多文件,以美好的语言描绘与表达了广大农民的社会理想:“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土地公有,平均分配,财产归公,建立“圣库”等等。这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从《礼记》大同篇、张鲁五斗米教、李自成“均田免粮”直到太平天国这

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峰,它是直接对抗那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合理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合理性与革命性。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十分热爱与理解农民,因此他始终支持与爱护农民的这种积极性。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也从理论上与实践上为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作了有益的探索与必要的准备。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人将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力图实现而无力实现的社会主义空想变成了科学,变成了光辉的现实。毛泽东并对太平天国农业社会主义的落后性与绝对平均主义作了一定的批判,他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这是十分科学的结论。

第四,毛泽东高度重视太平天国革命在近二十年复杂的斗争中所积累的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极为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并自觉地将这些经验与教训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重要的借鉴。如在革命队伍中怎样保持廉洁与谨慎,防止骄傲与腐败,如何加强团结与统一,防止分裂与宗派主义等等。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1日特地写信给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希望他继《甲申三百年祭》后,再写一篇总结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经验的文章供中国共产党人借鉴。毛泽东在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事业是庞大而复杂的。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想不犯或少犯错误,办法之一就是要认真学习与总结历史经验。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写道:“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的史论、史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体察到毛泽东对总结太平天国等历史经验教训的史论、史剧是多么的重视与要求的急迫。毛泽东真不愧是一位酷爱学习又善于学习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的斗争业绩与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更是复杂。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在研究与

太平天国

的图书机构

天津南开大学 徐 健

太平天国革命延续十四年,波及十八省,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太平天国所编印的书籍,曾在其所辖地域内广泛散发,产生过重大影响。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已将国内外发现的太平天国书籍辑为《太平天国印书》出版。而关于太平天国从事图书事业的机构,或因限于资料,尚未见专文论及。兹就所见,略述如下:

太平天国在起事当年即开始刻印图书。如太平天国经籍之一《太平礼制》封面题“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新刻”。既有刻书,当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主管其事。壬子二年四月,李寿辉被封为“正典镌刻”,则迟在太平天国二年已有专门负责刻书的职官。定都天京后图书机构的设置情况,仅在当时清方反映太平天国事迹的文献中有零星记载,然尚可赖以考见其梗概。这些机构有镌刻衙、刷书衙、诏书衙、删书衙等。

《粤逆纪略》:“伪镌刻衙,主为贼刻伪书。”《贼情汇纂》:“典镌刻四人,主刊刻伪诏旨伪书。”是则太平

天国刻书机构称“镌刻衙”,负责刊刻太平天国编辑的书籍。镌刻衙的官员称“典镌刻”,共四人。前文提及李寿辉任“正典镌刻”,说明此官职分正副。典镌刻主要负责校对工作,校对无误,再交与刻工付梓。《金陵杂记》称:“贼在广西两湖掳得刻字匠,为伪镌刻……至江境又掳得此项匠人甚多。”可见太平军中有不少刻工。其仍从事刻书的,当在镌刻衙归典镌刻管辖。镌刻衙设在天京城内的“复成仓大街。”

“刷书衙”这一称谓见《金陵省难记略》。《金陵杂记》也有记载:“贼造伪书并首逆等伪示,间亦有印刷者,派令伪刷书衙贼将掳得刷书匠胁令刷印,馆在文昌宫后檐。”“伪刷书衙贼”者,以其可“胁令”他人,当即为刷书衙主管官员。其称谓及人数未见记载,而工匠是很多的。据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三月到天京访问的英国海军上尉费士班说,当时“有四百人终日从事印刷,向外分送。”^①但这似乎仍不能满足复制图书的需要,便使能写字者为其抄写。现存太平天国经籍《钦定敬避字样》和罗尔纲访得的一本《天条书》即

认识评价太平天国史时,也不可能没有一些失误与教训。例如,毛泽东在晚年不加分析地提出“造反有理”,甚至将这种“造反”原理搬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搬到革命队伍内部,甚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一严重失误的做法。再例如,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从《礼记》的大同篇,到张鲁的五斗米教,直到太平天国的“天国理想”,虽有一定的批判,但缺少必要的深刻性与彻底性,有时还十分欣赏,到他晚年甚至加以提倡推广,这都是受到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从而使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挫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党对这些失误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总结,并在工作中进行了纠正。

总之,毛泽东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高度重视与一系列科学的认识评价,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思想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 淑 玉)

注: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2〕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见1921年3月25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3〕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转引自《青年毛泽东》154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4〕以下所引毛泽东言论,均见《毛泽东选集》与《毛泽东书信选集》。

为抄本。

从字面看,诏书衙似仅与天王诏旨有关,其实不然。太平天国的“诏书”与历代帝王的“诏旨”并非同一概念,其内涵既包括天王的各种命令,亦包括太平天国编印的各种书籍。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录“诏书衙联”云:“诏出九重天,哪怕妖魔施毒计?书成一统志,岂容狐兔竞横行?”则诏归诏,书归书,合而称之,谓“诏书”。在已发现的四十余种太平天国经籍中,有许多于卷首印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如《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新历》卷首“诏书总目”列有二十九部太平天国经籍。太平天国称自己的书为“诏书”,与诏书衙名正合。故诏书衙亦为图书机构。

诏书衙职官设置及职掌各处记载不一,且不甚明确,考订稍费周折。

《贼情汇纂卷三伪官制·伪朝内官》:“典簿书正副共四人,即伪诏书衙。典诏命正副二人,主缮写伪旨。宣诏书正副又正又副共四人,主收发伪书。”

“典簿书”为职官名,“诏书衙”乃机构名。称“典簿书……即伪诏书衙”,于理不通。其意应指典簿书系诏书衙官员。从这段记载的行文看,似“典诏命”及“宣诏书”亦属诏书衙。

《金陵杂记》:“广西通文理之贼为伪正副典诏命,大约系述写洪逆言语,捏造伪书,缮写伪榜等事,住富民坊。”

《金陵杂记》:“贼专贴伪示,有伪宣诏衙者,奔走贼也,馆在城北未详。”

合观《贼情汇纂》及《金陵杂记》所记,典诏命为正副二人,编辑书籍是其职掌之一,并负责撰写榜示等。宣诏书掌收发书籍,张贴榜示,故须四处“奔走”。

《粤逆纪略》:“伪簿书衙,主批伪本”,“伪承宣衙,主宣伪诏”,“伪诏命衙,主为贼写伪示。”

据此又可知典簿书的职掌为批复奏章。故诏书衙的三种职官中,典诏命与图书的关系最为直接。不过,与“典簿书”、“典诏命”、“宣诏书”的职官名相对应,有“簿书衙”、“诏命衙”、“宣诏衙”的官署名,又似三者各为独立机械。与单看《贼情汇纂》的记载所能得出的结论抵牾。或因三种职官分住各处,《金陵杂记》及《粤逆纪略》的作者即据此各以“衙”名之。但考虑到《贼情汇纂》乃据曾国藩所获太平天国内籍及被俘太平军兵口述等多种资料撰成,所记当更为可

信。②《贼情汇纂》又载:“癸丑七月,安徽望江县伪军帅禀奏保荐望江生员龙凤璠有安邦定国之才……旋送入诏书衙学习。”在外访得贤才,先入诏书衙学习,则诏书衙兼具学术机构性质。

《金陵省难纪略·贼伪官名》载太平天国有“诏书衙、镌刻衙、刷书衙,后又添删书衙”。同书《洪贼改字删书》节称:“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又添删书衙,使春官丞相卢贤拔主其事,择能文书手佐之。”③两处记载均称“又添删书衙”,是删书衙设置稍晚。《贼情汇纂》载卢贤拔“甲寅二月封镇国侯……五月杨贼令在删书衙删改《六经》。”甲寅年系太平天国四年,故删书衙至迟成立于是年五月。参加删书者除卢贤拔外,可考者尚有一人。一是天官又副丞相曾钊扬。《贼情汇纂》载:“甲寅二月,洪逆下伪诏,删改《六经》,以钊扬总其成。”一是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甲寅二月升夏官正丞相,与曾钊扬等删改《六经》”。一是夏官副丞相赖汉英,因攻江西省城不下,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九月,被杨秀清调回,“革职删书”。《贼情汇纂》记此四人居所均在“江宁明瓦廊大街前户部郎中梅曾亮宅”。《金陵癸甲纪事略》称:“贼王居伪名府,贼官居伪名衙。”则四人居所亦即删书衙署。又四人皆官居丞相,乃太平天国最高官阶,④足见删书衙非等闲机构。

太平天国建立了如上所述的一套图书机构,编辑、刻版、印刷、散发、改定等事,各有职司,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堪称空前。虽据现史料仅能勾画轮廓,但睹枝柯亦可想见其扶疏,故略述如上。

责任编辑 霁明

注:

①费士班:《中国印象记》三九一页,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

②《贼情汇纂序》:“俘获贼中文籍,汗牛充栋,更得彼中有心计者来归,出俘件使辨之,所指悉不谬。”“凡例”又云:“贼中伪制……安由苦思索解,始得端绪,必须层层推究,方能明晰,若以简炼出之,恐多遗漏。”(见《太平天国》第三册)可见此书记事可信程度较高。

③《太平天国》第四册;④太平天国有王、侯,乃爵位。官阶以丞相居首,次为检点、指挥、将军等。参见郅纯著《太平天国制度初探》。

新发现的

太平天国乙荣五年门牌及其价值

● 章义平

编户注籍,颁发门牌,是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的重要举措,在太平天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和影响。由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肆意摧残,时称“汗牛充栋,人人习见”^①的太平天国文书、公据,至今残存不多,其中太平天国颁发的户籍门牌,为数更少。湖北省嘉渔县近年发现的“北殿户部尚书”门牌,是目前湖北发现的唯一太平天国门牌实物,也是全

国发现的唯一木刻版刷的乙荣五年门牌。

值此太平天国金田起义 140 周年之际,发表公布于世,以饕读者。

该门牌浅黄皮纸质地,木版蓝刷兼墨书填写,高 68 厘米,宽 50 厘米,长方形。除中部和下边略有破损外,保存基本完好。见下图:

牌 门												
太平天国乙荣伍年	合家男妇总共		叔	伯	弟	兄	孙	子	父	祖	现年	太平天国
月	名	侄	叔	伯	弟	嫂	媳	妻	母	婆	家丁	湖北省武垸郡嘉渔县
日	立	媳	婢	母	媳						列后	乡距城里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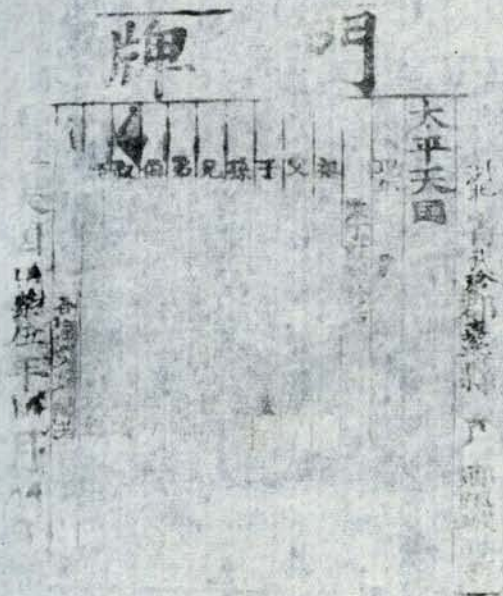
“月”、“日”前皆空白未填,为“太平天国乙荣伍年月日立”。所盖钤印为长方形殊色,高 16 厘米,宽 8 厘米。印文为扁宋体字阳铸,刻“太平天国北殿户部尚书”十字,四周阳铸双龙戏珠海水纹饰。

现据门牌诸特征及有关史料,分析如下:除刷印的固定格式外,此门牌仅用墨笔填写了“湖北”省、“武垸”郡、“嘉渔”县,及太平天国“乙荣五”年,未填写户主姓名、年龄、家庭成员,所居乡村官组织名称和颁发月日,显然是一件尚未正式填发使用的半空白门牌。

该门牌的钤印印文为“太平天国北殿户部尚书”,显然是北王韦昌辉属官“北殿户部尚书”使用的钤印。

该门牌的发现,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目前已发现的太平天国门牌原物,约有四、五十件。其中太平天国前期填发的仅有三件,即: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殿右十二检点发给安徽省安庆郡望江县小北门太慈乡徐怀文门牌;②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殿右十二检点发给安徽省安庆郡桐城县东门外黄广元门牌;③太



太平天国乙荣年五年门牌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殿左二十一检点发给安徽省安庆郡桐城县羔军洞朱浣增门牌。^④其余基本为后期辛酉十一年和壬戌十二年填写的。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填发的门牌,过去一直没有发现,此次尚属首次,填补了现存太平天国门牌中乙荣五年的空白。为研究太平天国乙荣五年间户籍门牌制度实施情况,提供了唯一的实物资料。

其二:湖北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根据地和西征的主要战场,西征军所到之年举乡官,造家册,发门牌,势在必行。张德坚《贼情汇纂》辑录的太平天国门牌里,就有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湖北省黄冈郡黄冈县监军彭某颁发的门牌。但该物是时人誊录的抄件,并非原物。而“北殿户部尚书”门牌,不仅是太平天国西征军在湖北的历史遗物,而且也是目前在湖北发现的唯一太平天国门牌原物。对研究太平天国西征历史

和湖北地方史,不无裨益。

其三:现存太平天国前期门牌,是太平天国户籍门牌制度草创之初的产物,多为墨笔手书。不仅易误书或被伪造,而且遇到众多需求时,常常供不应求,贻误大事。鉴于此点,太平天国后期所发门牌几乎全为木版刷印。嘉渔发现的“北殿户部尚书”门牌,为乙荣五年填写,虽属前期门牌,但却为木版刷印件,这在目前发现的前期门牌中绝无仅有。对分析研究太平天国户籍门牌制度和印刷业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其四:为研究太平天国前期职官、钤印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譬如:太平天国前期,天王以下封东、西、南、北、翼等,西王以下俱受到东王节制。东王杨秀清大权在握,其六部实质为太平天国前期的内阁,辅助东王处理日常军政大事。东殿六部尚书及其属官,不论人数、级别,还是使用钤印,与其它诸王皆有差别。以户部为例,东殿户部设尚书十二人,皆取同检点。而北殿户部尚书仅六人,取同指挥,低一个职别。至于钤印,“伪东殿各尚书之掌书,颁给印信”。而其它诸王各部尚书的“掌书书理六曹执事,若胥吏而已”,^⑤并不颁给印信。至于北殿六部尚书是否颁给印信,未曾见有史料记载,此问题一直不甚清楚。该门牌上所“北殿户部尚书”之印,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了北殿户部尚书是颁给印信的。而且六位尚书共同掌用一枚“太平天国北殿户部尚书”印,而不是六位尚书各执掌一枚钤的。因此,北殿其它五部,即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书颁印情况,也应大致如此。显然不能与东王属官相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王韦昌辉在权力、地位、待遇上,与东王杨秀清的差别,印证了有关史料的可信性。对研究当时杨、韦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宁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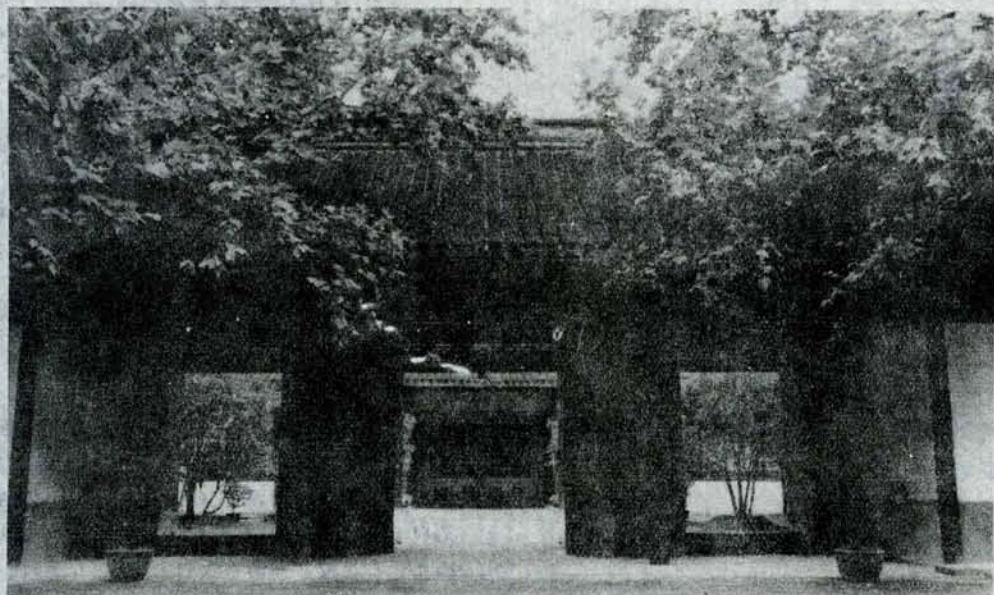
注:

①⑤张德坚:《贼情汇纂》,见神州国光社《太平天国》111;

②《文物天地》1984年第二期;

③拙作《从新发现的良民牌析太平天国在安徽的门牌户籍制度》见《安徽史学》1990年第一期;

④罗尔纲:《太平天国文物图释》第207页。



园馆合璧的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 施善苹

素有“六朝金粉”称誉的十里秦淮风光带上，有座斗拱结构式的明清建筑，高大宏伟，庄严古朴，迎面照壁镌刻有“金田起义”的大型浮雕，这就是位于瞻园路、名闻全国的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1982年3月，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六百多年前这里是明代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的中山武宁王府；清代作过藩署，屋宇多达391间，是南京地区久负盛名的明清建筑群；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东王府最初设于此，夏官副丞相赖汉英衙署及肖朝贵之子肖友和的幼西王府也曾设在这里。1953年3月在堂子街东王属官衙署原址首次举办《太平天国文物展览》，1956年10月1日成立了太平天国纪念馆，1958年5月该馆迁至现址，1961年1月太平天国起义110周年纪念日正式定名为太平天国历

史博物馆。她是我国唯一的太平天国史专题博物馆。

全馆总面积22亩，（瞻园是该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列厅及办公区占10亩，园林占12亩。）“瞻园”匾额系乾隆皇帝御笔亲题，取东坡先生“瞻望玉堂如在天上”之意。园内三座假山各具风姿，北假山陡峭雄峙，西假山蜿蜒如龙，南假山巍峨雄浑。园内海棠院与桂花园中，尚保存着九百年前宋徽宗时“花石纲”的遗物“仙人峰”和“倚云峰”，石头颇具瘦、皱、漏、透、秀之奇，堪称一绝，刻有“东坡居士书记”的“雪浪石”，酷似正在溶化中的雪浪势，古朴典雅内秀，具有动态感、透视感，每个剖面都是一道景观。该馆融建筑、藏品、绘画、雕塑、装饰、山水、花木于一体。东部的《太平天国历史陈列》和西部素以山石取胜的瞻园珠联璧合，是一座既适合人们参观学习获

得历史知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又是赏心悦目供游人休憩娱乐、获得精神享受的高雅游览胜地。

建馆 35 年来,该馆始终以办好陈列为中心,积极开展文物征集复制与科学研究工作,收藏有关太平天国史的原始档案 2000 余卷宗,1000 万字,抄录各地记述太平天国史的稿本,抄本和刻本资料 1400 万字。在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直接指导下,现已出版太平天国资料书籍 20 多部,近 700 万字,太平天国图书 6000 余册,以及各地太平天国文物和遗址照片 5000 余张。如:《太平天国艺术》、《太平天国印书》、《太平天国资料汇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吴煦档案选编》、《太平天国诗歌选》、《太平天国传说故事》、《太平天国歌谣》、《曾国藩往来信稿真迹》、《瞻园画册》、《太平天国文物》等。馆内现拥有太平天国文物 2000 余件,一级藏品 42 件包括海内外孤品“绣龙马褂”。其中太平天国刷书衙当年自行出版颁行的钦定《士阶条例》、《钦定军次实录》、《钦定英杰归真》,三种原刻本,均属国内孤本,极为珍贵;复制了全国各地发现的太平天国重要文物 5000 余件,有 1953 年在安徽当涂太阳河码头发现的《渡船规条碑》,它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树立的打击刁顽船户,保护贫苦人民利益的历史见证;有前九典圣粮刘晓谕粮户早定国库布告、干王洪仁玕发给外国友人古路吉通行证、忠王李秀成发给黄祠墓祭田凭、济天义委办锡金在城赋租总局经董薛知照以及太平军进军苏南常熟打击地主团练书写的墙头诗真迹等原件,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工商、交通各项保护人民利益的制度和政策;有反映太平天国提倡男女平等、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结婚证书“龙凤合拜”;有体现太平天国重视教育事业为娃娃馆、育才馆的少年儿童出版的通俗读物《幼学诗》封面刻版;有显示太平天国在文化艺术上可喜成就的杨柳青年画《金鱼满塘》等原件;有记述太平天国时期颁布的禁止妇女缠足、禁止娼妓卖淫、禁止聚赌、禁止吸食鸦片、禁止读黄色书刊等一系列除旧布新法令的文献,有主张向西方学习科技文化、兴办中国近代工业的洪仁玕著作《资政新篇》的复制件;有天王授权给“刷书衙”主管官员用于书籍批准颁行的

洪秀全“旨准”木印;有太平天国乙荣五年造的铜炮和当年太平军使用过的短柄枪、鸟枪、抬枪、标枪、矛叉、藤牌(盾)、擂石,有太平军抗击英美侵略者的有力历史见证——英国常胜军弁勇八百人墓碑和美国洋枪队统领华尔墓碑;梯王练业坤的墓碑它记述了天国儿女为保卫首都天京而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较为珍贵的是刻有“李秀成”三字的佩剑,曾于 1864 年被常胜军统领戈登带到英国,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的堂兄弟、陆军总司令剑桥公爵。剑桥死后辗转多人,可谓历经劫难。1961 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历史系教授柯文南先生想方设法追寻下落,终于觅得随即买下,1962 年无偿送还我国。原件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该馆保存的系本馆高级技师宋骏制作,为全国唯一的复制件,亦很珍贵。剑鞘上精工雕刻着象征太平天国最高政权的龙凤图案与象征吉祥的瓜瓞绵绵、喜鹊登梅、鹤鹿同春、万字回纹等图案。太平天国将士用生命和鲜血保存过的天王玉玺、幼天王玉玺原件现藏中国革命博物馆,该馆展出的系青田玉石精刻的复制件,做工之精细可以假乱真。有清朝苏松太道兼署江苏布政使《吴煦档案》原始资料 1080 卷为全国仅有。

该馆的历史陈列和瞻园的秀丽景致,每年都吸引了数十万中外观众。万里、彭冲、黄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胡志明等外国贵宾,曾先后来馆参观。日前该馆已成为全国太平天国史的收藏中心、资料中心和陈列中心。在太平天国历史的研究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并同日、英、美、德、澳等国太平天国史学者保持广泛的联系。近年来,在改革浪潮中,该馆充分利用丰富的馆藏文物,另办一套《太平天国文物展览》赴全国各地巡回展出,扩大了宣传教育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现正筹备《太平天国天京馆》和《太平天国史学馆》的专题陈列,以适应普及和研究的双重需要。

责任编辑 淑玉

20 页照片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即原东王府遗址),吴瞻摄影

太平天国的画家与画工

● 蒯伟

太平天国英雄们在打击封建政权,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同时,曾广罗知识分子从事艺术工作,创造了绚丽多姿的壁画艺术,从而繁荣了我国的绘画艺术。

根据史料记载,为太平天国从事壁画艺术创作的人员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画家,称为“画士”;二是民间画工。前者人数不多,后者则为数众多。太平天国设立绣锦衙作为专门管理画家与画工的机构,涂浮道人在《金陵杂记》中说:“两湖贼有知画者,为伪绣锦。掳胁各处并省中画士为之画旗、画伞、画轿衣。”

太平天国专业画家中最重要、具有代表性的是来自扬州的虞璜、陈崇光及安徽罗琪、浙江朱彝等人。

虞璜,字步清,约生于公元1784年,扬州甘泉郡西南半村人,故自称为“半村老人”。擅长山水壁画,卷轴画也很出色。汪鋈《扬州画苑录》称虞璜“画笔苍莽雄肆,令人可骇可愕”,“当其下笔,快若风雨骤至,又如海涛澎湃,随汰随提,轻重浓淡,不次并下,一炊黍时,成一巨幅。全以气行,看去但觉墨沱翻腾,纸上飒飒有声。而又熟于包间交叉之法,左宜右有,层出不穷”,“举千钧若一羽,惟先生有之”。汪鋈给予了虞璜以极高评价。

1853年太平军第一次攻占扬州,年在60余岁的虞璜应召赴天京作画,曾在天京某王府中管理宋元古画。据专家从其绘画的风格与技巧上考证,南京堂子街《守江望楼》、《栖霞山》等山水壁画很可能即为虞璜所作。太平天国失败后,虞璜回扬州。扬州有画谣云:金脸银花卉,要讨饭画山水。正是在这样的崇尚花鸟、无人鉴赏山水画的环境中,专擅山水的虞璜“既乏巨服推毂于前,又遭无知者疵议于后,愈老愈困”,终于随着天国的失败而穷困潦倒而死,年80。

陈崇光(1838—1896),原名矧,字崇光,更字若

木、栢生,江苏甘泉人,虞璜弟子。陈崇光的画以花鸟为最好,其次为人物、山水,近代画家巨擘吴昌硕称陈画“笔古法严,妙意从草,篆中流出。于六法外又见绝技,若木道人真神龙矣。”在1860年前后,应召到天京作壁画,并负责管理天国所藏宋元古画。1864年天京陷落后,流落到上海,后回扬州。1890年精神病发,未久病死。

罗琪,字如璧,安徽歙县人。太平军攻占安徽时,曾为某首领画花鸟卷轴。开始不愿留在太平军中,后因患病,太平军给予治愈,罗琪十分感激,留在太平军中作画3年。太平天国败亡后,削发为僧,“被缢入山”。乡里无人知其下落。

朱彝字小尊,太平军占领金华时,曾请他作画,在金华府城内太平军馆中,朱彝“太挥秃笔,画官兵长毛交战,兼画各色花卉翎毛,又写文书信件”,太平军首领“大喜,待如上宾”。

参加太平天国的画家,尚有人人所熟知的大画家任伯年与虚谷。任伯年参加过太平军行军作战,扛过大旗,但未作画。虚谷(1824—1896)俗姓朱,名虚白,安徽新安人,居扬州,工于花卉、动物,据说出家当和尚后曾暗中帮助过太平天国革命。

除了上述专业画家外,太平天国为数众多的是民间画工。据现有资料所知,主要有:1.广西画工:曾在广西永安州县署创作临时“朝门”壁画;2.苏州画工:创作了苏州忠王府的壁画与采画;3.绍兴画工:人数最多,有李匡济、郑长春、洪福祥等几十人,主画了天王府及其他王府壁画,为太平天国最重要民间画工。

李匡济,字小淮,扬州邵伯人。善于画鸡。1853年(太平天国癸好3年),林凤祥部太平军第一次占领扬州后,李匡济母亲曾在太平军总部洗过衣服。而太平军总部所在的原盐运司衙门内金碧辉煌的壁画即为李匡济等人作品。李匡济是第一个应召到天京参加壁画创作的民间艺人。其后,他陆续介绍了不少



汪精卫 在南京的两处公馆

● 远 秋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在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他初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及“行政院长”，1940年11月29日又自任“主席”。任职期间，在南京先后有两处住所。

第一处在颐和路34号。这原是褚民谊的私宅。褚民谊自称与汪精卫为“菽蓿之亲”，他妻子陈舜贞是陈璧君母亲卫月郎的养女，和陈璧君姐妹相称。褚民谊凭借汪精卫之力，抗战前曾担任过行政院秘书长，叛国投敌后，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等要职。为了报答，将这所房子送给汪献殷勤的。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西式洋房，一楼是会客室、办公室等，二楼四周有四间卧室，中间是一大会客厅，三楼为孩子们的卧室。室内设备极为考究，汪精卫一直住此处。抗战胜利后，由军委会战地服务团接收，改作美军军官俱乐部。

另一处在西康路18号。这是由陈璧君集资、国库“辅助”盖的，气派比颐和路的住所大得多。一进门是一宽大的庭院，一幢三层楼的西式大建筑，矗立正中，两傍回廊起落，弯延有致，大楼一层为会客室、办公室，二、三楼为卧室。大楼左侧建有一幢图书馆，右侧是一座带喷泉的石台，转过石台，为一小巧玲珑的花园，曲径通幽，古树参天，岗峦起伏，另有一门通古林寺街，门牌17号。园内有一直角形建筑，设有浴室等。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参观过西康路住所，准备用做主席官邸。蒋介石听说是汪逆的住所，大为恼火，宋美龄解释说，房子盖好前，汪精卫已去日本治病，实际上并未住过，蒋介石才答应住进去。

（责任编辑 惠 兰）

扬州画工到天京作画。

郑长春，画土地庙画工。据周村调查，扬州城隍庙的二十四司壁画即为郑长春杰作。与郑一起来天京的画工有几十人，先画天王府，后在各王府绘画。作品巧夺天工，太平军由此对他们都很尊重。

洪福祥，杰出画工，据传，当他在天京作画时，天王府建造了一个很高的亭，需画五条龙——五龙聚顶。天王洪秀全命令他限时完成。亭子高，只好搭引架上去。当时因紧张，只配好颜色，而忘了带水上去，下来取唯恐时间来不及，便以小便代水作画。最后，

洪福祥不但按时完成，而且画得很精采，五龙姿势整齐。天王龙颜大悦，重赏了洪福祥。天国失败后，他返回扬州，卖画度日。

太平天国除了有专业画家与民间画工外，尚有太平军中的绘画作者，如安徽绩溪县曹氏支祠《太平军攻城图》壁画，从画中内容与技术，即可断定为参加过实战的太平军战士，但因缺乏资料，而无法推断作者们的真实姓名了。

责任编辑 宁 宁

●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段传奇

美军飞行员 脱险记

● 张 衡 吴雪晴



神州
風雲

下图为获救的美飞行员，从左到右依次为斯太尔美克中尉、奥勃朗上尉、赛伏爱少校、罗茨中尉、勃朗台治少尉



1984年6月11日，在美国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在华盛顿下榻的饭店里，亲切会见了三位60多岁的美国朋友。当张爱萍将军郑重地打开一本影集展示在他们眼前时，三位美国朋友先是惊异，接着便指着照片上的人，激动地喊道：“这是我”，“这是我”！其中一位叫赛伏爱的美国朋友兴奋地问张爱萍将军：“真了不起，40年了，这些照片你是怎么保存下来的？”他们指点着照片，回忆起40年前那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

黄海上空坠下“空中堡垒”

1944年夏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方向变化。战斗在中国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海岛争夺战。为了配合前线的攻势，在中国大后方由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断派飞机飞越黄海，轰炸日本本土，藉以摧毁军事工业基地，瓦解日军的士气。

8月20夜晚，天下着濛濛细雨，靠近盐阜抗日根据地的黄海上空，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马达轰鸣声，一架飞机摇晃着双翼，喷吐着浓烟，向盐阜根据地飞来。当飞机飞到建阳县（今建湖县）境内时，一个个黑影从机舱中跳出，不一会，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几张降落伞，在夜空随风飘荡。飞机呼啸着继续下坠，在临近地面时，从机舱中又跳出一个黑影。随后，失去控制的飞机象发狂的野兽，撞倒几棵粗壮的桑树和一架风车，一头栽进建阳县二区辛家桥（今建湖县建阳乡）的一块稻田里。由于飞机巨大的惯性冲击力，使油箱内残存的汽油爆炸燃烧，熊熊的大火映红了半边天。

这是一架美制B29型轰炸机，由于它续航距离长，携带的炸弹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美国空军的王牌轰炸机，被

1984年6月11日,张爱萍访美期间会见赛伏爱。左一为张爱萍,左三为美国防部部长温伯格,左四为赛伏爱。



人们称为“空中堡垒”。这次,它从中国的大后方起飞,轰炸日本的九州岛,在返航途中,由于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而坠毁。

最先得到飞机坠落消息的建阳乡民兵模范班的民兵,在乡干部带领下,火速赶到现场,扑灭飞机上的大火。乡干部从飞机残片的标志上认出是一架美军的飞机。

飞机坠落的地点是抗日根据地的边缘区,距湖垛镇日军据点仅几公里,日军出动,只要个把小时就可以赶到。为了保护这架飞机,新四军盐阜独立团二营六连连长王海涛、指导员郭典文率领全连战士不顾泥泞路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沿横塘河布置了警戒。此时,湖垛镇的日军也得到了情报,为了抢夺飞机,70多名日军和40多名伪军倾巢出动,在中队长近藤的指挥下,向飞机扑来。日伪军害怕中埋伏,不敢走大路,就从小路和田埂绕道而行,在前面搜索的伪军更是走走停停,这样,当他们接近坠机现场时,已是21日的大天亮了。上午9时,争夺飞机的战斗终于打响了,日伪军的火力,猛烈地向六连前沿阵地射击。六连是个只有80多人的新兵连,武器差,子弹少。可是,面对日伪军的掷弹筒和机关枪,战士们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一次次冲锋。中午时分,附近几个乡的游击队、民兵和群众纷纷赶来参战,将日伪军包围起来。六连战士士气大振,越战越勇。孤立无援的日伪军见势不妙,狼狈逃窜,缩回湖垛镇据点。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六连机枪班班长李绍义和战士周仲昆、朱良、朱长林等人,为保卫飞机而英勇牺牲。

这架美机已严重毁坏。战斗结束后,六连指战员们抓紧时间,将飞机上的武器、弹药和所有能拆下的机件全部带走,主动撤离了现场。

营救美军飞行员

就在飞机坠落的这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建阳二区万丰乡钟庄农民,正要吹灯睡觉,忽然听到天空

传来隆隆的响声,便紧张地从家里跑出来观察动静,只见一架巨大的飞机呼啸着飞过,接着,天空中出现了几团白花花的东西。这几团“白云”飘然落地后就不见了,农民们也并不在意,随后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清早,一个老汉拎着灯笼到村头草堆去抱草烧早饭,当他从草堆上拿下两捆稻草时,突然从草堆里钻出两个人来,老汉大吃一惊,掉头就跑,边跑边喊:“来人啦,来人啦!”庄上的群众闻讯赶来,只见这两人白皮肤,红头发,蓝眼睛,高鼻子,身着草绿色的军装,他们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话,可是谁也听不懂。其中的一个人着急地用手指指天,又指指地,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旗子。人群中一个识字的上前拿过旗子,见上面并排印着中国、美国的国旗,还有一排中文大字“亲爱的中国朋友,我是来华与日作战的美国人!”大家这才明白他俩是美国飞行员,便上前帮助他们抖掉身上的草屑,将他们迎进庄上休息。

同一天早上,近湖乡的民兵中队长刘江荣带着30多个民兵执行任务归来,在周家舍的草堆边也发现一个外国人,身边还放着白色的降落伞。刘江荣上前盘查,可是听不懂他的话,只好用手势打起哑语来。这位外国人用手指指天空,意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刘江荣指指不远处日军据点的太阳旗,意思是“你认为日本人怎样?”他连连摇头,还伸出小姆指,表示蔑视的意思。刘江荣又伸手作出“八”字状,指指北方,表示自己是跟八路军一样的人,外国人这才点点头。刘江荣考虑到此地离敌据点很近,便叫几个民兵护送他到东郑庄的二区政府。正好区里有一个干部会讲英语,经过询问,才知道这位外国人是美B29型轰炸机的少校领航员,叫赛伏爱。他们驾驶的飞机上共有12人,在轰炸日本返航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决定弃机跳伞。前两批跳伞是七人,第三批跳伞是四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通过交谈,还了解到赛伏爱28岁,是美国芝加哥人。几个月前,他从印度调到中国,在第十四航空队服役,曾参加河南战役保卫洛阳的空战,还到东北执行过轰炸任务。赛

伏爱说：原先我们对这里的情况不了解，每次飞过这里的时候都是提心吊胆，早知道这里是新四军驻地，我们就放心了。赛伏爱为了感谢刘江荣的救命之恩，将手上的金壳手表脱下送给他。刘江荣表示，你是我们共同对日作战的盟邦战友，救你是我应尽的义务，你的财物我不能接受。赛伏爱听了十分感动，还希望区干部帮助查找营救其他11名同事。建阳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一方面将这个情况报告了盐阜行署和新四军三师师部，一方面通知全县民兵和群众帮助寻找。很快，钟庄群众营救两个美国飞行员的消息报到县政府；在高作村，群众也发现了两个美国飞行员。他们分别是：奥勃朗上尉、罗茨中尉、斯太尔美克中尉、勃朗台治少尉。这四位美国飞行员分别由当地民兵护送到建阳县政府所在地，与先期到达的赛伏爱少校见了面。后经我情报部门了解证实，前两批跳伞的7人分别落在黄海和敌占区内，均遭到不幸。

根据地的“奇遇”

美军飞行员在盐阜根据地迫降的消息，很快上报到中共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三师师部，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区党委书记兼三师师长黄克诚请副师长张爱萍、师参谋长洪学智及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等负责接待工作。23日上午7时，盐阜独立团派出部队，专程护送赛伏爱一行五人前往三师师部。除了斯太尔美克中尉脚部挫伤，由担架抬着外，其他四人骑着马前往。中午，到达阜宁县东沟镇，镇上的群众闻讯赶来欢迎，镇商会还送来香烟和水果慰劳他们。这可把几位美国飞行员乐坏了，飞机出事时，这些基督教徒本以为要升入“天国”，谁知却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自由民主的“天堂”，真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奇遇。赛伏爱激动地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热烈的欢迎。

下午，美国飞行员到达了三师师部的驻地阜宁县益林镇南窑村。洪学智、吴法宪等亲自带领部队和群众出村欢迎。尽管当时根据地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可指战员们尽最大的努力，使美国飞行员生活得好一些。他们将村头的一座大庙打扫得干干净净，隔成卧室、会客室、餐厅、浴室等，还在墙上挂上世界地图和欢迎盟军战友的标语，当地群众也纷纷送来鸡、鸭等慰劳营养品。

8月25日，在华日人解放联盟苏北支部的负责人松田等，也带着慰问品慰劳美国飞行员，操着日语和不太熟练的汉语向美国朋友问好。赛伏爱等人看到新四军的部队里还有反战的日本人，十分惊奇，便详细地询问他们在中国的感受。赛伏爱还问松田：“美军轰炸日本，你们有什么看法？”松田说：“你们轰炸的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这表明日本法西斯崩溃的日子不远了。”在谈笑中，美、日两国朋友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27日中午，新四军三师师部举行宴会，招待赛



1944年8月(阜宁)

照片为张爱萍所摄

美军飞行员在联欢会上为根据地军民表演降落。

伏爱等美军飞行员。张爱萍、洪学智、盐阜行署主任曹获秋等人出席作陪。张爱萍代表苏北根据地军民对赛伏爱等盟军战友表示慰问和欢迎，赞颂了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赛伏爱在宴会上说：我们这次得到了民主政府和新四军的全力营救，化险为夷。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的政府也会感谢你们的。当奥勃朗上尉听洪学智参谋长说飞机的所有武器、文件和机件都保护下来时，激动地说：是新四军战士用生命保守了盟军的军事秘密，我们愿将飞机上的6挺机枪和一门炮送给新四军。席间，中美两国战友频频举杯，预祝反法西斯战争早日取得胜利。

下午，新四军三师师部举行了有300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中苏美英四国国旗。当张爱萍等人陪同赛伏爱等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洪学智介绍了五位美国飞行员的简历，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他们赠送了缴获的日本军刀作为纪念品。他说：我们的抗日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全世界都有我们反法西斯的战友。赛伏爱也在会上讲了话，谈了飞机失事的经过，对新四军的营救表示感谢。会后，举行了中美战友的联欢会，三师八旅的文工团表演了节目，美国飞行员也表演了降落伞使用的方法。爱好摄影的张爱萍副师长及时地摄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通过几天的参观访问，美国飞行员对国民党政府限制、打击新四军的政策产生了不满。他们提出：新四军是一支能打日本队伍，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和物资，为什么不分配给新四军；并表示，要将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告诉大后方人民和美国人民，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战的真象，了解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

8月30日，赛伏爱等五位美国飞行员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张爱萍、洪学智等新四军首长，在部队的护送下，来到新四军军部。而后，转辗回到大后方。

苏北根据地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的行动，得到了大后方和美国舆论的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曾发表署名文章，热情称颂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指出：“被迫降落在解放区的美国飞行员们，对于中国游击队的机智表示很深的感激和敬佩。”

* * * * *

40年后，当张爱萍与赛伏爱重逢，回忆这段难忘的经历时，心情都十分激动。他们交谈了分别40年来的人生旅途，共同祝愿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发展。

(责任编辑 淑玉)

彭湃被捕 及遇害详情

彭湃同志是中国著名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领导人之一。1921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县农会——海丰县总农会。1927年他又参加了南昌起义,任前敌委员会委员,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政治局委员,1928年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等职。

1929年8月24日,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5人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闻路经远里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白鑫是中央军委秘书,在通知开会的一个月以前,白鑫已出卖了开会的消息。当开会至下午4时,捕房巡捕和公安局的中国包探载着钢甲车而来,将会场团团围住,经过核对名单后,把彭湃等5名参加会议的人全部逮捕,关在上海公安局小北门水仙庙侦辑处的拘留所内。彭湃在狱中受尽了各种严刑拷打,几次死去活来,脚骨也被打伤,但他始终坚贞不屈。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于当晚召开了中央特科各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彭湃等同志和了解他们被捕的原因。

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接受任务后,极力想办法营救,他选中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任职的鲍君甫。

鲍君甫,又名杨登瀛早年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识一些共产党人,并对共产党人表示同情,他1925年就结识了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加入共产党。1928年开始为我党工作,是我党在敌特侦探机关中第一个建立的反间谍的关系,为我中央特科控制敌特上海侦探机关起到

了重要作用。

由于鲍君甫是老牌特工,并与陈立夫、张群、张道藩、杨剑虹等头面人物私交很深。1928年下半年陈立夫正式任命鲍为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蒋介石在委任状上签署:“特派杨登瀛(即鲍君甫)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在营救彭湃的过程中,鲍君甫向陈赓提出,彭湃是知名人士,不可能简单地就能营救出来,建议当彭湃由伪公安局解往伪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

陈赓将鲍的想法向中央特科请示后,同意路劫。陈赓与顾顺章专门在虹口旅社开了一个房间,作为营救彭湃的联络地点。

鲍君甫又到伪公安局拘留所内去探望彭湃,了解有关情况,鲍先到侦缉队长卢英处约他一同去拘留所,但卢不在,鲍便独自到拘留所内看望了彭湃,鲍报以同情的目光,并移了移呢帽表示敬意,从中暗示彭湃做好准备,鲍在走出拘留所时碰见了司法科科长王郁芬,王当即约鲍翌日下午参加陪审彭湃一案(鲍经常陪审重大共产党案件)。鲍得此情况后及时向陈赓作了汇报,并提出陪审彭湃案件时我方要派一位同志参加,这样能及时让彭湃知道我们党正在设法营救他。陈赓当即否决这种做法,认为会引起彭湃的怀疑,以为是陪审人出卖他的,鲍便建议找一个彭湃平时最信任的同志参加陪审,陈赓对此表示同意,并得到组织上的支持,派了一位同志于8月26日和鲍一同到伪公安局三科审讯室,审讯时已是傍晚,庭审时间大约半小时。审讯中鲍君甫装得样子很凶,骂得很厉害,但是非党巧妙地把党的意图暗示给彭湃了。

由于彭湃的名气很大,蒋介石早就恨之入骨,下令立即杀害彭湃,审讯结束后伪局长袁良便与鲍约

抗战前南京市曾举办过牲畜家禽比赛会

● 王 长 喜

1936年11月16日至18日,南京市政府首次举办了南京市牲畜家禽比赛会,参加对象主要是农户,农场亦可参加,但只给精神奖。正式比赛项目有牛、羊、猪、鸡、鸭五种,表演赛有信鸽、北京白鸭等。

比赛分为三个区举行,第一日于(11月16日)在孝陵卫区马群镇小学举行。上午时,农民已把参加比赛之牲畜牵领到场,场上猪吼鸭叫,好不热闹。截止上午11时登记终止时止,计有牛155头,羊22头,猪9头,鸡262只,鸭90只。作为表演赛的有北京白鸭4只,其大如鹅;另有军政部通讯兵学校及中国信鸽会信鸽320余只。农民们扶老携幼前来参观,军警维持秩序,场上观众逾千人。

登记完毕后,初赛开始。评判是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专家,凡有劣处的离畜一律淘汰,专家们一一指点农民,并教以纠正方法。

下午举行复赛,由中央农业实验所兽医系主任程绍迥、副主任郑庚等6人主持。经过严格鉴别,比赛名次确定:黄牛取6名(孝陵区多半是黄牛),第一名73号,业主朱宝书,奖洋犁1把,第二名奖喷雾器1具,第三名奖稻种3担,第四五六名亦得类似奖;水牛取1名,奖小农具14件;羊取1名,奖剪羊毛刀

一把;猪取1名,奖黄豆1担;鸡取4名,鸭取3名。

3时许,市长马超俊在社会局长陈剑如陪同下来到赛场,在他们身后,马夫人沈慧莲陪同市长太夫人前来参观,此时比赛的真正高潮已到,几百只信鸽腾然跃空,在场上空飞翔,全场欢声雷动。马超俊首先训话:“农民生活甚苦,如欲解决此项问题,应增加生产,畜牧为生产之一种,望农民善为饲养,将来必因此转贫为富。倘农民能依本会改良方法做去就是觅得一条致富之道。所发给各小册子亦即教各农民发财之方,希各农民幸勿忽视之。”

训话完毕即发奖,除优胜者有特殊奖品外,凡参加者均赠毛巾1条及《耕牛饲养法》、《牲畜疾病救治法》小册子各一本,在孝陵卫区的比赛结束。

第二日和第三日分别在燕子矶区和上新河区举行比赛,赛况和第一日相似。

这次牲畜家禽比赛会和在这之前举行的第一届农村改进讲习会,农具展览会等,都是当年农村改进运动的一个方面,这次农村改进运动虽没有改变南京农村贫困面貌,但毕竟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而象牲畜家禽比赛会之类的改进措施则是创举。

(责任编辑 霁 明)

定后天来了再带走。鲍又及时将情况向陈赓汇报,研究对策,当周恩来得知敌人将于8月28日晨要将彭湃等同志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的消息时,当即下令中央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动。埋伏在囚车经过的途中,准备劫车营救。8月28日凌晨,中央特科为了保卫党中央,镇压叛徒特务的猖狂进攻而专门成立的红队,化装成拍电影的外景摄影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也化装成拍电影的演员参加营救,当时约定武器是由专人用箱子送到现场。

8月28日早晨6时,鲍君甫和我党派去的一位同志到伪公安局时,彭湃等人已被带走了,鲍又立刻驱车驰往龙华警备司令部,中途遇见了一辆大卡车(鲍事先可能不知道中央特科组织营救),另一位同志到卡车上和他们谈了几句话就告诉鲍君甫押解彭

湃的车未经过这里,并说这辆卡车是天没亮就预伏在这儿的,是准备营救彭湃等人的,鲍又和这位同志驱车到龙华警备司令部查询,得知彭湃已被送往龙华。鲍赶紧驱车回到红队预伏的地点,援救人员已经离开,营救未能成功。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被杀害。

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被杀害后引起全党悲痛,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陈赓的直接参与下,通过鲍君甫的侦察及跟踪,两个月后,叛徒白鑫被我红队执行枪决。

责任编辑 宁 宁

(注:鲍君甫解放后留在大陆,此文根据他的笔记及有关材料整理)

国民党当局策划 皖南事变内幕

石井坑
皖南事变激战地



今年是皖南事变五十周年,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天理难容。

抗日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所惑,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企图以打击共产党力量的作法讨好帝国主义,并趁机扩充实力。而皖南事变则是他们实现上述目的挑起的一次反共事件,它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本文想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事变的起因以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将这一历史片断作些再现。

(一)事变前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活动与军事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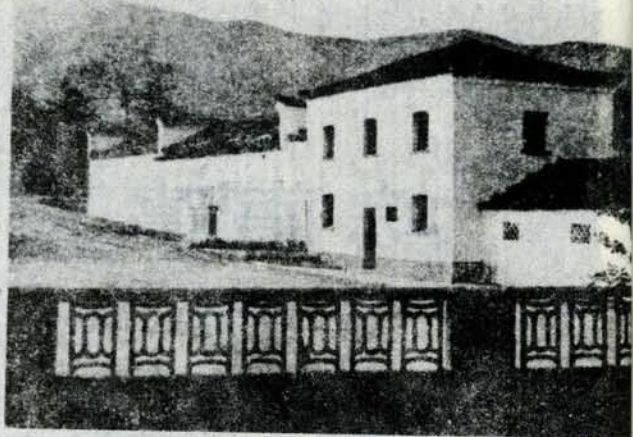
蒋介石一伙早在皖南事变前就制订了许多削弱共产党的措施与办法。1939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任意污蔑,曲解事实,将抗战有功的共产党说成贡献于国家民族者少,谋一党

之私利发展者多”等等,为蒋介石集团挑起国共冲突制造借口。1939年6月制订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对共产党进行了种种限制,规定其在各地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秘密组织,个别共产党员在抗日各机关团体服务者,必须开列名单,呈报国民党中央,否则一经发现,即以战时非法活动论罪。共产党言论只能在允许范围内,于国民党外围刊物上发表等等。在政治上反共的同时,在军事上也实行了种种限制,如规定共产党军队的“军令必统一”于国民党中央,未经许可不得擅自组织武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派“联络员”监视共产党军队的整个活动,新四军在各地的军事机构,未经同意一律封闭。1940年4月拟订了“缩小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区域的方案”,使共产党军队被约束在几个小范围内活动,区域外由国民党军驻防。7月16日又公布了缩小共产党作战区域的所谓“中央提示案”,取消共产党的“陕甘宁边

区”抗日根据地,将其隶属国民党政府的行政区。文中还规定八路军限编三个军、六个师、五个补充团;新四军限编两个整师。为了阻止共产党人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1940年4月又制订了“防止异党兵运方案”,提出用考验、侦察、密告等手段清理士兵队伍,一经发现共产党分子,立即就地秘密处决,其所在班的全体成员都得受连坐处罚。

(二)事变前夕国民党军围攻新四军的军事部署。

在一片反共、限共声中,蒋介石一伙加紧了事变的军事准备。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在蒋的指使下,以国民党军委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发出电令,诬蔑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军队“自由行动”、“不执行命令”等等。并以此为借口,限共产党军队在一个月內即“12月1日起开始行动,至12月底全部过江”开到黄河以北,电令又指定新四军的北移路线为“泾县、马头镇、杨柳铺、孙家铺、鲍桥、飞鲤桥、郎溪、城定埠、上兴埠。”^①11月9日,叶、项正副军长在答复何、白的电文中,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同意新四军全部渡过长江北移。但北移路线除原来的外,要求增加经苏南再由镇江到苏北的路线,当时顾祝同表示同意,上官云相总司令也允许,蒋介石也准许了,这证明新四军是执行命令的。新四军由苏南北移者“已逾两万”,^②剩下的只有新四军皖南军部、直属团队及后方机关伤病员兵、老弱妇孺约九千人。因军部内思想不统一,经费、弹药缺乏等原因,在原地迟疑不决,延误时机。而这时国民党军队却在加紧军事部署,围攻新四军。1940年10月国民党九十二军,奉令开入皖北,作阻击北移新四军的准备。12月7日经蒋介石批准,军令部下达了“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准备第一步以顾祝同部兵力,在1941年1月底前“肃清”江南新四军,然后再“肃清”苏北新四军。第二步以李宗仁所部,于2月28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限皖南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全部北移,如“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③同日国民党一〇八师奉上官云相命令,派宪兵十五团十一营(欠一连)推行至广德、郎溪等处,监视新四军行动。12月下旬一四四师也奉命向云岭、戴家汇方向前进,准备阻击新四军南去。12月20日国民党四十八军一个团奉命严防新四军北移过江,并破坏新四军在泥汭、姚家沟沿江地区架设的浮桥。国民党军统帅部一面周密部署,一



新四军军部旧址

面又搞伪装欺骗,于12月25日忽命新四军改道,由埋伏了约八万国民党军的铜陵、繁昌地区北上,企图引新四军入包围圈一网打尽。国民党的这一阴谋还未实现,又于12月29日命令三十二集团军制订围歼新四军的详细计划,确定该集团军指导方针为扫荡苏南、皖南的新四军,行动路线为:先封锁长荡湖至固城湖,隔断苏南与皖南新四军的联系,然后于12月31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翟、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④构筑工事,准备阻击。除此以外,还对作战指挥系统、作战地域、各部队具体任务等等作详细部署。1941年1月2日国民党军又调七十九师到太平地区,作围歼新四军的机动部队。1月3日四十军方日英部又奉令在黄昏前到达溪里风、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之线,作阻击新四军的准备。经过长期部署,蒋介石集团先后从各方调集了五个军兵力,分三面从背后包围新四军,北面沿江有国民党十五个师布防,数百汽艇往来梭巡于扬子江上。

(三)皖南事变的爆发及新四军被围攻的经过。

面临险境的新四军,经中共中央一再严令催促,决定于1941年1月4日晚从泾县云岭出发,5日因大雨滞留在茂林、屯仓徐一带山谷中,突然遭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袭击,毫无防备的新四军全部被围。

6日,新四军军部决定分三路突围,一路向樵岭口;一路向屯仓徐、源岭;一路由大坑、双家洲突围。

而国民党军也加紧兵力调动,阻击突围,命一一九团于午前6时30分到倪家村集结待命,午后1时又命该团一营进至内浮溪附近高地,防堵新四军南逃。与此同时,三十二军军部令一五五团向榔桥河急进,协助一二〇团在榷岭口附近包围新四军,防止新四军主力由该处脱逃。同时,又令一五六团迅速进驻湾滩一带,向茂林方面作攻击准备,一五四团推进巧峰策应。国民党军一〇八师奉令破坏宣宁间、鸡头岭一带轻便铁路及京赣铁路,该师工兵营又奉令破坏桥梁,防止新四军逃跑。

7日,在周密部署的基础上,以上官云相为总司令的三十二集团军五十二、四十、七十九师等部队,约八万多人,在蒋介石“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下,向新四军发起猛烈的总攻击。6时许,茂林的新四军约六、七百,向南突围,遭国民党军四十师一团在榷岭附近阻击。不久千余名新四军又被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一二〇团包围,直至中午,新四军向牛栏岭突围,一一九团奉令由内浮溪向新四军迂回阻击,激战至黄昏,新四军突围不成。同时,七十师和一二四师主力在麻岭、山口至榜山一带夹击新四军。15时50分,新四军五、六千人被四十师堵击于坦里口、函口、沥岭附近,国民党一四四师四三〇团及四三一第二营奉令渡河向茂林东南地区推进,压迫新四军背后,形成两个师前后夹击新四军的局面。为将各路口严密封锁,以免新四军漏逃,一四四师四三二第一营和四三一四个连于20时,分别封锁苏口、溪口河防及焦石埠、章家渡等地。

8日0时40分,新四军两主力支队在叶挺和项英的指挥下,向牛栏岭至坦里口一带突围,战斗激烈,但突围未成。据档案记载,新四军在山口伤亡七、八百,牛栏岭伤亡三、四百。2时30分国民党军统帅部令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一部为右翼队;二三六团一部为中央队;二三七团一部为左翼队,各于5时30分以前,占领金龙岗、叶家殿、大礼村以北高地,将新四军包围于屯厄徐附近,待机消灭。四三二团一部于4时前展开于金官凸、高坦徐一带,向东南攻击新四军后背。午前8时,右翼队先后占牛栏岭、沥岭、源岭及七十二罐东北高地,与该处千余新四军激战。新四军利用险峻、复杂的地形顽强战斗,直至午后4时,仅剩五、六百人,向西北撤退。与此同时,四十师一部包围了由小和里向西突围的数百名新四军,经过激战,只小部向西北突围出去。

9日1时40分,一四四师四三〇团奉令于拂晓向屯仓徐的新四军攻击。3时,七十九师也奉命向源



泾县茂林镇

岭西南、西北高地及狮子山、椅子堂的新四军攻击,直至午后2时国民党军占领狮子山。此役新四军百余人牺牲。午后5时10分,上官云相电令四十师,因新四军主力向东流山、鹿角山运动,准备由茂林村西南地区突围,故令该师一团占领高坦徐附近,配合其他部队围攻新四军。一四四师的五个营又奉令进驻茂林村,七十九师的二三七团也奉令于午后8时前占领茂林以南,沿小河西岸阻击千余名新四军西逃。战斗中新四军伤亡二百余,被俘二十余。

10日1时20分,各部奉令拂晓继续猛攻东流山的新四军主力。1时30分一四四师令四三二团向屯仓徐、高坦徐新四军阵地进攻,四三〇团向孙家以左的老虎尾(又名状元山)攻击,限4时前准备完毕,以奎山头红色信号弹二发为进攻的标志。5时,师长发出攻击命令,激战至10时30分,屯仓徐阵地被国民党四三二团第一营占领,11时高坦徐阵地也被该团第三营占领。这次战役中新四军牺牲百余名,37人被俘。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四三〇团第一营也在老虎尾与新四军进行拉锯战,新四军英勇顽强,战至5时,四三二团令第二营向东流山北麓攻击,第三营向孙村及老虎尾攻击,入暮时将新四军包围封锁于东流山、鹿角山地区。同日拂晓,国民党五十二师一五六团二营在双家洲以北无名河东岸与新四军激战,新四军参谋处长赵凌波和一百名士兵被俘。12时30分国民党四十师令一一九团分数纵队,在一一八团

策应下,完成包围东流新四军的任务。此时,新四军伤亡已过半,几日未进食,粮尽弹缺。

11日拂晓,国民党军一〇八师六四四团在求岭、鹿角山以北高地围攻新四军,此役中50余名新四军牺牲;新四军上校参谋曾汝霖被俘,直至下午该团占领鹿角山。7时50分,国民党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向潜伏在俘盖山东北山地的五、六百名新四军袭击,新四军全部壮烈牺牲。中午奉上官云相电令:新四军主力约二千余人,正由东流山北端高地向鹿角山进攻,以图突围北逃,特命四十师一五四及六四四团围攻,令一二〇团进至坦里口附近,堵击新四军的逃路。夜23时许,新四军约千余分三路突围,多持手枪和手榴弹,激战至12日3时,两路冲出包围,但又陷入国民党军的第二层包围圈。此役新四军伤亡二百余,283人被俘。

12日5时30分,国民党军四十师奉令派一一八团第一营等部队,包围东流山北麓及其西北峪地带,围攻新四军主力四千余人。同时,五十二师一五五团集结双家洲附近,向鹿角山以南进攻新四军。中午五十二师六四四团主力奉令到达承流峰以北山地,一四四师也于10时30分包围东流山西面及鹿角山南面。国民党军队以猛烈炮火向新四军射击,激战至午后5时,东流山被国民党军占领,新四军牺牲六、七百名,部分新四军被迫向孙村退却。午后2时,七十九师二三七团第一营与二三五团第二营向孙村的五百余新四军夹击,至午后4时许国民党军占领该村,58名新四军官兵被俘。午后七时许,新四军主力被围困于东流山东北、鹿角山西南、溪里风以南地区,而且包围圈逐渐缩小。晚8时新四军猛烈攻击,再次设法突围,但激战整夜,无法冲出重重包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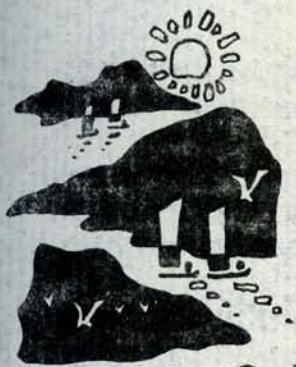
13日晨4时许,新四军约千余人向东流山反攻,实行突围。国民党四十师令一二〇团等部,扼守各路口,使新四军无法突围,并于8时开始总攻,连续不断地向新四军发动袭击。此时五十二师也由鹿角山向南压迫,与四十师夹击新四军军部。至午后5时,新四军仅剩五百余人。6时许,七十九师二三五、二三七团先后到达茂林附近参加战斗,激战中新四军指挥袁国平牺牲。10时许约二百余新四军官兵被四十师一团包围于孙村东北的无名村,战斗中数十名新被四军俘。下午2时百余名新四军官兵被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在辛村东北地区围攻,此役98名新

四军官兵被俘,据档案记载:自12日23时至13日入暮时止,新四军牺牲约500多人,被俘838人。

14日6时30分,新四军约千余人由鹿角山经溪里风,向国民党军四三一团阵地突围,结果未成,战斗中288名新四军官兵被俘。另外,在牛山柴棚有10余名新四军,被一四四师四三〇团七连发现,当场开枪乱射,5名被枪杀。至夜,被围新四军除黄火星率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叶挺军长及军部要员多人,在鹿角山被俘,其中有新四军少将秘书长黄诚、政治主任林植扶、上校军医处长陈延生等。项英率小部份人化装撤退至皖南山中,不久被叛徒杀害。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四)事变后国民党军继续袭击新四军

综上所述,蒋介石集团是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封锁、包围、袭击、阻截新四军的,他们一手制造了皖南事变。但是,事变后他们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相反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不守军纪”,不得已而执行制裁等等。1月17日又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宣布组织法庭审判叶挺,气焰十分嚣张。1941年3月,又命汤恩伯率20万军队继续“扫荡”新四军所在地区。3月21日顾祝同又拟订了继续围攻新四军余部的办法,密电蒋介石,大意是:皖南事变后溃散的新四军分向各地逃跑,少数分批往浙西,有的在天目山建立根据地。为此,拟定五条办法。①令忠义救国军全部,分四个挺进纵队,分途“清剿”,并设法截断新四军的扬中交通线;②由国民党军教导第三团及第一总队,与淞沪行动总队组成苏嘉沪挺进纵队,严实控制据点,“积极游击”,防止新四军在该地的一切活动;③命有关的国民党党政机关加紧联系,堵截零散的新四军活动;④命闽、浙、赣边区绥靖指挥官“清剿”新四军;⑤迅速充实、改组战地各县党部及下层机构,由军政协助工作。国民党军队遵照这五个办法,展开了继续围攻新四军的活动,5月31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新四军约两团潜伏于铜陵、繁昌之间,该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及营长彭家洪“率领残部200余在皖赣边区活动,”^⑥命其继续派兵围攻。1941年8月国民党二十三集团又拟定了继续袭击皖南一带新四军计划,成立铜、南、繁、泾四县及毗邻地区的绥靖区,党政军统一指挥,积极训练民



就《小重山》 词中地名答 读者问

● 陆良庚

黄石市教育学院贾克非先生寄来《小重山》词：“马脑冈头石径微，寂寥高座寺，掩禅扉。种松几度旋成围。人何在？春物镇芳菲。青史事多违，梅陵留庙祀，也崔巍。野棠如雪落还飞。南朝梦，一树付斜晖！”查询词中“马脑冈”、“高座寺”、“梅陵”的词意。

经查史志书中记载的有关资料，现借《南京史志》杂志予以回复，供你参阅和斟酌。

词中“马脑冈”即今日位于南京市南门外的雨花台，古名石子冈，又分别为东、中、西三冈组成。东冈即梅冈，中冈又称凤台冈，西冈为西冈台。传说在1400多年前的南朝梁武帝时，有位和尚云光法师曾

在此冈的高座寺讲经，因法师心诚得道，感动了上天，落雨如花，雨花台由此而得名。此处景色甚美，有山远揖江峰，近俯城堞，烟霏雾縠，万景毕纳，每当夕阳衔山，峦容树态，金碧晃漾，尤为佳胜。古代冈上还盛产色彩艳丽、花纹清晰、五彩斑斓的小石子，古人视为宝石，又称玛瑙，故有玛瑙冈之美称，词中的“马脑冈”是否传抄笔误。

“高座寺”位于石子冈之上，晋朝永嘉甘露寺是该寺的前身。当时有西域僧人尸梨蜜多罗，法号高座云游至此，为晋丞相王茂弘（即王导）所器重，挽留在此讲经，高座圆寂后亦葬于此，后以僧人法名命寺。唐朝李白曾以《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一诗赞颂该寺。高座寺两次被毁，一次失火毁于明朝洪武年间，在弘治元年起重修，九年后完工，二次何时被毁，现未查到记载，此寺已是历史古刹。

“梅陵”即石子冈的东冈，为纪念晋朝功臣豫章内史梅璜设庙祀于此，后人称此冈为梅冈。又因明朝精于篆法的徐霖，号称九峰道人，徙居金陵，在此立碑，又有梅陵之称，此处“陵”并非帝王将相之陵墓，而是陵与冈相呼应系丘陵或大土山的意思。

众，编查户口，健全保甲等。并决定于1941年8月1日开始“清剿”新四军和其他革命人士，第一期3个月，至10月31日止，肃清所谓新四军残部；第二期3个月，至1942年1月31日止，为清乡完成时期。“清剿”由国民党军五十二师部担任主力，各县自卫队配合，清乡由自卫队负责，五十二师一部协助。除采用武力外，还提出用“策动”“分化”“说服”等手段，使新四军官兵“自新”、“自首”。此外，1941年11月26日蒋介石还密令李宗仁，积极“剿办”渡襄河的新四军2个团。

史实说明，蒋介石一伙挑起了皖南事变，杀害了许多新四军官兵，皖南新四军大部被歼，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新四军并没有被消灭，被歼的新四军仅为整个新四军的十分之一，分布在各地的9万新四军，

在新成立的军部指挥下，坚持抗战，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的队伍。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1）（2）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致叶挺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3）《皖南事变资料选辑》154页；

（4）蒋介石致顾祝同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5）第三十二集团军围击皖南新四军部的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6）蒋介石“剿办”皖南新四军的密电，（中国第二次历史档案馆档案）。

抗暴斗争经过

女大学生沈崇事件

夏蓓

1946年12月24日震惊全国的“美军强奸北京女生沈崇事件”发生了，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立即引起爱国学生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爆发了反美爱国的高潮。

沈崇，福建闽侯人，系清末名将沈葆贞之孙女，其父沈劭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沈本人为北京大学南京上海考区录取新生。24日晚沈崇去地处东单的平安电影院，在途中被两个美兵拖至僻静处强奸。

事件发生后，首先作出反响的是北平各高校。27日，北京大学贴满了揭露和抗议美军暴行的标语及抗议书，随即召开了各系级、各社团代表大会，并联合燕京大学、师范学院、中法大学、清华大学定于30日罢课一天，举行示威游行，还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29日晚，北平各大学500余人在北大开会决议：组织“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30日清晨，清华、燕京三千人的队伍出发了，辅仁大学的学生在中途也加入了队伍，这时北大学生已集中在操场上，中法、朝阳、师范、铁院等校的学生陆续赶到北大。下午一点半，城内城外学生在沙滩汇集成一万人的队伍，开始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沿街市民鼓掌相迎，许多青年店员，公务员自动加入队伍，游行队伍直奔“军调部”。“军调部”大门紧闭，学生们把“美国佬滚回去”的标语贴满了大门，队伍到达东单操场，也就是美军奸污北大女生的地点，大家在这里停下来开展演说朗诵等活动，控诉美军暴行、“抗议美军进行曲”的歌声，响彻了广场的上空。

中共南京局下属党组织对女大学生沈崇被强奸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并决定组织发动全国大学生支持北平大学生的这场正义的抗暴斗争。接着天津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28日连夜召开理监事会议，对美兵的不法行为决议四点：1、向马歇尔、司徒雷登及美军当局严重抗议；2、发表告同胞书；3、在校内张贴标语；4、联络各校学生一致行动。并郑重要求三点：1、要求美军赔偿损失；2、就地严惩肇事美兵；3、美军立即退出中国。这时上海、南京、昆明、武汉、开封、重庆、广州、杭州、福州等地，有50万以上的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31日，浙江大学学生总罢课，并开大会决议次日发动游行，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东吴大学等组织了“响应北平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后援会”，并准备联合通电全国以支援政府作外交后盾。在国民党的心脏首都南京，高校学生连日声援北平，游行示威。在1月3日由学生代表5人赴西康路美驻华大使馆请见司徒雷登大使，向司徒雷登提出三点要求：1、惩凶；2、当事人向全中国道歉；3、驻华美军撤退。中大学生还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美军暴行。学生连日来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各界的支持。北大教授致函司徒雷登要求：1、对于被害人之荣誉损失之赔偿；2、对于犯罪之士兵，迅绳之以法；3、保证此后绝不再有类似事件在中国任何地方发生。经过几天的游行示威“北平各大学生抗议暴行联合会”提出了六项文件：1、上书蒋主席（指蒋介石）2、函马歇尔转杜鲁门；3、告全国同胞书；4、告全国同学书；5、告美国人民及学生书；6、告美国驻华官兵书。

北平市府也于29日致函各大学，说明了沈崇事件的经过情形，

原函如下：查本月 24 日下午 8 时 30 分，本市东单练兵场发生美兵对中国女生施行污辱一案，当即本府警察局内七分局及中美警宪联系室巡查组，将肇事美兵之民皮尔逊·威廉当场捕获并经本府警察局详加询问，检查，即进行调查，认为此次事件系美兵皮尔逊·威廉与另一美兵同犯，对未成年中国女子施行污辱之罪行，本府当即根据此项结论，照会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提出严重抗议，并附志备忘录一件，列举四项要点：1 本案系在华美军违犯中国军刑法，依中美 1943 年 6 月 9 日协定，在华美军人犯罪惩治条例第一节、第一条、第二条甲项规定，应即执行军事法庭，裁判警处，当开庭时，得允许被害人及其监护人出庭，并由本府警察局派员参加，更依同条例补充办法第三项规定，应在中国迅速公开审判之，本案审判之结果，请以书面通知本府，以便转达被害人；2、被害人遭受恐吓迫及污辱行为，其身体精神名誉已受莫大损害，应请由美当局，以书面道歉，由驻平美军最高长官亲至受害人家中慰问；3、由美方赔偿被害人身体名誉精神等损失以及因此所引起生活上之一切损失；4、驻平美军当局，对其部属应加管束，重视军纪军律以防任何有关伤害中国平民之行为及中美事故之发生，并保证今后绝不再有类似此事件发生；5、当地美军当局，应与中国当局密切联系，求得更密切之合作，以维护中美传统友谊等，并由本府派员面致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口头抗议。据美军当局口头答复，照会各节，俟审判完竣罪案确立后，可全部接受，并深致歉忱，但在程序上，须俟呈天津美军总部核定后始能施行，此次事件贵校师生想表关切，相应函达查照为荷。司徒雷登于 1947 年 1 月 2 日向抗议北平女学生被奸案而举行示威游行之学生，发表了声明。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抗议浪潮中，于 4 日通电全国，认为此事为美兵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制裁，至“中美友谊”自不应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藉口而有损侮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为，并规定 1、不准在美军辖区及美军司令官驻地美驻华机关所在地游行，否则军警将采取措施；2、邀请有关机关开会，商讨防范办法。

同一天，驻华美军平津区司令霍恩德抵达南京向马歇尔、司徒雷登报告了北平美军肇事经过，事后记者采访司徒大使。大使称此乃美国军法问题，与整

个问题无关。

经过大量的侦讯工作，美决定组成军事法庭审理、因沈崇无亲属在北平，北大乃以监护人资格，北大法学教授燕树棠、费青及清华某蔡教授为其法律顾问。北平美军部于 2 月宣布，玛斯塔中校为“北平美军强奸案”之辩护人，克莱密上尉副之，军事法庭之首席检察官为费兹格来特中校，副检察官为杨克上尉。

驻平美陆战队司令部于 10 日下午侦讯了中国方面的证人关德俊等 11 人，11 日侦讯了沈崇本人。

17 日法庭正式开庭，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宣布被告犯罪五端：1、强奸，2、胁迫强奸，3、奸非，4、破坏军纪，5、妨害风化。检察官随后依次传询各证人，被传询的证人为 1、麦克奈尔上尉（美陆战队第一师第五团情报员）他呈献了美兵肇事地图一纸；2、孟昭杰（第十一战区汽车修理班工徒）他为第一个目击人，他供称：去年 12 月 24 日晚 8 时 30 分在东长街平安电影院门前购买香烟，目睹两美兵架一女人至电影院对面的树林中，并听到该女的哭声；两美兵后又架该女越东长安街到南大地草场，遂喊同伴 5 人前往观看，并报告了巡逻警，到有该女哭声处，光线不明不暗，无月色，无风。检察官又询问了与孟同行的其他五人，供词与孟大致相同，其中一人还拾得有血迹与沙土的手套，并在法庭上当场认出该手套，关德俊（内七分局一等警士）供称：当晚 10 时 30 分接报告前往查此事，在南大地听见女人哭声，走近后，见一美兵及女人躺在地上，以国语喝令美兵起来，美兵答以粗暴声调并拟动武，后即逃跑。关还供称，除因哭声寻见美兵与该女外，并见一件白色物件摇动；美兵找获后，即在东单拦住中美联络室巡逻车报告。刘尚志（保安警察队十三中队警士）供称：当时美兵暴躁态度恶化，当其逃走时我用枪挡住，其时该女站在关的身后，手中拿一白色物，问该女才知是她的内裤。该女说：“她被强奸，为北大学生，姓沈。”在场人见该女着深色大衣未扣，衣上有土，面上鼻上亦有土，因她的大衣未扣，故见衣服零乱。

19 日，沈崇在其父陪同下来到法庭，在 2 小时的审讯中不时流泪，泣不成声，引起法庭人员的极大同情和愤慨。沈供称去年 12 月 24 日晚去看电影，由王府井南口向东，在平安影院对面边树林旁突有两美兵将她架走，一个握右手，搂着她的脖子，她叫喊

“救命”时美兵即以手掩住她的口，两美兵先架至南大地南墙边，强奸一次，这时发现手电光，此次又拟强奸，因有手电光搜寻，故此次强奸未遂。继被拉至东大地空房，她曾脱身逃出，然旋即被美兵抓住，同时滑入一沟，但未跌倒，其后又被美兵拖至空房东北，这时黑暗，看不见哈德心大街，又被美兵强奸一次。沈还供称：在南墙根时，因被脱下的裤子系白色，乃拾起摇动求救，喊叫时，被美用手将口掩塞。

“沈崇事件”的发生，使蒋介石政府与美国政府的关系陷入了一个大漩涡之中，宋美龄知道此案关系重大，如果处理不好，将不好对付美国朝野，不好对付中国民众，不好对付共产党的抨击，于是亲自出面来平息了。

宋美龄首先接见了沈崇，并搬出了耶稣，她告诉沈崇，圣经上有句话：我认为再没有比那些只顾自己鼻子尖底下一点事情的人更可悲了，并询问了沈崇的要求。沈崇要求加入基督教，宋美龄不但当了她的洗礼人，还收沈崇为干女儿，她在沈崇面前表示，要同美国政府交涉，将皮尔逊绳之以法。宋美龄接着向沈崇提出了要求，别再在报纸上抛头露面并替沈崇改了一个名字：“沈××”，替她转到了北平女师大读书。宋美龄心想：只要沈崇不再闹，国内的学潮自会平息，再劝皮尔逊低头认罪，华盛顿的关节自会打通，所以接见了沈崇。宋美龄又来到了皮尔逊面前，然而皮尔逊见到宋美龄却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连第一夫人都不放在眼里，可见美国人在中国是何等骄横跋扈，然而宋美龄清楚，没有美国的军事援助，是难以打败众望所归的共产党的，所以她只能强颜欢笑，当皮尔逊问宋美龄他可能判多少年时，宋美龄告诉皮尔逊：你不是一般的强奸罪，你强奸了美国的援华政策，强奸了中美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你的案情不但惊动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连美国总统先生都骂你，按中国法律你将被杀头。宋美龄的话击倒了皮尔逊的气焰，接着宋美龄用缓和语气说：“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可以救你，只要你写一份真实的认罪书，我一定在贵国总统面前说情，最多判你十五年徒刑，决不会处死你。”

1947年3月，美国军事法庭判处了皮尔逊15徒刑，而对普利查德只逐出陆战队，送回美国了事。

蒋介石在听到了路透社华盛顿发布的消息后，举办了盛大的招待会。“中国方面对本案的胜诉，至表欣慰。”

然而美方一面判处了皮尔逊，一面扣留了援华物资。美国总统特使露骨地说：要想得到美援，就要撤销对皮尔逊的判决。也就是要承认美军在中国的太上皇地位。事隔不久美国就撤销了对皮尔逊的判决。国民党政府对此未作任何表示。美国的强权政治又一次强奸了中国。

(责任编辑 淑玉)

《著作权法》关于报刊用稿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四章第一节第三十二条规定：

“著作权人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杂志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杂志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史志编者按：本刊已从今年3月1日起按上述规定执行，凡向本刊投稿在一个月内存未接到采用通知的，可以自行处理。稿件所引用的资料务请注明出处。本刊一般不退稿(6000字以上的长稿除外)，请自留底稿。

关于报刊转载或文摘、资料刊登付稿酬的标准问题，经查《书籍稿酬暂行规定》(国家版权局1990年6月15日)第五条中规定：

“期刊转载其他报刊已发表过的作品，按第三条第(1)款标准(史志编者按：即著作稿每千字10至30元)的20%至40%向原作者付酬，并按第三条第(1)款的10%至15%向首次发表该作品的报刊付酬。”

本刊亦按此规定处理。

●“六朝军事史研究”增刊由：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

●《南京史志》编辑部

联合组织编发

六朝军事史最新研究成果

● 南京大学教授 卞孝萱

果 的 交 流

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大学兵制史研究所、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西省上饶师范专科学校、庐山白鹿洞书院等七单位共同发起的“六朝军事”学术讨论会，于1990年9月25日至28日在江西九江庐山麓的白鹿洞书院举行。十多个省市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的专家学者：姚公骞、简修伟、万绳楠、李季平、周伟洲、罗宗真、田泽滨等五十多位同志与会，提交论文三十余篇，著名学者吴泽、谷霁光先生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时期，其间战争频繁而复杂，并涉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因此，对六朝军事的研究，就成为解剖六朝社会的重要课题。“六朝军事”学术讨论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从探求军事规律、总结战争经验、借鉴指挥艺术的高度，对六朝军事与战争的性质和特点，六朝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六朝军事制度、军事人物、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六朝具体地区的战略地位，六朝典型战例等问题，作了多侧面、多层次的讨论，在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进展，取得令人满意的丰硕成果。

这次会议以专题形式对历代军事史进行探讨，在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史学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诚如谷霁光先生在贺信中所说：“贵会今开风气之先，为之倡导，对于推动史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并把军事与战争的历史作为研究历史的一个重大课题来抓，意义至为深远。”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弘扬马列主

义国家学说，加强军事与战争的整体研究，推动六朝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起了积极的作用。

提交的三十余篇论文，观点新颖，论据充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国内六朝军事史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大交流，将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记下引人注目的一页。与会同志接受白鹿洞书院的提议，决定在该院立碑留念。

经过酝酿与筹备，由《南京史志》编辑部与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共同编辑“六朝军事史研究”专号。邱敏、孙永如、张学锋三位同志负责编选工作。张学锋同志与我住址靠近，往来磋商尤多。限于篇幅，有许多好文章未能收入，深以为憾，请同志们谅解。由于经验不足，这个专号可能存在不少缺点，欢迎会员和读者指教。我们希望今后能采取更多形式，加强学术合作与交流，为推动历史研究的更加繁荣兴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以黄河或淮河、秦岭为界的南北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何止数百次,其中有北方政权的“南进”,也有南方政权的“北伐”;结果一是形成统一局面,而且往往是北方统一南方,一是“南进”或“北伐”失败,南北依然分治。如何认识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性质?过去中国封建史家往往以封建正统论和大汉族主义思想出发,来衡量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性质。他们总是把自己认为封建正统的一方、汉族政权的一方,看成是正义之师,对其发动的南北战争加以肯定和歌颂;而对他们所谓的“僭越”的一方、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一方发动的南北战争,视之为“反叛”或“入侵”、“征服”,加以否定和丑化。这些观点,自建国以来大都为史学界所批判、扬弃。但是,在对历史上南北战争性质的认识上,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争论还十分激烈。因此,研究历史上南北战争的性质,特别是带有民族矛盾的南北战争的性质,对于正确的认识、阐述中国历史,丰富和发展新中国的史学理论,加强民族团结等,均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分裂割据时期(即“六朝”时期),是南北战争较为集中的时期。因而,我们以六朝时南北战争为对象,进一步探讨南北战争的性质。关于此,田余庆先生大著《东晋门阀政治》(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有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笔者受田先生大著的启发,想在此书基础上,将论述范围适当的扩展(即增加对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性质的探讨),以六朝南北战争性质为题,加以讨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时有短暂的统一外,几乎都存在着南北政权对峙的情况。由此产生的南北战争,大致可分两种大的类型,划分标准是以是否存在民族矛盾、民族对抗为准。由此,我们可将三

国时北方曹魏对吴、蜀的战争(包括东汉末曹操与孙吴、刘备的“赤壁之战”),西晋的灭吴之战,隋灭陈之战,以及蜀汉诸葛亮的“北伐”等,划为第一类型。今天史学界对这一类型战争的性质认识没有多大的分歧,大都认为这是南北割据政权(统治阶级)之间相互兼并或统一性质的战争,因战争一方的胜利而统一全国,结束分裂割据,其进步的历史作用是一致加以肯定的。

自西晋永嘉之后,北方各内迁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建立政权,西晋统治集团偏安江南,建立东晋政权,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后期北周政权为汉族杨坚夺取,建立隋朝后为止。在这大约 260 多年时间内,北方政权基本上是由内迁少数民族建立的,而南方政权是由汉族建立的。因此,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就有了民族对抗的因素在内。诸如北方前、后赵对东晋的战争、前秦对东晋的战争(包括“淝水之战”)、北魏对刘宋的瓜步之战;南方东晋对北方的战争,即所谓的祖逖、桓温、刘裕等的“北伐”等等。我们将这种带有民族对抗性质的战争划为第二种类型。对于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较之前一类更为复杂,目前史学界对其性质的认识颇多分歧,争论激烈。因此,本文主要讨论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性质。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是自统一的秦汉以来、经三国分裂之后,再一次大的分裂。与三国分裂割据相同的是,各分裂割据势力和政权都是在原统一的秦汉或西晋的领土之内建立的封建政权;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所建的封建割据政权有由汉族所建,也有由内迁“五胡”(匈奴、鲜卑、羯氏、羌、)及拓跋鲜卑等族所建,而后者又皆立国于北方。

笔者认为。无论北方的五胡、北魏等政权,抑或南方东晋及南朝诸政权,它们都是多民族中国境内

各民族的政权。它们之间的战争(南北战争),也是国内分裂割据的封建政权之间的内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性质主要是由交战双方继续什么样的“政治”来决定的。这一时期各族封建统治阶级(包括汉族),他们发动南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兼并对方,有时甚至是为了“混一六合”,建立“大一统”的伟业。因此,无论是东晋的“北伐”,或是苻秦发动的淝水之战、北魏的瓜步之战也好,从中国历史发展总的趋势和背景,及各族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目的等方面来分析,都是属于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兼并或统一性质的战争。

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终归是在不同民族所建政权之间进行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民族矛盾、民族对抗是客观的存在。故这一类型的南北战争又必然带有民族战争的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特别是南北战争,其性质不是纯粹的、单一的,而往往是双重或多重性质的。而战争的性质也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所转化或变动的。如以上的分析,十六国南北朝时的南北战争就是具有统一兼并和民族战争的双重性质。

试以近十余年来史学界讨论最多,争论颇为激烈的淝水之战性质为例,加以阐述。淝水之战的性质,截止目前史学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有谓此战是前秦对东晋发动的一场“民族侵略战争”,或“民族征服的非正义战争”;有说是“南北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兼并统一战争”,或是前秦“统一中国的正义战争”;或说“淝水之战具有统一战争和民族入侵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入侵战争。”

在仔细研读以上三种不同看法的论据之后,笔者认为第一种看法过份地强调了当时民族矛盾和民族对抗,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南北分裂割据的形势及北方前秦政权发动战争是在继续什么样的政治。第二种看法,却又过份强调了前秦政权的汉化和南北胡汉民族矛盾的淡化,而完全忽略了当时南北民族矛盾、民族对抗存在的事实。笔者基本同意第三种意见,即认为淝水之战具有双重性质。

但是,笔者认为,淝水之战(包括十六国南北朝时所有的南北战争)是具有“统一兼并和民族战争”的双重性质。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一般说来,都是分裂割据时期南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兼并对方,其中有的是作好充分准备,以“大一统”为目的而发动的,更多的是为了兼并、掠夺对方某一地区的局部性战

争,两者性质一致。因此,作“统一兼并战争”来概括战争性质似觉更为全面和确当。其次,由不同民族建立的封建割据政权发动的南北战争,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然而不一定是“民族入侵”或“民族征服”战争。

不仅淝水之战具有统一兼并和民族战争的双重性质,而且凡是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均具有这种双重性质。其中,也应包括东晋及南朝诸政权对北方各族政权发动的南北战争,如东晋时祖逖、恒温、刘裕的“北伐”等。如果没有传统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偏见,谁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晋偏安江南后,南方的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与北方各族所建政权的性质完全相同,它们都是当时分裂割据于国内的封建政权。它们之间的战争都是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权益而进行的对另一民族的战争。长期来一些史学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把中国历史上凡是汉族政权打少数民族,都说成是“进步的统一战争”,是先进的文化战胜落后的文化,先进的社会制度战胜落后、野蛮的社会制度等;而当少数民族打汉族政权时,则一切都是野蛮的入侵、民族征服战争等。对此,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和反思吗?

三

自然,说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战争具有双重性质,并不意味着对这一类型战争“统一兼并”和“民族战争”两种性质论的调和和折衷。因为这两种性质在某一时期总有一种性质是主要的。

以笔者之愚见,淝水之战,包括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所有南北战争的性质是双重的,即是统一兼并战争,也是民族战争,而主要方面是封建兼并统一的性质。自东晋建立,南北对峙,南北方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对抗一直是存在的,这是历史事实,谁也不否认了。就拿前秦来说,诸如苻融劝苻坚勿攻东晋时说:“且国家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晋书·苻坚载记附苻融传》)这说明氐、汉之间仍有鲜明的界限,而氐族本身也有民族自卑感。东晋统治集团也视苻秦为“北狄”、“氐贼”。广大汉族人民与前秦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矛盾也仍然存在。特别是北方广大汉族人民“人心思晋”,希冀东晋“北伐”,南北统一,安居乐业。在淝水之战前约30年,东晋恒温“北伐”至长安,“三辅郡县皆来降”,“民争持牛酒迎劳……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资治通鉴》卷九

九)再从氏族苻坚的前秦政权本身来看,他主要依靠人数分散的氏族上层;实行了一些维护本民族统治阶级的措施。如仿汉赵,后赵徙民实畿甸,甚至分关中氐户出镇四方;国内隐藏着的民族矛盾也十分复杂、尖锐。以上这一切,说明当时南北政权有差异,而且民族矛盾、民族对抗依然存在;北方的民族融合远远未达到大体完成的阶段,南北之间的民族对抗情绪仍然十分强烈等,所有这一切在那些主张淝水之战是民族入侵性质的论著中,均有充分的论述。

可是,确定淝水之战及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战争性质的主要因素,是看发动或承受战争的一方的政权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权,它继续的是什么样的“政治”。

前秦政权最本质的特性到底是什么?隋代思想家王通(文中子,580—617年)的看法,也许对我们有所启迪。王通高举儒家提出的行“仁政”的大旗,从是否行“王道”(仁政)来臧否历代帝王,评论“正统”之所在,主张“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怀之”(《中说·王道篇》)。他对学生提出的“苻秦逆”,反驳道:“晋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齐桓、管仲不得背也;晋制至私之命,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纣;齐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晋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中说·周公篇》)在距前秦灭亡二百多年后的王通,能够摒弃传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正确评价苻秦和晋朝,真是难能可贵。

总之,十六国、南北朝北方内迁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属性和特点,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1)它们是由内迁已久,与汉人杂处,并已逐渐汉化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2)这些政权建立在当时中国内地或边疆,而且是承继汉魏以来内地汉族政权制度的封建化政权,有的杂以胡俗或实行胡汉分治;(3)这些政权之间相互战争主要的一面是相互兼并,但也带有民族战争的性质,是以各族封建统治阶级为扩大领地,以封建奴役各族人民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

基于以上的认识,尽管当时民族矛盾、民族对抗仍然存在,有时甚至十分尖锐,但是北方各族政权发动的南进战争,与历史上北方蒙古对南宋、满族对南明的南北战争有明显的区别,蒙、满等族并非内迁已

久,已开始汉化的民族;他们建立的政权(指统一全国之前)的性质(社会性质)亦与十六国南北朝各族政权不同。他们对南方汉族政权的战争,主要的一面是民族征服,只是到战争后期其性质才转化为统一战争的性质。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前所述,判断历史上战争的性质,应是以发动战争的一方是在继续什么样的“政治”为主要标准。而战争的成败,统一战争的条件是否具备,不能作为判断战争性质的主要标准。南北战争的性质并不主要取决于战争最后是否取得统一的结局;而统一战争的胜利与否,也不取决于南北民族融合是否大体完成。战争失败,没有达到统一的结局,并不能改变或缩小战争是统一兼并为主的性质。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否则不正应了历史上一句应该批判的老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了吗?

四

综上所述,六朝时已是在中原内地的南北各族政权之间、各族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的南北战争,都是为了兼并或统一对方,将对方的各族人民纳入自己的封建剥削体系之中。无论是北方各族政权的“南进”也好,或是南方汉族政权的“北伐”也好,都是在继续着上述的“政治”。因此,从中国历史发展总的趋势和大的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性质,主要的一面是“内战”,是割据的各族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相互兼并或统一的战争。同时,这一战争因当时南北民族矛盾、民族对抗的存在,而具有民族战争的性质。但是,民族战争的性质是次要的,它随着南北民族融合的加深,民族对抗的缓和,而逐渐削弱,以致基本消失。到隋平陈之战时,因南北民族对抗因素的最大削弱,民族战争性质的一面也就随之消失。

既然六朝南北战争主要是各族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兼并、统一对方的内战,一般说来无正义与非义之分。其中成功的南北统一战争,如西晋平吴之战,隋灭陈之战,虽然其战争初亦无正义可言,但其结果却对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起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次南北战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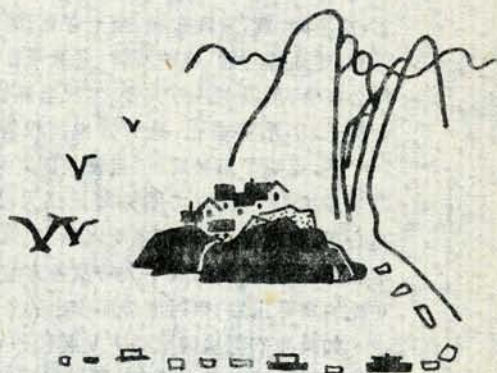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惠 兰

孙吴“保有江东”

基本国策评析

●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简修炜

庄辉明



汉末以后,各军阀势力的混战和割据,打破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一统局面,战争成了三国时期经常发生的社会现象,也成为当时政治的主要手段。战争不仅是交战各方经济力、军事力的较量,也是各方政治力的较量。处于对抗中的任何一方,为在频繁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首要之务在于制订正确的国策,确立切合实际的战略目标,用以指导和制约自己的一切军事行动。可以说,谁的战略思想正确,谁就能在对抗和冲突中占有优势,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正是在这一点上,统治江东长达半个世纪的吴主孙权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权继立以后,即正式确立了“保守江东以观天之衅”^①的基本国策,以后五十年中始终奉为圭臬而未曾稍改。

对于孙吴的这一基本国策,历来存在着非议。宋代的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作的注中评论说:“江东君臣上下,本谋不过此耳”^②,其不以为然之意,溢于言表。近年来,亦有学者撰文认为:“当时在江东诸大臣将领中,敢于提出统一全国目标的,也只有鲁肃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孙权集团中普遍的政治倾向与鲁肃的愿望相距太大了”,“在三国中,吴的内外政策最为缺乏远见”。^③

要对孙吴“保守江东”的基本国策作出恰如其分的评判,既要联系当时孙吴所处的内外环境,更要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加以考察。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孙权所确立的基本国策,既是审时度势的务实之举,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明智决策。

《兵经》曰:“兵之动也,必度益国家,济苍生,重威能。苟得不偿失即非善利者矣”。又曰:“善兵者,审国势己力,师武财赋,较于敌以立计。”^④这里着重强调了两条原则:一是军事行动必须以益国济民为

旨归;二是作战方案和战略目标的确定,必须建立在审时度势、明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以此衡量孙吴“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便不难发现,孙权并非“缺乏远见”,而恰恰是一个“善利”、“善兵者”。

从当时的外部环境看,孙吴在鼎立的三国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王夫之曾论曰:“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⑤,从政治凭藉与实力对比两方面指出了孙吴的劣势。事实确是如此。曹操父子“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汉献帝的名义号令天下,虽然“操非果忠于主者,而名义所在,昭然系天下之从违,固不敢犯也”^⑥。加之曹魏兵众土广,所谓“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⑦,其势远在吴、蜀之上。蜀汉虽偏处一隅,地狭民少、势单力薄,但从宗法正统观念看,蜀主刘备以“帝室之胄”自居,树起“攘除奸凶,兴复汉室”^⑧的旗帜,在政治上凭藉显然也较孙吴为优。相比之下,据有江东的孙权,北有曹魏之患,西有蜀汉掣肘,既无蜀汉宗法正统的旗帜,更乏曹魏那样的军事实力,唯一可以凭藉而“拒操者,长江也”^⑨。以孙吴之实力断然无法与曹魏争雄;即使结好蜀汉以成犄角相援之势,也只是使南北间的力量对比大体平衡,仍不足以扫灭曹魏。纵观三国形势,看似魏、蜀、吴三足鼎立,实际上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在经济力、政治力和军事力上的对立与抗争。据有益州的蜀汉与控制荆、扬的孙吴之间虽然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但毕竟同处于长江流域。孙刘的矛盾在争夺荆州,而吴魏的矛盾则在存亡。对于孙吴而言,真正的威胁来自曹魏,这是问题的关键,也是孙权制订国策的出发点。孙吴的实力和处境,孙权君臣是颇有一点自知之明的。对此,吕蒙与孙权的一番对话就很说明问题。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吕蒙建议取关羽、夺荆州,孙权提出:“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吕蒙对曰:“今操远在河

北,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余士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取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权善之^{〔10〕}。一个“守”字,点明了东吴君臣“自量吴国之兵力不足北向以争中原”^{〔11〕},只有力图凭藉长江天险以保有江东的心态。由此看来,孙权之所以确立“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正是从当时天下大势及各方政治、军事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而作出的务实之举。

如果我们再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孙吴政权社会基础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更可以明了“保有江东”国策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秦及西汉时期,全国的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均在西北的关中地区,江南的经济还未走出低谷状态。直到汉武帝平定闽越时,淮南王刘安犹以为“得其地,不可郡县也。”^{〔12〕}司马迁也认为:“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13〕}。很明显,从生产发展水平的总体看,无论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土地利用、人口增长率,南方都落后于北方。但自东汉以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长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初步发展,长江的上、中、下游,分别形成了益州、荆州和扬州三大经济区。至东汉末年,中原政局动荡,战乱不止。相比之下,江东地区有长江阻隔,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北方人口(其中不少是北方大族)为躲避战乱而纷纷渡江移居江东^{〔14〕},不仅使南方的劳动人手大为增加,而且促进了生产经营管理的进步;东汉以来一些地方官吏如会稽太守马臻等在江东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积极作用逐渐得到显现。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江东地区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水土条件,丰富的水陆资源,利于交通的河湖港汊等,都在江东地区经济的开发中日益显露其优势。东汉以来,尤其是到了东汉末年,江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已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长江流域经济的初步发展,并没有打破中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优势的格局,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南方落后于北方的状况也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是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三国后期依然由北方来实现全国统一。然而,恰恰是长江流域经济这种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东汉末年长期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原经济的特殊条件下,形成了南北经济实力相对平衡的局面,导致了魏、蜀、吴三国的鼎峙,也成为孙吴确立“保有江东”国策的经济基础。没有江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孙吴就无法“保有江东”;而如果江东区域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北

方,孙吴又必定不会仅仅满足于“保有江东”。可见,孙吴“保有江东”国策的确立,是江东区域经济一定程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明确指出孙权不得不“限江自保”的缘由:“今议者咸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15〕}胡三省也认为:孙权之所以“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其因盖在于“自量其国力,不足以毙魏”^{〔16〕}。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孙权连长江流域都未能全部控制,吕蒙等人提出的“全据长江”的目标尚且不能实现,又怎么可能去与控制整个黄河流域的曹魏争夺中原呢?!

再从孙吴政权的社会基础看,孙氏在江东得以站稳脚跟,与得到江东土著大族地主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东汉末年,与区域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江东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变革,其突出的表现便是庄园经济的经营形式的出现。近年来出土于江浙一带的东汉文物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浙江海宁出土的东汉墓葬中的画像石,既绘有重围家院,又有鱼、羊、马、嘉木、更有马夫、仆人、挑夫及管事,贵族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无疑是业已出现的地主庄园经济的缩影和折射。^{〔17〕}

地主庄园经济的经营形式的出现,是江东土著豪族地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东汉末年,江东大族地主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发展、壮大,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社会势力。吴郡的顾、陆、朱、张,会稽的孔、魏、虞、谢等强宗大姓,不仅“财丰巨万”,而且“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18〕}但是,由于此时南方经济刚刚从低谷中走出,江东土著豪族地主的势力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与北方宗法封建性大地主的力量相匹敌,因而江东土著豪族地主具有明显的软弱性特点。这种软弱性不仅存在于孙吴时期,而且持续了较长时间,至东晋时表现得尤为清楚。西晋灭亡后,江东的土著大族不仅没有乘势而起,拥戴自己首领建立政权,反而容忍和支持以中原南渡的司马氏和北方大族为核心的东晋政权,便是一个极好的证明。

其次,江东土著豪族地主又具有浓厚的地域性特点。豪族地主作为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者,历来带有地域性的特点。《后汉书·酷吏传》的序文中指出:“汉承战国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则陵横邦邑;桀健者则雄张闾里。”不论是“陵横邦邑”,抑或是“雄张闾里”,实际上都指明被称为“豪猾之民”的豪

族地主势力往往局限于某一地区的地域性特点。与享有政治特权的地主世家相比,豪族地主没有政治身分,他们主要凭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顽强的守法势力,才能够独霸一方,称雄于乡里。一旦脱离了他们所控制的地区,豪族地主的实力和影响便会遭到很大的削弱。江东土著豪族地主自然也不例外。豪族地主的地域性特点,使他们主要着眼于江东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着眼于维护自身在江东地区的既得利益,趋向于拥众自保。虽然在东汉末年的军阀纷争中,江东土著豪族地主中的相当一部分与孙氏政权相结合,逐渐转化为“世有高位”的地主世家,但其注重区域发展的特征依然存在,并且通过他们的政治代表强烈地表现出来。如吴黄武七年(公元228年),陆逊率军击败魏军大司马曹休,诸将建议乘胜追击,“进取寿春,割有淮南,以规许、洛”,陆逊却“以为不可,故计不施行”^[19],便是一例。

江东土著豪族地主既是孙吴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则其地域性和软弱性的特点必然要影响到孙吴政权政策的制订。身为一国之主的孙权亦深知与江东土著大族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即所谓“势一则禄祚可终,情乖则祸乱尘起”。^[20]为了国祚久永,孙权在制订政策时就不得不考虑江东大族的利益与愿望。一方面,孙权在用人上“外仗顾、陆、朱、张”^[21],起用江东大族的代表担任将相要职。孙吴一代,江东大族尤其是顾、陆二姓高官辈出,顾雍祖孙三代均被委以重任,陆氏一门前后出二相、五侯、十余将军。另一方面,孙吴政权的基本国策则体现了江东大族的利益及其地域性、软弱性的特点。江东大族的根基在江南,基本利益也在江南,他们要求孙吴政权以保存和维护江东地域利益为前提,不少江东大族地主反对主动出师北向攻魏,其实质就是反对把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消耗在北取中原的战争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孙权为“禄祚可终”而迎合江东大族的意愿,作出“保有江东”的战略决策,正是务实之举。

“保有江东”这一国策的提出,不但是区域性经济发展和江东土著豪族地主的特点在孙吴政权政策上的必然反映,而且反过来又维护和促进了江东地区经济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孙吴政权创建伊始,即以“保有江东”为基本国策并从这一既定国策出发,灵活地运用外交与军事手段,因时、因地制宜,调动各种手段以实现既定目标,这就使得孙吴在三国时

期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环境中,能以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江东的开发和经营,成为当时战事最少的一方,既在数十年时间里保障了江东的相对安定,又保存了江东的人力和财力,对江东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王夫之认为:“自汉末以来,数十年无屠掠之惨,抑无苛繁之政,生养休息,唯江东也独”^[21]。这一评论虽不尽确切,但相对于同时期的魏、蜀而言,还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综上所述,吴主孙权确立并恪守不渝的“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不仅反映出他善于审时度势的战略家眼光,而且充分体现了他的务实精神。揆诸当时形势,是没有理由将其贬为苟且偷安、不图进取的。恰恰相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对孙吴“保有江东”的基本国策以及孙权为实现这一国策而作的努力,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

(责任编辑 莽 明)

注:

- [1][2]《资治通鉴》卷63,汉献帝建安五年十月条;
- [3]参见冯君实:《简论鲁肃》,《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
- [4]引自《兵经释评》,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页、198页;
- [5]《读通鉴论》卷10;
- [6]《读通鉴论》卷9;
- [7]《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二年八月条;
- [8]《资治通鉴》卷70,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条;
- [9]《三国志》卷54,《周瑜传》;
- [10][11]《资治通鉴》卷68,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月条;
- [12]《汉书》卷64上,《严助传》;
- [13]《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 [14]参见拙文:《诸葛亮躬耕地定位要历史地全面地考察》,《华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
- [15]《资治通鉴》卷71,魏明帝太和三年四月条;
- [16]《资治通鉴》卷72,魏明帝太和五年十月注;
- [17]参见《浙江海宁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5期;
- [18]《三国志》卷28,《邓艾传》;
- [19]《三国志》卷56,《朱桓传》;
- [20]《三国志》卷46,《孙策传》;
- [21]《读通鉴论》卷10。

东吴军事思想述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余大吉

研究东吴军事,不能不研究其军事思想。因为它是东吴的战争指导者在割据条件下对战争与军事问题的基本思想、见解和观点,对东吴的成败兴衰关系甚大。然而至今它仍然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对它全面系统的研究,目前更不多见。为此,本文尝试对此作一次初步的阐述。

东吴军事思想的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汉末以来的形势,向东吴战争指导者提出两个问题:当汉末天下大乱时,在军事上后起的弱者如何才能割据一方?在随后出现的三国鼎立中,又如何维护安全、同北方强敌对峙?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东吴军事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思想是在东吴的战争和军事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东吴的战争具备如下一些特点:一、在江东形成了有利割据的自然经济。中原旧经济区遭受战乱严重破坏,而江东经济区则获得较好的开发,南北出现某种程度的均势。二、江东世家大族把持了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共同支持孙氏政权,以维护其在地方的利益,但是不情愿承担更多的战争负担。三、三国鼎立期间,曹魏的强大和东吴的相对弱小。上述第一、二个特点,规定了东吴有可能找到成功割据的思想;第二、三个特点,又规定了这一思想带有一定的软弱性。东吴的军事具备如下的特点:它建立了以水兵为主的军队,据有长江之险,水战取得战略地位,兵士中多为胁迫来的山越和俘获成分,又终身为兵,世代为兵,发生兵员不足和士气不高的问题,等等。东吴的军事思想,就是在上述战争和军事特点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东吴战争指导者的头脑对上述特点作出的能动的反映。

东吴军事思想的内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崇尚武治的战争观、用众力众智的建军思想、割据江东的战争指导思想。其建军思想又包括爱人多容的用将思想和断斩示威的军法思想,战争指导思想又包括根据地、全据长江、江防、结盟鼎立和限江自保等思想。现分叙如下:

崇尚武治的战争观

东吴以武力起家,以武力建国,其内心深处是崇尚武治的。这种思想有过一次明显的流露。那次是“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1〕}。张昭等三人是通经名士,却崇尚武治,正是乱世在见机有为者头脑中造成的观念。孙氏本是武力强宗,崇尚武治,更是理所当然的。

从东吴的言行看,他们以为武治是不可或缺的:对外,可借以平定四海;对内,可借以维系巩固孙氏政权。建安五年,孙权继任。“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2〕}周瑜率兵赴丧,留吴郡不走,借武力维系东吴,安定人心,度过政权内部危机。东吴有人曾设想,如果放弃武治,照周瑜的看法,是“极不过一侯印,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岂与南面称孤同哉?”^{〔3〕}崇尚武治甚至深入成为东吴众将的人生观。他们处乱世,立志凭武力创功立业、猎取高位。在众将心目中,东吴的武治同他们一登龙门有着怎样密切的关系!

用众力众智的建军思想

汉末三国,江东最活跃的势力是世家大族,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控制着当地社会。孙氏一门的政治社会地位,在江东不属于最强大之列,孙氏政权全靠在江东的南北大族的合力支持。

赤乌元年,吕壹事败,孙权告谢诸大将,引咎自责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从智,则无惧于圣人矣。”^{〔4〕}这里说的正是东吴建军思想的核心。孙权要用诸大将的众力众智,而诸大将无非是大族在军事上的代表。孙权实际上是企图通过与诸大将共同分配军事权益来笼络和使用大族的众力众智,以建立起一支能与北方强敌抗衡、能保卫江东大族利益的军队。

用众力众智的思想,实际上包括相辅相成的两

个方面。其主要方面,是对于代表世家大族利益的诸大将实行爱人多容;作为补充的一面,则是对于军队的一般成员更多地实行断斩示威。通过恩威并施,达到用众力众智的目的。

爱人多容的用将思想

孙皎因为小事情同甘宁忿争,孙权教导他“爱人多容,可以得众”⁽⁶⁾。这个“爱人多容”实际上道出了孙权的用将思想。“爱人多容”包括“爱人”和“多容”两方面,在“爱人”方面,孙权主张与诸大将“同船济水”,⁽⁷⁾“荣福喜戚,相与共之”⁽⁸⁾。对于腹心将领,彼此间意气相投,达到真诚的了解。有人谗言诸葛瑾,孙权明确表示:“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⁹⁾史家孙盛评论说:“观孙权之养士也,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夷(当众指向其创痕),殉陈武之妾(命以陈武之爱妾殉葬),请吕蒙之命(千金募医,治护万方),育凌统之孤(在宫中养育成人,还其故兵),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虽令德无闻,仁泽罔著,而能屈强荆吴,僭拟年岁者,抑有由也。”⁽¹⁰⁾

“爱人多容”的另一面是“多容”,对诸大将的缺点、问题给予更多的宽容,对他们志短贵长,忘过记功。孙权说鲁肃虽有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¹¹⁾吴将潘璋“服物僭拟。吏兵富者,或杀取其财物,数不奉法。监司举奏,权惜其功而辄原不问。”⁽¹²⁾所以陈寿评曰:“以潘璋之不脩,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宣哉!”⁽¹³⁾

断斩示威的军法思想

东吴军法的基本思想是断斩示威,就是果断杀人,建立权威。渊源可以追溯到孙坚。他曾请求司空张温以三罪陈军法斩其所部董卓。他认为,古之名将,没有不断斩以示威的,所以司马穰苴斩庄贾,魏绛戮杨干之仆。如果不诛杀董卓,将亏损威刑。以后吕蒙征荆州,麾下士取民家一笠,覆盖官铠。官铠虽然是公物,吕蒙还认为违犯不得干历人家的军令,不可由于同乡而废法,于是垂涕斩之。吕蒙量刑显然过重,但是他的目的在于立威,结果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

东吴的刑罚,连陆逊也觉得太重。那时就太子宾客谢景引进魏臣刘虞的先行刑后礼之论,有过刑礼先后之争。陆逊呵责刘虞说:“若彼之谈,不须讲也。”⁽¹⁴⁾认为“礼之长于刑久矣”⁽¹⁵⁾抬高刑罚的地位违背先圣教导,并建议孙权施德缓刑。孙权则强调刑罚具有先令后诛、以威“小人”的作用。他只对大将们

讲“多容”,一般将领在边界镇守的,必须把妻儿交出作人质,如果本人逃亡叛变则杀掉无辜的妻儿。认为刑罚重是不得已而为之,将军翟丹叛逃魏国后,孙权担心诸将畏罪继续逃亡,才同意自今诸将有重罪三次,然后议刑。后来又被迫作一次让步,声称“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弃父,其伤义教,自今杀也。”⁽¹⁶⁾

割据江东的战争指导思想

东吴在进行割据江东的战争形成它的战争指导思想。这些思想是:

避实击虚、创建根据地的思想

孙氏起兵初期,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择割据方向。在这个问题上,孙氏不是没有教训的。孙策的父亲孙坚,从长沙太守任内起兵北上讨伐董卓,企图争锋中原,立威天下。尽管他作战勇敢,孤军开进洛阳,然而一困于讨董联军中袁术不运军粮,再叹于联军内部务相兼并以自强大,无人同他戮力进攻董卓,不得不仍然退回南方。他死后儿子孙策再次起兵,其用兵方向便和父完全不同。孙策的思想,是远避中原,投靠丹阳,收合流散,东据吴会。

这个开拓江东的选择,体现了战略上避实击虚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中原虎争,强手如林,到孙策起兵时候,中原已被群雄瓜分。孙策做为后起者,在时机上已落了后,其初起的兵力又少,如果继续走孙坚争锋中原的道路,必定难于成功。但是,如果避开中原之实,转而开拓江东,那就不一样了。江东相对来说,乃是空虚之地,它偏处东南,群雄无暇顾及,长江横亘西北,形成天然屏障,当地割据势力多而分散,加之孙策家有旧恩在该处,乘虚而起,据为根据地,可以用力小而收功快。当时即具有此等眼光,是难能可贵的。孙策以兴平二年(195年)渡江,到建安四年(199年)十二月收降豫章,前后不到五年,据有江东六郡,其开国的速度,远远超过曹操和刘备,为参加其后三国间的竞争,赢得较多的准备时间。那时曹操、刘备都还在中原苦战。尤其是刘备,奋战17年,迄无成功,直到后来采取同孙策一样的避实击虚的思想,退出中原,转向相对空虚的南方,跨有荆、益,才打开局面。但那已是步孙策的后尘,而且在时间上也被孙策远远抛在了后面。

全据长江的思想

中国历史上,立国东南较早的有春秋战国时的吴、越,然而它们之间的战争,主要是内争吴境内的

三江五湖之利。此后楚灭越，秦灭楚，至于两汉，都不曾以争夺长江为重要目标。至东吴，首次划江而治，其眼光便投向整个长江，要求取得整个长江的制江权。

这个思想，便是所谓的全据长江，即据有长江下、中、上游及其所在的杨、荆、益州。在东吴历史上，曾经再三再四地提出过全据长江的主张。孙策渡江前，张纮提出荆杨可一，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此后，沈友向孙权陈荆州宜并之计。鲁肃建议，因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甘宁献计说，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一破黄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境之楚关，大势弥广，即可逐渐规取巴蜀。直到蜀国降魏后，东吴陆抗等率军围困蜀巴东守将罗宪，仍然企图夺取蜀地，全据长江上游。显然，全据长江，是东吴一贯的得到普遍赞同的思想。

东吴为什么要全据长江？它的看法是：第一，有利于在变化了的形势下，为东吴的北进创造条件。孙策企图渡江北上袭许，那时由于北方多务，仅凭立足江东即可施行。官渡战后，北方走向统一，周瑜等认为此时仅仅立足江东就不够了，还必须进一步立足全据长江，然后才可以北进争夺天下。第二，有利于形势益张，以上流护卫下流，以保证安全和独立。第三，认为控制长江水道，可以迅速机动，兼顾两个战略方向。吕蒙曾设想“令征虏（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17〕}第四，有利于避陆战之所短，扬水战之所长。

全据长江的思想是东吴在成功地割据江东之后，规定其发展方向首先是向着中国的南方，后来吴蜀交恶，其思想根源盖在于此。

江防思想

当孙策在江东一隅作战时候，东吴还只重三江之固；其后进入全国的斗争，长江防卫便提上日程。孙权对邓芝说：“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18〕}东吴江防的基本思想，是应当有两个战略方向和实行开江延敌。

东吴认为它的江防有两个战略方向。最重要的方向是防御北方。为此它主张沿江部署重兵，把治所由腹地的吴逐次迁移到江边的京和秣陵，并依托长江，守在江北，防止北军进入长江，尤其防止进入长江上流，否则“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19〕}在沿江部署中，实行要点防御。其中尤其重要的西陵、江陵、武昌、濡须、石头，则修建永备筑城工事，以保证防御

和稳定。东吴认为，江防第二个方向是防御西方。当西方同它敌对时候，这个方向尤其重要。在西方，主要实行关限防御，就是要守住长江上的西大门，夷陵、建平就是必守的西大门。为此，陆抗死前上表，说西陵（由夷陵改名）、建平是国家外部蕃篱，社稷安危的关键，倘若该处有难，应当倾国力争。吾彦也主张增加建平守兵，认为建平不下，敌人终不敢渡江。

东吴江防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开江延敌，积极防御。东吴认识到，长江之险尽管是它具有的极大的地理优势，然而单纯依赖它是危险的，因为长川峻山“乃守国之末事”^{〔20〕}那么，守江的指导思想应当是什么呢？就是，反对消极守江，主张积极守江。武昌防御属于对北防御，对西防御时这一主张是否适用呢？夷陵之战初期，陆逊后退五六百里，让出三峡水域，从这一诱敌深入的行动看，东吴认为对西防御中，开江延敌的主张是同样适用的。

结盟鼎立思想

魏、蜀、吴之间的斗争，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三角斗争。在三角斗争中，东吴的指导思想是以灵活的态度夺取每次关系变动的主动权，以便在三角中始终占据有利位置。为此主张一贯结盟并处理好盟友的关系。

它主张一贯奉行结盟，避免军事上的孤立。当曹操南下时，鲁肃认为应该说刘备，使他抚集并争取刘表部下，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当它向昔日盟友刘备集团背后开刀，以夺取并保卫荆州时，转而主张乞求和讨好昨天的敌人曹魏。当战胜刘备随之又面临魏文帝的三道攻吴时，主张回过头来再同刘备修好，争取蜀国的谅解和友谊。

在处理同弱者盟友的关系时，主张借扶弱以抗强，但不可养虎遗患。为了对抗威力实重强敌曹操，孙权主张广揽英雄，鲁肃主张借荆州给刘备，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另一方面，东吴又警惕扶弱成虎。周瑜临死前告诫，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吕蒙也以为，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在是头熊虎，不可以腹心对待。

在处理同强者盟友的关系时，主张屈身忍辱。东吴由于实力和政治上都低人一等，同曹魏联合，是以请降、称藩纳贡、接受封拜的屈辱形式出现的。但决不可质任子，以免受制于人，丧失江东的独立。

限江自保思想

三国鼎立以后，东吴确立的战略思想是实行战略防御，诸葛亮称之为限江自保。孙策在开拓江东以后，其战略思想是与天下争衡，所以有渡江袭许之

洪秀全的后代可能逃到日本

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此后,清朝统治者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同起义有点关系者皆遭杀戮,洪秀全的家乡尤甚。官禄埭有40余人被害,洪秀全等的房舍、宗祠被夷为平地,祖坟被挖。唯一幸存的真物是洪秀全手植的一棵龙眼树。

据花县有关人士介绍,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家族改姓埋名四处逃亡,有的甚至逃到国外。抗日战争以前,有个叫矢野兴的日本官员,自称是洪秀全后

裔,曾到官禄埭祭祖。1938年广州沦陷后,官禄埭遭到日军骚扰。一个名叫矢崎的日本军官从广州赶来,宣布不准骚扰洪秀全的家乡,还修复了洪氏宗祠,取走了洪氏族谱。后来虽然归还,但这是复制品。矢野兴是不是洪秀全的后裔,不得而知。但洪氏族谱传到日本是千真万确的。1980年,东京大学教授小岛晋治写信证实,并寄来了洪氏族谱手抄本的复印件。

洪氏后人是否真的逃到日本,这还是个谜。

(益人摘自《旅游》总第八十四期)

举。孙策遇害临终嘱以保江东,观成败,是为度过权力的移交而实行战略转变。当孙权站住脚跟时,周瑜主张重新实行战略进攻,规划取蜀,进图北方,得到孙权的批准。不料周瑜随即病死,这一战略失去推动力。不久就进入三国鼎立。

对于鼎立期间应取何种战略问题上,东吴内部思想上是有分歧的。朱桓、殷礼、诸葛恪继孙策、周瑜之后,期望恢复战略进攻,伺机北进。这期间,东吴曾经多次发动有限出击,但都不属于战略进攻。殷礼说,若不悉军动众,照那样轻举,则不足大用,易于屡退。人民疲惫,丧失威信。但是殷礼、朱桓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直到孙权死后,主战派一度掌了权,才有条件实现他们的素志。建兴二年,太傅诸葛恪从州郡大发兵20万,企图曜威淮南。

主张战略进攻的理由,是认为时机有利。朱桓说曹仁大败,此万世一时也。殷礼认为,魏明帝死,幼主曹芳继位,虎争之际而幼童莅事,是天丧曹氏。诸葛恪认为自曹操以来,魏国亡形未有如今者也。

持相反意见的人属于主流派。他们以吴郡陆逊、陆抗父子和陆逊弟陆瑁等显要的江东大族为首,主张在鼎立期间限江自保。孙权在鼎立期间不能不更多地听主流派的。魏文帝死,魏国大丧,陆逊乘机建议宽赋息调,实际上企图压缩军队规模。两年后又否决了朱桓北进的意见。陆瑁提出,当前中夏鼎沸、九域相互盘结的时候,不能远征,应当深根固本,爱力惜费,务自休养。针对东吴军旅屡屡出击的问题,陆抗认为,应该讲求富国强兵,力农蓄谷,放弃穷兵黩武。不能听任诸将求名,一味邀利。诸葛恪大举出师,反对者乘其失利,发动政变把他杀掉了。到了孙皓时

候,吴郡华核又批判攻魏,说孙权死后,强臣专政,数兴军旅,以致军资匮乏,仓廩不安,赏赐无着,造成严重后果,主流派的力量很大,加上当时东吴的实际困难,因而限江自保的主张基本占了上风,被奉为鼎立期间的国策。

东吴军事思想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它是中国分裂时期弱者在军事上取得一定成功的一种指导思想。它的全据长江和江防思想都是前无古人的,结盟鼎立的思想显示了在三角斗争中少有的灵活性。它还创造了同吴越有别的思想模式;更多地着眼于在江南站稳脚跟而不是把争雄中原做为主要军事目标,开以下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之先河,在历史上具有发轫创新、承前启后、不可代替的作用。

(责任编辑 惠 兰)

注:

〔1〕三国志·吴书·陆绩传。以下凡引三国志。吴书,注中标出处时都予省略,仅出篇名;

〔2〕〔7〕〔8〕吴主传;

〔4〕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5〕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6〕孙皎传;

〔9〕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

〔10〕凌统传;

〔11〕〔17〕吕蒙传;

〔12〕〔13〕潘璋传;

〔14〕〔15〕陆逊传;

〔16〕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18〕吴主传注引干宝晋纪;

〔19〕周瑜传议者语;

〔20〕陆抗传。

东晋南朝中军补说

● 南京教育学院 副教授 邱 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转变时期。何兹全先生早年撰有《魏晋的中军》^①，详述魏晋之间中央军制^②的变化，论极精审。但自晋武帝卒后迄于南朝，中央军尤其是宿卫军制并未真正稳定下来，三百年来废置变动仍然不小。这种状况，正是两晋南朝政治历史特点的反映。在重温何先生考论后，本文拟为补说，浅陋之处敬请指正。

(一)

东晋南朝，京师宿卫军多沿西晋旧制，由“六军”“四军”“五校”和其他宫廷宿卫将领组成。

“六军”即《晋书·职官志》所载：“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分由领军将军（或中领军）、护军将军（或中护军）、左卫将军、右卫将军、骁骑将军、游击将军统领。此为中军精锐主力。

“四军”系指前、后、左、右四将军所统之军。《晋书·职官志》：“左右前后军将军。案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秦始皇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

“五校”为汉魏旧制。《晋书·职官志》：“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皆中领军统之。”何先生并以为，太康平吴以后，又置翊军校尉，合为六营。

属于宫廷宿卫军的还有：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卫将军（或左、右卫将军）、武贲中郎将（后称武贲将军）、冗从仆射（后称冗以将军）、羽林监（后称羽林将军）、积射将军、强弩将军等。南朝又有左、右中郎将之设。

中央宿卫军尤其是做为主力的六军，职责首先是宿卫京师、宫廷。《宋书·百官志》：“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晋）元帝永兴元年，复改曰北军中侯，寻复为将军。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领军与北军中侯官名往复互改，正说明领军以宿卫京师为基本职责。东晋以来，且为二卫、骁骑、材官诸营宿卫兵的统帅。

《宋书·百官志》又称：“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何先生曾指出，外军系指京师以外都督分领之中央军。是则护军统率京师以外诸军。但是，护军仍属中军六军之一，统率外军不等于不参与京师宿卫。《宋书·百官志》、《晋书·职官志》护军将军条下皆称：“受命出征，则置参军”。反言之，不出征，仍驻扎京师附近，担负宿卫任务。

《隋书·百官志上》记梁陈中军也指出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及“四军”“五校”，左右中郎将，虎贲、冗从、羽林三将军，积射、强弩二将军和殿中、武骑等职责“皆以分司丹禁，侍卫左右”。

东晋南朝以来，每逢京师形势告急，中军诸将帅皆率部参与宿卫。

《世说新语·方正》载，王敦反，军至石头，周顗往见曰：“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刘注引《晋阳秋》曰：“王敦即下，六军败绩”。

晋咸安二年（372）“彭城妖人卢悚（《晋书》作卢悚）自称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余家。十一月……甲午，悚师众三百人，晨攻广莫门，诈称海西公还，由云龙门突入殿廷，略取武库甲仗，门下吏士骇愕不知所为。游击将军毛安之闻难，帅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左卫将军殷康，中领军桓秘入止车门，与安并力讨诛之，并党与死者数百人。”^③

晋隆安五年（401），孙恩率军至丹徒，京师震恐，“冠军将军高素，右卫将军张崇之守石头……游击将军毛邃备白石，左军将军王嘏、领军将军孔安国屯中皇堂”。^④宋明帝死，遗诏以萧道成“为右卫将军”。元徽二年（474）五月，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率众二万举兵于浔阳。一时长江中下游方镇纷起响应，京师震恐。道成即“与护军褚渊、征北张永、领军刘劭、仆射刘秉、游击将军戴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集中书省计议”^⑤，终击败休范军，挽回危局。

以上皆说明，东晋、南朝的中军在宿卫京师、宫廷时，发挥决定性作用。

何先生指出，魏晋中军不同于汉代南北军的重

要一点,在于后者专任宿卫,很少出征。前者则于宿卫之外兼任征伐。综观东晋南朝史,中军不仅沿袭此制,而且,对外征讨更为频繁。

成帝咸康元年(335),后赵军寇历阳,王导以司马率军讨之。值石勒刚死,石虎专恣,石聪及后赵谯郡太守等遣使请降。东晋军司马孔坦致书石聪称:“今六军减严,水陆齐进,熊黑踊跃,屹噬争先……”^{〔6〕}可见,中军主力“六军”全部投入征讨。

淝水战前,前秦军围三阿。东晋以“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司马)昱之、淮南太守杨广、宣城内史丘淮次堂邑……”^{〔7〕}

宋元嘉三年(426),文帝翦除政敌徐羨之、傅亮,激起谢晦在江陵起兵。遂“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率六师西征”。^{〔8〕}

南齐建元三年(481),“领军将军李安民等破虏于淮阳”。^{〔9〕}

梁晋通六年(525)遣中护军夏侯亶督寿阳诸军侵魏”。^{〔10〕}

魏晋南朝的中军,越来越多地投入征讨,与政治局势的发展特点有关。汉末以来政局分裂动荡,频繁的改朝换代,南北政权的对峙、阶级矛盾的激化、统治集团内部尤其是皇室间的骨肉相残,最终往往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在动用京师以外的中央军亦即各都督控制的诸军不敷需要之时,或在并不掌握诸都督军的形势下,最高统治者必然把宿卫军队动员起来,实现其政治斗争的目的。所以,中军职责的转变是魏晋南朝政局动荡的必然结果。

(二)

东晋南朝虽然沿袭了魏晋之际的中军制度,但是,这二百余年,也出现了不少迥异于魏晋之际的变化。

(1)中军将军地位的变化。

何先生在《魏晋的中军》一文中曾指出,领、护军随曹魏王国的建立而代替汉代卫尉、执金吾、光禄勋,成为总领宿卫军的统帅。但也随着曹魏势力的衰落而权力下降。司马氏控制朝权后,先是视左右二卫为最重要的宿卫将领,晋武帝时,再置中军将军统率之,成为新的宿卫军统帅。但是,这一局面维持时间并不长。早在晋武帝死后不久,中军将军显赫的地位已不复存在。

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11〕}西晋首尾半个

世纪,中军将军有明确任职记载的时间总共不过6年左右。我们虽然不能仅据万氏年表缺载而断言,其余40余年中军将军一职已废。但缺载时间如此之多,毕竟可以推论,西晋一朝中军将军统帅宿卫军的制度处于似有若无的状态。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当与西晋政局尤其是武帝身后的动荡有关。痴君惠帝即位后,杨骏秉政,贾后弄权,逐渐酿成八王之乱。相继擅权的宗室诸王,多以三公、三师以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控制内外军事力量。皇帝形同傀儡,擅权者“你方唱罢我登场”,有如走马灯一般。中军宿卫制度自难健全。八王之乱平定后,勉强支撑危局的怀、愍二帝,所能掌握的军事力量微乎其微,更谈不上健全的宿卫军制。

晋室南渡以来,宿卫军制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据秦锡圭《补晋执政表》等资料,排列东晋百年间中军将军的任职记载可见:

元帝太兴元年(318),钟雅迁守中军将军^{〔12〕}。

永昌年元年(322),东海王司马冲“迁中军将军”^{〔13〕}。

明帝太宁元年(323),卞壸“行中军将军”^{〔14〕}。

成帝咸和四年(329),中军将军陶回迁护军将军^{〔15〕}。

穆帝永和六年(350),后赵石虎死,“于是以(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16〕}。

升平三年(359),“以中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丕为骠骑将军”^{〔17〕}。

孝武宁康元年(373),“以江州刺史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扬州刺史,镇姑熟。”^{〔18〕}

太元元年(376),司马道子“拜散骑常侍、中军将军。”^{〔19〕}八年(383)“以中军将军谢石为尚书令”^{〔20〕}。

安帝隆安二年(398)琅邪王司马德文以中军将军迁卫将军。^{〔21〕}三年(399)司马元显领中军将军。^{〔22〕}

元兴元年(402),桓谦以尚书左仆射加中军将军。^{〔23〕}

义熙四年(408),刘裕自车骑将军“降为中军将军”。^{〔24〕}十一年(415),刘道怜“以中军将军为荆州刺史”。^{〔25〕}十二年(416),刘义符“为中军将军,监太尉府留守事”^{〔26〕}。

恭帝元熙元年(419),以刘怀慎为中军将军,徐州刺史^{〔27〕}。

上列资料表明,至刘裕控制朝权以前,东晋中军

将军任职记载仍不完全,至有十余年,二十年不见任职记载的情况。西晋以来中军将军似有若无的局面并无根本变化。究其原因,自应归于门阀士族势炽和司马氏皇权几近虚设。中军将军原以宿卫宫廷为基本职责,皇帝既被若干高级士族挟制于指掌之中,此职往往失去意义。所以,中军将军的职位多由高级士族把持或则空缺不置。

晋末义熙间,这种局面始有变化。随着刘裕逐步控制朝权,中军将军的任职记载重又增多。随着王、庾、桓、谢为代表的高级士族政治势力退坡,以刘裕为代表的低级士族、寒门将帅崛起,中军将军一职似又引起当权者一定程度的重视。不过,晋末至南朝,担任中军将军的人选和地位又有变化。^[28]首先这一职位多由心腹亲信尤其是皇室子弟任之。此从上列资料中义熙以来诸条可见一斑。刘裕以外刘道怜、刘义符、刘怀慎皆属此类人物。其二,尽管当权者重又注重此职,却未真正恢复西晋初年统领宿卫兵权那样显赫的地位。相反,出现向勋官、散官一类虚衔变化的趋势。上列资料中,刘道怜以中军将军任荆州刺史,刘怀慎以中军将军为徐州刺史,这两条颇令人思索。中军将军向以宿卫京师、宫廷为主要职守,即使出征,事毕应即还,未见带中军将军衔长期在外专任方镇者,刘道怜、刘怀慎所挂中军将军之号,显然已近于虚饰之位。再则,细读南朝诸史百官志,“中军将军”条不见于执行宿卫任务的诸将帅如领、护、左右二卫及骁骑、游击将军的条文中,相反,往往与安置勋臣、表示尊崇的骠骑、车骑、镇军、抚军等重号将军并列。可见,至迟自义熙以来,中军将军似渐退出中军宿卫部队。

(2) 领、护军将军的建置和地位变化

两晋时期,中军其他重要将领,如领军将军(中领军)与护军将军(中护军)的置废,与中军将军颇有相似之处。大体晋武帝在位时,建置尚齐备。仅泰始八年(272)到咸宁五年(279)和太康五年(284)至七年(286)这11年间,有护军无领军任职记载。太康八年至十年(287—289)3年间领、护军俱无任职人,余皆领、护俱有载。^[29]惠帝在位十七年,仅元康九年——太安元年(299—302)四年间领、护军均记任职人,余者不是领、护军缺一,就是领、护俱缺。至怀、愍二帝,仅永嘉四年(310)俱有领、护军的任职记录,余皆阙如。^[30]

东晋百余年中,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统计,领、护军将军俱有任职记载的仅40年。其余60余年不是有领无护,就是有护无领,甚至领、护俱

缺。^[31]

南朝以来,领、护军将军的任职记载重又齐备。据万氏宋、齐、梁、陈四朝《将相大臣年表》,只宋元嘉十一年(434)和梁大同七年(541)至太清二年(548)九年间缺载护军将军,梁敬帝绍泰元年(555)有护军、中护军而无领军。总合南朝170年,领、护军将军任职情况只有十年稍有缺载。

以上统计表明,领军与护军将军的建置,似也经历比较齐备——不齐备——再齐备的曲折过程。显然,也是与晋武帝时皇权的短期巩固、惠帝以来皇权的衰落以及南朝诸帝力求伸张皇权的历史轨迹相适应的。

东晋南朝中军宿卫制中,领军与护军地位的重新提高颇值得注意。何先生说:“领、护两将军,在魏代是最重要的宿卫军统帅。领军地位尤为重要。魏初领军曾总统五校、中垒、武卫三营。”至魏晋之际,左右二卫成为“宿卫兵的中坚”“中领军、中护军虽然仍然领营兵典宿卫,但只是众军之一而已,远非魏代中领护之比了。”但是确切地说,领、护军地位下降,与中军将军地位之重要,仅仅是魏晋之际这一很短暂的历史时期的现象。早在晋武帝身后,这一局面已变化。南渡以来,领、护军即恢复曹魏时代统领宿卫军的旧制。此据《宋书·百官志》护军将军条:“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通典·职官典》论及南朝中军亦称:“宋置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齐有领军及中领军。凡为中,小轻,同一官也……梁领军将军管天下兵要,谓之禁司。与左右仆射为一流,中领军与吏部尚书为一流。陈因之。”宋以来,领、护分掌内外军,亦即中军统帅。梁、陈以来,位望更加显赫。而在领军、护军地位提高的同时,入晋前后做为中军中坚的左右二卫将军的地位则有下降迹象。此处不再赘述。

(3) 中军将帅的身世变化和骁骑将军地位的上升

分析了东晋南朝中军制度的一般状况后,再将中军将帅的身世略做考察。据《补晋执政表》,东晋任中军将军者先后有:卞壺、钟雅、陶回、殷浩、周𢖽、司马丕、桓冲、谢石、周子骠、司马道子、司马昱、司马德文、桓谦、刘裕、刘道怜、刘义符、刘怀慎。此外,王导次子王恬,似亦曾任中军将军。^[32]如将名单中义熙以来当权者刘裕及其子弟心腹除去,几乎清一色的门阀士族代表。再据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江左以来任领军、护军将军者(包括中领、中护军)

有：戴渊、王邃、周顗、庾亮、纪瞻、邓牧、卞壺、应詹、陆晔、褚翼、陶回、赵胤、周谟、孔愉、诸葛恢、顾和、何充、冯怀、顾众、王羲之、桓景、江影、周闵、王彪之、王洽、范汪、王格、庾稣、桓秘、谢安、王劭、王荟、谢琨、王国宝、车胤、王稚、司马道子、王凝之、司马元显、桓修、孔安国、司马遵、虞啸父、王谧、王羲之、谢混、吴隐之、谢裕、孔靖、刘怀慎、刘义欣、范泰。另据《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晋阳秋》，韩伯亦历官领军将军。此 53 人中，除个别身世待考外，与前列中军将军的出身统计类似，绝大多数出身于侨姓或吴姓士族。

及至晋末，中军统帅除以皇族子弟担任外，出身于低级士族和寒门者显著增多。试以萧齐为例，见于《齐将相大臣年表》^[33]的领军、护军将军有：李安民、陈显达、张岱、王敬则、萧景先、长沙王晃、柳世隆、萧子良、萧顺之、刘俊、萧鸾、萧缅、庐陵王子卿、吕安国、巴东王子响、随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安陆王子敬、沈文季、武陵王晔、鄱阳王锵、萧湛、王玄邈、南海王子罕、萧坦之、刘暄、王莹、崔慧景、桂阳王宝贞、王茂、萧弘。以上 31 人中，除个别身世待考外，不计皇族萧氏，出于低级士族和寒门者，已有李安民、陈显达、王敬则、刘俊、吕安国、沈文季、王玄邈、刘暄等 8 人，占南齐领、护二军主将总数近三分之一。据前文所引《南齐书·高帝纪》，元徽间刘休范举兵反，助萧道成宿卫京师的六位中军将领中，除褚渊、张永出于士族外，其他四人（领军刘劭、游击将军戴明宝、骠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皆为低级士族或寒门。可见，南朝以来出于低级士族和寒门的将帅已成为宿卫将领的骨干。

梁陈以来，中军中原级别较低的骠骑将军^[34]的地位逐渐显赫。《隋书·百官志上》载：“天监六年，置左右骠骑、左右游击将军，位视二率。改旧骠骑曰云骑，游击曰游骑。”杜佑论及骠骑亦称：“梁以来其任愈重。天监六年，置左右骠骑，领朱衣直阁（将军），并给仪从。北徐州刺史昌义之首任此职。出则羽仪清道，入则与二卫通直，临轩则升殿夹侍。”杜氏并于自注称：“陈时韦翊为骠骑将军，素有名称，每大事恒令夹侍左右，时人荣之。”^[35]骠骑将军至南朝后期何以位渐显赫？我们知道，高唱士庶之间乃天壤之别的高级士族，并不甘心退出在各领域里的统治地位，自然也包括中军高级将领等职。南朝又多以皇族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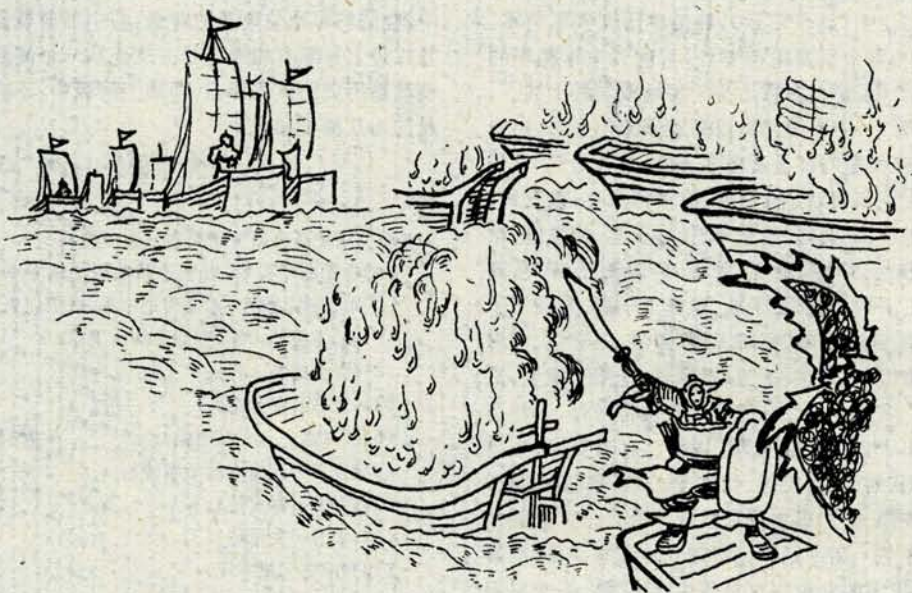
充任中军高级将帅。而这两类人物中，真正富于领军作战才干者已绝少见。在权力之争和政权变易空前频繁的南朝，这些养尊处优的宗室和士族纨绔是绝对担负不起京师和宫廷宿卫任务的。于是，只得重用出身低微、级别较低而又富于才干的宿卫将帅。向来，治南朝政治史者，多注意中枢权柄落入中书通事舍人，方镇大权则由典签控制。其实，中军宿卫将领中，骠骑将军地位渐显的背景，与中书通事舍人和典签权势上升颇有相通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南朝政治历史的重要特点，即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力量的相互消长和变化。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 [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读史集》；
- [2]中军即中央军，以别于州郡所统地方军。其有内军、外军之分。本文所论中军，试依何先生文章之例，主要论内军，亦即京师宿卫军；
- [3]《资治通鉴·晋纪廿五》；
- [4]《晋书·安帝纪》；
- [5][9]《南齐书·高帝纪》；
- [6]《晋书·孔愉附从子坦传》；
- [7]《晋书·谢玄传》；
- [8]《宋书·文帝纪》；
- [10]《南史·梁本纪》；
- [11][29][30]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
- [12][15][21][22][23][27]秦锡圭：《补晋执政表》，《廿五史补编》本；
- [13]《晋书·东海王冲传》；
- [14]《晋书·明帝纪》；
- [16]《晋书·殷浩传》；
- [17]《晋书·穆帝纪》；
- [18][20]《晋书·孝武帝纪》；
- [19]《晋书·司马道子传》；
- [24][25][26]《宋书·武帝纪》；
- [28]南朝中军将军任职情况，大体与晋末以来类似；
- [31]万斯同《东晋将相大臣年表》；
- [32]《世说新语·德行》注引《文字志》。按《晋书》本传，中军将军之职为王恬卒后之赠官；
- [33]万斯同：《齐将相大臣年表》；
- [34]据《宋书·百官志》附百官品级表，领、护军第三品，骠骑将军四品；
- [35]《通典·职官典》。

赤壁之战拾遗



孙振奎
插图

●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万绳楠

一、巴丘遇疫与洞庭君山之游

建安十三年，曹军以破竹之势，迅速占领荆州治襄阳。十月，占领江陵，主力自江陵浮江东下，将与孙权“会猎于吴”。

《三国志》卷一四《郭嘉传》记曹军“于巴丘（今湖南岳阳）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

裴松之注引《傅子》记有曹操写给荀彧的一封信，信中说：

“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千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

南方，则不生还’。然与共论计，云当先定荆。此为不但见计之忠厚，必欲立功分，弃命定。事人心乃尔，何得使人忘之。”

汉末疾疫流行，从曹操写给荀彧的信中，可知曹操征荆州之年，“南方有疫”。郭嘉说过“吾往南方，则不生还”的话。但郭嘉赞成“先定荆”州。从曹操在巴丘遇疫时所说的话：“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看来，郭嘉只是主张打荆州，不主张打了荆州，又去打江东，即不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原因便在“南方有疫”。

所谓“于巴丘遇疾疫”，是到巴丘时，疾疫在曹军中蔓延开来。在此以前，时疫已经染上了。周瑜曾说曹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对曹军早有所料，但不到疾疫蔓延，曹操是不会停止进兵的。十月占江

陵,当月便东征,正表明曹操想一举再歼孙权与刘备。

有一首诗,过去不仅为史学界所忽略,而且为文学界所未解。这诗便是曹操的《气出倡·游君山》。诗云:

“游君山,甚为真。崔嵬砢砢,尔自为神,乃到王母台,金阶玉为堂,芝草生殿旁。东西厢,客满堂,主人当行觞,坐者长寿遽何央。长乐甫始宜孙子,常愿主人增年,与天相守。”(据《宋书》卷二一《乐志》)

这首诗被称为游仙诗之祖。文学家不明历史,以为全诗都是想象。史学家很少涉猎文学,自不在意,其实这首诗牵涉到既是文学也是历史的一件公案。

要知此诗浪漫主义虽浓,但却为纪实之作。诗中明言曹操曾游洞庭君山,并在君山宴客,相互祝寿。问题在于曹操什么时候,有此雅兴,作君山之游呢。

按曹操自十月由江陵浮江东下,到十二月(《通鉴》十一月),才与孙刘联军于赤壁相遇,打了一仗,中间历时近三个月。自江陵顺流到赤壁,是要不了两三个月的。那么,曹军必在进军途中逗留。在哪里逗留呢?据《郭嘉传》“于巴丘遇疾疫”的记载,曹军必在巴丘逗留。因为疾疫既已蔓延,自不宜继续东下,必须停止下来休整、治疗,否则无法打仗。

巴丘当洞庭湖入江之口,君山距巴丘不远(约三十里)。在曹军于巴丘休整期间,从《游君山》一诗所记,可证曹操曾往君山一游。此诗的写作年代,由此可以断定为建安十三年进兵江东途中。内容也就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写实了。“游君山”自然不是梦游,而是真游。“常愿主人增年”的主人,自然不是西王母,而是曹操。对西王母来说,已经是“与天相守”,还须增什么年?“王母台”自然不是西王母之台,而是比喻曹操宴会宾客之处为君山仙境而已。

二、孙刘进驻夏口与浦口之战

人们都说孙刘联军驻地在赤壁,或说赤壁为孙刘联军总部所在地,非也。

按《周瑜传》记周瑜对孙权说过:“请得精兵三万人,进驻夏口,保为将军破之。”夏口才是孙刘联军总部所在地。赤壁,山名,不可以驻军或设总部。夏口,城名,只有夏口才可驻屯军队与设总部。

关于夏口,《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胡三省注说:

“《前书·地理志》曰:夏水(汉水、沔水)过江夏郡入江水。《水经注》曰:黄鹤山,东北对夏口城,亦沙羡县治,盖齐、梁之鲁山城,今之汉阳军,即其也,所谓汉口也。祝穆曰:夏口一名鲁口。似指汉水之口。然何尚之云: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对沔口。而章怀太子亦谓夏口戍在鄂州。故《唐史》皆指鄂州为夏口。盖

本在江北,自孙权取对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

据此可知周瑜所欲进驻的夏口,指夏口城。孙权时,夏口城在江南岸,正对江北的沔口,沔口也就是夏水、汉水之口。此城晋时为江夏郡沙羡县的县治。今为武汉市武昌之地。吴时亦有武昌,但不是现在的武昌,而是现在的鄂城。

王粲《英雄记》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舡,乘排从汉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舡走舸百所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燃即回舡走去,去复还烧者,须臾烧数千排,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去。”(《艺文类聚》卷八〇《火部·火》)

按此段记载为《三国志》所无,但既出于《英雄记》应为信史。据这段记载,周瑜已经进驻夏口城,江路已被孙刘联军截断。乘排从汉水而下的曹军,当是一支从汉水来或从曹军主力分出的军队,欲从浦口(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即汉水分支入江之口渡江,登上南岸的赤壁山,接应曹操水军主力。其目的当在从水陆二路攻打夏口。这支军队“住浦口,未即渡”,似在等候曹军主力的来临。但为周瑜侦知,在一个夜间,为周瑜使用火攻歼灭。

《英雄记》所记“浦口”,地当何处?考《水经注》云:

“江水左迳百人山南,右迳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江水东迳大军山南,山东有山,屯夏浦江水左迳也。……江水又东迳小军山南,临侧江津,东有小军浦。江水又东迳鸡翅山北,山东即土城浦也。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夏、汉)水从北来注之。”(据《水经注》卷三五)

据记载,赤壁山与百人山南北夹峙,江水通过,北岸又有大军山。大军山之东有山,峙于夏(沔、汉)浦江水左迳。此夏浦江水之口,即《英雄记》所记浦口之战的浦口。江水由此浦东流,北经小军山,南经鸡翅山,又东北至夏沙羡县即夏口城的西北,沔水主流从北来注之。

可知从记中所云浦口往西为大军山,再往西为百人山,均在长江北岸,而南岸与百人山相对的即赤壁山。无疑所云浦口与南岸的赤壁山、夏口城成犄角之势,西距赤壁山,东距夏口城,都不远。如果远,就无法“从赤壁渡江南”,也就无法对夏口城形成威胁。

三、乌林与赤壁考辨

考《水经注》云:

“江水左迳止乌林南(止当作上),村居地名也,又东迳乌黎口,江浦也,即中乌林矣。又东迳乌林南,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即是处也。”此所谓“吴黄盖败魏武于乌林”之乌林,即下乌林。

《水经注》又云：

“江水又东，左得子练口。……江之右岸，得蒲圻口，即陆口（陆水之口）也。……陆水又入蒲圻县北，迤吕蒙城西，昔孙权征长沙、零、桂所镇也。陆水又迤蒲圻山，北大江。……对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州，洲头即蒲圻县治也，晋太康元年置。”

然则下乌林在蒲圻县治之南。此蒲圻县治，立于蒲圻洲洲头，正对长江南岸陆水入江之口。《水经注》谓为“晋太康元年置”，实则为孙权所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蒲圻县》有“吴大帝分立蒲圻县”之言，晋蒲圻县属长沙郡。

《水经注》又云：

“江水左得中阳水口，又东得白沙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余里，吴所屯也。……至白沙方有浦，上甚难，江中有沙阳洲，沙阳县治也，县本江夏之沙羡矣。晋太康中，改曰：沙阳县。”

据此可知江水由蒲圻洲头蒲圻县治“北入百余里”，才到立于沙阳洲上的沙阳县。此县为晋武帝分沙羡县所立。

《水经注》又云：

“江水东，右得蓑口，江浦也，左对蓑洲。江水左迤百人山南，右迤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所起也。……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

然则赤壁山在晋沙阳县之东或北，又可明矣。吴无沙阳，而只有沙羡与蒲圻县。乌林在蒲圻县南，赤壁则属于沙羡县。自乌林至赤壁一段水路，从《水经注》所记由蒲圻洲到沙阳洲，即有百余里之遙来看，路程何止二百里。从晋来说，乌林与赤壁之间，隔了一个沙阳县。

将赤壁移于乌林对岸，始作俑者为李吉甫，次为胡三省。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江南道三·蒲圻县》说“赤壁山，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北临大江，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故诸葛公论曹公危于乌林是也。”李吉甫说的蒲圻，是沙阳。他说“晋武帝改为沙阳，今县口一里沙阳故县是也”，并不正确。因为晋仍有蒲圻县，属长沙郡，沙阳在晋则属武昌郡。由于他把沙阳当作蒲圻县，属长沙郡，沙阳在晋则属武昌郡。由于他把沙阳当作蒲圻县，所以他说“赤壁山在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李吉甫何以认为赤壁在此，“其北岸即乌林，与赤壁相对”呢？这要明白他把赤壁与乌林二役混为一谈了。

李吉甫既说乌林“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舟船败走处”，又说“孙权遣周瑜、程普各领兵万人，与刘备来敌曹公，遇于赤壁，因风纵火，曹公大败”。他把诸葛亮说的曹操“危于乌林”当作了二军“遇于赤壁，因风纵火，曹公大败”，因而把赤壁搬到了乌林对岸。这种误会，来之于在曹操但称赤壁之役，在孙刘但称

乌林之役，后面再谈。

胡三省《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注解赤壁，引用了《元和郡县志》的话：“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用黄盖策焚曹公船处。”而于《水经注》，虽引了“江水自沙羡而东，右迤赤壁山北”，但未引“左迤百人山南”，后人遂用《元和郡县图志》之说，而忽略了早于此书的《水经注》之说。其实即从胡三省所引《水经注》的话，也知赤壁在沙羡县，不在蒲圻县。

由于苏轼所写的《前、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词脍炙人口，于是又有黄州的赤壁。黄州在江北，治黄冈县，与南岸的樊口相对。胡三省《通鉴》建安十三年注云：“《水经注》：江水过鄂县北而东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陆游曰：黄州与樊口正相对。”苏轼笔下的黄州的赤壁，当指南岸樊山附近的江边的某个山而言。可苏轼并未肯定它就是“三国周郎赤壁”，他所用的“人道是”、“传云”、“所谓”都是不肯定之词，自不能扰乱我们对赤壁的认识。

上三种关于赤壁所处位置之说，唯《水经注》之说为信史。所以说它是信史，一由于它成书在《元和郡县图志》之前，二由于它的说法与《三国志》所记赤壁与乌林之役相符合，三由于它尚有王粲的《英雄记》作佐证。《英雄记》浦口（夏浦江水之口），与赤壁所对的百人山，只隔了一座大军山。

四、是赤壁之役，抑乌林之役

《三国志·武帝记》记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周瑜传》记“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这里但云曹军有疾病，两军遇于赤壁，初一交战，曹军不利，引次江北，未言引次江北何地。亦未言曹军船舰在何地为黄盖所烧。但《程普传》讲了“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甘宁传》、《凌统传》也说“后随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吴《鼓吹曲》十二篇有一篇《乌林》，说得更为明白，此曲云：

“乌林者，言曹操既破荆州，从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孙权）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又《鲁肃传》注引《吴书》记关羽对鲁肃之言，也有“乌林之役”一语，诸葛亮亦谓曹操“危于乌林”。则曹军必然自赤壁退到了乌林，火攻在乌林。

《周泰传》谓“与周瑜、程普拒曹公于赤壁”。十分明显，赤壁只是孙刘联军阻击东进曹军之处，是防

邵力子 题字

● 邵黎黎

荷葉披、一浦涼青
奕、夜吟商牛生家識
味聽得秋聲憶故鄉
風怕月滿時卧看雲影入
波濤輕舟忽回窓邊
動青蓋一雨枝秋雲低
亂山愁千頃綠波凝不
畔畫船隨上島嶼揚風
佳、范蠡曲、柳絮、人靜
空見一燈前葉似雲香
小船搖曳入西陵
子聯先生
邵力子

近得我祖父邵力子先生为李奕(字李子联)先生写的一张字,这是很难得的,也鲜为人知。因为祖父生前不大为人题字,所以显得珍贵。

他虽是我国现代史上名人,又是“江南才子”,在解放前和新中国诞生后,请他题字的人不少,但他总以自己的字写不好过谦而回绝。

春节前,我收到浙江省丽水市李奕先生给我来信,同时附上四十多年前邵力子先生在南京为他写的一条幅的照片,并作了说明。

那是1947年初春,李奕先生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审计部三厅工作,当时我父亲邵遂初先生在审计部三厅任厅长。父亲虽职位比李奕高几级,年龄也大于他,但因为父亲没有一点官架子,因此他们相

处很好,也时常一起谈心。一天,李奕来到父亲办公室看到祖父字写得很苍秀,因为他喜欢书画,就跟我父亲说:“你是否可以替我请邵老题写一张字,但是必须他亲笔写才行。”因为有许多人自己不写字,往往会叫秘书代写,盖上一个章,这纯属应付。父亲回答他说:“他老人家平常是不大给人写字的,写不一定好,不过我可以叫他有空时给你写张小条幅。”大约过了十多天或半个月,父亲就把祖父写的这张字给李奕了。但父亲对他交代说:“他老人家说,他的字不一定使你满意,要你不要浪费钱去裱了,留个纪念吧!”李奕先生一直完好无损的保存至今,这的确是难得。

线。曹军进至赤壁,与孙刘联军打了一仗。因军众有疾病,不利而引退。此战只能说是遭遇战。

决战在乌林进行,此即《周瑜传》与注引《江表传》所记,周瑜用黄盖之策,火烧曹军。曹军大败,还保南郡。

孙、刘都讲乌林之役,吴有歌辞记其事,关羽并口称“乌林之役,左将军(刘备)身行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鲁肃)来欲收地邪?”即《武帝记》注引《山阳公载记》亦谓“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华容道正是自乌林退保南郡之路。乌林之战无疑可信。

正是因为乌林之战曹军吃了大亏,曹操讳言此役,后来在他写孙权的信中,故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他不承认有

乌林之役,但言赤壁之役,不承认船舰在乌林为孙刘联军所烧,但言“值有疾病,烧船自退”。

赤壁之战已成了通行的名词,自然可以继续使用,但须知道此战实包含了三次战役:一为浦口之役,二为赤壁之役,三为乌林之役。决战在乌林进行。曹操烧船自退,不无可能,但非自动烧去全部船只,而是眼见船只为孙权刘备联军所烧,并延及岸上营寨,不得已,下令焚毁余船退走。

最后要说一下,焚烧曹军船舰的黄盖所领灌满了易燃物的小船,自非从赤壁出发。孙刘联军必随曹军的引退而向前挺进。曹军在乌林,孙刘联军必进到距乌林不远之地。这是军事常识,无待赘言。

(责任编辑 霁明)

六朝水军与水战

●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钟 立 飞

六朝的主要军事对手是北方政权,南北政权的对立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对立双方交战频频,而战场多在江淮流域一带进行。由于江淮流域到处水网密布,水域广阔,这给当时的兵制和战争带来巨大影响,六朝为了在江淮地区有效阻止北方政权的攻击,竭力发展水军,因此六朝的水军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水军的发展导致战争常在水上或水边进行,使南北之间和六朝内部发生许多规模较大的水战,水战战术得到一定探索和发展。可以说,在南方六朝,水军和水战是其兵制和战争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本文试图对六朝的水军和水战状况进行一些探索,以期就正于大方之家。

六朝水军的规模和统率

从史料上来看,六朝都有大量的水军,水军在六朝军队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东吴水军规模是“浮江万艘,带甲百万”^①,其辞虽有夸大,但东吴水师确实不少,《历代兵制》卷三论吴国兵制时亦云:“吴多舟师”。东吴常以舟师抵挡北方曹魏军队的南攻,如黄武元年,吾粲“与吕范、贺齐等俱以舟师拒魏将曹休于洞口。”^②到了晋王浚攻灭东吴之时,收其战船尚有五千余艘,可见东吴水军规模很大。

东晋之水军也很多,桓玄据荆州时,其楼船等战舰很多。《晋书·成帝纪》载,陶侃、温峤、庾亮、魏该等率有水军四万人,是一支规模不小的舟师。刘裕为南攻番禺卢循起义军,“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③而当时割据在成都的蜀汉王刘寿为了东攻东晋,曾征集士卒七万余人为舟师,从中亦可看出东晋舟师是很强的。东晋舟师不仅在江南活动,而且还北入黄河,如369年,桓温引舟师自清水入黄河,舳舻百里。东晋在镇压孙恩、卢循农民起义的战争中大量投入的也是水军。

刘宋王朝为平定沈攸之的反叛,曾动用“舳舻二万”、“轻舰一万”^④的水军参军,其水军兵员不下数万人。《初学记》卷25“舟”说:“宋孝武度六合,龙舟翔凤以下,三千四十五艘,舟航之盛,三代两京无比”水军和战船的规模是空前的。

萧齐之水军亦不弱,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萧衍率军东征,有戈船七万。其水军士兵当有十万以上,萧齐与北魏对敌相持时,“战舰塞川”。齐将王敬则反叛朝廷,使百姓十余万为其撑船,其水军之盛可见一斑。萧齐统治者还常在建康玄武湖等地操练水军,如水明元年(483年)齐武帝亲临玄武湖观看水步军操练。永明六年,又“车驾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⑤由此可见,水军在南齐受到相当的重视。

萧梁与叛将侯景大战,主要在水上进行,双方的水军都很盛,大战于长江江面。如550年,侯景遣舟师八千攻广陵,梁湘东王绎遣王僧辩和鲍泉等帅舟师一万拒之。552年,陈霸先帅甲士三万,战舰二千艘东伐侯景,侯景命侯子鉴以舳舻千艘载战士于水上阻挡陈霸先水军,双方大战中江。双方都有战船千艘以上,水军万人以上。

陈朝时已处六朝末期,此时北方混战渐趋结束,形势趋于明朗,北方政权开始集中力量南攻了,而这时的南方陈朝,虽较衰弱,但水军的数量却不少,如陈霸先初立陈朝时,(557年)攻王琳之战有舟师二万,567年击华皎时,吴明彻帅舟师三万趣郢州,征南大将军淳于量又帅舟师五万继之。三者共有舟师八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水军部队。为了抵挡隋军的南攻,陈朝更是大治水军,“出金翅战舰二百艘,缘江上下,以为防备。”^⑥陈水军都督周罗睺与郢州刺史荀法率水军守江夏,使隋军十余万不得东进,相持逾月。隋为了攻灭陈朝,不得不大造战船,大治水军以对付陈朝强大的水军。依靠水军才最后瓦解陈在长江的水上力量,攻占建康。

从上述情况可知,六朝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战船和水军,战船少则千艘,多则近万艘,舟师从几万到十数万不等。舟师在六朝都是当作主力军来运用,这主要是由于六朝的地理位置和地貌条件所决定的。正所谓是“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六朝水军的统帅情况历朝虽有些不同,但基本是一样的。孙吴时期,孙策孙权常亲率水军出战,孙权还有专门的御船供其坐镇指挥。东吴很多时候则以都督都尉或将军统领水军,如周瑜为都督时一统水步军。吕蒙为都尉时,曾率舟师破黄祖水军。公元

230年孙权曾派将军卫温和诸葛直将舟师一万到台湾。242年又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舟军讨海南。东吴也出现过专门统帅水军的军官,称“水军督”⁽⁷⁾,但并不常制。东晋时亦以大司马和将军统领水军,权倾朝野的刘裕曾主治和统帅东晋舟师,大司马桓温督率舟师入黄河北伐,假骠骑将军钟雅节,亦统率舟师为前锋以拒苏峻。

刘宋时多次出现专门统帅水军的官员,他们专门装治水军和统领水军。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都水使者乐陶装治水军。都水使者管的不仅是战船,还有其它如漕运等水上事务。刘宋仍经常以将军、州刺史和郡太守统率水军。如殿中将军沈灵赐,右将军到彦之,宁朔将军王玄谟等。萧齐亦以将军统率水军,如骠骑将军李叔献,驃骑将军陈伯之皆曾统水军北伐。梁有“水军主”之名,如551年水军主宋遥帅楼船出战,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固定的水军统帅,而是多以将军太守都督等帅之。陈朝时有水军都督之水军军官,文帝时,陈慧纪曾为水军都督。隋南攻时,陈派水军都督居江夏统水军阻击隋军。但多数时候还是没有固定的水军统帅,而象以前各朝一样以将军或其它官员统之。

六朝的水军很发达,但水军的专门统帅都一直没形成定制,虽然自孙吴以来就出现了“水军都督”、“水军主”等官名,但并不普遍,大部分时候还是以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一般将军来统帅。

六朝主要的水战和水战战术

在六朝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发生了数百次,比较大的战争也不下十次,在这众多的战争中,大多数战争都有水军参加,但我们不能把有水军参加的战争都称为水战,有些战争主要是在陆上进行,主要由步兵骑兵展开决战,水军只当一种辅助力量而已,这样的战争不能称为水战。但六朝有些战争,主要由双方的水军交战,战争在水上进行,这些战争完全可以称为水战。较大的水战是:

1. 西晋灭吴之战

公元263年,邓艾钟会等攻灭蜀汉,三国鼎立局面打破,剩下东吴与晋独对。晋灭蜀后,为了对付吴国大量水军,马上着手造战船,准备水战之具,当时由晋的益州刺史王浚负责造船,其所造战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⁸⁾。公元279年,西晋有了足够的水军,王浚唐彬开始顺江而下攻吴。吴人为了抵挡

晋之水军东下,曾在长江要害处作横江铁锁,又作文余长的铁锥置于江中,以阻晋之水军。但王浚等却造大筏,缚草为人,立于筏上,使善水者以筏先行,用筏把铁锥勾走,又点火炬,灌麻油,烧断横江铁锁,于是晋水军顺流东下,不久攻克武昌,进逼吴都建业。吴派游击将军张象帅舟师一万人趣江拒挡,但见到晋军水师甚盛,便一触即溃,王浚率士兵八万,战船迤邐百余里,鼓噪攻抵建业,吴主孙皓只好举起降幡。晋军以水军攻取长江一线,东吴只好投降,攻击和防守双方都在长江江上进行,因此这是一次较典型的水战。

2. 东晋军队与孙恩卢循义军之战

公元399年,东晋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最初的活动据点是今舟山群岛一带。至401年春,孙恩率军水陆路进攻江浙沿海,溯江而上欲攻建康,此时义军有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震动建康,后来在东晋水陆军的阻击下失败,退归海岛,由于义军长期以海岛为据点。其水军和战船自然十分发达,多次与晋军在水上交战。孙恩死后,卢循率军浮海攻占广州,聚积力量,然后沿赣湘两江北攻。为了壮大水军力量,义军将领徐道覆伐南康山之木材大造战船。410年,义军大起北伐,攻占江豫二州,并顺流东下直指建康,有众十余万,水军甚强。东晋政权派刘裕屯雷池拒敌,遣王仲德以水舰二百艘于吉阳下阻卢循水军。同年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众数万,乘战舰东下,刘裕“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⁹⁾又纵火烧毁义军战舰,义军战舰多被着火,焚毁殆尽,被迫退出长江。这是长江上进行的一次较为激烈的水战。在这战同时,刘裕又派水军浮海攻取了广州,义军至此基本被镇压。

3. 梁军与侯景叛军长江之战

公元548年,变化多端的侯景起兵反梁,兵锋直指建康,由于梁朝多年武备不修,只派三千水军防守长江,侯景轻易渡江攻占建康,饿死梁武帝萧衍,551年侯景自立为帝。萧衍第七子湘东王绎时为镇西将军都督荆州刺史,起兵攻侯景。侯景有大量水军,曾派侯子鉴等帅舟师八千攻广陵。后侯景西寇,“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¹⁰⁾侯景水军拥有装备一百六十棹的快船名艫舩,捷过风电。梁军王僧辩陈霸先等人也统帅有大量水军。陈霸先有甲士三万,舟舰二千艘,王僧辩等有舟师二万,512年双方大战于长江,王僧辩以小船假装后退,而以大战舰夹两岸停泊,侯景水军以为梁军怯退,争出舫舩千艘出战,梁水军于

是“大舰断其归路，鼓噪大呼，合战中江，景军大败。”^{〔1〕}水军还在赤湖亭与侯景军大战，梁员外散骑常侍徐世谱领水军，多造各类战舰与侯景军大战。水战是当时双方的主要战争方式。

4. 陈军讨平王琳之战

王琳开始为梁朝的一个地方刺史，拥有较强势，后征为司空。557年，陈霸先代梁立陈，王琳不服，大治舟舰，将攻陈霸先，占据长江上流之武昌长沙等地，又与北齐勾结。陈霸先遣侯安都等率舟师二万会武昌攻之，双方在江中交锋。互有胜负。558年陈又发舟师五万西讨。至560年，王琳自合肥率水军入，舳舻相接，与陈水军合战江中。王琳水军掷火烧陈船，正值风向逆转，反烧己舰，陈军“施拍纵火。定州刺史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江而进，发拍中于贼舰。其余冒突、青龙各相当值。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贼舰，并熔铁洒之。琳军大败。”^{〔2〕}王琳丧失了其所有水军，被迫投奔北齐去了，陈朝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这场相持数年的战争，多在长江上进行，双方都以水军为主力参战，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水战。

5. 隋军灭陈之战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80年西晋在巴蜀治水军，东下攻灭东吴，三百多年后，隋朝从同样的道路，采取同样的方式攻灭陈朝。581年杨坚建立隋王朝，统一北方后兵锋直指南方陈朝。前文已述及，陈虽处六朝之末，但水军数量却还不少，隋为了对付南方政权的水军，象西晋一样在巴蜀广造战船大治水军。隋命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建造数千艘战船，其中最大的“战舰名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余、平乘、舳舻各有等差。”^{〔3〕}准备从水上攻陈，陈亦大修武备，派金翅战船二百艘缘江上下，以为防备，也象东吴一样造横江铁锁三条以遏隋船。588年，隋水陆50万大军八路攻陈，由杨素、王世积、燕荣率领的三路水军，从长江上中下游全面出击。杨素水军于三峡东下，打败陈水军将领威欣。次年隋军击败岸上守军，拆除江上铁锁，水军得以顺流而下，陈将率水军退守荆门。“素遣巴蜒（巴中部族，习水性，善驾船。）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余舰，遂大破之。”^{〔4〕}至此，隋军控制了长江上游。此时陈朝荆门刺史陈慧任帅将士三万人，楼船千余艘，欲入援建康，又为隋秦王俊所拒。这时隋将王

世积又率水军攻占江州等地，燕荣率水军浮海南入长江太湖，在包山（今洞庭山）湖面大败陈水军，包围建康。589年正月隋军主力入建康，灭陈。这是一次与晋灭吴很相似的水战，不过双方的水兵较前次水战更加强大，战争也更加激烈。

当时水战的主要战术有：

1. 弓弩射击

六朝还处于冷兵器时代，火药还未发明，对付远处的敌人只能依靠弓和由弓发展进步的弩来射击。水战有时是战船隔水而斗，用弓弩射击敌船和水兵是六朝水战较多使用的一种战术。如《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裴注引《魏略》载：“（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迴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大船所受之箭导致船身倾斜，可以看出魏军发射的箭数量很大。

2. 火攻

由于当时的战舰皆由木竹所制没有铁甲保护，极易着火，故火攻乃是六朝水战对阵的重要作战方法。赤壁之战，孙刘联军火烧曹军战船，大获全胜，是火攻的典型战例。

3. 施拍击敌

拍击战术就是利用杠杆原理在战舰上预先造好拍竿，利用拍竿将拍抛掷到远处的敌船，以击碎敌船，侯景之乱时，徐世谱曾造拍舰以击敌，到这时拍竿已经普遍使用。陈朝章昭达攻打欧阳纥时也“装舳造拍，以临贼栅”^{〔5〕}，这是用拍来击碎敌军阻击的栅栏。吴明彻攻打华皎时，曾“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6〕}则可见双方都有装拍竿的大舰，施拍击敌是很重要的手段。

（责任编辑 华云）

注：

- 〔1〕《资治通鉴·魏纪一》；〔2〕《吴书·虞陆张骆朱传》；〔3〕〔9〕《宋书·武帝纪》；〔4〕《宋书·沈攸之传》；〔5〕《南齐书·武帝纪》；〔6〕《南史·施文庆传》；〔7〕《吴书·陆逊传》云：“水军督留虑、镇西将军朱琨拒胤。”；〔8〕《晋书·刘睿传》；〔10〕《梁书·简文帝传》；〔11〕〔13〕《文献通考》兵考十；〔12〕《陈书·章昭达侯瑒传》；〔14〕《资治通鉴·隋纪一》；〔15〕《陈书·章昭达传》；〔16〕《陈书·华皎传》

世间奇绝的枯枝牡丹

● 杨 志 萍

盐城市区南五十华里处。座落着一座近 2000 年历史的小镇——便仓。这里枯枝牡丹，奇甲天下，饮誉古今。每年谷雨前后，枯枝牡丹独放异彩。此时，小镇游客如云，盛况空前。大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景象。这种盛况，已不知延续多少年了。她的魅力何在呢？

枯枝牡丹的传奇历史，清代小说《镜花缘》记述道：“如今世上所传枯枝牡丹，淮南卞仓最多”。向被誉为花中之王的牡丹，历来荟萃于洛阳，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何盛产便仓小镇却鲜为人知。据历史记载，这里的枯枝牡丹原出于洛阳，北宋末年，苏州枫桥人卞济之。曾任陕西“参政公”，为官清廉，宋亡后。隐退江南，为避战乱，又举家迁至东溟（便仓），并携洛阳红、白两株牡丹植于园内，“取其红者以示报国忠心，取其白者，以示为官清正”。卞氏于便仓辟园建祠后。乡间名贤曾书赠“国色天香”、“吉祥盛端”、“枯枝不朽”等匾额，祠旁对联为：“海水三千丈。牡丹七百年。”后经代代培育，繁衍不息。元末，卞后裔卞元亨和施耐庵一起，随张士诚起义，成为吴王的部将。朱元璋打败张士诚之后，元亨隐退家乡，朱闻元亨才名，多次征召，元亨不出，朱元璋一怒之下，将他发配辽东边境，临行时，他到花园以酒酌牡丹曰：“待我南还花再开”。元亨走后，家人大都散去。唯有一妾朝夕对花祝愿：“主人有信回，当再花作开”。说来也奇怪，元亨走后的第 10 年（1403）年牡丹突然开放，这年，元亨果然得赦归来。他百感交集，写下了《戍归》一首：“丈夫志远遍天涯，一跨辽东忽到家，荒径尚存苍翠柏，故园犹有牡丹花。文章自古浑如梦。勇略于今谁共夸？回首风烟成往事，乐夫天命何复嗟！”同时，有感于牡丹、爱妾十年相守之情，又题咏牡丹两首：“牡丹本是亲手栽，十度春风九不开，多少繁华零落尽，一枝犹待主人来”其二：“草堂松菊晚凋残，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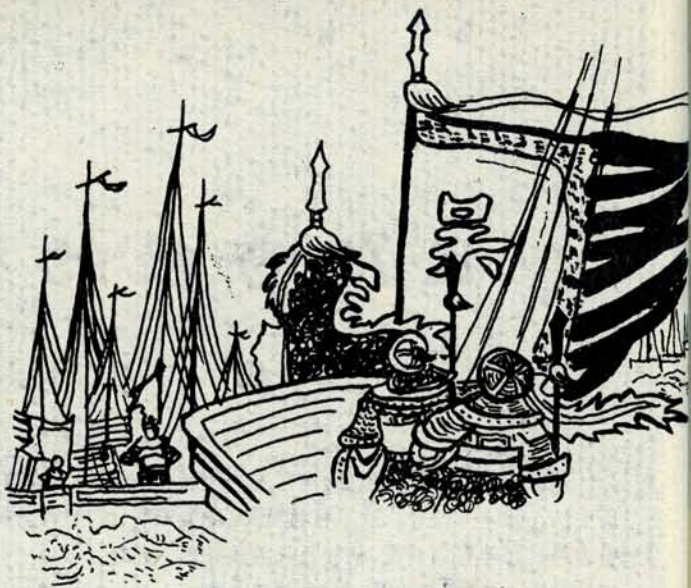
有西园旧牡丹，自是枯枝存劲节，依依惟念故人还。”迄今，枯枝牡丹已历经 700 年沧桑，却方华未艾。

世上的牡丹数百种。为什么便仓的牡丹却冠以“枯枝”二字呢？

原来，便仓枯枝牡丹除了传奇的历史之外，还具有奇异的特色，其一为枯而不朽。世上牡丹数百种，而冠以枯枝的却凤毛麟角。便仓的牡丹，花朵美鲜润泽，芬芳馥郁，叶片青翠欲滴，而枝干憔悴欲朽，无论何时将其梗枝摘下，用火柴点燃，顿时就可燃烧。其二为花为单瓣。正常年份，牡丹每朵花为 12 瓣。但是，每逢农历闰月的那一年，则花朵一定为 13 瓣。其三是春花秋放。牡丹本是春花，每年谷雨前后开放。便仓的牡丹有时还在深秋或初冬时节两度开放，枝干无叶却有花，蔚为奇观。尤其神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年。枯枝牡丹盛开在举行开国大典之日，国庆 10 周年时，枯枝牡丹曾两度开花，1972 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席位时，枯枝牡丹又在隆冬时开放，1987 年，中共十三大之后，园内和园外散植的单瓣红白牡丹，再次开出若干无叶之花。对此，报纸和电视都有过报道。虽然这是偶然的巧合，却给枯枝牡丹涂上了更加迷人的色彩。

1938 年，日军侵犯便仓，枯枝牡丹园成为一片瓦砾。当地群众冒着日机轰炸的硝烟，将花根小心挖出，藏进麻袋，栽在自家菜园中，才使枯枝牡丹免于灭顶之灾。解放后，当地政府先后 4 次重修和改建枯枝牡丹园，现已建成苏州园林式花园，牡丹品种近百个。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为该园题写了“枯枝牡丹”的横额和“海水三千丈，牡丹七百年”的楹联。目前该园已成为苏北对外开放的又一个旅游景点，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墨客、游人前往观赏。不久，新落成的 23 处观赏点将开放，那时，前来观光的中外旅游者，将会在这里充分领略枯枝牡丹园的无限风光。

东吴 舟师 作战 特点



● 江西大学历史系 周兆望

一、以江汉为池，大兴舟师

东吴地处东南，傍海临江，河湖密布，水道纵横，素有水乡泽国之称。自古以来，这里居民以习水便舟著称。

东吴为防蜀抗魏，以保持鼎足而立的地位，则从两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水上优势：一是凭依长江天险，以此为重要的军事屏障；二是多造船舰，大兴舟师，立足于水战，即所谓“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1〕}孙策临终前，谓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2〕}蜀汉使臣邓芝与孙权论吴蜀地理形势曰：“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3〕}陆机《辨亡论》也说：吴“东负沧海，西阻险塞，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矣。”长江对孙氏政权之重要固不待言。为了巩固天然屏障，孙权在长江沿线派遣谋臣猛将，部署重点，控遏江陵、武昌、寻阳、濡须等军事重镇，“江津要害之地，多为吴所据。”^{〔4〕}又在沿江的孤山头上设立无数烽火台，“有急，以火传之”，“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三十里，寇至则举，一夕行万里。”^{〔5〕}

东吴的造船业十分发达，所造船只种类繁多，如蒙冲、斗舰、大舸、走舸、舳舻及“飞云”、“盖海”、“长安”等大型楼船，且设计精巧，装备齐全。此等舰船特别适合战争需要。楼船，小者能载马八十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

物出万斛；”至大者可坐三千人。^{〔7〕}建安的侯官（今福建福州市）、临海的横茆船屯（今浙江平阳县）、番禺（今广州市）、南昌近郊的谷鹿洲是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设有典船校尉等专官负责督造。^{〔8〕}水手则大都由谙熟水性的闽、粤人组成，所谓篙工楫师，选自闽、番。^{〔9〕}此外，孙氏创业初期，还从刘表等军阀手中夺得大批战船，如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击庐江太守刘勋，“收得勋兵二千余人，船千艘”^{〔10〕}继讨黄祖，一次获取“船六千余艘，财物山积。”^{〔11〕}孙权征江夏，“斩黄祖将张硕，尽获船人。”^{〔12〕}

多水的地理环境和发达的造船业为兴建舟师创造了重要条件，而对山越的长期征战则保证了源源不绝的兵源。

在上述基础上，东吴建立了一支强大的舟师。赤壁大战中，孙权一次就调集水军3万，“船粮战具俱办。”^{〔13〕}遣周瑜、程普、鲁肃率兵联刘抗曹。东吴各重要将领，大都拥有一支可观的水军，如将军加齐“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雘，……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14〕}将军吕范“器械精好舟车严整。”^{〔15〕}吴军屯田皖城，一次就被魏军焚毁战船六百艘。^{〔16〕}可见，屯田将士中亦有相当部分是水军。孙权在与曹魏对峙中，频频出动舟师，少者一次数千人，多者一次达万人。建安十八年（213年）春，曹操进军濡须口，号称步骑40万，孙权率水军7万御敌，双方相持一余月，曹操见孙权“舟船器仗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17〕}随后撤军而还。建安二十年（216年），孙权率军围合肥，出动的水军竟达10万。东吴晚期仍

保持着一支强大的舟师,建兴元年(252年),诸葛恪为攻夺淮南,曾率舟师4万迎战魏将诸葛诞、胡道等人于东兴,大败魏军,吴亡时。犹有兵23万,舟船五千余艘。^[18]

为了便于舟师的训练,调遣和军需的转运,东吴还开凿了许多重要的水利工程。如凿青溪、潮沟、运渎等。

这些水利工程构成了一个以建业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既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同时也具有军事意义,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吴之治所或都城亦皆选择于滨江便航之地。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始治吴(今苏州市);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由吴徙治京口(今镇江市);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次年修建石头城,改秣陵为建业。魏黄初二年(221年),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于武昌。次年九月,迁都建业。甘露元年(265年),孙皓又一度徙都武昌,一年后迁回建业。孙氏自割据江东,凡治吴8年,居京口3年,都武昌9年,都建业60年,吴临太湖,京口、武昌、建业滨江,均为便航之军事战略要地,孙氏作如此选择,用意甚明,赤壁战后,刘备至京口,谓孙权曰:“吴去数百里,即有紧急,赴救为难将军无意屯京乎?”权答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居之。”^[19]孙权自己道出了迁都的意图,无待多论。

二、“上岸击贼,洗足入船”

东吴将士中曾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上岸击贼,洗足入船。”^[20]它形象地概括了吴对外作战的基本特点。吴蜀长期结盟相好,互为唇齿,战事较少发生,吴对外战争,大都与曹魏进行,而曹魏多步骑,便于陆战,舟师不足与东吴匹敌。吴军要战胜兵强马壮之魏军,处处立足于水战,魏军为扬长避短,则尽量避免水战。吴渴求水战既不可多得,为克敌制胜,遂不得不据水为势,“利则陆抄,不利则入水。”^[21]即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因此,舟师陆攻,近水而战便成了吴对外作战的主要形式,下面试举重大战例若干以观其概貌。

1. 孙曹皖城之战。皖城系曹操在合肥以南的唯一要镇,距吴领土最近,曹操为作南伐准备,遣庐江太守朱光屯田皖城,大开稻田,又令人招诱鄱阳山越大帅以为内应,严重地威胁孙氏的安全,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孙权亲征皖城,问计于诸将,诸

将皆劝作土山,添攻具,吕蒙进计曰:“治攻具及土山,必历日乃成。城备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图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经日,水必向尽,还道艰难,蒙窃危之。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乃水而归,全胜之道也。”^[22]权从之,遂破皖城,俘获太守朱光、参军董和及男女数万口。观吕蒙之言,知此战为舟师陆攻。由于吴军近水而战,速战速决,令敌猝不及防,故获全胜。曹操虽失皖城,却不能与争,盖惧吴之舟师也。

2. 吴蜀夷陵之战。黄武元年(222年)七月,刘备为夺回荆州,以替关羽报仇为名,统兵4万大举攻吴,并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相助。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将军朱然、韩当等5万人拒敌。次年春,两军在战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东南)。刘备始则“水陆俱进”。继则“舍船就步,处处结营。”^[23]陆逊施展火攻,破其40余营,汉军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仅得逃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此次战役,吴以5万军队参战,究竟系何兵种,史书记载不明,但从下列事实推知其为舟师或大部分为舟师则无疑问,夷陵乃东吴江防要津,“夷陵要害,国此关限”,^[24]陆逊领宜都太守,在此驻有重兵,其中不乏舟师,既然刘备“水陆并进”,东吴向以舟师见长,不可能以五万步兵以敌,此其一。战役临江展开,无舟师则难以想象,此其二。汉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其中必有相当部分成为吴军的战利品,陆逊要夺取舟船器械及水军军资,必须依赖舟师,此其三。显然,夷陵之战战例属舟师陆攻型。

3. 吴魏石亭之战。黄武七年(228年),孙权使都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大司马曹休,曹休果然中计,率步骑10余万至皖城迎鲂。秋八月,孙权至皖口,以陆逊为大都督,以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督3万人击休,三道具进,大破魏军于石亭,追亡逐北,“斩获万余,牛马驴骡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25]

宠急率水陆军救援,曹休才得以逃脱。淮南乃吴魏鏖兵之地。争夺至为激烈,不独曹魏在此设有军事重镇合肥,东吴亦在合肥南面之巢湖夹濡须口水口立坞,建立一个偃月形的强大水寨,常年驻扎大批舟师。吴军多次攻合肥、皖城,皆用舟师,“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是吴军对付魏军的惯用手段,此次战役亦当为舟师陆攻型。由于东吴预设圈套,诱敌入围,又采用近水快攻的战术,故能一举破敌,大获全胜。

此外,还有合肥之战、东兴之战,战例甚多,不烦一一列举。相比之下,水战战例甚少,赤壁之战系著

名水战,史书详载,妇孺皆知,兹不赘叙,现将人们不甚注意的两次重大水战略述于后。

1. 孙刘荆州争夺战。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为夺取整个荆州,乘关羽北上与曹军争夺樊城之机,遣吕蒙率“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吕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舳舻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26]与此同时,孙权遣“蒋钦督水军入沔。”^[27]配合吕蒙行动。吴军顺利攻取南郡,关羽败走麦城,父子皆被擒斩,这是一次著名的水上偷袭战,孙权所付代价极少而能如愿以偿。

2. 吴魏洞浦之战。黄初三年(222年),魏文帝命征东大将军曹休督张辽等及诸州郡二十余军,“以舟师大出洞口。”^[28]南下攻吴,孙权“遣吕范督五军,以秒师拒休等。”^[29]双方大战于洞浦。吴军水营因遭风暴,“吕范等船便纜悉断,直诣休等营下,斩首获生以千数。”^[30]魏军侥幸取得小胜。在此不利形势下,吴军仍坚持战斗,“曹休使挟霸以轻舟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略数百。”^[31]此次水战,双方打成平局,互有胜负,主要是魏军讨了天时的便宜,否则将另作结论。

吴人习水善战,深为北人折服。魏明帝曾说:“(孙)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32]晋征南大将军羊祜也说:吴之“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33]曹魏自以为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鄙称吴蜀为“蕞尔小国”,但对长江天险及吴之舟师却无如之何。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统率精兵10万出广陵,临江观兵,慨然有渡江之志,然而,面对长江滚滚波涛和吴军的严密设防,只好畏而却步,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魏吴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34]故终魏之世而不能越江半步。孙皓即位后,政治极端腐败,晋武帝君臣大议伐吴,羊祜说武帝曰:“孙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战而克,若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有百万之众,长江未可窥也,将为后患矣!”^[35]益州刺史王浚上疏曰:“孙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列立贤主,则强敌也。”^[36]可见,两晋之所以能顺利渡江灭吴,并非吴舟师不强,船不坚,城不固,关键是抓住了吴政治混乱、军心涣散之有利时机,孙皓自己也承认:“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乎?孤之罪也。”^[37]这亡国之君总算说了大实话,为了灭吴,晋武帝命王

浚在蜀作船七年,灭吴之役,也主要得力于王浚所率舟师,“戎卒八万,方舟百里”^[38]沿江顺流而下,吴军无心战斗,或望旗而降,或悉众逃散,至使晋军势如破竹,顺利攻下建业城。

综上所述,东吴对外战争有如下显著特点:一是所用者皆舟师,立足者皆水战;二是据水为势,舟师陆攻、近水而战是吴军的主要作战形式,也是其对外战争的基本特点,三是利在速战速决,出奇制胜。在一系列战役中。由于吴军能创造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水上优势,故取得了不少重大胜利。然而,一旦远水则无所适从,这无疑又是对吴军的严重制约。

(责任编辑 宁宁)

注释:

- [1][22]《三国志·齐王曹芳纪》注引《汉晋春秋》;
- [2][10][11]《三国志·孙策传》及注引《吴录》、《江表传》;
- [3]《资治通鉴》卷70;
- [4]《资治通鉴》卷71 胡注;
- [5]《三国会要》卷17《兵·杂录》;
- [7]分见《三国会要》卷17《兵·舟师》、《三国志·孙策传》、《太平御览》卷769;
- [8]分见《三国志》孙权传、孙皓传、张纡传,《宋书·州郡志》及《水经·赣水注》;
- [9]左思《吴都赋》;
- [12]《三国志·凌统传》;
- [13]《三国志·周瑜传》及注引《江表传》;
- [14]《三国志·贺齐传》;
- [15]《三国志·吕范传》注引《晋阳秋》;
- [16][17][30][32]《三国志·孙策传》及注引《吴历》;
- [18]《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
- [19]《三国志·薛琮传子莹附传》;
- [20]《三国志·张纡传》注引《献帝春秋》;
- [21][23][27]《三国志·吕蒙传》及注引《吴录》、《吴书》;
- [24]、[25]、[26]《三国志·陆逊传》;
- [28]《三国志·蒋钦传》;
- [29]《三国志·全琮传》;
- [30]《资治通鉴》卷69;
- [33]分见《三国志·明帝纪》。
- [34]《三国志·羊祜传》;
- [35]分见《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录》及《资治通鉴》卷70;
- [36][37]《资治通鉴》卷80;
- [38][39]《三国志·孙皓传》注引《江表传》、《晋阳秋》。



利用有利自然条件 发挥综合开发作用

● 玄武区城镇建设综合开发

总公司总经理 戈仁泉

总经理戈仁泉在珍珠饭店开业仪式致词

保留着古城面貌的玄武区,宜人的地理状况为其综合开发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玄武区开发公司最早为玄武区拆迁办公室,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变化而演变为规划办、统建办、住宅办,直至1984年正式改为玄武区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公司,现简称总公司。从仅负责小范围的拆迁任务到成片改造旧城,从单纯的住宅建设发展到商业网点、办公营业、市政配套设施的综合开发,全公司已从十几人壮大到目前62人,有职称的科技人员37人,占总人数的60%。公司内设6个职能部门。我公司的开发宗旨为“保本微利、旨在服务、造福人民”,注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对全区旧城开发建设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分期实施。

几年来,除零星建房3.2万平方米外,主要是在鱼市街、一枝园、将军巷、板仓村、后宰门、南湖、百子亭、如意里、太平桥等地新建片区12个。几年来,已有近1万户约35000人搬入新居。总计建房207栋,建房面积52万平方米,完成学校、幼儿园、商业网点、居委会等公建配套设施共18栋,4.2万平方米。

在建房建设综合开发工作中,我公司能够为如意里小区拆迁户抓紧建房,赢得信誉。原来该小区是本公司和市住宅建设开发公司联合开发的,1987年开工后,曾因复建房建设计划安排过少,工程进展迟缓,致使大批拆迁户过渡期延长,加上部分住宅结构不合理,居民很有意见。1990年初,市政府决定如意里小区改由本公司一家开发后,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我公司认真总结了小区前期建设的经验教训,选派责任心强、精通业务的人员充实加强了小区开发领导班子,清退了4支不合格的建筑队伍,搬走了影响小区建设的13户和7家工企业单位,使8幢复建房去年得以同时开工。对部分复建房按《拆迁法》的规定组织力量修改了图纸,按新的标准精心组织施工。为了有更多的房源安排拆迁户,区里还将6幢预

售的商品房改建为复建房。经过多方努力,在外过渡的550家拆迁户终于能在今年一月至春节前夕迁入新居。区里在加快复建房建设的同时,还抓紧了配套设施的建设。小区内1公里长的主、次干道也已铺就,供电、供水、排水工程于去年底已完成,医院、金谷食品厂、商业综合服务楼都先后竣工。此外,居民们盼望已久的供气工程已列入今年计划,开春即将动工铺设煤气管道。我公司将全力以赴搞好后期工程建设,使目前仍在外过渡的部分拆迁户早日迁入新居。

我公司针对本区具有吸引中外游客的有利条件,在玄武区中心地点建设了一座造型新颖、结构独特的涉外饭店——“珍珠饭店”,它位于珠江路与太平北路交会的十字路口珍珠河畔,傍依珍珠公园,环境优雅,地段繁华,交通方便。饭店主体为7层,建筑面积为8700平方米,总投资2000万元。

饭店底层设有商务中心、购物中心、咖啡厅、储蓄兑换部和风味小吃,二层设有宴会厅、西餐厅、旅游餐厅、卡拉OK舞厅,一次可同时接纳500人就餐,并满足不同层次中外旅客的就餐需要。三层以上设有各种规格的单人房、双人房与套房客房共92间,208个床位,顶层设有颇具园林特色的屋顶花园和玻璃宫。客房内装有现代化的卫生设施,高级卧具与配套生活用具,并设有良好的通风排污系统,采用集中空调,配备自动化防火报警系统、喷淋消防设备,闭路电视系统、电话通讯传真配套系统与音响设备及富丽高雅的装饰。该饭店于1991年元月试营业后,效果很好。

我们将继续利用我区的有利地理环境,强化综合开发,愿为积极投资参加我区开发的各界朋友提供良好的服务。

(编稿 沙亚男 陈蕊心)

东晋末年建康攻守战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刘曼春

东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五月至七月东晋太尉刘裕守建康,农民起义领袖卢循攻建康,发生了一场建康攻守战,出奇制胜,值得研究,试作纸上谈兵。

建康,军事形胜,乃兵家必争之地。东吴建邺的形势,诸葛亮赞为“钟山龙蟠,石城虎踞”^①。

安帝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孙恩起义于东土浙江。元兴元年(402年)败于临海。孙恩投海死。^②孙恩死后,尚有数千余众,遂推卢循为首,继续备战。卢循乘东晋统治阶级内争之机,重新开辟基地,扩充实力,众十余万。卢循在浙闽立不住脚,元兴三年(404年)冬十月,泛海到番禺,寇广州,驱逐刺史,自摄州事。卢循以广州为根据地,在长江中游,东南沿海活动,以图再进,攻取建康。

刘裕败桓玄,义熙四年正月,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掌握了东晋实权。六年(410年)二月刘裕北伐南燕,卢循起义军,乘刘裕北伐之机,由华南向华中,华东进军,攻建康。卢循所属,始兴太守徐道覆至番禺,建策卢循:“朝廷桓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裕)未有还日,不乘此机而作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亲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③义熙元年二月,卢循、徐道覆从始兴出发,分兵两路,卢循领西路,攻湘中诸郡,东晋荆州刺史刘道规遣军至长沙,为卢循所败,攻克长沙,驰至巴陵(湖南岳阳市)进取江陵。徐道覆领东路,破南康(江西赣州市)下庐陵(江西吉水县北)攻豫章(江西南昌市)东晋镇南将军何无忌与徐道覆战于豫章,官兵败绩,无忌被害。义军欲攻江陵,为官军所败。徐道覆驰走劝告卢循,“请并力攻京都,若克之,江陵非所忧也。”于是,连旗而下,戎卒十万,舳舻千计,直指建康。抚军将军、豫州刺史,刘毅抗表南征,舟师二万,发自姑熟,溯江而上,阻击义军,五月,刘毅败绩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

初,卢循至寻阳(江西九江市西)闻知刘裕已还建康,卢循欲退还寻阳,进平江陵,据二州以抗朝廷。

徐道覆主张宜乘胜进取,固争之,疑议多日,乃见从^④农民起义军既破江豫二镇,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一路顺风,势如破竹,迺至江宁。孙武子兵法形篇谓:“可胜者攻也,不可胜者,守也。”^⑤义军一路进攻,到达建康,掌握着军事主动权。

另一方面,东晋末年政治腐败,支撑东晋,保卫建康全赖北府兵名将刘裕。刘裕在当时乃民心所系,安危所在。刘裕最初攻克齐地,欲停镇下邳,清荡河洛,既而征使至,即日班师。卢循农民起义军,沿江而下,直逼建康,内外震骇。朝廷欲奉乘舆北撤就公。公至下邳,以船运輜重,自率精锐步归。至山阳,闻无忌被害,则虑京师失守,乃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同行旅以朝廷消息,人云:“贼尚未至,刘公若还,便无所忧也。”刘公大喜,单船过江,至京口,众乃大安。四月公至京师,元师到位,解严息甲^⑥。及刘毅败回至,内外汹扰。于时北师始还,孙武子兵法谓:“胜久则钝”,多创痍疾病。京师战士不盈数千。孟昶、诸葛亮长民惧寇渐逼,军事力量悬殊,寡不敌众,欲拥天子过江,刘裕力挽衰势,孟昶坚持请求不止。刘裕重申:“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危骇,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岂可得至!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若其克济,则臣主同休,苟厄运必至,我当以死卫社稷,横尸庙门,遂其由来以身许国之志,不能远窜于草间求活也。我计决矣,卿勿复言!”刘裕挂帅,战略上“以寡而击众”,战术上“我专而为一”集中有限兵力,聚众石头,随宜应赴,取守势。于是太尉刘裕大开赏募,投身赴义者,一同登京城之科,发居民治石头城,建牙帐,戒严。当时议者谓,宜分兵守诸津要。刘裕以为:“贼众我寡,若分兵屯,则人测虚实。且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今聚众石头,随宜应赴,若徒旋旆集,徐更论之耳”。移屯石头,乃棚淮断渣浦。

卢循、徐道覆沿江而下,直至江宁(建康城南),以十倍的优势兵力,威临建康城下。建康攻城战将开始,陈势如何摆?主攻方向如何定?如何发挥优势兵力击中要害?关键在主将。徐道覆作为农民起义

军的战略家,“数有决,知刘裕已还,欲乾没一战,请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之。”

新亭在建康城西南郊,六朝时近江渚,是北取台城的要道。若从新亭直上,其进军路线大略为渡城南秦淮河朱雀航入朱雀门,入城南宣阳门进建康城,直取台城,台于孙臧兵法十问中杀将击衡之道,^[1]以敌中军要害为攻击目标。白石垒在北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数道攻之分其兵力,足以发挥优势,击中要害,一举全胜。可谓知己知彼的上策。而卢循多谋少决,欲以万全之计,固不听。卢循失掉了决胜的战机,五月乙丑(十四日)到蔡洲。卢循累犯兵家之忌。主帅无勇无谋,优势变劣势。徐道覆虽是强将,但无权决策。

刘裕建康攻守战临阵筹略曰:“贼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挡,宜且回避,胜负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于是刘裕登石头城以望循军,初见引向新亭,公顾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于是建康内外戒严,太尉刘裕紧急部署,大司马琅邪王德文都督宫城诸军事,次中皇堂,太尉刘裕次石头,梁王珍之屯南掖门,冠军将军刘敬宣屯北郊,辅国将军孟怀玉屯南岸,建武将军王仲德屯越城,广武将军刘怀默屯建阳门,淮口筑渣浦、药园、廷尉三垒以拒之,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斑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2]“贼并聚视,咸畏惮之”。孙臧兵法略谓:善战者,便势利地者也,主人安地抚势以待。

建康城攻守战开始了,卢循仅遣十余舰来拔石头栅,刘裕命神弩射之,发辄摧陷,循乃止不复攻栅,石头城是刘裕亲自防守的,兵力比较集中,孙子兵法势谓:避实而击虚,卢循犯兵家之忌,避虚而击实,不利。卢循迂回,设伏兵于南岸,又分兵使羸老悉乘舟舰北向白石。策略地分刘裕兵,调虎离山。刘裕忧虑其从白石步上,乃率刘毅、诸葛长民北出拒之,留参军徐赤特戍南岸,命坚守勿动。刘裕既去卢循军焚渣浦(清凉山南)步上,赤特军战败,死伤有百余人。赤特弃余众,单船济淮。卢循遂率数万人屯丹阳郡(建康东南五里)刘裕率诸军驰归,分军还石头,列阵于南塘(秦淮河南岸),命参军褚叔度、朱龄石率劲勇千余人过秦淮。卢循军数千人,皆长刀矛铤,精甲曜日,各跃争进。龄石所率鲜卑人,善步掣,并结陈以待,卢循军短兵器不能抵抗,死伤数百人,乃撤退,^[3]刘裕

以北兵陆战神弩、鲜卑步掣制南兵水战短兵器发挥了扭转战局的作用。刘裕用兵法“主人逆客于境”刘裕统率北府兵主力列陈秦淮河南岸南塘,坚壁不战。卢循五月乙丑(十四日)到蔡洲至七月庚申(初十)屯兵坚城之下两个月,卢循对道覆讲:“师老矣,弗能复振,可据寻阳,并力取荆州,徐更与都下争衡,犹可以济”。卢循攻建康失败,作战略退却,因自蔡洲南走,七月,建康解严,卢循军事形势发生了逆转,由进攻转为退守,由胜转败。

刘裕以少胜多,转败为胜,战略上由防守转为进攻。长江一线,据中游乃克敌制胜关键。刘裕还东府大治水军,皆大舰重轴,高者十余丈。卢循自蔡洲南走,还屯寻阳,并力取荆州。遣其大将荀林寇江陵,荆州刺史刘道规破林于江津,并追斩之,十月,徐道覆率众三万寇江陵,荆州刺史刘道规又大破之,斩首万余级,道覆走还湓口(江西九江市)卢循不能取据荆州。刘裕治兵齐备,十月率充洲刺史刘藩、宁朔将军檀韶舟南伐。刘裕、卢循在中游豫章决战。卢循军大败,率军还寻阳。卢循闻知刘裕走向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鄱阳湖口)。刘裕军至左里,卢循军虽殊死战,不能禁。刘裕诸军乘胜奔袭,卢循单舸走。所杀及投水死,凡万余人。刘裕自左里凯旋而归^[4]。卢循失中游南归。

卢循收散卒,尚有数千人,奔还广州。刘裕前遣建威将军孙季高,率众三千向海道袭番禺。“攻其不备”,卢循不重视根据地的巩固和准备最后的退路。广州守兵不以海道为防。孙季高乘海奄至,见城池峻整,兵犹数千。孙季高焚贼舟舰,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勒兵谨守。

七年二月,卢循至番禺,为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逃,夏四月攻克台浦;进攻交州至龙编(州治)。刺史杜慧度谲诈败卢循。卢循兵败投海死。

(责任编辑 宁宁)

注:

[1]《御览》引张勃吴录;

[2]《晋书·孙恩传》;

[3]《晋书·卢循传》;

[4]《宋书·武帝本纪》;

[5]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

[7]《孙臧兵法校理》中华书局

后赵浮海抄略散论

● 南京大学 张学锋

在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近三百年的军事战争中,虽然呈现了北强南弱的总趋势,但是,北方军队踏上江南土地者,仅有两次。一次是北齐上党王高涣率千余人送梁贞阳王萧渊明回建康(今南京)做皇帝。这次过江并不奇怪,因为侯景之乱后,北齐、萧梁已划江为界,并且还有王僧辩渡江迎接。另一次,就是比高涣送萧渊明过江早 220 年的后赵军队南进海虞(今江苏常熟)、南沙(今江苏常熟西北)、娄县(今江苏昆山东北)、武进诸县,深入东晋王朝的腹心地区。当时,东晋与后赵以淮河为界,江淮之间,被东晋政府牢牢控制,后赵军队难以从陆上越过江淮间的广袤地区,正面向南渡江骚扰,而却数次“浮海抄东南诸县”,这一军事行动在近三百年的南北战争中是绝无仅有的。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两晋南北朝史》中论述后赵盛衰时,已将“浮海”一事提出,作为后赵军事行动之一例;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论及郗鉴时,亦将抵御海寇一事提出。惜两位先生仅有一笔,其形势未能详尽。“浮海抄略”作为南北战争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后赵“浮海抄略”的历史记载

“浮海抄略”事见于诸史:

1、《资治通鉴》卷 94 晋成帝咸和五年(330)

赵将刘微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杀南沙都尉许儒。

2、同书同卷晋成帝咸和六年

春,正月,赵刘微复寇娄县,掠武进,郗鉴击却之。

3、《晋书》卷 7“成帝纪”

(咸和)五年,夏五月,石将刘微寇南沙,都尉许儒遇害,进入海虞。

4、同书同卷

(咸和)六年,春正月,癸巳,刘微复寇娄县,遂掠武进。

5、同书同卷

(咸和)七年,三月,西中郎将赵胤、司徒中郎匡术攻石勒马头坞,克之。勒将韩雍寇南沙及海虞。

6、同书卷 67“郗鉴传”

时,贼帅刘微聚众数千,浮海抄东南诸县,鉴遂城京口,加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率众讨平之,进位太尉。

7、同书卷 105“石勒载记”

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俘获五千余人。

8、《建康实录》卷 7“显宗成皇帝”

(咸和五年)夏五月,石勒将刘微寇南沙,害都尉许儒。

以上记载中,《通鉴》记二次,《晋书》记三次,《建康实录》记一次。那么,后赵“浮海抄略”到底有几次呢?

咸和五年刘微的第一次浮海,各书记载均同。咸和六年刘微的第二次浮海,《晋书·成帝纪》、《晋书·郗鉴传》和《通鉴》亦同。刘微的两次浮海当无疑点。吕思勉先生所谈及的也是这两次。咸和七年的浮海抄略,只有《晋书》有记,它书未载。《晋书·石勒载记》中记得比较全面,前引明言,马头坞为晋将赵胤、匡术攻占后,韩雍救之不及,遂采取了另一途径,浮海抄略。《晋书》“成帝纪”和“石勒载记”所记咸和七年后赵韩雍浮海一事,似可成立。

总之,后赵有组织地航海武装抄掠,共有三次,分别发生在晋成帝咸和五年、六年和七年。

二、后赵“浮海抄略”的历史条件

后赵政权的政治中心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后赵统治集团是以少数民族羯族为核心的。按常理,骑兵陆战是他们的特长,航海则是他们的弱势。因此,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后赵军队是否具有远距离航海作战的条件。

我国的航海历史,至迟在秦汉时代已有史可考。魏晋时期,航海技术日趋成熟。司马睿在江左立国时,辽东的慕容廆“遣长史王济浮海劝进”,^{〔1〕}苏峻被曹嶷逼急后,率数千家“浮海来奔”。^{〔2〕}种种事实表明,当时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东部沿海兵民已掌握了相当熟练的航海技术。因而,后赵通过长距离的航海来攻击东晋的腹心地区,在技术上已经具备条件。事实上,浮海攻掠也是后赵军事中常用的一种战术。如“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深榆津(今天津北)”。“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3〕}后赵军队能胜任“浮海抄东南诸县”,这是没有问题的。

再者,东晋、后赵两个政权在青州的势力消长,也为后赵“浮海抄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时,当时割据青州的是曹嶷。曹嶷本是匈奴刘氏所任命的安东将军,他向司马睿上劝进书,奉晋为正朔,至少在名义上算是东晋的屏藩。但曹嶷不过是想借东晋之名义来维护他在青州的利益。形势的发展,并不如曹嶷的意,他也看出了建康君臣放弃中原,偏安江左已成定局,“以建邺悬远,势援不及,惧勒袭之”。^{〔4〕}所以,当匈奴内部大乱,石勒势力极速发展时,曹嶷又迫不及待地讨好石勒。石勒在与匈奴刘氏争夺最激烈的时候,白得了个青州,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授曹嶷青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其实,曹嶷与石勒通好,其目的与他向司马睿劝进是一样的。曹嶷接受石勒官封以后,又遣使赂石勒,请以河为境,勒“许之”。^{〔5〕}其实曹嶷时而尊晋,时而赂赵的良苦用心,石勒何尝不知,所以,当石勒正式建立国家,需要进一步扩大势力范围时,青州曹嶷的覆没就在所难免了。东晋太宁元年(323),后赵“中外步骑四万讨曹嶷,……曹嶷降,送于襄国,勒害之,坑其众三万”,^{〔6〕}曹嶷的势力几乎被灭尽。石勒派刘微为青州刺史。刘微是一位有一定政治见解的州牧,他想问题要比石虎远得多,当石虎要杀尽曹嶷所属生口时,刘微阻止石虎说:“今留微,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微将归矣!”^{〔7〕}最后,石虎好歹留下男女七百口给刘微,镇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南),青州诸郡县全部归入后赵的直接统治之下。这位刘微也就担负起了“浮海抄略”的任务。

在中国东部沿海,存在着沿岸海流系,其中,黄海沿岸流,由北往南,到长江口才逐渐向东南海域流去。因此,刘微从青州借黄海沿岸流之势,能够很顺

利地到达长江口。撤离时,只要距海岸线稍远一点,又可借黑潮之势,顺利地返回青州海面。

东晋使臣出使辽东,“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8〕}这是江船入海的例证。后赵韩雍是否准船入海呢?咸和三年,后赵将领石堪“攻祖约军于淮上”,^{〔9〕}“攻晋豫州刺史祖约于寿春,屯师淮上”,^{〔10〕}都可反映出后赵在淮河与东晋争夺寿春时有水军。寿春沿淮而下即是马头戍。因此,石堪的部下韩雍利用水军出淮入海,顺流南下,抄寇南沙、海虞诸县是说得通的。

三、后赵“浮海抄略”的军事性质

东晋建都建康,这主要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仅靠建康近周的财力物力是供不起一个庞大的官僚士族集团和数量众多的军队的,因此,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三吴,这是东晋王朝立国的根本之一。三吴是东晋王朝的大后方,海虞、南沙、娄县可以说是三吴的北大门,也是东晋都城建康的东大门,这扇大门一破,轻则骚扰吴郡,晋陵郡(治今江苏常州),重则可以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直达石头城下,骚扰建康。但是,东晋政府在这一带几乎没有军事力量,建康君臣做梦也不会想到后赵军队会在他的后园放火。咸和五年五月,刘微攻占了南沙,杀了都尉许儒。次年,刘微再次南下,登陆抄掠了娄县以后,朝着建康方向,一直打到距建康只有二百里的武进,引起了东晋政府的恐慌。朝廷命郗鉴为都督扬州之晋陵吴郡诸军事,筑京口城抗御后赵刘微军。郗鉴在咸和四年平定苏峻叛乱中立功,拜司空,加侍中,而在赶走刘微军队后,进位太尉。比较起来看,赶走刘微之功不亚于平叛苏峻之功,可以想见,刘微浮海抄略南沙、海虞、娄县、进掠武进,给东晋王朝造成的危机不见得比苏峻叛乱所带来的危机小。约略与郗鉴城京口的同时,吴郡太守虞谭在今上海西北沿海“修沪渎垒以防海抄,百姓赖之”。^{〔11〕}亦可见其危害之大。

后赵的长距离浮海骚扰,给东晋君臣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数年以后,石虎在青州造船数百艘,扬言南下时,政府立刻调蔡谟在土山(今江苏江宁)到江乘(今南京市东北)一线筑垒设防,这一道防线已经是建康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可见,后赵军深入东南,不仅给东晋政府造成了人力物力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一种心理压力。

刘微作为一个州刺史,组织千余人,长距离浮海来战,他的目的是什么?这就牵涉到后赵“浮海掠

略”的性质问题。我们认为,浮海绝对不会是刘微(或者韩雍)一个人的所思所行,而是石勒对东晋战略思想的一部分,刘微只可能是按诏行事而已。

石勒并非胸无大志之辈,他一直以灭亡东晋政权和蜀地氏族政权,统一宇内为目的。咸和三年洛阳之战后,前赵政权已名存实亡。咸和四年,石勒即兵锋一转,直指东晋王朝,将主力军分成两路。进攻东晋,重点争夺长江中游的襄阳和淮河南岸的寿春。咸和四年,趁东晋内部苏峻、祖约叛乱时,轻而易举地拿下了东晋王朝的北部重镇寿春,打开了东晋政府的北大门,建康君臣一时如惊弓之鸟。咸和五年,后赵兵又陷襄阳,毁其城,筑樊城戍守。东晋王朝两个最重要的前沿重镇被后赵掌握。

将刘微浮海南下看成是石勒战略思想中的一部分是合乎情理的。咸和五年到咸和七年间,正面战场之外,刘微作为一个州牧史,冒这么大的风险,率领千余人,浮海数千里,来到东晋的大后方,这既不可能纯粹为了抢掠财富,也不可能以攻占建康为最终目的,我们只能将刘微之举看成是后赵的一股骚扰部队,包括韩雍咸和七年的浮海,其性质都只能看成是骚扰。进入东南诸县后,只是烧杀抢掠一番,便撤退北归。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即给东晋王朝造成后院起火的威胁,配合后赵军队陆上的正面进攻。但由于紧接而来的后赵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失去了军事对付东晋的优势。

综上所述,对于后赵的三次“浮海抄略”,我们认为:后赵军队远距离航海抄略东晋腹地地区,或杀或虏,其目的在于配合陆上的正面进攻,这是石勒军事战略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 宁 宁)

注:

〔1〕《资治通鉴》卷90 晋元帝建武元年;

〔2〕〔5〕《资治通鉴》卷91 晋元帝大兴二年;

〔3〕均见《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4〕〔6〕〔7〕《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

〔8〕《资治通鉴》卷95 晋成帝咸和九年。

〔9〕《资治通鉴》卷94 晋成帝咸和三年。

〔10〕《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11〕《晋书》卷67“虞潭传”。

“元嘉之治”

● 扬州师范学院

刘义隆于423年即皇帝位,是为宋文帝。425年“始亲万机”,通过铲除顾命集团和皇族、士族的反对势力,确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格局,继而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改革。

在政治上采取了整饬吏治、倡导儒学、革除弊政等重大措施。在经济上采取了劝课农桑、奖励垦殖、宽减租税等重大措施。从而出现了南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繁荣安定的局面,即所谓“元嘉之治”。历代史家对此赞不绝口。沈约说:“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1〕}又说:“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2〕}司马光也说:“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3〕}。

宋文帝时期,入主中原的鲜卑拓跋部日渐强大起来,对刘宋展开军事攻击。北魏南进的目的在于掠夺人口与财物,其手段是极为残酷的。南北人民对刘宋政权寄以很大的希望。刘宋统治者也为维护其统治,先后进行多次北伐战争。

首次北伐

文帝亲政后,北魏不断骚扰河南。为阻遏其进攻,树立个人威望,文帝“有志北略”。元嘉七年(430年)。派大将刘彦之率“甲卒五万”、“精骑八千”为主力,恢复河南。但同年冬为北魏击败,造成“悉委弃兵甲,武库为之空虚”^{〔4〕}的结果。

再次北伐

北魏统一北方后,全力用兵河南。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派宁朔将军王玄谟等北伐。虽然进攻关中的偏师柳元景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主力王玄谟部全军崩溃。拓跋焘一路进攻,抵达长江北岸的瓜步。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致使“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免于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鸡鸣吠犬”^{〔5〕}。

三次北伐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文帝得知拓跋焘病死,为挽回丧失的威信,“更谋北伐”。以何偃为代表的大部分朝臣一致反对,以为“淮、泗数州疮痍未复,不宜轻动”^{〔6〕}。但文帝一意孤行,以萧思话部为主力攻山东,以鲁爽攻河南,以臧质攻关中,做为策。但萧思话

及其北伐

王永平

部监军张永攻高敖城，“累旬不能拔”。八月七日夜，北魏偷袭其部，“士卒烧死及虐杀者甚众”。其仓皇退兵，“不报告诸将，众军惊扰，为虏所乘，死败涂地”^{〔9〕}。从此，刘宋丧失了河南和山东。

宋文帝经营北方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社会危机。史载：“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蕃，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乱。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10〕}。对此，人们不禁要问：有为之君宋文帝何以在军事上表现得如此无能呢？分析起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宋文帝对北伐问题在战略上重视不够。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宋文帝北伐往往凭一时冲动，或急于立威、或仓卒应敌、或为挽回脸面，在战略上一无严密的考虑与部署。如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次北伐开始后，才发现军队不足，急诏“发南兖州三五丁，……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有司又奏军用不充，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资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11〕}。如此手忙脚乱，毫无准备，怎么能战胜北魏呢？果然，这些拼凑的军队一遇上北魏的军队，便出现了“江南白丁，轻易进退”^{〔12〕}的情况，根本没有战斗力。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京口北固亭怀古》中感叹道：“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正是就此而言的。

其二宋文帝杀戮军事将领，致使军事人才严重缺乏，任用非人，难以应战。宋文帝为防止别人居功夺权杀戮了一些有为军事将领。元嘉十三年（436年）杀大将檀道济。“魏人闻之，喜曰：道济死，吴之辈不足复惮”^{〔13〕}。刘真道、裴方明为元嘉初年名将，曾共同攻破仇池，文帝找借口将两人处死。如此轻易杀害大将，只能是自毁长城。北魏拓跋焘曾写信给宋文帝，说：“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焉得与我校邪！”又说：“知彼公时旧臣，都已杀尽，彼臣若在，年几虽老，犹有智策，今已杀尽，岂不天资我也”。^{〔14〕}事实也正是如此，遇有战事，文帝派不出得力的将帅。如元嘉二十七年北伐的

主帅王玄谟，他对行军征战所知甚少。对提出合理建议的将士，“专依所见，多行杀戮”；决战之际，自“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遇到反击，临阵逃跑，以致“麾下散亡略尽”^{〔15〕}。

其三，宋文帝制定的一些不合理的军事制度严重束缚了将领的手脚，使其难以应变。宋文帝对将领的监督很严，遇有战事，总委派监军使，以督察将领。有什么变故，由监军使依诏行事。这些监军使多是文帝亲信，根本不懂军事。如元嘉二十九年北伐的山东主力部队监军张永，以通诸杂艺得文帝信爱，曾设计华林园、玄武湖等游乐场所，被任命为督冀州、青州之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武将军、冀州刺史，督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略河南，以致不战自溃。为进一步限制将领，文帝“每命将授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赧赧，莫敢自决”^{〔16〕}。如元嘉二十九年文帝派亲信徐爱“随军向高敖城，衔中旨，临时宣示”^{〔17〕}。这一规定完全违背了军事规律，剥夺了将帅临阵应变的起码的权利，根本无从出奇制胜。而且，文帝本人不长于军事，他的方略是与少数中枢文臣商议的结果，多是纸上谈兵。当时有实战经验的将领沈庆之对文帝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陛下今欲伐敌，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18〕}。

综观元嘉历史可以看出，宋文帝凭借皇权强化的优势，推行了诸多改革措施，赢得了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但他缺乏战略眼光，甚至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惜杀戮军事人才，从而造成了军事上的软弱与失败。这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在南北分裂，民族矛盾激化的时代，没有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一味地穷兵黩武，固然不能成功，但没有全局性的战略指导与强大的军事保护的偏安一隅与经营地方，也是同样注定不能长久的。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1〕〔7〕《宋书》传论；

〔2〕〔10〕《宋书》卷92传序；

〔3〕《资治通鉴》卷123臣光曰；

〔11〕〔14〕《宋书》卷95《索虏传》；

〔8〕〔12〕〔13〕〔16〕〔18〕《资治通鉴》；

〔6〕《宋书》卷81《顾琛传》；

〔9〕《宋书》卷53《张永传》；

〔15〕《宋书》卷76《王玄谟传》；

〔17〕《宋书》卷94《徐爱传》。

战争频仍中的六朝江南城市

● 安徽省社科院《安徽史学》 张 南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各割据政权之间、各政权内部发生兼并或叛乱的战争不断,各族人民起义也此起彼伏。城市攻守战,是中国古代战争的基本方式之一。“限江自保”是六朝的基本国策。六朝以江北为北部边防,以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防线,而以江南地区为后方。北方政权多次南伐,多被遏制在长江以北。但,六朝内部却以江南为战场,频频发生内战。此外,农民起义亦横扫过江南城市。因此,六朝江南地区的许多城市与战争,尤其是内战结下了不解之缘。

本文主要论述六朝江南城市在内战、南北战争及农民起义等诸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诸种战争对六朝江南城市的破坏和影响。

1. 蓬勃发展的六朝江南城市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了战乱的很大阻碍。南方政权统治下的长江以南地区,由于有江北防线和长江防线的双重保护,相对处于和平环境之中。以荆扬地区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得到了大力的开发和发展,这集中地体现在该地区城市的发展上。这一时期,全国比较重要的大都会大部分位于长江以南的地区中,而且还兴起了一些繁荣富庶的中小城市。在长江沿岸的重要的江南城市有下列几个:

建康,是六朝之都,江南的第一大都会,长江中下游交通的枢纽。在梁“侯景之乱”前,它始终保持着空前的繁荣,商业最为发达,“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城南“淮水(即秦淮河)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1〕}“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2〕}“贡使商旅,方舟万计”^{〔3〕}有城市居民二十八万户。

京口(今江苏镇江),徐州、北徐州先后治此,“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4〕}“利尽淮海”^{〔5〕}是江南仅次于建康的又一大都会。南方政权的大批官僚将领皆家居于此,“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6〕}

汉,“控接湘川,边带潏、沔”^{〔7〕},是长江中游的商业都会。

柴桑(今江西九江),为江州州治(梁时,州治移浚口城)。它依匡庐,负大江,据彭泽,为中流襟带。刘宋的贪官邓琬任浔阳内史、行江州事时,曾“使婢仆出市道贩卖”^{〔8〕}。宋将萧斌在据守柴桑城附近的浚口时,曾强征或抢夺大量的商旅船只,“造楼橹,立水栅,旬日皆办”^{〔9〕}。可见,柴桑城亦是长江中下游之间的一个都会。

江陵,为荆州州治。它虽在江北,但荆州长期为南方政权所拥有,而且是南方政权赖以立国的基础之一,“江左大镇,莫过荆扬”^{〔10〕}它与长江中下游的江南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江陵馆“雍、岷、交、梁之会”,荆州境内物产丰富,“良皮美鬻,商賈所聚”^{〔11〕},是长江中游的西部都会。

位于江南腹地的那些郡县治所中,有不少是有一定规模的经济较繁荣的中小城市。如吴县(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山阴(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吴兴、阳羨(义兴郡治,今江苏宜兴)、丹徒(晋陵郡治所)、长山(东阳郡治,今浙江金华)、永宁(永嘉郡治所,今浙江温州)等皆是比较突出的中等城市。限于篇幅仅简述其中较大的,且与战争关系较密切的吴县与山阴。

吴郡是汉以来的江南大郡,地处富庶的太湖之滨,盛产稻米,是六朝的粮仓,吴县位于古运河的中段,是供应建康的吴郡漕运线的起点。吴郡“山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所以吴县“商贾并凑”^{〔12〕},是三吴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六朝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

山阴,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是两浙稻米、绢帛的贸易中心。早在东晋时,商业已十分繁荣,商人“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王彪之《整市教》,《全晋文》卷三十一引《初学记》卷二十四)。刘宋时,山阴城繁华如昔,“民户三万,海内剧邑”^{〔13〕}

夏口(今湖北武昌),为郢州州治,它扼制江

2. 六朝江南城市在战争中的军事地位与作用

六朝一些江南城市,不但成为长江防线上的战略据点,亦是内战中的军事堡垒。如:

建康,是南方政权的根本所在,它缘江而立,又处长江下游的交通要道,所以它不仅经常受到北朝军队南伐的威胁,而且还多次受到内战的冲击。为保卫首都,屏障三吴腹地,它也就被六朝统治者建设成为江南第一军事重镇。城内驻有重兵,石头城是著名的军事要塞。

京口,是六朝长江下游东端的战略支点,也是最接近京师的渡江要地。它缘江为境,屏藩建康的东北方。由京口出兵,可迅速抵达曲阿,切断三吴粮食漕运建康的运输线,可谓京师的生命线。因此,京口被建成江南地方城市中最大的军事重镇之一,与建康、姑孰(今安徽当涂)构成六朝长江下游的防线。东晋时期,京口为北府精兵的驻地,此后,一直驻有重兵,如梁末,南徐州刺史陈霸先曾“自京口举兵十万”之众,突袭把持建康王僧辩^[14]。

夏口城“边江峻险,楼櫓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15]是建康上游的又一军事重镇。顾祖禹说,“自东晋以后,谈形势者,未尝不以夏口、武昌为要会,盖六朝之际,上游有事,夏口为必争之所”^[16]。

柴桑位于荆扬之间,亦是内战中双方的必争之地,“六朝之间,浔阳未有三十年无事者”^[17]。

江陵城扼控建康之上游,为六朝襄樊防线之后盾,肩负着保卫上游,抗击北朝军队包抄江南的重任。因此,自三国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晋氏南迁之后”,与襄阳一样,“皆为重镇”^[18]刘宋时,因荆州“资富兵甲居朝廷之半”,常以宗室子弟镇守江陵。而南方政权中镇守荆州的将领们,则因其“兵强财富”,和“外带江汉,内阻山险,有金城之固”,可为“帝王之资”而滋生政治野心,“称兵跋扈,无代不有”(《三国志》卷五十四,《通典·州郡典》)。他们屡屡拥兵顺江而下,问鼎金陵,引起所谓“荆扬之争”,即方镇与中央政府间的内战。可以说,江陵城是内战的策源地之一。

有些江南腹地的城市或因其富有,或恰恰位于军事行动路线上而卷入了战争,以吴县为例。

吴郡是建康的粮仓,吴县是三吴的交通中心,战争一旦波及吴郡,吴县往往成为争战之地。政府军要固守,叛乱或敌对的军队则希望攻下吴县,掠取城中的财富与储粮,同时还可切断中央政府的粮食供应。梁末,北齐南伐,韦载对陈霸先说,“齐若分兵三吴之

路,略地东境,则时势失矣”陈末^[19],隋军攻陈,分军并进,以一军直插三吴,下吴县,断陈之粮援,于是陈朝旋踵而亡。

长江沿岸江南城市直接参与了荆扬之争等内战,亦参与了抵御北朝南伐的防御战,而成了前进基地与军事堡垒。军事职能始终是这些城市的主要职能;江南腹地的有些城市卷入了战争,主要是内战,有些直接参战或受攻击的城市,在战争期间,亦具有军事堡垒的职能;此外,江南腹地的另一些城市虽未直接参与战争,但它们为战争提供兵员、物资等方式支持战争,间接参与了战争。在战争期间,它们具有准军事职能。

3. 战争对六朝江南城市的破坏与影响

江南城市地处内地,本应是安乐之邦,它们的主要功能应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多次的战争,尤其是内战使它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以荆扬之争对江南城市的破坏面最大,而侯景之乱对单个城市的破坏最烈。此外,南方政权镇压农民起义,北朝的南伐等对江南城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

荆扬之争几乎贯穿着整个六朝时期。东晋的王敦、桓温、殷仲堪、桓玄;刘宋的谢晦、刘义宣、袁顼、沈攸之、刘休范;萧齐的陈显达、萧衍;陈的王琳、华皎等人,皆利用节制上游军事的地位,拥兵顺江东下向建康发难,燃起了战火。受到荆扬战争直接影响的主要是荆扬间长江沿岸的诸形要城市。

荆扬之争给这些城市造成了的影响是:首先,战前的经济封锁与备战,破坏了城市的正常发展与人民的安居生活。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三吴地区受到孙恩起义的冲击,中止了对首都建康的漕运。此时,桓玄正在荆州策划起兵东下之事,他趁机“禁断江路”,切断了上游给建康的粮食供给,建康城因此“公私匮乏,以赇、橡给士卒”^[20]平民百姓处在饥饿的恐慌之中了。备战中的强迫征用,和清理战场障碍等也对城市人民的生活影响很大。宋顺帝昇明元年(477年),沈攸之自荆州起兵东下,萧贍据守柴桑城附近的湓口城,任意抢夺征用过往的船只,“断取行旅船板以造楼櫓,立水栅”^[21]柴桑附近的商人旅客都遭了殃;齐东昏侯永元三年(501年)萧衍自荆州起兵,逼近建康时,东昏侯采纳江州刺史李居士的建议,纵火焚烧秦淮河南岸民屋,以开拓战场,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大片民居皆化为灰烬。^[22]

其次,是战争中双方军方肆意的破坏。无论何种形式的战争都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在六

朝江南城市中,所蒙受战争破坏的损失大部分不是战斗的直接后果,而是由于作战的一方或双方以水淹、火攻作为战斗手段,或干脆纵兵烧杀抢劫所造成的。请看几例史实。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在平讨晋安王刘子勋时,上虞令王晏攻入山阴城,“纵兵大掠,府库皆空”^{〔23〕}。

宋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年),任农夫在平定建平王刘景素叛乱时,在京口附近“纵兵烧市邑”^{〔24〕}。

宋顺帝昇明元年,沈攸之帅兵东下,围攻郢城,“令诸军登岸烧郢邑”^{〔25〕}。

齐东昏侯永元三年,萧衍攻入建康,东昏侯在退保宫城时,又烧毁城内的蕃署官府,强驱士民入宫城,为其守城^{〔26〕}。

侯景之乱,几乎毁灭了江南城市中最繁华的建康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年)十月,侯景率军攻入建康,包围台城130多天。其间,不仅堰水、放水淹城,而且还“纵兵杀掠”,“富室豪家,恣意哀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27〕}。

政府军破坏城市祸害百姓往往与叛军并无二致,平侯景之乱时,“王师之酷,甚于侯景”。侯景叛乱时,老百姓扶老携幼迎接王师,但这些军队一到,“便竞剥掠”。如王僧辩所率军队,在建康“卤掠士邑,剥剔士庶”,“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于是百姓失望”。因此侯景之乱后的建康城,“郭区内外,居人略尽”。建康城一蹶不振,再经隋灭陈后对建康都城的平毁,建康都城就失去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江南第一都会的地位。

侯景之乱亦摧残了一些三吴地区的城市,使这些城市衰落了。

东晋南朝爆发了多次农民起义,而以孙恩、卢循领导的起义规模最大,东南“八郡,一时俱起”,持续了十一年零五个月,转战东南半壁河山,攻破了几十座城池,狠狠打击了世族地主。但是起义军中难免良

莠不齐,攻入城中,烧杀抢劫时有发生。这种行为亦给江南城市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史书记载说,他们“杀异己”,“烧仓库,焚邑屋”,“虏掠财货”,大战中,一次“杀百姓数万人”等^{〔28〕}这些因属污蔑之辞,但起义军在城中烧杀的现象还是有的。

但是,政府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更是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如刘牢之在镇压孙恩起义时,疯狂屠杀无辜的人民,吴中“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29〕}。他还纵兵抢掠,战后“三吴……编户饥馑,公私不贍”^{〔30〕}。富庶的三吴城市又是一片残破景象。

总之,战争虽然破坏江南许多城市的正常发展,但相对北方城市而言,江南城市在多数时间仍是处在和平环境下向前发展。多数城市在承受了战争的损害后,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不但能恢复过来,而且还继续发展。维持了长期的繁荣,并比较正常地发挥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

(责任编辑 淑玉)

注:

- 〔1〕《隋书》卷24;〔2〕〔4〕〔12〕〔18〕卷31。
〔3〕《宋书》卷33〔5〕卷5;〔8〕卷84;
〔13〕卷80。
〔6〕《南齐书》卷14;〔7〕〔10〕〔15〕卷15;〔11〕卷2。
〔9〕〔21〕〔24〕〔25〕《资治通鉴》卷134;〔19〕卷166;
〔29〕卷111;〔20〕卷112;〔22〕〔26〕卷144;
〔23〕卷131。
〔14〕《梁书》卷45;〔27〕卷56。
〔16〕《谈史方輿纪要》卷75;〔17〕卷83;
〔28〕《晋书》卷100;〔30〕卷64。

编者附言:《四十年来外国首脑访华录》因稿挤暂停一期,下期继续连载。

南京市地方志

dfz.nanjing.gov.cn



用贖金创办图书馆

● 魏希德

时下,为死者追悼,赠仪日丰,赠赠之财物何以用之?勾起我对40多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1946年12月,高淳县立初级中学校长童铭新与世长逝,根据他临终前的嘱托和追悼大会决议,将全部贖金用于补给充实校内的教学设备和创办“铭新图书馆”。此举,超众脱俗,至今尚启人深思。

童铭新又名童良瑞,号震滋。生于1875年。禀贡生。高淳县童家村人。清末曾先后在甘肃平番县、广东揭阳县任职,宣统三年(1911年)离任返乡。民国十二年(1923年)创办高淳县立初级中学,被公推为校长,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病逝。

1946年12月10日,高淳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在县初级中学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上,主持人及其亲属讲述了死者临终前愿将全部贖金用于补给充实校内教学设备的遗嘱,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并于次年8月,由我的外祖父、曾任江苏省民政厅视察、高淳县商会会长、救济院院长孔嗣圭等64人联名在高淳县参议会主办的《大道报》上,刊登了《铭新图书馆征募图书启事》。全文如下:

铭新图书馆征募图书启事

敬启者,本县县立初级中学创办人童公震滋于去年溘然逝世,薄邑同深痛悼,惟念童公致办教育,功在吾淳,经于十二月十日日本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在该校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先生家属遵先生临危时之嘱咐,所有以贖金来赠者概不领受,当经大会议决,发起募捐,创办“铭新图书馆”,藉资充实校内新设备补给及该校师生之精神食粮而留永久纪念。敬盼

全县人士、县中校友多所赞助,无论现金捐助或图书惠赠,均所欢迎。倘荷见许并请于本月十五日前送寄高淳县立初级中学列收登记制据。无任感荷

发起人 孔嗣圭 陈安愚 王良才 袁辉守 张鼎 张树德 吴建东 吴朝望 王钟骏 朱定深 杨鼎侯 韩祖荣 施兴阳。魏冀征 王昌华 曹源松 魏志信 吴济望 邢朝纲 赵士志 李春 李德珊 施可卿 赵愚山 邢刚晨 韦尚论 陈基定 胡凤鸣 陈渭犀 杨蔚桢 汤宗羲 程德滋 顾炯 王煦台 夏霖 芮向荣 潘宗纪 潘宗纲 韦光汉 孙金钵 王竹琴 童泳南 徐同祐 孔庆湖 高竹园 张文郁 高士超 陈启新 傅中麒 王秀槐 卜学瑜 谷甘霖 江永芬 赵士达 葛英立 周国桢 葛才霖 孔凡翱 傅廷柏 史云华 周典煌 史长刚 倪德耀 周震东同启。

《启事》刊出后,由于发起人都是当时县内政界、军界、工商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陆续有人捐款赠书,并用捐款从上海购回一些进步书刊,如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等。在县初级中学校园内“尊经阁”东侧设立了“铭新图书馆”。童铭新的亲属童荫泉还亲自刻了“铭新图书馆藏书”的印记和制作了赠书收据等。我于1947年下半年考入该校初一班,曾从图书馆里看到或借阅过捐赠的《清代名家书信手迹》(石印本)、《中学生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编印)、《高考指南》以及《中央日报》、《申报》、《新闻》、《东方杂志》等报刊。这些书刊,在当时并非稀世之物,但究其来源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石头城的军事地位和六朝时期的防御政策

●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 罗宗真

唐代诗人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一诗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首家喻户晓的诗篇，正反映了三国末年石头城在军事防御上的地位。

孙吴黄龙元年(229年)自武昌(今湖北鄂城)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为南京建都之始。东晋咸和间(326~334年)又在吴的太初宫和昭明宫基础上，于城址中部正式建宫城，城凡二重。据《建康实录》：六朝都城城墙“初皆以土墙竹篱为之”，东晋末始部分用砖，南齐建元二年(480年)方正式建“都墙”(《南齐书·高帝纪》)，悉用砖。梁天监十年(511年)，又增建第三重宫城，像这样有三重城的宫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和都城建筑史上均属初见，应与当时政局动荡，皇室惶恐不安有关。同时也与六朝都城面临长江，所采取的防御政策有关。

为了加强防卫，南京的六朝都城，除本身增筑数重城墙外，历代还增设了外郭城，起到堡垒的作用，这也是六朝时期城市布局的一个特点。当时都城之北的白下垒，东南的东府城，西南的冶城，以及冶城之西的西州城，东府城城南的丹阳郡城，在东晋以后更为增筑加固，城堡罗列。但其中最早并最为重要，起到直接保卫都城作用的，是西北两面临江的石头城。根据考古资料，石头城的范围大小，建筑结构现在还有部分保存得十分清楚。据文献记载：孙权早在建安十七年(211年)在“金陵邑”(公元前333年楚国所筑城，面积仅三万平方米，即今清凉山)旧址上修建“石头城”，将秣陵改为建业，这比他定都南京还早十七年。《舆地志》记：石头城“环七里一百步”，《丹阳记》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晋)义熙初，始加砖累甃，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为奇势”。《建康志》也记：石头城中有仓城，又名“石头仓”或“石头库”，用以储存军用器械、粮食和物资，历代帝王常以亲近和重臣领戍军，镇守石头城。可见它对保卫都城的重要作用。刘宋大明中(457—464年)

以其地戍离宫，齐武帝为世子宫，地位更为突出。石头城西南有烽火楼，《同治上江两县志》说是吴举烽火处，当时石头城与长江上游相通，凡沿江要处，皆设有烽火台，举火相望，瞬息可达。一旦有军情，半天之内，可传遍长江沿线东吴所辖各地。这里又是东吴水军驻所，沿江最大的港口码头，往往可停船舶千艘，由此可知六朝以来，因江流逼城。倚此为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这些史料，为我们今天在清凉山下考定石头城的遗址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而证明基本上是确实的。

石头城利用清凉山的自然形势，在山岩上填以土石筑城，其西北两面紧靠长江，扼淮水之出口处，形势险要。今从实地测得石头城西北所存旧址的边缘长118米，其下岩石俱属紫红色的砂质砂岩，即当时江水直达城边，冲击暴露的岩石。在这些岩石上面有垒石所筑的城墙和少数六朝城砖，其上还有六朝以后迄今的砖墙，所垒的石块平均长135、宽65、厚36厘米，石块可见的部分最厚达十二层，高5.5米，系就地取用同类岩石制成，故现在石头城下层的城墙即是当时六朝的遗迹。这些石块垒筑的城墙，今天还可看到当年江水冲击的痕迹，故知六朝时期，长江是直达石头城的。刘禹锡还有一首《石头城》诗：“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犹过女墙来”，使我们进一步得知唐代江岸尚距石头城不远，秦淮河水尚绕经城下，江潮可以拍打已废的旧城。由于唐武德以后统一全国，改变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城不复起防御作用；到了五代，江岸更为北移，石城失去险势，无复虎踞之雄，所以也就逐渐荒芜，再也不复驻军了。由于我们在今汉中门、水西门外，城西郊区这一带勘察，因该地系一片冲积平原，在地质上属于侵蚀堆积阶地，与城东、南、北三面的地貌绝不相同，迄今未发现过六朝墓葬。故可确定，那里在六朝以后，江水逐年北移，淤积造成平原，和上述文献资料也是相合的。

六朝时期南北对峙,虽有北伐之举,但均无功。北强南弱的形势,促使南方着重采取防御政策。据陈寅恪分析“南北比较,经济、武备,北方远胜于南方”(《魏晋南北朝史讲演集》)。他首先认为:北方人口之众,即占优势,曹魏之时,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而当时吴和蜀两国人口加起来的户数“虽为八十余万,口数却只有三百二十余万”;北魏时期户数“三百三十余万,口数近九百万”,南方宋朝大明八年,“户仅九十余万”;陈亡之际,“户仅五十万,口仅二百万”,可见北方人口多于南方。

军事上北朝的部队也远胜于南方,组织之严密、骑术之精、斥候之明,陈先生在上文中均有论述。虽然如此,但北朝不能过早地统一南方,主要原因在内部的民族问题和政权巩固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北朝统治者内部矛盾,不能有力的发挥潜在经济与武备力量。反之,南朝北伐不能成功,原因也在物力不及北方,武备不及北方,长途征伐运输困难,再加南朝统治者对北伐不感兴趣,所以这段时期,南北形成对峙局面。从总的方面来看,南方采取的也还是以守为主的防御政策。

陈寅恪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一文中,对孙吴政权的地域性及其影响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孙氏之建国乃由江淮地域之强宗大族因汉末之扰乱,拥戴江东地域具有战斗力之豪族,即当时不以文化见称之次等士族孙氏,借其武力,以求保全而组织之政权。故其政治社会之势力全操于地方豪族之手,西晋灭吴以后,此种地方势力并未因之消灭,所以能反抗洛阳之统治”。这种地域性观念,可以说自孙吴时起,就奠定安业于江南的思想,也影响着对外政策。可以说,一直到南朝,仍继续受到这种思想影响,北伐无力,固守江南,深信以长江为天堑,可以永保国力,这就是形成对外采取防御的基本政策的根本原因。反之,北朝诸国,则采取积极的进取政策,无时不在考虑南下。

这里,我们试举一些具体事实为例证明。

曹魏立国,北方经济逐渐恢复,经营淮河的农业区,更为迫切,《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说:“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今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以淮河流域为粮食基地,作为取吴的跳板,这是魏国南向灭吴

的战略决策。

魏国开辟了淮河流域的军屯区,犹如一堵坚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阻挡吴军北上出击,同时又可西向攻蜀,形成无后顾之忧的地理形势。再加上吴国世族地主势力逐年扩大,依附人口增多,各自经营割据的势力范围,以致严重地削弱了国家军事力量,给西晋灭吴创造了条件。公元279年西晋二十万大军分六路伐吴,吴所能调集的主力,才不过三万人,再加上当时晋军一方面顺江而下,王浚水军斩断拦江的铁索,先克武昌,包围石头城,另一方面由江北陆路南下,两路夹攻。在灭吴过程中,晋军首先攻占石头城,王浚所率戍军八万人,方舟百里,攻占石头城之后,使吴的外围主要防御基地沦陷,建业无险可守,吴主孙皓,不得不面缚请降。

公元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是北魏力量最为雄厚的时期,这时南朝宋文帝在位,也还比较富强。在这前后南北对峙中,从公元423~450年,虽有战争连绵打了三十年,但无多大成果,450年北魏发起了最大的一次战役,历时一年多。这年冬天,北魏军在太武帝亲自率领下,越过黄河,围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因久攻不下,乃绕过彭城,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太武帝驻兵于江北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准备造筏渡江,进攻建康。当时从采石(今安徽当涂西北)到暨阳(今江苏江阴县东),六七百里江岸,处处烽火,形势紧张。特别是石头城和建康都城内外,戒备森严,宋文帝立在石头城上,北望江上烽烟,焦急万分。当时由于天气严寒,供应困难,北魏军无法渡江。等到公元451年春天,久居北岸的魏军,粮草缺乏,运输不及,不得不退兵返国,但沿途大掠,使南朝的国力大衰。这次战争,南方十分危急,由于气候原因和长江分隔,暂时维持了政权的苟安,更为促使南朝加强防御。到了齐梁之际,建康地处长江南岸,紧接淮南前方,防御地位更为突出,所以都城结构,悉用砖石,尤为牢固,暂时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对峙局面。

自瓜步之役后,刘宋政府便把江北防线,从洛阳、滑台(今河南滑县)撤至淮北,明帝时(469年)淮北四州及豫西九郡先后被魏吞并,防线又撤至淮水以南。南齐立国共24年,内乱频仍,更无暇北顾,所谓“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武帝的短暂北伐,犹如昙花一现,接着侯景之乱,东魏乘虚而入,梁军在彭城寒山堰一仗,几乎全军覆没。西魏又乘梁武帝死后的内讧之机,占领了襄阳、江陵要地。等到陈霸先立国之后,只能保全长江以南:“西不得蜀汉,

宜兴周氏与六朝军事

● 江苏宜兴市政协 叶聚森

宜兴周氏,指以周宾所繁衍下来的一大家族为主,也包括宜兴籍的其他周姓。宜兴周氏在历史上人材辈出,根据1988年在宜兴黄干发现的《黄干周氏宗谱》和正史记载统计,仅六朝三百多年间,就出了十余位著名将领。

周宾,吴国广平太守。其子周鲂,年少好学,举孝廉,为宁国长。因镇压彭式、彭绮有功,先后升迁鄱阳太守、昭仪校尉。赤壁战后,曹魏仍控制着苏北、皖北一些地区,严重威胁着东吴政权。这时,孙权除派步骘招抚广、交的士燮兄弟,向岭南开疆拓土外,更将重点放在同曹魏争夺荆州和江淮地区上。黄武七年(228年),孙权密旨周鲂,命他“求山中旧族名师为北敌所闻知者,令谲挑魏大司马扬州牧曹休”(《三国志·吴书·周鲂传》)。周鲂受命后反复考虑,深怕

“民帅小丑”不足担当这重要任务,“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乃向孙权画计7条,亲自致书曹休伪称投叛,并截发以示守信。曹休消除疑虑,率领步骑十万潜入皖地。周鲂随陆逊横截休军,斩首数万,重创了曹魏的有生力量。事后,孙权大会诸将欢宴,酒酣,谓鲂曰:“君下发载义,成孤大事,君之功名,当书之竹帛。”

鲂独子周处,西晋名将,生有三子。长子周玘,性格强毅沈断。西晋惠帝太安初年,张昌聚众江夏,攻城略地,所在覆没,其党石冰略有扬土。周玘起兵讨伐。“时右将军陈敏自广陵率众助玘,斩冰别率赵鸯于芜湖,因与玘俱前攻冰于建康”(《晋书·周玘传》),石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投降,徐扬地区遂平定。周玘不言功赏,散众还家。而陈敏自恃功高,在扬州反叛,以玘为安丰太守加四品将军。玘将

北失淮淝”,是南朝诸国版图最小的一个王国;其间陈宣帝在太建五年(573年),曾北伐一次,进军淮南,但克吕梁(徐州东南)之后,不思北进。当时他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划淮而守,苟安江表,这是继东吴以来,历代南朝统治者,具有十分代表性的政策意向;对待北朝,始终以守为主,采取防御。可是客观情况不是如此,北周不及一年,尽占江北淮南之

地,把陈的势力全部驱回江南。自此以后,石头城和建康都城完全暴露在北朝虎视眈眈的目标之内;南朝再也不可能恢复旧地,就是维持江南一隅,也处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之下。

石头城的军事地位,从三国到南朝始终未变,可以看出六朝立国的一贯对外防御政策的连续性。现在检查起来,我们认为这种防御政策是不足取的。

此事密告镇东将军刘准，令发兵，己为内应，并与顾荣、甘卓等以兵攻敏，敏众奔溃，陈敏单骑北逃，在江乘界被俘，斩首建康。陈敏叛时，吴兴人钱珍亦起义兵攻讨，后闻刘聪进逼洛阳，便畏葸不敢进。晋帝促以军期，珍乃谋反，杀陈丰，焚邸阁，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来寇阳羨（宜兴古名）。玕率领乡里义兵进攻钱珍军队，斩获魁首，传诸建康。周玕三定江南，为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扫清了军事障碍，因周家是江南的强宗豪族，在政治上有号召力，军事上有不同一般的战斗力，为东晋政权偏安江左奠定了社会基础，所以，晋帝特别注意对周玕的笼络，以玕行威武将军、任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吴兴寇乱之后，百姓饥馑，盗贼公行，玕安抚黎元甚有威惠，期年之间境内宁静。晋元帝又以玕颇兴义兵，除升官封侯外，特将阳羨及长兴和丹阳的一部分设立义兴郡。即使后来周玕因“宗族强盛，人情所归，帝疑惮之”而内心怨望，进而阴谋杀戮诸执政的事情泄漏后，晋元帝也只是“闻而秘之”（《晋书·周玕传》）。下令曰：“玕奕世忠烈，义诚显著，孤所钦喜。今以为军谄祭酒，将军如故，进爵为公，禄秩僚属一同开国之例。”

周处三子周札，西晋吴国上军将军。东晋建立后，封东迁县侯，进号征虏将军、监扬州江北军事、东中郎将，镇涂中，未到职就转任右将军、都督石头水陆军事。当时，东晋草创，王氏势力很大，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晋元帝为削弱王氏势力，重用刁协、刘

隗、周顗、戴渊，有意在朝廷疏远王导，在地方提防王敦。于是，王敦在永昌元年（322年）以诛奸臣刘隗为名，起兵武昌，挥戈东向。“王敦举兵攻石头，札开门应敦，故王师败绩。”（《晋书·周札传》）在这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中，王敦因得到了周札的支持，故轻而易举就占据了建康。是时，周札与诸侄周懋、周赞、周缙、周颢合计，一门五侯，并居显位，吴姓士族贵盛莫与为比。宜兴周氏当时握有强大的军事权力，王敦内心非常顾忌。后来周蕙丧母，送者千数，王敦更加害怕。不久王敦患重病，听信挑拨，周氏一门王侯，尽遭杀戮。宜兴周氏一门五侯覆灭后，吴姓士族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严重削弱。

四子周硕，对名利禄位很淡泊，平时他屏迹杜门，与亲戚断绝往来。未几而王敦难作，王侯之家皆遇害，唯他保全性命，周氏香火得以延传。从此，周家子孙都对仕途不感兴趣，到了第八代孙周山图时，因公元450年魏主拓跋焘亲率60万大军进攻刘宋，刘宋政权处于危急之中。周山图为保家卫国，才一改祖宗要子孙世代务农的遗训，毅然应募从军，领白衣队拒魏兵，以功加振武将军。他在萧道成麾下，出谋划策周密透彻，为道成看重。不久，沈攸之谋反，萧道成用周山图掌握的重兵镇压，政府军按照山图的军事谋略，打败了叛军，稳定了政局，为日后萧道成改朝登基奠定了军事基础。

公元548年，侯景之乱爆发，陈霸先在岭南起兵

这个历史教训，在以后的历史朝代直到现代也不是没有再现，仅不过表现形式和内容不完全一样，其实质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以保江南的防御思想则完全一致。这种防御思想也可以说始自六朝而影响甚大。例如国民党政府1948年的军事失败，也曾一度有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与共产党谈判之意图。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决策，祖国南北方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必需把革命进行到底，百万雄师，大

举渡江，迅速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取得全国的解放与统一，所以，研究六朝时期的军事政策，在今天对我们还是有借鉴作用的。

（责任编辑 华云）

入援京师,义兴阳羨人周文育与杜僧明为其前军,攻克兰谿,救援欧阳颢,在南野大败蔡路养,屡建战功。此后,周文育在白口与李迁仕的精锐部队频出交战,生擒迁仕;在豫章击溃侯景将领王伯丑;及至姑熟,又大破景将侯子鉴,平定了侯景之乱,使南朝经济免遭更大的摧残。周文育因功受勋,为智武将军,南移县侯。不久,王僧辩勾结北齐,迎萧渊明回建康,陈霸先乘机诛杀王僧辩。周文育遵照陈霸先命令,挥戈消灭了吴兴杜龛和会稽张彪的势力,加强了陈霸先对京畿东部地区的统治权力。接着,又在芜湖、白城、莫府山等地多次打败徐嗣徽的军队,暂时解除了政敌对京畿西部地区的军事威胁。周文育“频战功最,加平西将军,进爵寿昌县公”,成为陈朝的开国功臣。

综上所述,宜兴周氏在六朝时期,不仅多出将领,而且大都在对外作战和对内平乱的重大事件中,立有战功。尤其是在东晋建立和初期,宜兴周氏的军事实力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责任编辑 华云)



●方志研究●

博采中觅宝

●安徽省萧县志

资料是志书的生命,我们从1982年开始修志时,就抓住这条生命线,确立了要想把志书修好,必须以资料取胜的指导思想。这倒不是我们对志书有什么特别深刻的认识,而是从实际出发,我们都是方志界的新兵,别的事情不敢妄想,广征博采下点功夫还是做得到的。当时也有非薄自己的想法,只要资料丰满,自己本事差些也没关系,总是给后代留下一批资料,后代出了高手,他们能再修。如果现在把该搜集的资料搜集不上来,那就给后代留下麻烦。所以我们自始至终都把搜集资料放在首位。

有了资料,如何用,这是一个复杂问题,秉笔直书不易做到,就是实事求是也相当艰难。因为历史上许多人和事本身就有争议,现在把它载入史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就是把事情确定下来,采取什么方式表述,也有争议。所谓“四新”,其中就有新方法、新体例的要求,章学诚也说过:“文成法定,未尝有定格也。”新方志编写现在还处在探索阶段,往往佳作就在激烈争论中产生。

1. 从“儒俗楚风”,到一文一武

修志之初,我们开座谈会,许多熟悉萧县情况的老人告诉我们:要想写好萧县志,就必须把萧县的一文一武写好,即萧县的特点,一是兵家必争之地,二是教育比较发达。我们查阅资料,从已找到的萧县四部旧志,都有这样的记载:“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挟任节气,好尚宾游,此盖楚风焉!大抵徐兖同俗,故其余各郡,得齐鲁之所尚,莫不贱商贾,务稼穡,尊儒慕学,得洙泗之俗焉!”一个是楚风,一个是洙泗之俗。楚风乃西楚霸王刚强无畏之雄风,洙泗之俗,因洙水在曲阜之北,泗水在曲阜之南,系齐鲁文化和孔子教义的代称,这是两千多年历史上一文一武在萧县人民心中的沉淀,一方水土,一方人物,许多萧县有影响的人物,大都带兵打过仗,而带兵打仗者又多是知识分子。一方人物,又形成一方气度。萧县人民极富正义感,为保卫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反抗剥削和压迫,四境慷慨激昂之士,常执干戈,冒白刃,出生入死,效命疆场。抗日战争中输送万余人枪,数千名优秀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八路军115师代理师长陈光、新四军四师参谋长张震,都曾称誉

传统中创新

总编 吴孝桐

副总编 许振民

萧县为“抗日模范县”。在解放战争中,萧县是淮海战役的中心战场,支前民工达9万多人,全县100多个村庄夷为平地,3万多人丧失家园,在战场上死亡1681人,伤423人。无论战争的次数,规模及激烈程度,都有其突出特点。战火锻炼了此间人们的独特气度,起码是比他方人经了更多磨难,在内心比他方人多了几许恢宏。

“洙泗之俗”,尊儒慕学由来已久,历来社会贤达办学热心,莘莘学子勤学刻苦,常有英雄豪杰崛起于陇亩之间,名流学者愤起于清寒之门。孔门的“七十二贤”中,萧县就出了三贤,当今画坛风云人物刘开渠、朱德群、王肇民、王子云,以及新中国一代哲人孙叔平,文坛名流、民主促进会副主席邓伟志,也多多少少地佐证了萧县重教兴学、代不乏人。萧县人办学是有传统的,在抗日战争中萧县有国民党、日伪和我们三方不同性质的政权,三方都办学。抗战以前,萧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简师,当时入学学生有6000多人,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三方办的小学,学生达3万多人,同时三方都办中学,国民党办了萧县中学,日伪办了黄口中学,民主政府办了萧铜中学。当时国民党军界人物、萧县人王仲廉还在太和办了国立二十一中,由部队护送萧县学生200多人负笈读书,共产党方面萧县人纵翰民在邳睢铜灵地区任专员时,办了联中,也招收不少萧县学生去读书。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是三方争夺人才的结果。现在我们公正评论,在那样的环境里只要能读书,总归是好事。

2. 延伸一文一武,新立两个重点篇章。

萧县上下四千年的历史,便有200多次大的战争在这块土地上展开,平均每20年萧县人民就经受一次战火洗劫。特别是八年抗战,情况更为错综复杂。1个县,3个县政府,10个区,30个区公所。三个不同性质的政权,虽然别的地方也有,但是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展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斗争,在全国尚属少见。在军事上,各有数千人枪;在政治上,不仅各有建制,各委派官员,还各有政党,连汪伪也设立汪伪国民党萧县县党部筹备委员会;在经济上各有封锁政策,也各有补给政策;在文化上各办各的学校,各出各的报刊。此时保公所多是两面政

权或三面政权,不少学校也是两面学校或三面学校,形成一面、两面、三面,犬牙交错、错综复杂的局面。当时是敌、友、顽、伪、我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这是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反映。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集中在一个县的情况是不多的。虽然1927年北伐以前,萧县为北洋军阀统治14年之久,时而直鲁军县政府,时而皖系县政府,时而西北军县政府,城头几换大王旗,但毕竟只是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仓修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向我们指出:同一个时期存在三个不同性质的政权,时间达五、六年之久,而且全面展开了斗争,这在中国历史上再典型不过了,记载下来将对历史学界是个大贡献。我们照此意见编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三方政权》一节,分政治对策、武装配备、经济补给、文化宣传几个方面进行叙述,约一万余字。但方志界有人认为这是史体,不是志体,有违“横排竖写”的原则,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副教授胡惠秋认为,在第一个层次已经横排了,具体到节到目不一定一横到底,未必不可竖写。仓修良教授说得更加明确:我的主张在编写上应该“以类相从,按类编写”,这样是比较符合方志的编写的。我们按照专家的意见坚持下来,获得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赞扬,同时也受到专家的称许。

萧县是全国著名的“国画之乡”,有5位全国一流的画家作支柱,有全县1800名可施丹青之技的群众作基础,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十名颇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阵容比较整齐。国画大师李苦禅题词赞为“国画之乡”,一代宗师刘海粟著文称“龙城画派”(龙城系县治所)。我们设了“书画艺术”编,本来这是萧县“文”的方面的延伸和发展,又是萧县人文化素质一个集中表现,因为是独有的,所以也就最具特色。可是在评议会上却引起了爆发性的意见。总的倾向,认为语言不合志体,抒情多了,内容比较单薄可以补充,但书画艺术志的写法应允许同经济、社会志的写法有所不同,如果也那么死板的写书画,怕也没书画味了。方志在创新,只要述而不论也就是了。后来意见又集中在“龙城画派”能不能成立上,有的同志提出曾向某地两家刊物投过萧县画乡的稿件,提到“龙城画派”,编辑部来信说,全面研究了我们的国家内部同时期的画派,没有“龙城画派”,不予承认。社会上不承认的东西,志书上能不能写?我们请教了方志界的一些专家。他们认为:一个流派的形成,只要有代表人物,有相同或相近的风格,有一个作家群,有一批当代有影响的作品就可以成立,书本

上没有而实际上存在的东西,应当甄录存史。还有的说,不管是“扬州八怪”,还是“新安江派”,名字都是后人起的,当代海粟大师已经把“龙城画派”叫了出来,我们为什么不敢叫?为什么不敢载入史册?所谓没有根据,今天我们记了,就是后人的根据。我们下功夫编写了这一编,不能说已成佳篇,但起码是很有地方特色,很受人欢迎。把“龙城画派”的旗帜打了出来,已得到全国画坛的重视和认可,也为萧县文化史增加一个保留节目。

3、历史越复杂,处理越慎重。

(1)萧县,国民党称“模范县”,共产党也称“模范县”,县志应当如何记载?不记载群众又通不过。共产党称“模范县”好处理,那是指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新四军都称萧县为“抗日模范县”,周围许多县都向萧县学习过全民抗战的经验。国民党称“模范县”怎么收录?我们研究了这方面大量的资料,确定时间为北伐以后,在王公珣、姚雪怀两任县长内,一共八年,至抗战开始为止。大学毕业不久、放让弃出国深造、立志干一番事业的王公珣任萧县县长,治水、兴学,在农业上,引进外国新品种,推广新技术,组织棉花合作社,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老百姓身受其利,成为当时江苏省出名的“模范县长”,有“南钟北王”之誉。人们颂扬他的政绩又是在他调离之后,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至今去了半个多世纪,其政绩仍是人们闲谈议论的话题,但他也有劣绩,就是在他任内几次共产党领导的暴动都是他镇压下去的。我们正准备给他立传,有人却指责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修志怎么能给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县长立传?方志界的专家却颂扬我们有胆识,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本是人物传编写的原则。指责也罢,颂扬也罢,都无补于事,问题是怎么落笔,我们在编纂委员会内展开了讨论,取得共识:只要观点正确,资料准确,事实无误就大胆地写。我们这样做了,由于王公珣的影响大,海峡两岸反映都较强烈,认为我们对待历史是公平的。

(2)萧县有个郭庄,曾是闻名全国的“学大寨”典型,被誉为“安徽的大寨”。如今不仅被人冷落了,由于过去曾以“郭庄”划过线,在萧县人民中间产生过裂痕,现在谁也不愿再提到它而招惹是非。但对修志来说,这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我们请教了有关

的领导,也与有关方面进行了磋商,最后得出一个共识和解决办法,“文革”当然要彻底否定,但田是农民种的,对农民种田的功绩不能不记。郭庄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不能否认,他们的改碱、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农作物栽培新技术等也应当如实反映,农业靠投入,这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应当提倡的,因为郭庄的科学种田是在北京农科院十几位专家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们的经验是吃偏饭产生的,是别的地方学不来的。郭庄作为生产典型还是可以的,问题是当时把它作为政治典型,纳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当做棍子打人,这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只能由个别领导人负责,农民是没有责任的。一个时期对它不作宣传,让它从人们记忆中淡忘,也是对的。但记入史册,就要客观一些,要经得起后代人的推敲。我们这样做了,终于取得方方面面的认可。

经过七、八年修志的实践,我们深深体会到:由于修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领导的重视不行;我们都是新兵,没有专家的理论指导不行;处于探索阶段,没有争论不行;众手成书,没有“一支笔”杀青不行。书出之后,所以在当地受到欢迎,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发行4000多部(共印5000部),收回10万多元,原因还有我们把所能搜集的资料都搜集到,把所能征求的意见都征求到,把所能利用的力量都利用到,全县很多人都感到自己为这部志书出过力,凝结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怀着深厚的感情,以先睹为快。

(责任编辑 华云)

加价回收

《南京史志》精装本

1、因海外读者需求,凡愿意转让《南京史志》1983—1984、1985、1986、1987年精装合订本者,不缺货、不污损,按原订价加价30%回收。

2、因装合订本需要,1990年第五期《南京史志》不缺货、不污损者,按原价回收。

《南京史志》发行部

增设索引 方便利用

● 南通市 何晓宇

一部志书问世后,其应用范围的大小、服务对象的多少、使用价值的高低,都是检验志书质量的重要条件。因此,方志作为经世致用之书,在向广大读者提供“一种有系统的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在检索方法上给予更多的便利。这样才能使方志真正地走向社会,面向大众,适应和满足各个层次、各种对象的各样需求。

然而,浏览新版的诸志,检索方法仍然是沿袭旧志,使许多读者面对洋洋百万字厚厚一大本,不得不望“志”兴叹,客观上大大影响了志书的功效。笔者以为,新方志应注意吸取其它工具书“多开门”的经验,增设翻检索引,以求“快速、简便、准确”。其设想如下:

(一)分类索引

把同一类型和系列的内容按时间的先后顺序集中归纳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类,编成索引。这样结构上分门别类,内容上纵向记载,使之线索清晰,层次分明。

(1)把大事记按类集中,顺时排列,然后统计其总数,注上页码。

例:类别	总计	页码
军事	45条……	5、7、9、14、17、……
文化	68条……	7、8、11、15、17、……

(2)把人物传综合归类,以序排列,注上页码。

例:类别	姓名	页码
科技	张凡明	1029
	李建	1030
文艺	郭海涛	1012

(3)在原篇、章、节的基础上,添补上第四个层次“目”,注上页码。

例:《萧山县志》
第四编 农业

……

第六章 土特产 258

……

第三节 瓜果 262

一、水果 262

1、杨梅 262

2、青梅 262

3、柿子 263

4、樱桃 263

(二)笔划索引

把志书中所重点反映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事物(土特产品,科技成果,文化设施,名胜古迹等等)和人物传中的人物姓名,以笔划为序,编成索引。这样,既能体现一方地方特色,又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例:四画	页码
文峰塔	1543
文蛤	1211
王氏保赤丸	1486
天生港发电厂	2052

(三)资料索引

把同一类型的系列的资料归类编索引,主要是学术论文,资料来源,统计资料等原件,目的是为领导机关决策投资,专家学者研究考证,广大读者对照参考提供指引。这种方法具有容量大、跨度长、涉面广的优越性。

此外,还有图表索引等,《萧山县志》对此已作了可喜的尝试,这里不再赘述。以上仅是设想,是否可行,效果如何?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责任编辑 华云)

刘宋政权的崛起与北府兵的兴亡

● 江苏丹阳市 杨在年

一、北府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地区沦为各族统治者互相厮杀的战场。在阶级和民族双重压迫下，大批人民纷纷南下，大部分世家大族率其宗族，乡里、宾客和部曲南渡江左。他们凭借政治和军事的权势，迅速地在江南建立起以他们为核心的东晋政权。由于北方流民的大量流入，直接关系着东晋统治的安定与否，于是，在大江南北设置了很多侨州郡县。在东晋初年的流民中，以徐州、兖州及青州南下的侨民为最多，所以东晋政权首先在京口（镇江）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后来迁往江北广陵）。以后，其它郡县的侨民又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致使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侨民，人多且杂。虽经东晋的几次“土断”，但到刘宋时南徐州仍“领郡十七，县六十五”。南渡人口和侨置郡县大量集中南徐州，表明这一地区在东晋、南朝政权中占有显要地位，因而名人辈出，“艺文儒书，斯之为盛”。这一地区的人民长期保留着强悍好斗的心理传统，加之孙吴政权系依靠土著大族的力量割据东南一隅，实力与敌国曹魏相差悬殊，不得不以武治国。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树立和引导，使尚武精神在本地区得到凝聚和强化。所以，恒温常赞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①至刘宋、萧齐两家帝室皆出此地实非偶然。兵源充足，尚武精神又影响到兵源素质和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同时江南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东晋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促进流民农业生产，加之交通和造船业的发展。这就为北府军团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以京口北府为代表的强大军事集团就是在这样高水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京口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因是京都建康的门户而得名，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地带，自古为兵家必争。因而孙权在迁都建业之前，预先为保卫新都而在此建治所，亦称“铁瓮城”^②。三国以后，“铁瓮城”一直成为京口军府发号施令之所。东晋时又在其外增筑外城，流亡京口的世家大族郗鉴、王恭都曾先

后坐镇此间，并“更为营缮”。近年，镇江六朝城址的发现，也证明此城设有内、外城，内城为孙权时的“铁瓮城”，外城则是东晋初年修造的。由于京口所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乃是北府军赖以生存的根据地。

东晋政府在侨置很多州郡县后，侨置郡县的名称朝夕更改，地域时分时合，搞得“紊乱无纪，名实俱违。”于是，多次实行“土断”，通过整理户籍，将南迁流民编制在固定的土地上，以便政府对侨旧士民实行统一管理。“土断”对北府兵产生影响的有两次。一次是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年）“土断”，这次土断取消侨州郡县的“免调役”等许多优待权。由于进行得比较彻底，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多，而以后的组建北府兵，就是在这一次土断的基础上进行的。第二次是东晋末期，刘裕为了北府军团利益，庇护自己的发家地，遂规定：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在晋陵郡界内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皆依界土断。经过这次土断，“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③。这就使政府剥削对象增多，北来侨民不得再享受优厚的待遇，但唯有北府军团的根据地例外，北府军团在东晋及刘宋王朝的特殊地位不言而喻。北府军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从出现至消失都有其特殊的原因。

二、北府军的建立及军政

宁康元年（373），恒温死后，长江上游的桓氏势力仍很强大，对东晋朝廷时有威胁。执政的谢安在安定桓氏势力的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军力，因为谢安虽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但无军事实力制衡桓氏和应付前秦的威胁。于是他选中其侄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筹集军事力量。魏晋以来，驻屯地方的都督军衙称军府。东晋南徐州刺史多兼北中郎将，于是南徐州被称为北府。由南徐、南兖两州侨民组成的军队，称为北府兵。筹备北府兵借以充实长江下游军事力量，防止上游方镇的举兵叛乱，实为谢安制约桓氏势力发展的战略举措。

关于北府兵的史料，记载较为详细的有两条：一是《晋书》卷八四《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琊

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竞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入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北府兵。”第二是《资治通鉴》卷104孝武帝太元二年：“玄募骁勇之士，得彭城刘牢之等数人，以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时号北府兵。”这两则史料说明北府军实行的是募兵制。在招募中，将领为了多罗致兵士，多采取宽容手段，因而一般适龄男子皆可自愿服役。但到后来，由于长年征战，就实行强制募兵，如毛璩曾为司马恬、司马时（北府将员），将逃亡者都补充进“北府军”。招募的兵士带有无偿义务的性质，他们从军可被免除一系列租役减轻家庭的负担。北府兵虽然作战勇敢，但军纪不太严明，如北府军攻占山阴时，刘裕放纵军队去烧杀抢掠，造成东土“郡县，城中无复人迹，月余乃稍有还者”。^④从一侧面反映出北府军发展至后期军员素质已明显下降。

北府军内还实行奖励制度。自刘裕击败孙恩、卢循后，执政的桓玄就指示“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⑤北府军除陈步兵外，还设有水军、骑兵诸兵种的协同配合。刘裕北伐，王镇恶统军乘船自河入渭，兵至渭桥，令士兵饱食登岸后，就激励士兵说，离家已万里，船、粮已逐流而去，唯有死战可立大功，士卒振奋，一举攻克长安。这就是水军与步兵的配合作战。此时，还有骑兵与步兵的配合。如卢循进逼京师“敬宣分领鲜卑虎斑突骑，置阵甚整，循等望而畏之”。^⑥另据《宋书·朱龄石传》云：卢循“选致死之士数千人上岸，高祖遣龄石领鲜卑步骑过淮击之，率厉将士，皆殊死战”。由此可以看出，北府兵成员除汉人以外还有鲜卑兵。

北府军还有一特点是：谢玄主要是募将而不是募兵，因此在彭城刘牢之后开列的都是将帅的姓名。因为当时世家大族南下时，率其宗族、乡里、宾客、部曲南渡江左，本身就有一定数量的兵员，如祖逖北伐时就收随他南下的部曲数百家为兵士。所以说只要有将帅的才能，无兵也会有兵，同时京口地区众多的流民就是充足的兵源。出身寒门庶族的将士军人，要出人头地，也只有从事武事，才可能有进身之阶。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参加“北府兵”，使北府兵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即使有人员复杂、抢劫等军纪不正现象，北府兵还是能保持常胜。他们为了取得军功，披坚执锐，不惜身躯，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打出了军威，压倒了一切地方军队，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战争和东晋政权内部的争夺战中异军突起。

三、刘牢之的失败与刘裕的崛起

刘牢之，原籍彭城，父建，“有武干”。其家族“世以壮勇称”。^⑦属将家出身。他是北府兵的首批将帅，在淝水之战中，他作为前锋，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后，刘牢之又带领北府兵英勇作战，收复了徐、兖、青、司、豫、梁六州的广大土地。谢安在淝水之战后声望极高，遭王室排斥，不久病死。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宰相，专横跋扈，酒色无度。隆安二年（398年）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联合在京口起兵讨伐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迎战，元显采用拉拢刘牢之的手法，劝其倒戈反王，许诺事成以后让牢之代恭出任南兖州刺史，并且“事~~刘~~，即以卿为北府。”牢之杀恭之后，由三品辅国将军转为三品前将军。这时的北府兵虽已成为高门士族争权夺利的工具，但已表明北府军团已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北府兵只有刘牢之才能控制，而决定时局又非北府兵不可。在这样的历史转折时期，刘牢之却是缩头缩尾，不知所措，错过了历史给予的机遇。战功使刘牢之提升很快，但引起朝廷内外的不满与妒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刘牢之看中了孙无终冠军将军府的司马刘裕。他与刘裕同宗近邻，于是调刘裕到自己的前将军府作参军。当时掌握实权的皇族司马元显在平息王恭叛乱后，隐隐感到北府兵日后难以控制，便想建立一支由他掌管的新军。于是，他下令征调江南诸郡从奴隶成份解放出来的佃客，移置建康为兵，称为“乐属”。这一举动搞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⑧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十月，五斗米道首领孙恩、卢循以此为导火线率领道教徒起义。沿途得到人民的响应。十一月，朝廷命卫将军谢琰、前将军刘牢之率北府兵东征。在对孙恩起义军的镇压过程中，逐渐锻炼成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尤其京口之战，以少胜多。建康赖以保全，使刘裕名声大振，朝廷遂提拔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并为他跻身于上流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桓玄在起兵讨伐王恭时，趁机吞并了殷仲堪，自己兼领荆、雍二州，封锁长江，虎视建康。元显起兵讨伐桓玄，令刘牢之为前锋，刘裕力劝牢之积极迎战，但牢之目光短浅，不能综观时局的发展，无法自如地运用可能决定时局的北府兵。实际上此时的北府兵权已经完全转移到低级士族手中。但是刘牢之却迟疑不决，延误战机，以致最后自缢身亡。刘牢之死后，桓玄又先后斩杀了北府将领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

新穀是南京近代机器纺织业的开端

● 徐金元

南京,自东吴起,素以丝织业著称于世。惟棉纺织业,成为机器纺织工业,落伍甚远,直至1942年新穀染织厂之创立,始为南京近代机器纺织工业之发轫。

据《中国经济志》记载:南京匹头多由上海、南通、无锡输入,本地自织者,仅有公正、源成、冯晋记三厂,年出各种厂布,不过八千匹,且货色粗劣,市面不甚畅销。^①经查考:原来上述三厂创设于清末民初,均系木织机,乃人们常说之脚踏手拉的木机,生产丝光布与柳条布,质量自然低劣,全年营业不过27000元;从规模看,冯晋记是15架木机,其余两家均为20架,共计55架木织机,三家厂的职工总数为89人,资本总额为5500元,纯属乎工作坊之厂所。此外,织布散户较多,每户约有木织机三、四张,全市

起动机数约三四百架,织成品送厂布庄兜售。足见,民国前期的南京棉纺织工业,仍处在手工工业阶段。

1941年安徽及江苏北部布匹奇缺,尤其色织布价高质次。这一信息很快传到无锡新穀染织厂副总经理朱光华耳际,他便求南京昇州路、秦状元巷,找万勋记绸布店老万勋臣商议,认为南京位于扬子江畔,水陆交通方便,是沟通皖苏的要冲,物产丰富,商市汇集,“唯工业素不发达,市销各货大都仰求于沪锡各地,”^②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决定在南京办厂,乃以伪币45000元接盘白下路208号一新染厂,全部机器设备,计有2只小型卧式锅炉,2只染缸,一部9滚筒烘车,原是个洗染绸布的作坊,系浙江籍李绍卿所创。抗战中弃厂出走,故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应用。惟朱光华创业志坚,知难而进,历经四个月之

军竺谦之、高平相竺朗之以及冠军将军孙无终等。由于北府首批将领均遭杀戮,北府大权转落桓玄手中。

桓玄诛杀北府旧将后,继续加紧分割北府兵。桓氏兄弟兼领徐州、兖州刺史。刘裕与北府士卒的联系则被切断。刘裕从刘牢之的失败中得到教训,于是他暗中结聚力量,待机东山再起。在长期的戎马控轡中,他已经学会了冷静观察、审时度势的本领,决不轻举妄动。如刘牢之欲奔广陵起兵时,刘裕断定很难成功,便对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说:“镇北(即牢之)去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必能守节北面。我当与卿事之;不然,与卿图之。”^③桓玄一度保留东晋安帝的皇位,鉴于这形势,刘裕不敢立即同桓玄决裂。有一次刘裕随桓脩来建康办事,当时北府宿将死散殆尽,因而刘裕更为引人注目。刘裕察言辨色,巧妙地应付有篡晋野心的桓玄。桓玄最担心北府兵,听到刘裕“晋家微弱,民心久移。乘此代君,有何不可”这番话,如吃了定心丸,便加快了篡晋的步伐。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代晋称帝,刘裕等待的时机已到,便在京口起兵。在当地无基础的桓氏,很快遭到惨败,刘裕取得了胜利。

刘裕起兵所率,实乃再建之“北府兵”。因为桓玄将北府旧将尽加杀戮,所剩北府兵也转入诸桓手中。虽然起事的兵将皆世居京口,其家庭或多或少与以前的北府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但他们与北府名将刘

裕是无法比拟的。刘裕南征北讨,直至代晋建宋,依靠的是自己组建的北府新军。刘裕以北府新军之赫赫武功,提高自己的威望并尽揽人心,在消灭异己者刘毅、诸葛长明等的同时,先后两次北伐,灭南燕亡后秦,收复青、徐、兖、豫、司、雍六州,开东晋之最大版图,终于公元420年,踌躇满志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为宋。

于是他对赖以起家的发祥地恩宠有加,自元兴三年起兵反桓玄以后的十三年间,刘裕都自领徐州刺史、都督。土断实行,京口、晋陵例外,这样的特殊地位,保证了北府兵兵源。刘裕还规定京口要地,只有宗室近戚才能居住,以后萧道成篡事,亦赖北府之力。

萧齐以后,北府的影响大不如以前,尤其502年梁武帝下令“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京口的特殊地位被取消,军事优势也相对减弱了。

(责任编辑 惠 兰)

注:

- ①《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南徐记》;
- ②元《至顺镇江志》引唐人《润州图经》;
- ③⑤⑥《宋书·武帝纪》;
- ④《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三年;
- ⑥《宋书·刘敬宣传》;
- ⑦《晋书·刘牢之传》;
- ⑧《晋书·晋文三子传》。

艰辛整修,于1942年4月10日正式投产,定为南京新毅漂染厂,开创南京机器染整工业之先河。该厂以硫化元为染料,“金陵塔”为商标,生产元色细布,销售全市,深受各方称道,每日工作15小时,尚供不应求。各布店商号,均以坯布委托加工代染,亦相继不绝。

但好景不长,开业才两月有余,汪伪当局却实行统制棉布运输,切断无锡、常州坯布来源,而南京又无生产坯布厂家,原经营坯布之洋行,也因统制棉布而骤减,致使新毅厂面临断炊之虞。是时,主持该厂经营生产的张学文、黄毓昌、刘兆元等人,遂向无锡两位正副总经理汇报,朱光华当即决定再开办织布工场,以达自织自染之目的。便在五马街牙巷(现为南京第二印染厂厂址)建造厂房。同时,向无锡同新布厂购买织机34台,新毅一厂分出20台,共计54台织机,前后花5个月时间,于1943年5月25日,织布工场正式投产。由此,该厂有织有染,便更名为南京新毅第二染织厂。

新毅初创规模虽只有54台动力织机(其中有多臂织机20台)和4台卷染机,实乃南京市近代机器纺织工业之发端,改变了“南京工业,不甚发达”^{〔3〕}之局面。1944年起,又先后建立起新安、益来两家小型纱厂,计有纱锭4100枚;^{〔4〕}1947年,英商和记洋行,利用日本部份战争赔款,在其蛋品、肉类加工厂内(现为南京肉联厂所在地)开办5000锭的毛纺厂,1948年投产,日产粗毛线300公斤左右。这样,又填补了南京市近代纺织工业中棉纺与毛纺业的空白。

新毅厂染部生产万寿图元斜、金陵塔元细,织部乃生产条府和各种线呢,尤以威力呢、奇罗呢名噪一时。产品行销苏北、皖南,获利甚厚。1945年,该厂再次扩充规模,新增仿日丰田式织机18台,卷染机4台,20锡林卧式烘燥车1台及45尺拉幅车1台,男女职工有146人。从而使产量、质量又有新的提高,织部日夜两班,月产量高达6000匹,染部单班生产,月产量可达20,000匹,产品远销鲁、皖、豫。

1948年,淮海战役炮声连天,职工人心不安,工

厂只得停产解散。

1949年4月,南京解放。5月2日起,新毅染织厂在28名留守职工的努力下,染部率先复工生产,仅三天时间,染出元布400余匹,其中为商号代染加工200匹之多。5月10日,该厂首先与中国贸易总公司南京第二分公司(后改称花纱布公司)洽谈订货业务,签订了4000匹布的订货贷款协议,并得到人民银行旧币2000万元的货款,使解放前被遣散回乡的职工全部回厂,恢复染、织两部生产。9月底,奉工商局之命,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染部职工连夜清洗染整机械设备,加紧生产,染出500匹、黄布供应全市制作国旗。10月1日开国大典这天,全市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乃是新毅厂职工之一份辛劳。

但是,由于建国初期,战火未熄,交通不畅,经济不振,市场上出现(棉)花贵于(棉)纱,纱贵于布的状况,致使每生产一匹布,要亏损旧币3397.02元(即0.3397元)。〔5〕加之资金短绌,负债甚巨,新毅公司只得将南京二厂售交给人民政府。1951年4月开始接交,5月1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委派副秘书长谢群、厂长张士雄到厂正式宣布新毅厂收归国有,易名公营(即地方国营)南京染织厂〔6〕(现为南京棉织厂),成为全市纺织工业系统中第一家国营企业。工厂回到人民手里,得到新生与发展,旋即易地扩建具有200台国产自动织机的新厂,1952年4月首先投产100台,迎接“五一”;接着9月份,再投产100台,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周年。至此,200台自动织机全部投产,这在全市乃至全省,均属首屈一指,且为南京市开拓现代自动化纺织工业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 华云)

注:

〔1〕《首都志》下册;

〔2〕《新毅档案》

〔3〕《中国实业志(江苏省)》;

〔4〕《南京简志》;

〔5〕1951年5月1日《新华日报》。

东晋的西府及其战略地位

东晋作为一个处于南北对峙,战火连绵状态下的封建王朝,军府有着重要地位。本文拟对著名军府之一的西府作一些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西府考

关于西府得名缘起,前人颇有异议:

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以地理方位为规矩,强调豫州治历阳,历阳为西府。

《资治通鉴》晋安帝隆安二年(398)胡三省注:“晋以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豫州治历阳,在江西,故云北带寇戎”。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西府”条:“晋咸和四年(329)侨立豫州于历阳,置军府于此,蔚为重镇。以在建康之西,故称西府。今即安徽和县也。”

清人钱大昕,今人邓安生认为西府得名在于豫州都督以“西”为号。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庾楷传》:“是时楷以西中即将领豫州刺史,镇历阳。考南渡以后,豫州或治历阳,或治寿春,或治姑孰,而都督例以‘西’为号。……西府、北府原无定所,但以当时军府之号为目耳。”

邓安生《东晋四府考略》大体赞同钱氏意见,并引《宋书·州郡志》豫州治所记载,证“西府的治所不可能固定在一处”,“若以西府专属历阳,则有乖于史实”。

上述诸议,俱有偏失。首先,诸说俱直指豫州为西府,实际上是误将豫州等同于西府,这就淆乱了东晋军府与州、郡之体制。东晋秉承西晋体制,州郡本不领兵,文武分职,武备专属;而军府与州郡治辖范围并不相同。因战争频仍,事以权变,始以军府长官兼任州郡,形成所谓“以州贴府”的状况。王敦以元帅进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自选置兼统州郡焉。”^①晋成帝咸和年间,温峤曾为豫章治理事上疏,认为“今以州贴府,进退不便,且古镇将多不领州,皆

以文武形势不同故也。宜单选刺史,别抚豫章,专理黎庶”^②未获许行。以后,“因籍既久,遂以常体”。^③因此,就西府与豫州关系而言,豫州仅是所贴西府之州,西府作为军府署事决不限于豫州,豫州不等于西府,而且史无“豫州都督”之官号,以豫州径论西府,实为主次倒置。

其次,钱氏、邓氏指出西府治所非专属历阳,揆诸史实,是正确的。但认为西府得名在于所谓“豫州都督”例以“西”为号,却是难以成立的。且不要说西府长官并非都以“西”为号,如刘毅即以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五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将军,常侍的身份坐镇西府,并无“西”字;而且,东晋各朝往往同时有几个带“西”号将军者,如成帝时有征西将军祖约、征西大将军张骏、征西将军庾亮、平西将军赵胤。如果但以当时军府之号为目,岂不要同时有数个西府并称?实际上,西府得名在于西府所辖地域为建康之西(这一点,从指认地理方位看,胡三省等是对的,但其限指历阳,则言之未当)。史书屡言西府官长“受任西藩”,^④就是西府以拱卫京师西陲而为人专称的明证。

应该指出,探讨西府,必须了解西府名称内在涵义的变化,否则,将易产生误解。

考诸史籍,东晋成帝前,曾将以荆州为中心的军府称之为西府。《晋书》卷76《王舒附子允之传》谓:舒为荆州,允子随在西府,“王舒本为王敦之亲信。王敦自东晋立国后。”专任阍外,手控疆兵”。^⑤曾领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后转荆州刺史,坐镇武昌,明帝时,为专制朝政移镇孰,而以从弟王舒为荆州刺史,经营军府根基。因此,是时所谓“西府”,实指以王敦为首的军事府署。王敦军府以荆州为本营,而荆州为“国之西门”,故史以“西府”称之,然而,王敦军府署理六州军事。实挟全国兵权,故不具有特定军府之意义。

具有特定意义的西府,实起于成帝咸和四年(329)。是时,独擅兵权的王敦已死,盘据寿春的祖约、历阳的苏峻刚被消灭,各地统旅,重新分治。外戚

庾亮被命为平西将军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并以刚侨立于江淮之间的豫州贴附其军府，以其兼任豫州刺史，镇芜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豫州为中心，具有独立防区，独立府署的军府。以后，因军事之需或长官迁次，各军府署理范围虽屡有变化，但以豫州为中心的军府却始终存在，并为时人称之为“西府”。于是，西府有了特指意义，时人亦不再因荆州为“国之西门”，而将所在荆州之军府视为“西府”。

二、西府的战略地位

东晋西府以豫州为中心，其署理军事范围因时势屡有变动。不过考诸史籍，其军府官长大多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诸军事，如庾亮“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桓伊“督豫州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①桓石虔“以冠军将军，监豫州、扬州五郡军事”。^②刘毅“都督豫州、扬州之淮南、历阳、庐江、安丰五郡诸军事”，由此可见，西府军事领区盖以豫州、扬州之江西诸郡为常。

豫州、扬州之江西诸郡抵淮跨江，东逼建康。西距江州，名川四带，既有舟楫之利，又有重险之固；且为京师建康西藩，阻断南北，控扼东西，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此，西府的进退得失对整个东晋军事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就东晋的政治、军事形势而言，西府的军事战略任务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抗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并积蓄力量，适时北伐。

东晋立国江左，划淮而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凭借悍将强兵时刻觊觎江南，对东晋政权构成了极大的军事威胁。西府凭陵北方，跨淮即至中原，与中原首府洛阳距离甚近，所辖寿春自古就是交通淮南北的军事重镇，历阳更是屏障建康的江边要塞。因此，西府成为抗御北方南侵，保障南方安全的军事要区。东晋立国后，北方胡马不断南下。从后赵石勒至前秦苻坚，北方兵马屡次攻打寿春，甚至直冲历阳、耀兵江岸，威逼建康。如仅成帝统治的十七年间，北方石氏政权就三次遣兵攻打寿春，咸康元年(335)四月，石季龙更率众南寇历阳，临江而旋。在北方胡马南侵中，西府将士折冲于江淮之间，或临淮坚守，或屏江拉锯，在保障南方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西府治所不断移更，或寿春，或芜湖，或历阳，或姑孰，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府抗御北方胡马的军事动向。

在抗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南侵的斗争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发生的淝水之战。对于这场关系到东晋政权生死存亡的著名以少胜多的战役，人们普遍注意到东晋北府兵的显赫功绩，而忽略了西府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事实上，这场战争就发生于西府防区，而东晋指挥这场战争的军事统领谢安之所以能够指挥若定，胸有成竹，除了掌握了一支有谢氏家族亲自操练而成的精锐的北府兵外，与谢氏家族在西府有着深厚根基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自穆帝以来，西府由谢氏家族多年经营，谢尚、谢奕、谢万相继都督西府，所以，谢安就能以都督扬、豫、徐、青、兖五州，幽州之燕国诸军事的身份统领西、北两府，使西、北两府协调行动。从军事动向看，谢玄、谢琰率北府兵冲锋于前，谢安当以西府兵殿阵于后，否则，万一北府勇士涉淝水失利，岂不要全线崩溃？只不过，北府兵一战得胜，声名大噪，史不绝书；而西府殿阵之功则湮没无闻，史迹不彰了。

纵观东晋，朝廷并非一味退守，苟全江左，不图恢复中原，实现一统大业。东晋政权在固守江淮的同时，亦积蓄力量，不时主动出击，兴兵北伐。由于西府所处的地理形势，北伐亦必然成为其重要的军事任务。

江左之国北伐，历来有三条路线：东路，自淮泗入齐、鲁；中路，自寿春夺中州；西路，自襄阳趋关中或河南。其中，中路呼应东西，震动南北，为北伐之冲要，东晋西府正当中路进取之地。所以每次北伐，西府都膺当重任。如成帝年间，庾亮意欲开复中原，除亲自移镇襄阳外，还派亲信将领毛宝、路永等统领西府，习练士卒，并上疏请进据淮泗，寿阳，准备数路进发，齐逼河洛。又如穆帝年间殷浩北伐，殷浩以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身份统各路军旅次于寿阳。“以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开江西陂田千余顷，以为军储”，^③使西府成为北伐基地。

其二，防备上流权臣兴师东下，藩卫中央政权。

东晋开国于江南，建都于滨江之建康。于是，横贯东西的长江就成为沟通中央与外藩的重要通道。穆帝永和八年(352)前，益州尚为李氏成汉政权所掌握。以后，成汉政权虽被东晋消灭，但北方胡马从荆州突进南下的威胁始终存在，因此，荆州地区就成为上防成汉，北抗胡马的军事要区。东晋政权不得不在此常年集结重兵，这样就形成了上江军力偏重，下江武备不足，内外失衡的政治、军事格局。在这种格局之下，上流权臣极易挟武力自重，威逼朝廷，甚至兴

张大千与《韩熙载夜宴图》

王能伟 卢海鸣

1990年12月20日,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特种邮票,票面图案是我国古代名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是五代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在金陵南唐宫廷翰林图画院所绘。该画为绢本,纵28.7厘米,横335.5厘米,工笔重彩。画中主人公韩熙载,字叔言,淮洲北海(今山东潍坊)人,出生于北方一富家,少负才名,后因北方战乱,父亲被杀而逃至金陵,归顺南唐。韩熙载善为文,工书画,江左称他为“韩夫子”。他屡受南唐先

主李昇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的赏识;官至中书侍郎、光政殿学士承旨,李后主甚至有意授他为相,但韩熙载感到“世事日非”,无意为官。因他目睹后主“颇疑北人,多以死亡”,便竭尽家产蓄伎乐近百,纵情声色,以“避国家入相之命”,以免杀身之祸。韩熙载的住宅在金陵城南门外聚宝山坡的戚家山凤台里(在今雨花台山坡),环境幽雅,景致迷人。《韩熙载夜宴图》反映的是韩熙载为婉拒南唐后主李煜征召他为相而巧妙设

计的烟幕。宫廷画师顾闳中受李煜指派混入韩宅窥探,“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李后主看到韩熙载夜宴乐舞,灯红酒绿的情景,终于打消了起用韩的念头。全画现存五个段落:(1)《听乐》,表现韩氏与宾客们一边宴饮、一边欣赏乐伎、教坊副使李嘉明的妹妹弹奏琵琶的情态;(2)《观舞》,展现韩氏不顾高贵身份,亲自为爱伎王屋山击鼓伴奏的场景;(3)《歇息》,描绘韩氏一边与众歌伎及妻妾调笑言情,一边在床榻上

师顺流进击,兵临建康。实现独擅朝纲。为此,东晋朝廷总试图削弱上流权臣威势,进行军事牵制,遏阻上流权臣可能发动的兵变之师。西府地当上下江之间,芜湖、姑孰、历阳俱为沿江之重镇,是控扼江道的咽喉,藩卫建康的屏障,所以,在朝廷权力的倾轧之中,中朝总想控制西府,使其担负起藩卫中央政权的重任。

东晋立国之初,权臣王敦领兵荆州,震逼中外,刘隗“以王敦威权太盛,终不可制,劝帝出腹心以镇方隅”。^①其时,元帝即试图在寿阳、合肥一线集结军队,防备王敦,以征西将军戴若思领兵镇合肥,配之以散骑常侍王遐为军司,镇历阳。然而,王敦迅速举兵。戴若思等未能立足。以后经平定王敦,消灭祖约、苏峻,在江淮间侨置了豫州,于是,当朝廷分置统旅时,在豫州、扬州之江西一线设置了西府。西府设置后,在一般情况下,朝廷力图保持其独立地位,不为上江将军控制。简文帝时,西府官长谢奕卒后,王彪之谏奏不可使桓玄继任,以为桓玄已居上流,若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将尽入一门,对中央政权不利,就反映了东晋朝廷以西府牵制上江,防备上流权臣兴师的战略意图。

然而,正是由于西府的战略地位,上流权臣在时机成熟时,亦总是企图控制西府,或以亲信统领,或亲自坐镇,监领中朝。成帝时,外戚庾亮都督西府,权倾中外,陶侃卒后,迁镇武昌,仍以西府解授亲信。废

帝、简文帝年间,桓温声威浩大,为操纵朝政,擅行废立,曾率舟军进合肥,并以其子桓熙统领西府。后又亲自移镇姑孰,恃势逼宫,陵振皇纲。安帝时,桓玄篡逆,曾亲领西府,出居姑孰,并“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②这些上流权臣力图控制西府的史实,从反面证明了西府藩卫中央政权的战略地位是如何重要。

由于西府具有内外两方面的重要战略任务,东晋都督西府的人选都非等闲之辈,举凡西府历任官长,庾亮、庾翼、谢尚、谢奕、谢万、桓冲、桓熙等。或为朝廷外戚,或为名门大族,或为兵威显赫之权臣,这又给西府的战略地位留下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责任编辑 惠 兰)

注:

- ①⑤《晋书》卷98《王敦传》。
- ②《晋书》卷67《温峤传》
- ③《晋书》卷85《刘毅传》
- ④《晋书》卷81《桓伊传》。同书卷76《王彪之传》、卷85《刘毅传》、卷77《何充传》俱有类似之言。
- ⑥《晋书》卷81《桓伊传》
- ⑦《晋书》卷74《桓石虔传》
- ⑧《晋书》卷77《殷浩传》
- ⑨《晋书》卷69《刘隗传》
- ⑩《晋书》卷99《桓玄传》

边洗手的情状；(4)《清吹》，写韩氏不顾身份，散衣坐赏女伎吹奏管乐的场面；(5)《散宴》，描绘宴会结束时，众宾客与女妓调笑戏谑和送行的情景。

这幅丈余长的画卷中，画家别具匠心地运用屏风和床榻作为画面的间隔和转折，达到既分隔又连贯的特殊效果，美术界誉之为“连环画式”的长卷。这幅名迹，结构布局巧妙别致，构图安排疏密自然，设色浓丽而富有变化，用笔细润而圆劲流畅。特别是细节描写真实准确，所画衣冠文物、樽俎灯烛、帐幔乐具，都足以成为历史学家考据的好资料。入画人物均可一一辨认，有人指出，画中除主人公韩熙载外，尚有太常博士陈致雍、门生舒雅、紫薇朱锐、状元郎粲、名僧德明、教坊司李嘉明及其妹、歌伎王屋山等。

这幅名画得以完整保存，跟艺术大师张大千有着密切关系。

《韩熙载夜宴图》在五代人物画中是一幅杰出的作品。最早藏于宋宣和御邸。宋亡后，流落民间，始有王振鹏的摹本传世，而真迹不传。到了清代，宋人摹本《夜宴图》又传进宫内，为皇家御藏，盖有乾隆题署的印章。辛亥革命后，溥仪出宫时携带了大批文物珍宝，其中也有此卷。抗战胜利后，溥仪的伪满洲国垮台，《韩熙载夜宴图》等大批名迹墨宝散落

民间。

那么张大千是如何得到这幅珍宝的呢？据张大千在上海收的一位对此事知之甚详的学生曹大铁回忆说：抗战胜利后，张大千来到北京，“抵京后半月，有一素不相识者登门，邀请为之审定名画，从之。即登来人黑牌小轿车，行向颐和园西北山区，车行约40余分钟，始停下，导入一茅屋内，先与吾师坚约，如不欲购置或议价不合，则坚请保密，违则以性命相拼。悉如其议”。来人于是在煤油灯下展出顾闳中的《夜宴图》、董源的《潇湘图》以及宋人《溪山无尽图》等画卷，让张大千鉴定。大千爱不释手，表示欲买。来人“索价二千两，商之再，以七百两成交”，其中《夜宴图》与《潇湘图》作价五百两，余卷二百两。就这样，张大千花重金从一个来路不明的藏主手中买下了这件稀世之宝。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与董源的《江堤晚景》、《潇湘图》等三幅南唐名迹，被张大千自诩为“大风堂”的镇堂之宝。1948年，张大千在为徐悲鸿《八十七神仙卷》写的“跋”中说：“十二年前，……曩岁，予又收得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雍容华贵，粉笔纷披。……善并世所见唐画人物，唯此两卷，各尽其妙，悲鸿与予得宝其迹，天壤之间，欣快之事，宁有过于此者耶！”表达了收藏到《夜宴

图》后的欢快心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幅名迹曾被张大千携到印度，五十年代初又通过香港的一位古玩经纪人转售归还祖国，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据有关资料记载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大千携眷去国离乡，旅居印度西孟加拉邦的著名避暑胜地大吉岭，旋即又迁居香港。五十年代初，张大千在大陆的好友叶浅予与徐悲鸿曾联名写信邀他一起重返敦煌。大千托印度的一位学生捎信回来说，有些债务需要料理，暂时还不能回来。时隔不久，他决定迁居南美洲的阿根廷，为置办一笔搬家费用，他忍痛从行篋中取出三件钤有“别时容易见时难”、“大风堂珍玩”、“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收藏章的名迹，其中一件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一件是宋人册页，还有一件就是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他将《夜宴图》连同另外两件名迹交给香港的一位古玩经纪人，并告诉经纪人说，优先转让给大陆。消息传到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耳中，郑振铎当即派人去香港接洽，终于以四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拍板成交，使《夜宴图》连同另外两件从故宫散出的珍品，又完整无缺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

(责任编辑 莽 明)

城市环境卫生的卫士

——南京鼓楼区环卫所巡礼

● 吴纪岫 丁尔辰

古城南京西北侧的鼓楼区,原是以山林、菜地、沟塘为主的城区。现在是鳞次栉比的楼群多,高级宾馆、饭店多,党政军机关多,大专院校、大工厂多的新城区;全区陆地面积 17.24 平方公里,人口 41.6 万,是全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环境卫生成了该区人民生活和中外宾客最敏感的难题。

成立于 1956 年的南京鼓楼区环卫所,是该区环境卫生的卫士。因为长期以来,全民事业单位一直靠国家拨款过日子,面目陈旧,发展迟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南京城市建设事业迅猛发展,特别是近几年来,该所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实行了“两包双挂”的经济责任承包制为主要形式企业化管理,所容所貌焕然一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刚走进该所大门口就看到镶嵌着黑色的大理石,镌刻着由原南京军区政委、中顾委委员、著名书法家杜平题写的“鼓楼区环境卫生管理所”十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花园式的所部拥有 444 名职工,担负着全区 23 条主、次干道,96.53 万平方米和 122 座公共厕所的清扫保洁任务;还承担年均日运类便 182 吨、垃圾 409 吨,夏季瓜皮垃圾最高峰 712 吨的日产日清任务。该所连续三年被鼓楼区人民政府评为“金陵市容杯”三连冠的立功单位。尤其是 1990 年全国创建卫生城市时期,中央检查团到南京抽查鼓楼区,全部被查总分为 140 分,该所担负环卫项目是 58 分,一分未丢。并先后抽调 168 人次和专业车辆支援兄弟城区清洁保清,也未丢一分。被中共南京市委和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创建全国“十佳”卫生城市的立功单位,所长王文学是全市 44 名立功人员之一。

环卫事业单位是以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为主要特征的;实行企业化管理,在提高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前提下,努力增加经济收益,目的是弥补环卫经费的不足,更好地加强、发展环境卫生管理事业,提高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他们在强化社会效益指标考核的同时,努力执行“两包双挂”的经济责任承包制。

“两包”即一包上级下达应完成的环卫管理任务和经费的指标;二包计划外创收纯收入基数。“双挂”即一是创收的纯收入与职工奖励基金提成挂钩;二是对承包的部门,实行职工的奖金与经费削减比例挂钩。严格将创收纯收入分成三大块提成,即全所发展基金、职工福利基金、职工奖励基金的三大块比例为 5:3:2,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该所建设和发展的资金。1985 年前,该所固定资产 78 万多元,1990 年底已达 303 万多元。五年来增加固定资产 225 万多元。先后购置了全市最大的 10 吨冲水车 1 辆,各类运输汽车 14 辆,小型扫路机 4 辆,三轮流动保洁车 10 辆,3 吨装载机 2 辆,推土机 1 辆,自建小型垃圾中转站 1 座,改建 3 座,自搭修理工棚 3733 平方米,自建停车场 4740 平方米,养护和自建垃圾道路计 11500 平方米,利用废旧建筑材料自建办公用房 485 平方米,以及第三产业用房、职工宿舍、职工食堂、浴室、理发室、医务室等“五小”福利设施。为环卫监察队添置了三轮摩托车 1 辆和 4 部对讲机,初步奠定了发展和基础。

该所坚持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方针,在深化改革进程中,还逐步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内部分配制度,一改过去纯用国家经费吃大锅饭,变成下达定员、定额和有偿服务经济收入等项指标,执行了“基数包死,创收抵支,超收提成,欠收自补”的原则,对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内部经济责任实行考核和分配,并已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所部对下属科室、分所、车队,及环卫服务部、旅馆、商店,均签订了经济责任承包书。规定了承包负责人应承担的社会效益、安全生产和经济收入等指标,并层层落实聘用制,承包到班组、个人,对达标和超额或者失误和亏损,都视责、权、利等不同情节,适当拉开内部分配的档次。几年来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大锅饭”逐步被按劳分配所取代。特别是对车队驾驶员实行金额浮动、计件奖励工资制,在省内同行中受到好评。他们决心继续沿着深化改革的道路努力奋进。

华东军政大学的创办

● 钱家赵

四十年前,1949年6月,我军组建了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华东军大是华东军区、三野前委直接领导下的培养我军军政干部的学校,是一所人民革命的大学。它以原山东军大、三野军政干校和第八兵团直属队机关为基础筹建的全套机构。校部设在南京黄埔路。华东军大校长和政治委员由陈毅兼任、副校长陈士榘、副政治委员钟期光、教育长聂凤智、政治部主任余立金、副主任张崇文。军大根据华东军区、三野前委关于开办军事政治大学的《九一决定》(1949年9月1日),贯彻了以吸收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方针。军大在筹建初期,即1949年6—7月间就在华东各地(上海、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常熟、镇江等地)进行招生工作。军大第一期预科学员1.5万人左右。据1949年7月底统计,全校学员约18690余人(包括新老学员)分驻在小营3号、半山园、孝陵卫;全校教职工作人员包括战杂人员家属子女约18460余人。至年底统计,第一期预科新学员约为13240人(因各种原因被处理离校的约有1720余人未计在内),部队调剂干部为3520余人(伞兵总队、机训队、一团即高干团),共计16760余人。到一九五〇年初,军大除校直及两个总队直属机关外,有12个团及2个训练班(二总4个团、三总5个团、一团、伞兵总队、工人子弟团;教研班、短训班),另有妇干大队、子弟学校等单位。

军大实行向社会公开招生,考生须缴验学历证明或社会职业证件,并进行了入学考试。新生经过了国文、数学、社会科学常识、自然科学常识的笔试、口试,同时进行了严格的体检。考生的录取名单通过报纸发榜,考生须按录取通知书报到注册入学。一团从1949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老干部),9月中旬组建成立。二总在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学习后,于9月21日在苏州举行了开学典礼,1950年春迁到南京孝陵卫。在宁学员于10月18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军大第一期预科按计划于1950年4月初结业。毕业学员除分配到部队、留校任职和调学外,在经过组织调整后转入本科学习。

建国后,1950年3—4月间,军大招收了第二期预科学员,约5千余人。此外,还在山东、浙江、福建组建了华东军大分校。

华东军区、三野前委在《九一决定》中曾明确规定:“开办军政大学总的目的,是培养建设正规化、近代化国防军的军政干部。对于新的知识青年主要是给以初步的政治理论教育,使他们弄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树立新的人生观,并加以必要的业务训练。然后,让他们深入连队,深入实际,锻炼他们成为建设近代化国防军的基层干部。”前委提出的这一办校目的,也就是开办军大的任务。据此,当时军大在教育中紧密结合了形势,整个教育实施过程都是以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为教材,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与此同时,军大学员还经受了严格的军事生活和劳动锻炼,获得了军事基本知识和适应新社会需要的工作能力。

从1951年起,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军大的办校方针由训练青年知识分子为主改变为训练部队干部为主。这样军大在招收第二期学员后也就停止招生,并根据华东军区1950年11月28日的命令,华东军大撤销。

1951年3月5日,华东军区发出命令,依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成立一个高级步兵学校和五个步兵学校。”当时就以华东军大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组建军事学院)改编为华东军区高级步兵学校。以山东、浙江、福建军区所辖的三个华东军大分校为基础,分别改编为华东军区第一、第二、第三步兵学校;另以苏北、皖北军区所辖的教导团为基础,分别扩编为华东军区第四、第五步兵学校。1951年4月6日,华东军区发出命令,又将华东军区高级步兵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高级步兵学校;将五个步兵学校依次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步兵学校。1952年4月28日,华东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将第三高级步兵学校调归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1952年7月16日,将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步兵学校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步兵学校,后又改称为南京步兵学校。

华东军大的创办,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和军队建设准备了干部。虽然办校时间不长,但当时在华东却具有一定的影响,被称为革命的熔炉。

(责任编辑 淑玉)



靠产品发展企业 靠市场赢得效益

——记南京金陵制药厂

● 孙斌 朱云

南京金陵制药厂近年来有长足发展,令人瞩目,这是与这个厂一班领导人有极大的关系。厂长江中银,五十出头,曾经是南京军区体训队游泳队颇有名气的队长,运动健将,16个劈波斩浪的年头,练就了他万难不屈、拼搏到底的性格,而今金陵制药厂在南京众多的医药工业企业中,也象是一名健将。两年来,始终冲在前面,同行业中称其为南京医药工业丛中跃起的一颗新星。1990年创下的生产记录是:与上一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46.6%,销售收入增长50.9%,实现利税增长315.7%,实现利润增长355.9%,人均年创税利4.48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人均创利税在江苏省医药行业中均名列前茅。与1982年建厂初期相比,产值与利税分别是1982年的近10倍和23倍。

进入1990年,市场出现前所少见的“疲软”,而南京金陵制药厂出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这个厂的主产品——脉络宁注射液,每天收到的求购信、电报、电话数十封次,由于产品一直供不应求,有不少医药站、医院专门派人带汇票上门求购;有的来人坐镇该厂等货;有的则先把款子寄来,这样每月收到的求购脉络宁注射液的预付款就有数十万元。尤其是海峡彼岸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听说大陆有一种专治脉管炎的中药注射液脉络宁,便专程来到南京江苏省中医研究所了解该产品,回台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介绍脉络宁的专题文章,引起了台湾各阶层的关注;有不少人从美国旧金山及台湾、港澳地区来信求购;甚至有的专程从香港乘飞机到南京购买。而台工商大陆访问团到达南京后,便专程寻找该厂商谈大陆对台直接贸易。目前已有两家台湾公司、一家瑞士公司相继表示要求作该产品的代销商。

回想1981年,江中银走马上任担任金陵制药厂

厂长时,面对的是一个一度关闭的部队家属工厂,金陵制药厂今天有如此巨大变化,人们不得不问这家企业究竟有什么高招?

产品是企业的生命

该厂认为一个企业要在竞争中求生存,在低谷里求发展,特别是这样一个底子薄,仅有百余人的小厂,要想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掌握市场,不失时机地作出有效的反应。因此头两年他们始终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调研和分析上。他们了解到当前国内心血管、脑血管和脉管炎疾患所占比重较大,脑血管病的发病率为109.95/10万人,全国预计每年约110万患者,脉管炎患者全国约5万人,而治疗这两种病的常用药物有20多种,如果充分利用祖国医学的优势,开发一个专治血管病的新药,就可能改变企业的面貌。江中银看准了以后,始终把新产品开发作为调整产品结构的主攻方向,他充分发挥南京地区医药科研力量雄厚的优势,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是联合开发,二是积极移植。如脉络宁注射液就是与江苏省中医研究所共同开发的。这个新产品疗效好,见效快,无任何毒副作用,对治疗血管病有独特的效果。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与江苏省植物研究所共同开发了治疗上呼吸道感染的中药片剂“柴酮片”,与江苏省药物研究所开发治疗地方病的氯化钾缓释片,与中国药科大学开发治疗糖尿病的真菌药物,并移植了近20个新品种。

这个厂在抓开发的同时,又积极抓投产,有的品种往往当年开发,当年投产,当年见效。仅1989年一年,这个厂新开发的脉络宁就新创效益72万元、柴酮片15万元、酮基布洛芬13万元、雷尼替丁5万多

元。这4个新品的产值率就占全厂总产值的25%，而效益却占全厂利润总额的63%。

人才是工厂的活力

如何增强企业的活力？这家厂认识到企业的竞争是产品的竞争，但说到底人才的竞争，人才是办好企业最有效的活力。他们千方百计引进人才。这个厂的片剂车间主任邓修玉，原在另外一家药厂工作，是一位老先进。1982年老江请他来厂后，邓就一头扎在车间里，从车间布局、生产工艺直到班组定员、定额，把一个原是作坊式生产车间，改造成能按药典规范要求生产的片剂车间，生产成品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一次邓修玉突患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厂里不仅为他解决全部医药费用，而且老江通夜守护。邓病愈后，有家工厂以月薪300元聘请他，他谢绝了。他说：“我走了能对得起老江吗？”总账会计郭素馨，来自某地质勘探公司，她是位理财能手。通过对成本分析，使工时费用从15元陡降到8元左右，这个厂的工人主要是随军家属，文化低，老江舍得化钱化时间，办起了扫盲班、初中班、高中班等，还送一批人外出培训，使60多人领到初、高中毕业文凭，5人达到大中专毕业水准。最近，这个厂又盯上了中国药科大学的两名科研人员，把他俩请进厂来参与研制一种健身止渴的中药饮料。

厂里原来生产基础比较弱，生产能力趋于饱和，随着络络宁销售大幅度增加，他依靠一批骨干首先对能源供应系统进行合理调整，接着又对生产设备进行改造，把药物提取量从日产3000支，提高到22000支，并形成管道化生产，解决了原来浓缩、醇提、醇沉、醋提、醋沉的“长脖子”困难，既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大了安全系数，还节约了资金，提高了产量、质量和成品率，使络络宁注射液由月产25万支增加到34万支。所以同行们都称老江真是一个“见才眼迷、用才心迷、爱才如迷、育才着迷”的“才迷”厂长。

市场是效益的关键

这家厂还认为市场是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再

好的产品，没有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效益。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他们把如何强化产品销售，搞活产品宣传，做好销售服务，拓宽销售渠道，当作是企业第一位任务。近二年来，该厂除了坚持提高产品质量，增强销售力量，搞好销售服务之外，针对医药产品的特殊性，加强产品的宣传，不断开拓市场，这方面江中银是肯动脑筋的。他采取不同的宣传方法和宣传层次，使产品宣传起到了一次投资、多次效应的作用。1989年厂与江苏省广播电台联合举办新时期十年影评大奖赛，接着又与江苏电视台举办“金陵杯”大学生、中学生校歌比赛；1990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人民子弟兵节目播放了这个厂“金陵桂冠”的专题报道。还与《中国医药报》联合举办“桂冠杯”我用络络宁有奖征文，在《健康报》、《中国农民科技报》、《中国老年报》等报纸、杂志、电视台进行广泛宣传介绍，与用户沟通信息，迎来了海内外的众多客户。

为了加强销售服务，做好用药的指导工作，对一万多患者求购的信件，都认真负责地一一邮寄复信，同时说明途中如有损坏，厂里负责补寄。还聘请江苏省中医研究所专家给患者回答有关疾病方面的咨询。仅1989年10月至1990年底给患者寄出资料、适应症说明书和咨询答复共二万多份，邮寄药品3888件，从而赢得了客户和患者的信赖和赞誉，使产品知名度、企业知名度不断提高，随之也拓宽了销售渠道。

企业发展了，而江中银仍然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自强、拼搏、求实、开拓”的精神和金陵人的时代风貌，一年之内，拿下了络络宁的三步改造，从而扩大生产能力四倍以上，他经常白天指挥调度，晚上跟班作业顶岗上班，有时一干就是24小时，甚至连续两天不下岗。工人感动地说：“厂长这么玩命干，就是没有报酬我们也愿意加班。”江中银和厂领导班子，没有为已取得的成就而满足，现正计划按国际优质药品生产规范(GMP)要求进行技术改造，开创新的业绩，攀登新的台阶，为祖国医药事业多作贡献。

是是非非 歌舞厅

● 本刊特约记者

叶舟 季石

谁也没有想到营业性歌舞厅竟在中国大地上开办起来,并已过了七个年头,其间虽一度被取缔关闭,受冷遇,但在1990年初夏又“热”起来,而且越来越红火,成了引人注目的场所。

华灯初上,一辆辆“的士”“马自达”便陆陆续续驶来,停在闪烁着彩灯,挂着巨大的“舞”字的歌舞厅门前。车门打开,车上跳下往往是一对对或是三两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郎,随后在“先生们”的陪伴下,走进歌舞厅。那神态,仿佛去赴宫廷舞会,走进一个极乐世界。

来的都是客,别问来何方

在舞厅里,倘若你问别人干嘛来跳舞,八成是一个闭门羹。“哪个高兴谈?”门卫看的透透的,天长日久,猜也猜出来了:“差不多都是有钱的个体户、承包公司老板、出差人员,再就是有外财的人,小年轻谈恋爱的也有一些,最后才是其他人。前者常来,后者偶尔来,消费能力不一样嘛!”“动机嘛,一般来说,女孩跳跳、唱唱觉得快活,男孩跟女孩玩玩觉得惬意,不就这么回事吗?”和门卫、工作人员“侃”,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都能听到。某大学心理学系老教授甚至

建议校方把学生的毕业社会实践课放到舞厅来进行。

于是,一些数据便统计出来。

上海通宵舞厅后,有关方面还对大光明电影院通宵营业舞会作了抽样调查,向220位来宾分发了征询表。结果,来宾的“性别”和“婚姻”中,男女比例约六比四,未婚和已婚比例约7:3;年龄层中,20岁至40岁之间的占91.3%,超出两头的仅占8.8%,50岁以上没有。通宵舞厅有不少个体户和待业青年。文化程度高中占63.6%,初中和大学明显少于高中。职业上:工人占31.8%,个体户为23.6%;动机呢,大多回答“娱乐”和“消遣”,“玩个痛快”。此外,来宾中外地区外人占了一半以上,有人来了10次以上。从舞客构成可见上海通宵舞厅的大致轮廓了。

有人还对南京几家较大的舞厅专门作过调查,发现光顾者中有57%的人平均每周要上三次舞厅。人们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夫妇一道来的,大多为轻松轻松,娱乐调剂生活。在“龙门”舞厅,就有不少夫妇每周末都要光顾这里,有的丈夫虽不会跳,但陪妻子来一旁听听音乐,也觉不错。“恋人”来舞厅则有专利性,一位女郎独自坐在那里,几位男士彬彬有礼

北極HUANYIN
文道舞培訓班



WU 6年
长期

名师执教:倫巴·探戈·四
·华尔兹·吉特巴·

地邀她跳舞,她均婉言谢绝,摆摆手说:“对不起,我不会。”可是不一会,一男士拿着饮料而来,这小姐立刻活泼起来。一曲响起,他们翩翩起舞,誉之“舞林高手”毫不过份。经理说,这些恋人们只和自己“那一位”跳,一般不愿意让“第三者”插足。那些正处于热恋中的女郎,也十分注意“分寸”以免男友“误解”。

而那些老板,舞女们则是另一般对待了:温州某公司一位经理,到南京闹市区一家舞厅,请了舞伴又点歌。第一晚,他为他的生意合作对象;为他的舞伴某某小姐一连点了 32 首歌(每首 8 元);第二晚,干脆包下“点歌台”,两晚花了 2000 多元,出尽了风头。某女郎身着红色西班牙舞裙,在舞厅里跳得似乎忘掉了一切。后来我们和这位老板聊天时,他称自己单身在宁,工作不顺心,生活无聊,于是到舞厅来寻求一点乐趣。

舞厅就在这形形色色的斑斓世界中掀起了“狂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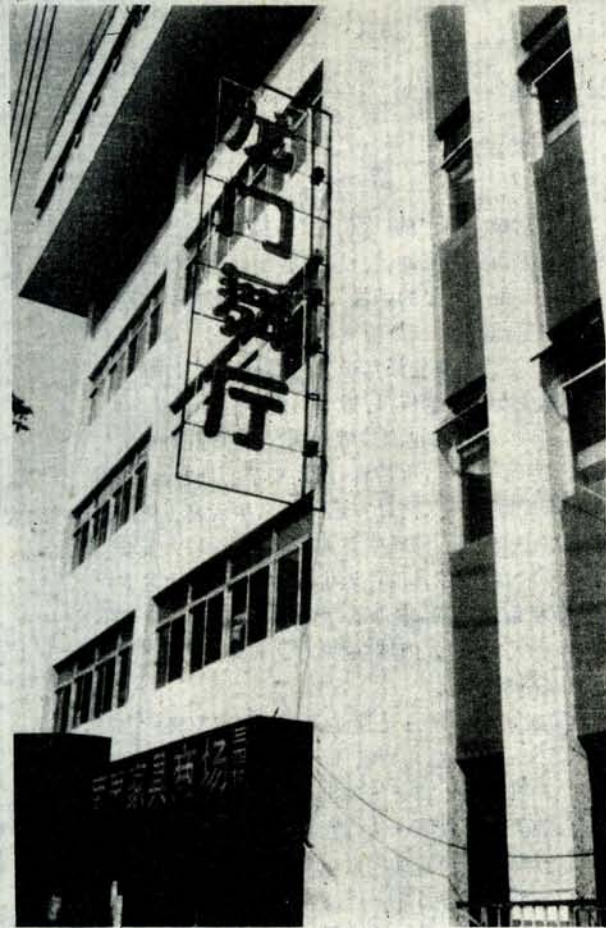
“第三次浪潮”

1986 年南京首先出现营业性歌舞厅,自那时以来,先后被批准办过 65 家歌舞厅,其间至 89 年几乎全军覆没,进入 90 年代,又“振兴”起来,除了原有的老舞厅外,新舞厅层出不穷,企业、公司、体育场馆利用场地开舞厅,新建的宾馆、大厦无一例外地也要开歌舞厅。原有的老舞厅增加了卡拉 OK,单纯的卡拉 OK 歌厅也遍地开花。歌舞厅的名字可算挖空心思,联缀起来颇为有趣:汉中的“太阳坡”,大行宫畔的“月亮河”,湖南路边的“康乃馨”,洪武路上的“星星烁”、夫子庙的“青云楼”、宁海路边的“海之夜”……新开的歌舞厅这边炫耀“全封闭空调”,那边声称“第一家激光、镭射歌舞厅”。1990 年夏季,南京的早场舞会毫不夸张无一例外地“人声鼎沸”、“人满为患”,恰如天热时游泳池内“下饺子”的情景。舞客们里三层,外三层把个中央舞池蚕食得只有一间 16 平方米的房间那样大,一家本只能进 200 人的舞厅一下闯进了 350 多人。许多人只是站在那里“看舞”,有人说“反正一块钱一张票,就是冲这点空调,凉快一下也值得。”但这种跳舞热的再度出现,确使行家们料所不及。一位舞厅业务经理兼舞训班主教练说:“今年跳舞的人这样多,真可谓‘第三次浪潮’。”他说,现在来跳舞的不仅是年轻人,更有许多三四十岁、甚至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他们在“补课”,抑或是寻找新的精神解脱?

南京汉中路上的“太阳坡”卡拉 OK 歌厅老板由于有日本岳父的资助,在设备、歌厅设计方面都很有特色。又由于老板的姻缘又来自三次旅途中与现夫人的邂逅,诞生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报章大肆宣扬“中日友谊传统佳话”,于是“太阳坡”享誉中外。大陆少男少女羡慕老板“好运气”,忍不住要来看一看。港台、日本客人则也闻该歌厅有他们熟悉的音乐与服务,因而一传十,十传百,以致来宁的港台、日客均要前来光顾。不久前日本超一流棋手武宫正树也在围棋棋手刘小光、邵震中等人陪同下光顾“太阳坡”,一展歌喉。老板还常请往返中日的人,将日本的卡拉 OK 最新信息带回,增加歌厅内容,使得歌厅常盛不衰,不少人成了“太阳坡”的常客。每晚,门口停放的出租车络绎不绝。

在上海,舞厅更是遍地开花,全市有舞厅 272 家,歌手 500 多人,每天有 4 万多舞客在舞场。那些餐厅、咖啡厅顶上都悬挂着五色彩灯,蛇形迷离环顶灯等,晚上桌椅推到一边,就是舞厅了。从门口挂出的广告牌来看,简直如同放电影一般,分晚场、夜场、通宵场、约莫两个小时一场,直排到天明,票价也依场次不同分高低,象大都会舞厅周末雅座票卖 25 元一张,华亭宾馆则要 30 元出头,但舞客仍然人头济济。据了解,上海的流动的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晚上进入舞厅消费。





图形的激光灯具,使歌舞厅呈现变幻无穷的美妙意境。

时下在舞厅里,激光灯、镭射灯、飞碟灯、还有维纳斯灯等多种灯具竞相斗妍,品种不下300种!镭射飞碟唱盘和大屏幕投影在歌舞厅内也屡见不鲜。歌舞厅目前已发生根本性改变,新科技为人们创造了崭新的听觉和视觉世界,使人们过去的奢望逐渐变为现实。因此,不少头一回进歌厅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到,这的确令人大开眼界,感到心灵的震颤与愉悦的兴奋。象南京最大的金陵饭店开设的“佳丽”歌舞厅,便以档次高,设备好而引人入胜,虽然门票要卖15元一张,仍每天有100多人光临,还开设了下午场。

在新建建筑群中,江苏展览馆的豪华大舞厅刚设计落成里面还未装修好,就有不少人天天在打听了:“什么时候开业?”“卖多少钱一张门票?”“起码要20元!”来上任的经理胸有成竹地认定“因为这将是南京城内档次最高的舞厅!”里面将铺设地毯、置100张黑色方桌、坐400位舞客,有大屏幕卡拉OK等,羊年春节前,新开业的金陵夜总会,夫子庙宏泰娱乐厅的KTV歌厅等都很引人注目,成为令人叹为观止的金陵夜文化中心。

歌手市场

如今的舞厅不仅有现代化的灯光音响,更有人数众多,风格各异的歌手队伍。这里的歌手虽没有歌舞团演员那样声名显赫,但待遇不低,从业自由,以致吸引得专业演员纷纷“下海”。

歌舞厅的歌手几乎在舞厅开放后不久就出现了。起先是舞厅为招徕舞客,在社会上招聘一些有几分姿色、模仿力强的业余歌唱爱好者到舞厅“助兴”、“献歌”,随之又给她们冠以“某某红歌星”的名义制造“轰动效应”。这样一来,歌手职业兴隆起来,南京市社会文化市场管理部门某次举行招聘考试,各行各业自命不凡的爱唱歌的男女一下涌来300多人报名,结果有80多人领到了歌手演出许可证。

歌手报酬每晚8元,观众点歌一支歌10元,由乐队和歌手、舞厅按5:3:2的比例分成。一般每场舞会舞客点七、八支歌,最多达20首,“有的歌手光点歌一个月就能得四、五百块钱呢!”

如今舞厅不仅有歌手,还诞生了舞会主持人。南京北极舞厅的主持人小姐是被该厅经理从几家舞厅“挖”来的佼佼者,她毕业于师范学校音乐专业,任教于小学,一周14节音乐课,又是少先队辅导员,本来她也爱唱歌,但经理见她风度较好,聘她任主持人。南京观众一直对演出报幕员和主持人十分看重,小D的主持也为晚会增添了光彩。这位出身知识分

1989年5月,北京作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的东西大都市只有58家正常开业的舞厅。而1990年5月,据权威人士说,仅卡拉OK歌厅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200家,风靡北京城。天津,每天平均有8000人沉浸舞场,该市为此专门成立了舞会管理办公室。同时,在全国,中小城市舞厅的开办也来势很猛,特别是卡拉OK歌舞厅有时一天竟会同时开业三、四家。为防止一轰而上造成一轰而下,保证卡拉OK这种娱乐新型活动健康发展,文化部在七月下旬特地发出了《关于加强“卡拉OK”娱乐活动管理的通告》。但这汹涌的“第三次浪潮”仍在不断地掀起新的波澜。

舞厅内部的设备更新也十分引人注目。几乎,全部老舞厅都重新作了装修,新舞厅更在豪华、立体声、全封空调等方面力图称雄。象至今一直开放的“北极”“龙门”等舞厅经重新装修后,使人入内眼花缭乱,灯光变幻莫测,音响立体感强,给人以音乐美的享受。在南京白下路10号那间十分不起眼的门面房子里,一家文化用品经营部经理兴奋地谈起:“我们为长城、化工公司等许多歌舞厅设计安装了灯光、音响设备,工程一个接一个,忙不过来。”由于是江苏省激光学会会员,所以这个经营部不仅为南京下关扬子饭店引进安装了江苏省第一家镭射歌舞厅,而且雄心勃勃地投资,将南京市京剧团的一块场地利用起来,以两家联营的方式,开办有300平方米舞厅和100多米的卡拉OK歌厅,安装可打出多种彩色



子家庭的女孩子,刚满 21 岁,对生活充满幻想与追求。但舞厅的实践使她懂得了许多,她也只把舞厅的工作当作锻炼自己的机会,她不赞成舞厅的娱乐方式,“我有时感觉自己只是为了赚每晚 10 块钱了。今儿我迟了,叫了一辆马自达,要我十块钱,敲了我一笔,今晚算白干了。”她打趣道。一会她认真地说:“我想今后去当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所以现在当实习。

在舞厅当主持人,和电视台、电台的不一样,是和观众面对面说话,要很亲切、自然,还要随机应变,幽默风趣,但也要有分寸,避免弄巧成拙。同时,观众直接看到主持人形象,因此我要求自己不仅在语言上要有艺术性,而且还要讲究仪表风度,让观众有美的享受。不过,目前舞厅主持人还不是主持一台晚会,有报幕的成份在里面,我只是努力去做罢了,”小 D 甜甜地一笑,谦虚地说。

在舞厅的歌手、乐队中,首先“下海”的是专业团体的演奏员,如今南京几十家大小舞厅伴奏的大多是省歌、前歌、市歌、市杂技团等专业艺术团体的乐队队员们,他们从事“第二职业”,乐而忘返。紧随而至的是歌舞团的演员们,主要是女演员,也许她们的身价要比那些业余的女歌手要高,所以不愿在家乡的舞厅里“卖唱”,而是纷纷南下“献歌”。江苏省歌舞团甚至与广东中山市富华娱乐城内的歌舞厅签订了长期合同,由该团派遣女演员来“献歌”,由女演员每月交给单位一定数目的劳务费。有位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声乐系的女歌唱演员就是“下海”舞厅的歌手之一。有报道说起先她为舞客们伴奏时,尽管同样拿着麦克风唱歌,但总觉与巡回演出大不一样,好象“降格”了,可两个月下来,她就淡薄了心理上的尊卑感,每晚半小时的演唱一月可为她带来 700 元的收入,比歌舞团高四、五倍。加之该城的现代生活氛围,使小李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她具有江南女性特有的姣好容貌和身段,加上训练有素的甜美嗓音,演唱完毕,总能博得舞迷们的一阵热烈掌声,还有人趁休息时邀她步入舞池。遇到熟悉的或顺眼的,她亦会翩翩起舞。她表示:“仅此而已,决不做越轨之事。”但她不否认,姐妹们中确有少数人靠着姿色越了轨。

舞客心态实录

舞厅是一处怎样的所在呢?也许并不象人们简而诩之的是使人轻松轻松的场所,它那特有的音乐节奏、忽明忽暗乃至暗色为主的灯光,给予人们的是

不可明状的境态。

在国外的背景音乐中,她为夜花园和夜总会提供的贝多芬的《F 大调浪漫曲》、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或者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都使人沉缅于情爱与狂热之中。中国的舞厅虽然奏《大刀进行曲》也能让人蹦达起来,但那软绵绵、慢悠悠的四步舞曲响起来、舞厅只留下暗色的荧光时,舞池便挤得水泄不通,这显然用“健康活泼”一词是无法解释的。“这是柔姿舞也叫情侣舞,”一位老舞客介绍道的,但除了鹊桥舞会,哪来这么多的情侣呢?无庸讳言,进舞厅的,大多为了同更多的异性交往……。虽然许多人不愿谈及自己上舞厅来的真正动机,但下面的镜头却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一男士独坐在舞厅一隅,四顾周围仿佛也是独来独往的女士或是无男伴的女孩们,舞曲一响,他便起身邀舞,不料女的不愿跳,他悻悻而去,转而又向别的女孩进攻,终于,没有再让他丢脸。一曲终了,他潇洒地抬起双手,示意服务员送饮料来招待女舞伴,次日,他又把另一位女子带入某歌厅。

“说句老实话,这年头改革开放了,国外的影视图书那么多,男女关系那么开放,中国人也学会了,发现了自我价值,该享受享受了,何苦自己呢?”某老舞客深有感触地说。“在家看看自己老婆或是丈夫腻味了,不顺眼了,到舞厅来寻求异性刺激,不就这么回事吗?舞厅不就靠这点赚钱吗?不然,大白天把帘子拉起来,搞得乌漆墨黑的干什么?光线亮了男女搂在一起方便吗?象话吗?听说舞厅管理搞什么测光表,规定亮度,糊得人的!不信,你把灯光老是搞得那么亮,鬼去跳!”老舞客仿佛一针见血地道出根由。

到舞厅里来的也有不少是离婚者或是家庭遇到不幸的人,她们试图从中摆脱寂寞,沉缅麻醉自己,但只能求得短暂的放松,最终只能引向失落与堕落。因此,她们也不认为舞厅是理想的场所,来此半是迫不得已。不少人去了一段时间,便感乏味,失去再光顾的兴趣了,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看到了舞厅的实质。

舞厅的正负效应

自舞厅先后在国内外问世以来,已有六个年头,如
(总 209) · 97 ·

今,要给舞厅评判的话,是功大于过,还是得不偿失呢?

在目前的报章上,给予舞厅的,大多是正面宣传,褒扬的记录: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有利培养人们的文明素养。是的,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在我们一些专为中老年人开放的舞厅里,似乎可以找到某种缩影。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工人文化宫和群众艺术馆开办的舞厅里,中老年人便怡然自乐,有的清早去菜场买了菜路过,满篮子菜也顾不上拎回家,就兴致勃勃地进来跳上一曲。因为票价只收几角钱一张,适应中老年人和退休职工的消费水平,他们在这里仿佛又回到了充满活力的年轻时代,那轻盈的舞步感动了人们。一位作家在散文中这样称道:“年老了还到这里(舞厅)来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这一辈子没有被生活压倒。他们潇洒着走过了青春,还要潇洒着走过暮年。”

在上海,大学生的跳舞热也被肯定为校园时尚的变化。现在只会读书、不善交际、没有个性的大学生在同学中不会受到重视,潇洒豪放地风度受推崇,跳舞也因此成为大学生们施展才华、显露风度和魅力的重要场所。

这是种集体活动,有益锻炼身体,调剂精神,是健康正当的娱乐。我们的工会、团委、妇联不是经常组织这样的舞会活动,以增加职工、老年的欢乐吗?有些人还在鹊桥舞会上找到了意中人,不也很好吗?

这大约便是人们历数的舞厅之“功”。

其“过”呢?

“简直是卖淫!”当这话从一位新任经理的嘴里说出来时,听者不禁大吃一惊。这是位十分正直的共产党员,也是位著名电影演员。他说这话也不是毫无根据,没有道理。他在某家舞厅内考察两个月,看见男女在昏暗的彩灯下,搂搂抱抱,“这成何体统!”他气愤地说。也了解到一些沉湎于舞场的舞客,有相当一部分人因此而导致了家庭破裂,一些人上班报个到,溜出去进舞场一跳一上午。至于中学生进舞厅更是不胜枚举,他们不惜抛下功课长期沉湎舞场,有的女学生则长期充当舞伴,不思上进。对家里只说去看电影,长期撒谎,以致不能自拔。舞厅的高消费方式又刺激了年轻人挖空心思收敛钱财。所以有人说,舞厅在令人迷乱的文娱氛围中,又营造了物欲横流的金钱世界,所谓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过去在影视上看到的场景,如今在现实生活中已可触及。这无疑对我们社会主义倡导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都是一种挑战。长此以往,必将从根本上动摇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悠久基石,这是否危言耸听呢?

“我们不必为舞厅唱赞歌,也无需回避其负效应;能够做的应是引导,尝试社会主义舞厅的新路”,

某社会学家这样告诫。

而舞蹈专家却把着眼点放在舞厅的负效应上。他说:“当前舞厅这样热,是好事但也可能变成坏事,别的不说,舞跳得那么迟,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学习?”他在任省国际舞比赛评委时发现,国际舞比赛中一对对选手常常不是夫妻。问一位选手:“怎么不把你的丈夫(或妻子)带来?”选手无例外使用了反话句:“那孩子谁带?”似乎另找对象为舞伴天经地义。这样下去,很不好。他直言道:“跳舞跳跳要‘热’的,不是身‘热’,心会‘热’,小年轻接触女性身体,久而久之,常常会发生感情上的变化。结果造成家庭不和,影响工作,严重的还导致夫妻离婚”,他认为,跳舞作为一般交际,在社会、经济稳定的情况下,娱乐娱乐是好事,本无可非议,但要适可而止,不能影响工作和家庭,要有人去抓这方面的思想工作,这样才能使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厅健康发展。现在舞厅大白天把窗子捂得严严的,姿势也没有规矩,把个女的抱在怀里哪里是跳舞?!

歌舞厅前景展望

歌舞厅的是是非非,正负效应,至今莫衷一是,今后会怎样呢?还会发生关闭的事吗?

对此,经理们表示了乐观的态度。他们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人来华做生意的越来越多,他们最不满意之一便是中国的夜生活太单调,太贫乏。因此,不仅歌舞厅还会发展,而且象国外的夜总会形式也必定会象已深入粤、闽一样,在内地发展起来。同时,歌舞厅的功能也早与旧时不同,不仅是跳舞,还是交际、洽谈生意、娱乐、休息和锻炼身体、陶冶性情的场所,这一点将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因此,歌舞厅的文明水准也必定会日益提高,成为高雅的文化场合,而不停留在目前状况下。南京市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也认为:工厂里会发生盗窃案,旅馆里会发生凶杀案,影剧院里也会发生流氓案。然而,不会因此强行关闭工厂,不会勒令旅馆关门,也不会硬要影剧院停业。但是,舞厅倘出了这类问题,可能会被勒令停业。这是否意味着歌舞厅一直遭到偏见与歧视?这是不对的。歌舞厅既是公共娱乐场所,任何人均可入场,真要出了事,只要按章处置,管理部门就不应简单地处罚歌舞厅,甚至关门了事。要热情正确地引导它正常地发展,使得人们有个娱乐场所,在劳动工作之余,有个快乐的去处,获得身心的享受与轻松的满足,不是更好吗?

(责任编辑 茅明)

(本文照片为樊小世、朱伟强摄)



细柳巷

陆永贵

去年10月11日《南京日报》的《常青树》一文，看后很受启发。高加索先生在文中提及细柳巷一地名引起我的浓厚兴趣，便查阅有关书籍及资料，现作短文以飨读者。

细柳巷，曾为细柳营。在明朝时因驻有兵营，故而得名“细柳营”。但对细柳有一说是：细柳即赤柳，因河沿、塘边遍长赤柳而得名。

这里原是一片荒地，有河流、水塘，亦有小桥叫栏杆桥。《（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中记载：“大阳沟之五老桥南流……经娃娃桥北盖古之护龙河久而湮者也，至娃娃桥南而细柳巷栏杆桥之水西流……”。同治年间，“右东北第三甲（区域）有红花地、常府街、细柳巷、太平巷、马府街等”。《（上江两县志）》据近代人所著《金陵历代名胜志》的列宋代建康府图所示，细柳营之右（即东向）为上元县。同书的历代互见图考中指出“宋上元县西细柳营直北，当为东城旧武学。”

其实，细柳巷它南起马府街，北至常府街，与早在五十年代拆除的市内小火车道（现长白街）平行。解放初期因拓建太平巷路，细柳巷才一分为二，形成南北两个不相交的巷子。随着郑和公园的扩建，使南北细柳巷拉开了距离。

这里的河道因年久有的湮没，有的淤塞形成洼地积水成塘，据说郑和公园内的水池就是在此基础上开掘的。至于栏杆桥也就不复存在了。

传说在道光初年，有个叫陈君宝的医士田居过细柳巷。他祖父、父亲皆从医，家中收藏很多医书善本，他秉承父业边学医治病，边种点蔬菜花草。一天，他的好友朴德善忽然得了奇疾，认为“女鬼”附身，时

常坐在室中啼哭，其声如妇女，见人辄作怕羞状，曾经多方求医用药，皆未能愈，后求陈君宝诊治。陈施用古法针灸术，针得朴德善大喊大叫，于是疾顿廖。其友感到十分奇怪，认为陈医士用针不仅能治病，亦能驱“鬼”。其实，朴德善乃是患精神方面之病，因“痰”迷心窍，心阻神志所至也，并非什么“鬼”在作祟（《白下琐言》）。

民国时期，细柳巷曾设有南京女子中学分院（《首都志》）。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细柳巷（靠常府街）除了陆军医院及军用仓库外，便是菜地，仅有几户贫苦居民住的简易茅草房、滚地龙；在细柳巷（靠马府街）除了能数过来的几间破旧矮小房屋和菜地外，只有一座较大的湖北同乡会馆。它犹如庙宇，飞檐钩角，门前有一对石狮及石球，倒蛮威风，大门对过是照壁。该馆专接纳一些有困难的穷人，亦有一批党的地下工作者和进步青年在此隐蔽，与敌人周旋，多次躲过跟踪和搜捕，在默默地作埋葬旧中国的战斗。象诗人丁力的《苦难的童年》三部曲和高加索的《江南谣》上集都是在此完成的。

现在的细柳巷只有北段了，它毗临三十四标，住户密集，是江苏省扬剧团所在地。而南段的细柳巷由新建的小区“马府新村”所替代。五、六层高的楼房在湖北同乡会馆的废墟上拔地而起，近三十幢的条式、点式楼房交错争辉，煞是气派！

教敷营

沿着南京城南瞻园路的太平天国博物馆东墙，一直向北到建康路，是一条弯曲的巷道，这便是教敷营。其实它的最初名为轿夫营。

明朝时，这一带是轿夫生活、歇息的地方，轿夫较集中，故称为轿夫营。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里逐渐成为市场，专卖各种鞋子，为履业萃集之所。据《客座赘语》记载：“鼓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轿夫营。”

到了清朝时，轿夫营则为城守营的汛地。据《续纂江宁府志》记载：“左哨千总司四汛（淮清桥、教敷营、堂子巷、武定桥）。”清朝的兵制是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这里便成为练武打靶场所，遂为教敷营，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时代的变迁，教敷营一带房屋逐渐增多，其范围越来越小，如今仅留下一条巷道而已。

（责任编辑：霁明）

关于曹操与三国的讨论

编者按：本刊去年第6期发表了刘凡同志《曹操并非三国时代的人》一文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来稿，皆认为曹操应为三国时代的人。现择其中两篇刊出，可见概貌。因无不同意见，本刊对这一问题不再讨论。

对于历史问题持有不同见解，是正常现象，通过讨论、争鸣，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这是好事。谢谢大家参加这次讨论。

也谈曹操与三国

● 周正章

读了《南京史志》1990年第6期《曹操并非三国时代的人》一文，乍觉颇有道理，但仔细一琢磨，感到这个提法断难成立。因为三国时代，如果真的抽掉曹操这个主心骨，那么三国还成了什么个模样？再者，“曹操不是三国时代人”的口子一开，这一段历史的麻烦事就多了，岂止一个曹操呢？

如果我们依该文意见，以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为三国时代的上限，那么人所皆知的三国风云人物，诸如荀攸(157—214)、荀彧(163—212)、夏侯渊(?—219)、庞统(179—214)、关羽(?—219)、周瑜(175—210)、鲁肃(172—217)、吕蒙(178—219)、黄忠(?—220)等等都要从威武雄壮的三国舞台上撵走，就连刘备(161—223)、马超(176—222)、张飞(?—221)等等也只能与这个舞台略沾点边而已。如是，三国时代的多彩的银幕，还剩下些什么内容呢？那就令人难以想象了。

作者称人们误把曹操当作三国时代人，是受了正史《三国志》和小说《三国演义》的影响。这两部书是古人写的，古人可能缺乏今天的“科学”思维，给我们作了错误的导向，是可以理解也无须予以追究的。古人早已失去“指导”今人的权威，我们何苦还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呢？！这大既是该文开宗明义提及这两部古书的原由。——其实不然，我打开今天堪称权威的工具书《辞海·历史手册·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在分类词目《历史人物·三国》之下，该文提出异议的曹操仍首当其冲，“曹操，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赫然在目；我担心有除名之虞的上述三国诸位人物，统统依次在列。从曹操到陆抗共收94个条目，恕不一一列举。

• 100 • (总 212)

其中，或许会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公元220年这三国时代幕布没有拉开之前，过世约莫有20年之久的袁绍(?—202)、袁术(?—199)、公孙瓒(?—199)、陶谦(132—194)、吕布(?—198)等，竟也“跨”进了三国时代。我们今天的史学专家们，为什么也疏忽大意到这步地田呢？

该文为何提出这么一个人人们难以接受的问题？原因恐怕是太拘泥于编年体，而置纪事本末体于不顾了。如果从编年体角度出发，编纂《中国历史年代表》、《中国历史大事年表》、《中国历朝世系表》等等之类，在东汉与三国之间以公元220年来断代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从纪事本末体方法考虑，从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向上追溯，娓娓道来，把三国时代的上限向前适当推移也不失体例。事实上，我国的历史学界也正是这样处理的，一部部历史著作就不用列举了。现仅以手头方便的《辞海》为例，已很能说明问题。《辞海·三国》(同上版本)条，就说得明白：“继东汉后出现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历史时期。从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起，到280年吴亡止，共历六十一年。一般也把赤壁之战后魏、蜀、吴建国前的历史划入三国时期。”(按：该文把下限280年误为290年)上限有两说：一为公元220年，一为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两说虽有矛盾之处，但在这里兼容并蓄得很好，无须大惊小怪！

若再深究一步，之所以会出现“东汉末年”与“三国时代”这两个历史概念交错的复杂现象，大概与这个时代产生的一具“怪胎”、傀儡皇帝汉献帝密切相关。他虽然于公元190—220年在位，但东汉政权已名存实亡。从“名存”的形式说，可称“东汉末年”或

曹操当为何时人

《南京史志》1990年第6期(总第43期)刊载《曹操并非三国时代的人》一文,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争鸣园地。贵刊的做法,肯定会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支持。本文就曹操是不是三国时代的人,发表自己的一些浅见。

曹操当为何时人?这一问题,历来史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东汉末年人(也就是说他不是三国时代人);另一说,他是三国时代人,而且都各有其依据。造成这两种不同说法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学者对东汉王朝结束的时间,和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时间,有着不同的划分概念而产生的。

主张曹操不是三国时代人的认为,东汉王朝结束于公元220年。是年正月,曹操去世。十月,他的儿子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称皇帝,国号魏,定都洛阳。曹丕的这一称帝建国举动,标志着东汉王朝结束,三国时代的开始。据此论点,曹操当然不属于三国时代的人了,而是东汉末年人。贵刊的《曹操并非三国时代的人》,就是依据此论点来确认的。

主张曹操是三国时代人的认为,东汉王朝结束于公元190年。这一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逃长安,实际上结束了东汉王朝的统治。从此,全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之中,历史开始进入三国时期”(张玉玺、张仁忠主编的《中国古代史辅导讲座》)。而且曹操一生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皆在此后的三十年间(公元190—220)。因此说曹操是三国时代人,也是有充分论据的。

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题,不妨让我们看看,曹操在

这三十年间的主要经历。曹操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采纳谋士毛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资治通鉴》卷60)的建议,作为自己成为“霸王之业”的总方针。公元196年,曹操把汉献帝挟持到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同时,实行屯田制度,注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从而,解决了军队的粮食问题。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他击败了地广兵多的袁绍,基本上统一了北方。208年,曹操进位为丞相。是年又亲率数十万大军南下,进行赤壁大战。由于孙权、刘备的联合抵抗,曹操的水军居于劣势,打了个大败仗。从此,曹操带领残部逃回北方,孙权巩固了在长江中下游的地位,刘备在湖北、湖南一带获得了立足点,后来又进占四川,这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了。216年,封魏王,220年正月去世。十月,曹丕废掉汉献帝,自称皇帝,建立魏国。曹丕之所以能在短短9个月建立魏国,这与曹操在世时,事实上魏国已经成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见,陈寿的《三国志》、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都把曹操定为三国时代人,是有一定根据的。再者,现今出版的《辞海》合订本第15页上也说:“一般也把赤壁之战后魏、蜀、吴建国前的历史列入三国时期”。208年,赤壁大战后,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当时,曹操仍健在,这则资料也可证实,曹操是三国时代人。通过上列史料的分析,笔者认为,曹操确是三国时代人,这是不可轻易否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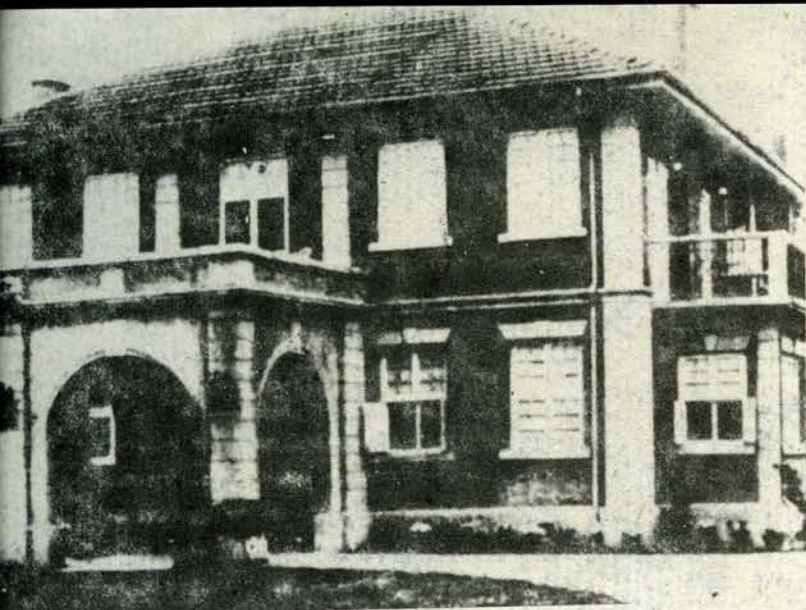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霁 明)

“曹魏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华佗、蔡文姬等许多人或曰东汉末人,或称三国时人,均无可无不可。汉献帝(181—234)与曹操(155—220)是同时代人,两者之间虽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关系,但君臣毕竟“共事”多年,然而这君臣俩人却分载在正史《后汉书》与《三国志》两种书里,一为前朝之尾,一为后代之首,颇顺理成章。曹操生卒在前,汉献帝生卒在后,

被完全倒置,人们毫不在乎。这恐怕是史书中皇帝与其丞相分割两处仅有一例。

初浅之见,不知刘凡同志以为然否?

(责任编辑 霁 明)



蒋介石 的

蒋介石 憩庐

蒋介石、宋美龄作为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一对夫妇，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官邸别墅，如庐山的“美庐”、西湖边上的“澄庐”、重庆的曾家岩官邸等等。但在南京居住的时间最长，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几处住所，简略介绍如下。

①黄埔路官邸

看过去年上演的历史巨片《开国大典》的人，一定对蒋介石远走溪口之前，在南京召开会议宣布“下野”的那一场戏还留有印象。

根据《李宗仁回忆录》的记载，这个再现历史的画面就发生在蒋介石最常住的黄埔路官邸，时间为1949年1月21日上午。

黄埔路官邸，座落于今天黄埔路东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部大院内。此处原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所在地。蒋介石系军人出身，又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家，所以他对军校有特殊的感情，他将官邸设在军校中，一方面安全可靠，行动方便，另一方面，还可以随时控制军校师生，可谓一举数得，此官邸为一幢红色的两层楼小洋房，屋宇小巧玲珑，周围花草树木繁茂，景色十分宜人。解放后，此房已另有用途，又由于是军事重地，内部无从参观，已不为一般人所知了，下面，我们来看看蒋介石原贴身卫士居亦侨先生有关黄埔路官邸的回忆：

踏上住宅的几级台阶，迈进第一室就是客厅，里面摆设着红木茶几和靠背椅子。茶几上一般放着厅装香烟灰缸，客厅的墙上，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合影的放大照片，孙中山着中山服端正地坐着，蒋介石全副武装，佩着指挥刀——长剑，站在孙中山后侧，像片上面挂着孙中山

亲书的名幅：“安危他日终须信，甘苦来日要共尝——介石吾弟嘱书，孙文。”

这间客厅的旁边是一间小客厅，里面放着柚木制的桌椅，挂着意大利人绘的风景画，一排呈半弧形落地长窗，使这间小客厅明亮而优美，就象一个西式的小书房，这是宋美龄接待宾客的主要房间。蒋介石的办公室设在客厅里面，共有两间，第一间是他白天批阅文件及与军政要人会谈的地方，由此进入第二间，两室陈设相似。但第二个内室，必须是蒋介石亲自邀请有资格的、或者是特别指明的人，如何应钦、刘峙、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等高级官员才可进去。

官邸楼上，是一间大卧室，卧室外面也有一间客厅，那是专门接见内亲或者是特别邀请的人，侍从副官及秘书，一般都不得随便上楼。



美龄宫

在南京 几处别墅

● 季智洲



按规定,一般官员的汽车来到蒋介石官邸只能停在大门外。只有蒋介石关照的外宾,国民党元老、少数几位部长和省主席的汽车可驶进大门,停在办公楼下。据说,蒋介石对中共领袖周恩来十分尊重,特别关照侍从对周恩来的汽车不能阻拦,可以开到官邸前面。

从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回忆录及一些有关蒋介石的文献资料上来看,黄埔路官邸出现的次数是最多的。然而,它在南京城内却鲜为人知,就连南京军区司令部里的官兵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是远远没法与蒋氏夫妇在南京的另一经常去处“美龄宫”相比了。

②美龄宫

在中山陵风景区四方城附近,有一座依山就势而建的中国宫殿式的二层楼房,背倚连绵群山,淹没于郁郁林木之间,雕梁画栋,挑角飞檐,屋顶覆以绿色的玻璃瓦。因建于山丘之上,整个建筑显得巍峨高大,气度不凡,委实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去处。解放前,这时曾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官邸及私人教堂,名曰:“小红山官邸”、“凯歌堂”,解放后,以“美龄宫”名闻遐迩。

1930年蒋介石相中这块地皮,随即向中山陵园借地造屋。经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成员孙科、戴季陶等人同意后,于1931年破土动工,不久落成。共占地120亩,由正屋、门楼、警卫室、汽车间及花园等数部分组成。

建成之后,蒋介石发现主体建筑高大显眼过于暴露,于战乱之际,作总统官邸不够安全,于是决定将此别墅充作“私人教堂”,以供做礼拜之用,取名“凯歌堂”。据说“凯歌”一词典出《晋书·乐志上》“其有短箫之乐者,则所谓王师大捷,令军中凯歌者也。”

穿过门楼,沿阶拾级而上,通向凯歌堂后面的大门,由北可登楼入室,底楼四周围以汉白玉的雕花栏杆,并用花色瓷砖铺地,可谓豪华气派。

凯歌堂上下两层,楼上左侧是带有卫生间的卧室,卧室十分宽敞明亮,摆设着一套古色古香的柚木家俱,中间是会客厅,四周沙发环绕,茶几放置其间,沿会客厅有一走廊直通二楼阳台,立于平台之上,极目远眺,钟山胜景,尽收眼底,心旷神怡之感顿生。

底层为教堂,可容200余人,蒋氏夫妇经常到此做礼拜,有时也下榻于此。

解放后,凯歌堂被人民政府接管,曾做过疗养院,1984年以来,改为宾馆,接待过外国元首。

③汤山别墅

南京东郊30里的地方,有一个以温泉而驰名的小镇——汤山。三、四十年代,汤山成为国民党军政要员休憩之地,他们常来温泉沐浴疗养,并在此建筑房舍,其中最著名的有张静江的汤泉路3号别墅,及抗战期间毁于战火的戴季陶望云书屋,于右任的黄栗草房等等。

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东渡日本,追求宋美龄成功,随即回国结婚,在上海举行了世人瞩目的盛大婚礼。不久,蒋介石携新婚爱妻抵达南京,张静江将汤山别墅作为新婚贺礼奉送蒋氏夫妇。(但也有人说,此屋是在陶保晋的“陶庐”的基础上建设的)

这是一座外表看起来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墙以石头垒砌而成,系两层尖顶小楼,覆以赭红色的平瓦,由于底层约一半陷于地平面之下,门前台阶直通二楼客厅,所以乍一观之,还以为只有一层。

此房历经半个多世纪,现仍保存完好。前几年,由南京市级机关管理局拨款作了维修。如今,汤山别墅面貌焕然一新。

当你跨进长着梧桐的幽静的院落,沿着一条铺满鹅卵石的小道,来到台阶上,换上拖鞋,走进屋内左侧的蒋氏夫妇卧室。这是一间小巧的房间,但布置极为考究,红色的地毯,低矮的席梦思,精致的壁灯以及优美的外国油画一一映入眼帘。

休息厅后面,有一楼梯通向底层,来到下面之

江南图书馆开馆日期辨误

● 王 玲

江南图书馆是我省第一所近代图书馆,也是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开始筹建于南京,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阴历)书楼建筑竣工,十一月将所储书籍移送其中,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上旬内部设备办备齐全,于八月十八日(阳历9月21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以后馆名曾多次更改。南京解放后,1952年10月并入南京图书馆。

开馆日期一般即定为馆庆纪念日,在我国图书馆建馆史上,是作为排列先后次序的依据。长期以来,在省内外刊登的一些文章中,如《我国早期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的今昔》、《我国第三大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以及1989年的《南京图书馆藏书小史》、《缪荃荪首创江南图书馆》等文提到江南图书馆的开馆日期均作宣统二年十一月或十一月十八日(阳历12月19日),这是与史实不相符的。正确时间应为农历八月十八日(阳历9月21日)。那么开馆日期怎么会推迟了三个月呢?这是因为他们所引用的史书上有一个小的失误。曾任馆长柳诒征在他所著的《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1928年出版)一书的13页8行至15行正文云:

“宣统元年……是年九月工竣。……翌年十一月十八日开办阅览,制定规章,江苏省之有大规模之公共图书馆实自是始。”

这段正文后面,用小号铅字附排他所引为依据的资料,是宣统二年八月十一日《图书馆申报开办阅览稿》(见13页末行)。原稿文字较长,现仅摘录其开始及收尾部分,中段以略述代之。

申报稿开始称:“敝馆于宣统元年十一月内将所储书籍一律移送龙蟠里书楼安放。”中段续称书之破损者业经修补装订,缺页者已经抄配,目录已先就观览者排印,过道、穿堂已经添建,阅览室、办公室已就旧屋修好,布置阅览室内需用的桌椅什具俱已办备齐全等等。收尾称:“敝馆拟即于本月十八日开办阅览事宜,先期广告,俾此邦人士及军学各界皆得到馆浏览,以广人士向学之心,而为增进文明之地。”

文中“本月十八日”当即申报开办阅览之当月,即八月十八日,即于申报时之八月十一日的一周之后的八月十八日。当时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只待申报经上级批准于所拟之一周后的八月十八日开办阅览了,这在申报稿上是写得很明白的。

证之史实也完全相符。当时总办(相当现在的馆长,副职为坐办陈庆年)缪荃荪在日记上也是记载得很明确的。他在《庚戌日记》的农历八月,记有“十八日丁丑。阴,时有小雨。图书馆阅览室开办。……”(见《艺风老人日记》)这是最直接、最可靠、最有力的证据。可见柳书正文“翌年十一月十八日”有误。

(责任编辑 宁 宁)

后,才发现此处才是蒋氏汤山别墅之精华所在,内部空间颇大,地面、顶部及四周墙壁,皆以白色瓷砖砌成。大小分五、六间,其中两间为双人浴池(原是相邻的两只小浴池,为蒋氏夫妇所用,后改为一大池)。汤山温泉水可通过人工管道直通池中,随时可用。另有单间,墙壁嵌以巨镜,乃宋美龄更衣化妆之处。

④ 励志社

严格地说来,励志社并不能算是蒋介石的官邸或别墅,但蒋介石夫妇却经常到此下榻,故在此也将

它算作一处。

今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招待所内有三座成品字形分布的大屋顶式建筑,便是当年励志社原址,励志社名义上是黄埔同学俱乐部,但实际为蒋介石内庭供奉机构,

南京励志社内有蒋氏夫妇的卧室,装潢极为考究。其中之情形已为《蒋介石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一文所详述,这里不再赘言。

(责任编辑 惠 兰)

皇帝聖旨
駙馬李棟 今年
朕之
及慈母朕平昔家
朕懷哭痛覺封知
遠內官詣府看一
附身安好朕甚
皇后親甚厚大
意天恩大者就
七月初有人自元
胡元也速丞相朱
元得到番官在祖
父迤邐追趕太
知再振明
安心勿慮手也

(总 217) • 105 •

建康何处

“东府城”

● 王少华



六朝时代,金陵军政要地除台城、石头、西州外,还有东府城,今台城、石头城等遗址犹能访,东府城址又究竟在何处呢?很值得查访。

(一)

东晋豪族、名帅谢安(320—385年),曾梦其西州府宅(冶山西北)之东为“代领扬州”的丞相、会稽文孝王道子的府第,预见到它的地位之重要,时人并以此“号为东府,而号府廨为西州”(顾野王《舆地志》)。而后,桓玄处死道子及子孙等而又驻此,且“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宋文帝元嘉中,彭城王义康更开拓之,于此建司徒府,成为宰相府第。元嘉二十七年(450年),肖颍(后为齐武帝)生于此。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年又以此为未央宫。后肖颍守此,并又建“朝堂”。梁太清二年(549年)十一月,侯景作乱陷东府城,“杀城内二千余人”,并驱数万人筑城内之东西二土山,“昼夜不息,乱加毆捶,疲羸者因杀之以填山,号哭之声,响动天地”。时侯景扶植的肖见理(正德子)随卢晖略驻此。陈时,此处即成为扬州廨。陈亡,城即被废。由此可见,东晋、南朝二百七十多年,这里就设府廨达一百八十多年,对都城、皇室都有举足轻重之势;东府城的历史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一个侧面。这一遗迹不仅是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在军事作战地理方面,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究竟东府城的地理位置在那里呢?它就在明城东南之郊,而不是城东南之隅。宋《太平寰宇记》称“东府城在县东二里”。元至正张铉《金陵新志》称,东府城“在台城东门外南”;又说,“在青溪东南,临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去台(城)四里”。明末,顾祖

禹《读史方輿纪要》更具体地说,城在“清溪桥东,南临淮水(秦淮河)”。清溪桥疑即今竺桥复成桥一带。又说,“肖嗣等渡淮攻东府城,焚之,……援军营于青溪东,东路与石头路中断。”这也就是说,东府城西距青溪还有一段路,其间并可驻军扎营。

侯景之乱,《梁书》详细记载有关东府城的攻防设防布局、诚可作为考证东府城址、地貌特点的较早可靠的依据。该书卷五十六侯景传内称:

“邵陵王纶,……直据钟山。侯景大骇,具船舟咸欲逃散。……缘淮造栅。及晓,景方觉,乃登祥灵寺门楼望之,……先渡兵击之”。

“鄱阳世子嗣、永安侯确、羊鸦仁、李迁仕、樊文皎等率众渡淮,攻东府城前栅,破之,遂结营于青溪水东,景遣其仪同宋子仙顿南平王弟,缘水西立栅相拒。”

“羊鸦仁、柳敬礼、鄱阳世子嗣进军于东府城北。栅垒未立,为景将宋子仙袭,败绩,赴淮死者数千人”。

这些记载都很明确,不但东府城南距秦淮河很近,并靠近“青溪水东”;而其北更无退路。至于其“水西立栅”处,即今大中桥西北端之八府塘东一带。如至正《金陵新志》称“秦淮栅即栅塘也”。又按《建康实录》所注,吴时夹淮立栅。梁天监中,于此作“重栅”。该东府城北直对钟山,南距秦淮不远,故“渡淮”即可攻击;就地形地貌讲,此城北地区东为青龙山、西为青溪、南北丘陵河道谷地,亦无多少后退之余地,筑垒不能很快奏效,故“栅垒未立”即为侯景兵所袭,亦即此地区地形上既不利于攻也不利于守!此侯军乱时,四周之板桥、朱雀航、白下、南塘、石头、覆舟山、玄武湖北、青塘、小丹阳、钟山等等,都是驻军筑垒之地,如此,亦可见东府城当时之军防地位,此亦为我们明确了东府城在都城的宏观位置。

(三)

考察东府城的具体位置,还必须了解东府城的具体形貌。对此《晋书·卷四十四,会稽王道子传》中有其营造情况的详细记载,内称嬖人赵牙“为道子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钜万。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於山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府内有山,因得游瞩,甚善也,然修饰太过……。”而桓玄驻此,更修筑台馆山池。又《丹阳记》称,该城有东、南、西三门,其《元和志》亦作了同样记载;此即该城没有北门之设,这与当地环境是分不开的,也因当时此西北为宫城之建阳门。又《金陵志》追记称,该城东北角有土山,而《金陵新志》详载,其“四周土墙,堑两重。……山是板筑所作。”“其城东北角,有土山曰灵,即牙(赵牙)所筑也”。另又有记载称,宋刘义康时,更“作东、西堑。”肖颐驻此,曾筑有朝堂,更于南门外立栅。上述《梁书》称侯景攻东府城时,即曾“设百尺楼车,钩城堞”,可见梁代初该城之高耸。侯军占城后,却又“于城东西各起一土山,以临城内,城内亦作两山以应之”,这时,更“毁土墙而以砖甃”。该城之为砖砌,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是故其后期,攻城更只能从“前栅”而入,而“营”则在其西之青溪岸东扎立。今我们从当时侯景破城杀城内二千余人等来分析,此城决不会小于“周三里九十步”,此因当时它还作过储粮仓库,并有供水之大池。这些也都为我们今天考察东府城遗址,提供了可靠的历史依据。

(四)

根据上述坐标位置,地形地貌,经多年查察发现,该东府城遗址即今城东郊天堂村,亦即明代天坛所在地。此处,南临秦淮河,东靠海福庵,西近明城濠,其北为靶场、童子仑山,连接卫岗,近苜蓿园,再北即钟山。今见城址,土城呈长方形,东西宽约350米,南北长约500米;光华门外石门坎、海福庵公路,即把城分成为南北两部分,公路所穿城墙缺口处,疑即当年东西二门址。今南区正南面城基仍在,高出地面1—2米,宽约20多米,其南确贴近秦淮河,有大路去河边。该段东南角,有明建筑基础,人称为“天坛埂”。越河(北源钟山麓、南入秦淮)去东南,

今地名为“过兵桥”,疑与古大干道有关。此干道即长干道之东端,通句容等地。城内东南隅,有水池甚大,水位低于秦淮河3—4米,人称为“将军塘”,无疑是人士塘当为筑城时所挖。东晋时,会稽王道子曾封为骠骑将军;《江南通志》并称,城南秦淮河上有桥,称“骠骑航”,亦称“东府城桥”。此桥当在南城门外秦淮河面上。是故,东府城内此塘称“将军塘”亦情理中事。上述“穿池”之记载当亦可参证。

东府城北区城基,基本上是利用自然山丘,基址南侧一线明显看出为东西向之直线土基,底宽亦20米左右。此北面一段城基,确无城门痕迹;但在墙外,却有半圆形土围,以与北端山丘相对。城北区之东北隅,今仍存圆形土山,从剖面看出明显为人工堆筑,登山可以“游瞩”钟山、青龙山、秦淮河,疑赵牙当年所筑之灵山。附近原来还有一山,人称前几年推土时见基部不少人骨,这是东府址的又一证据。土山之北(城基外),亦有相应山岗,当地名为“童子仑”。志称,东晋、刘宋时代,东府城为貯米处,此当是仑名之由来。史称侯景之乱部,曾由此东府城运粮西去石头城。今遗址东面,又有一段南北长约300米左右的堆土带,黄土基仍宽1—2米,而基下则为黑沙土层,表明是人工加筑之基。今东墙外尚见南北向沟濠一道,其水源自钟山南麓,至此又东会青龙山西之水,向西南而入秦淮河。

北城区之西北隅,今存一大土墩,一二米深地下,均为明代砖瓦,当是明代设坛之地。再往西,又有一区高坪,黄土表层,前为清凉庵址。再西三里,即今存之明城濠。城濠东北向一片,地势较洼,似填没河道。如此,诚如上述所称刘宋时所开的“东西堑”。上述洼地之北,亦即上述之卫岗丘陵了。今观此北城外地形,确也难立“棚垒”守攻,大大不如东府城南地形的可以进兵可以驻守。

有意思的是,今北段城墙之北侧(外侧)基部(地表下1—2米),仍留有许多梁代断砖(砖脊宽阔4×13厘米),概未见其他时代之砖,此即史载侯景占城后“毁土墙而以砖甃”的历史证据。

这些,在今光华门东、西南等,都找不到如此的系列遗迹。

上述东府城南秦淮河南岸,孙吴时即东长干道,又称府秦淮大路、白杨路、横道等,东端亦即“屯营”或设“廨署”之地;这一带,曾是房舍“栉比”、“棋布”、

孙中山先生与复旦大学

● 张学恕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早年长期在上海和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对复旦公学和复旦大学给予极大的关怀和支持,充分体现了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对我国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

复旦大学的前身是复旦公学,1905年5月创办于上海。当时,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为抗议帝国主义势力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干涉和压迫,毅然创办了这所高等学校,并担任了公学的第一任校长。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后,复旦多数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军。1912年元旦,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5日,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通告各省,指出大局初定,速令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开学,为国家培养各类建设人才。于是,各校纷纷复课。但是,复旦因经费困难,一时无法复课。当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复旦学生于右任,便与另一位复旦学生邵力子一起,将复旦公学困难情况,向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作了汇报。孙中山认为复旦是一所具有反帝革命传统的学校,且为提倡高等教育,对此事极为关注,竭力支持复旦复校,并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当即拨发补助金一万元给复旦作为复校费用。于是,在孙中山先生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复旦公学于1912年5月10日正式复校和开学上课。当时,孙中山先生为了激励复旦师生奋发上进,还亲笔为复旦题写“努力前程”四字勉励。

孙中山先生对复旦师生的关怀和爱护,使复旦全体师生永志不忘。1913年初,复旦公学成立校董

会,聘请孙中山先生担任复旦公学校董会董事。同时,被聘任为复旦校董的,还有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著名人士陈其美、于右任、王宠惠等。校董会成立后,由于有了强有力的领导,使复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在孙中山先生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下,复旦师生在认真搞好教学,努力把复旦办成全国第一流大学的同时,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关心国家大事。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复旦师生响应孙中山先生号召,一致抵制帝制。复旦教师邵力子在课堂上予以揭露,激发学生讨袁斗志。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复旦师生热烈庆祝,演剧三天。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复旦师生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这场伟大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去。复旦大学(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一位教师兼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首先接到北京“五四”的专电,立即告知复旦同学,联络上海大中學生,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并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动轰轰烈烈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孙中山先生在“五四”运动期间,对复旦学生始终站在爱国斗争的最前列,并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坚强支柱,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极大的支持,使复旦爱国学生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复旦师生以各种形式,沉痛悼念孙中山先生,决心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

(责任编辑 淑玉)

“飞甍舛立,”其“水浮陆行、方舟结驷,……楼船举帆而过肆”(晋左思《吴都赋》、宋《太平寰宇记》等)。该古道再东端,就是著名的倪塘、为建康郊野,晋王恭受斩处。早先会稽王道子还斩王绪于此市肆。故当时有民歌称:“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明年斩诸桓”(《宋书·藏质传》)。近代太平天国时期,“铁公鸡”亦于此一带称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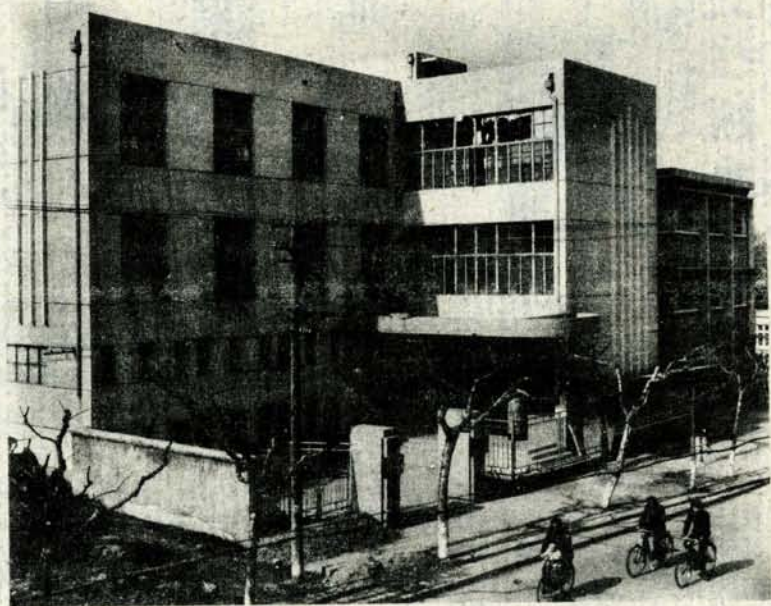
• 108 • (总 220)

东府城之东北,昔又有临沂、白马、白石诸城;其西南,则是古越城、丹阳郡城、南塘;其西,即西州城、石头城、新亭、三山寨等。因此,在此诸城之间,在青溪、秦淮交接处东端筑东府城,确是台城之东大门,扼陆路句容、东坝入台城之要冲,其战略地位确实十分重要。

(责任编辑 霁明)

江苏最大的县级儿童图书馆

● 王宏



溧水县儿童图书馆 王宏摄

座落在南京郊县的溧水县儿童图书馆是目前南京地区第一所县级儿童图书馆。它是依靠国家和社会力量集资创办起来的。

1981年春，溧水县图书馆根据中央书记处“培养和教育少年儿童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一项战略任务，全党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指示精神，拟出了“关于筹建儿童图书馆几点设想”的报告，报送县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对此十分重视，当即召开了有关单位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筹办儿童图书

馆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县妇联、总工会、文教局等6个单位联合发出倡议：呼吁各厂矿、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都来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要求在“六一”前夕开展一次小朋友送礼活动。捐书献款，筹办儿童图书馆。县政府还决定从地方财政中拨款2000元作为儿童图书馆的开办经费。

倡议发出后，仅个把月时间，就有76个单位献出7248元。还赠送了落地台扇、小桌子、小椅子、儿童读物等实物。县图书馆又将馆内最好的座北朝南的3间平房作为儿童图书馆的馆舍。

经过充分的准备，于1981年5月31日举行了开馆典礼。县委、县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各单位的代表、省、市和各兄弟县图书馆的代表200多人出席了开馆典礼。

儿童图书馆的开办，吸引了广大少年儿童，活跃了县城少年儿童的课外活动。但活动场地毕竟只有3间平房，而每天到馆内活动的少年儿童有百余人，使之拥挤不堪。为此，县政府又作出新建儿童图书馆馆舍的决定。

由省、市、县共同拨款，经过一系列的筹备工作，于1984年9月底，新馆舍大楼正式动工。于1986年5月底竣工。

现矗立于县城大街东侧的县儿童图书馆是一



石巢园

湘园与陶衡川

● 凌 昕

秦淮河上的媚香楼已经修复，人们自然会想到孔尚任的《桃花扇》，想到《桃花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他们之中有些人也曾出入媚香楼，如阮大铖。明天启时阮大铖与魏忠贤结为死党。阉党失势后流寓南京，以声色自娱。弘光朝，任兵部侍郎、尚书。南明败亡，降清，随清军攻福建，跌死在仙霞岭。能诗、善曲，著名者有《燕子笺》传奇。他虽是怀宁人，但南京却置有宅第。据《白下琐言》云：“阮大铖宅在城南库司坊，世人移其名曰‘裤子裆’”。其宅第则是石巢园，这也有根据。《桃花扇》[侦戏]出中，杨文驄去阮宅时就说这是“石巢园”还说中“……山石花木，位置不俗”是出自堆叠假山名家张南垣之手，又称赞石巢园“花林疏落石斑斓”，如同倪瓒、黄公望的山水画。但摹绘石巢园景物之盛的篇什并不多见，倒是叙写其颓圯荒败景象的诗作却见诸清人文集之中，如蒋士铨于乾隆三十三处（1768）就写过《过百子山樵旧舍》二首，现择一首如下：

中兴歌舞荒淫日，群小风云际会年。
乐器谁焚亡国主，词臣分孽衍波笺。

名高十客平章重，网尽诸人党祸连。

一样蓬蒿埋旧宅，白头江令较他贤。

——《忠雅堂集》卷十八

从此诗可知入清之后石巢园一园蓬蒿，满目荒凉了。

石巢园颓圯，已有人在文章中叙及。然而，在乾隆中后期，石巢园又再度修葺一新，成为南京城西南风景胜处，则鲜有人提及。自然，此时石巢园已经易主，更名为湘园了。据陈作霖《凤麓小志》（考园墅）记载“明社虽墟，未遭兵火，苔纹草色，履迹可寻，踵而筑之者”之中有“陶氏冰雪窝”。陈氏在夹注中还说说明陶氏冰雪窝“即阮氏石巢园也，衡川孝养廉居之”。

其实，“冰雪窝只是陶氏湘园之一角，并非全豹。湘园胜处有百城烟水阁，深柳读书堂，春草池、黄叶廊、风光霁月之堂、冰雪窝、平桥、墙东古柏、移灯处、小罗浮、竹梧小隐等。江苏华亭人（松江）沈大成曾写有《寄题陶衡川精舍》十一首，赞誉这些景点，现选一二首如下：

幢全框架混合结构的三层L形楼房。高11.4米，建筑面积为960平方米，总造价是20.7万元。整个新馆舍楼的造型优美，书库实用面积有200m²。可藏各类图书10万册。

二楼是阅览室。分为少年、儿童、老幼三个阅览室。各室全是水磨石地面。不仅装有乳白色的双管灯，还配有吊扇，便于少年儿童在暑期阅读。四周墙壁涂有一米高苹果绿的墙裙。雪白的墙壁上挂有精心复制的几幅适合儿童特点的图画。按不同年龄配置了全绿色的桌椅。老幼阅览室还配有小型沙发，形成了一个幽雅、安静的阅读环境。其中宽敞、明亮的儿童阅览室里一次就可容纳200位儿童阅读报刊。

三楼是视听活动室和教师阅览室。活动室也称报告厅。它的实用面积有180m²。配有吊扇和壁灯，

象个大舞厅。电视机、录放像机、扩音器等都放在专门配制的橱柜里，随时可用。这儿一次可坐下500余人看电视、录像或听报告、听讲座。

1986年6月1日，新馆舍落成使用，县政府作出“儿童图书馆单独建制，设立专项经费”的决定。并充实了专业人员。领导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县儿童图书馆就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了，现已初具规模。到1989年底，馆内已有工作人员6位。并藏有43284册图书；还拥有各种报纸93种、141份和各类刊物389种、559份。它不仅是目前南京地区第一所县级儿童图书馆，也是目前江苏省内最大的一所县级儿童图书馆。

近十年来，全馆同志把为社会主义培育人才作为一切工作的宗旨。以传播知识为中心，开展多种形

《百城烟水阁》

百城在烟水，此语译梵策；
宛宛秦淮流，渔艖轻如叶。

《冰雪窝》

群卉畏冰雪，梅花独与争；
所以素心人，对之吟情盈。

大约“冰雪窝”为陶氏待客之处，景色尤佳，常为人称道。如乾隆十七年壬申科(1752)状元江宁人秦大士就写有《过陶衡川冰雪窝》一诗，云：

屋声惊雀散晴沙，万个琅玕玉荃芽。
种柳清原陶令宅，藏书窝敌邨侯家。
佳儿挽袖知留客，稚女垂髫学捧茶。
补屋筑墙门巷改，斜阳影里思无涯。

从此诗可知，石巢园颓圯之后，经陶湘更名湘园，着意经营，补屋筑墙，种柳栽竹，水木清华，颇具规模。可惜此园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作霖《凤麓小志》时，虽然犹存“盎然古趣”，但也只剩下“老树小池”了。

石巢园的主人阮大铖，虽然气节有亏，但倒是臭名“千古”的；而湘园主人陶衡却少有人知，其实他在乾隆朝的南京文坛上却是颇具文名的，与住在城此的程廷祚齐名，一时北程南陶并称，不妨略作介绍。

陶湘，字范文，号衡行，又号楚渔。“少孤贫，藉母纺绩以读，肆力经训，能为古文辞”。他入学(考取秀才)以后，以成绩优秀而“食饩”，即所谓的廪生，可以按月得到一定数量的银米补助。每当他领到所谓的“馆穀”后，仅以少量银米维持简陋的生活，其余的膳

食补贴则用来“市奇书读而藏之，数十年藏书独富于金陵”。他又极为喜爱摩弄汉唐以来的碑志文物和宋元明三朝的名人书画手迹，并“一一辨其源流真赝，蓄以自娱”。

陶湘的生卒年不详，仅知“卒年六十余”。他是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1771)乡试举人。初时同考官阅其卷而“屏弗荐”，主考彭元瑞搜遗卷时发现，叹曰“此宿学也”，乃“取殿其榜”。这一科策题以两字为句，每道不满二百字，而陶湘所作“通篇用‘也’字，亦以二句为句”。彭元瑞极为惊讶，说：“予被此公笑矣。”揭榜之后，即命驾去访问他。彭元瑞也是一代文宗，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先后历任工、户、兵、吏诸侍郎、尚书，“以文学被知遇”，卒后赠协办大学士，谥文勤。“陶湘的文章连‘彭文勤公’都如此推崇，自然声名大起。袁枚与他也颇多交往，当他死后，袁枚颇为伤感，写有《新正十日，闻陶衡川孝廉之讣，……感赋一诗》：

一度秋风一逝波，故人零落渐无多。

仓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挽歌。

据有关记载，陶湘著述颇多，但“经乱佚弗见”。光绪六年《重刊江宁府志》卷五十四，除著录其“文集”外，尚有《春秋集传集解补义》。尽管其著作大半散佚，但在当时确“与邑程氏廷祚齐名，有南陶北程之目”。至于住在南京城北的程廷祚，当另文为之介绍。

(责任编辑 宁 宁)

式的读书辅导活动。仅1989年就外借图书有280824册次。阅览室接待了小读者76636人次。并面向农村开展“三个一”活动。即：送一箱书、作一场读书报告、放一场儿童录像。做到把知识性、趣味性、形象性、直观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了儿童的读书兴趣和能力。

少儿图书馆还先后举办过6期少年书画培训班。参加培训过的同学总人数达925人次。先后有66幅书画作品参加了省、市及国际展览。其中有30幅作品被送至土耳其、日本展出。

辛勤的劳动，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肯定，邓颖超同志得知溧水县儿童图书馆的情况后，曾高兴地说，征集资金办儿童图书馆，这样做得好。省文化厅厅长王鸿同志于1989年11月6日视察溧水县儿童图书馆

时指出：溧水儿童图书馆是我省一个很有特色的馆，希望为培育祖国幼苗做出更大贡献。台湾大学图书馆系主任周骏富教授于1990年元月21日到溧水探亲，还专程到溧水儿童图书馆参观并提笔留词：知识水库。

1982年，溧水县儿童图书馆获得团中央等15个单位发起的“全国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同年12月，荣获“全国少年儿童图书馆先进集体”的称号。1988年，又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图书馆。从1986年至198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南京市文明图书馆。并多次获得奖状和奖品。

(责任编辑 宁 宁)

和平公园 的 “还都塔”

● 霁 明



《还都塔》
朱伟强摄

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可是一大群离退休的老人们却早早来到这古城北部、鸡鸣山南麓的和平公园，有的做操，有的打拳，有的舞剑，有的练气功，更有的在时尚流行的乐曲伴奏下，跳起了国际舞和迪斯科。这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老有所乐”吧。可是谁也不曾问一声这身旁的塔，这玲珑的园是何时有的，它有何来历？

还是在那民族危亡的年月，古城金陵被侵华日军一场血洗之后，更显得阴森萧条，荒凉破败，镇压与反抗仍时时在发生。就在这样一个时候，一群以汪精卫为首的民族败类，在日本太上皇的卵翼下，做起儿皇帝梦来。他们乔装打扮，敲敲打打，热热闹闹要登基了。也许是自己壮胆，亦或是欺骗别人，于是扯起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帜，并兴师动众地立碑建塔，以“流芳千古”。

1940年3月29日，就是在汪精卫自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行政院院长”的前一天，他率领周佛海、梅思平等一帮“内阁”

成员来到这伪政府（原国民政府考试院，今南京市政府）对面的园面内，塑立起：“还都纪念碑”，接着动工兴建“还都纪念塔”。1941年3月竣工，并举行了所谓“还都一周年纪念塔”落成仪式。这就是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还都塔”。此后逐渐形成一处景点，至五十年代初正式辟为街头小游园，占地1.77公顷，因紧靠和平路（1958年前后改称北京东路），此园当时即称之为“和平公园”，沿称至今。

塔外看是三层，内则为四层，飞檐翘角，钢筋水泥构筑，底层长宽均为5.45米，一至四层由大到小，呈斜立式，给人以稳重之感。塔通高约17米有奇，其中第一层高4.15米，二层高3.75米，三层高3.7米，四层高2.1米，塔顶高约3米，塔座高0.55米。塔座也为正方形，长宽均为13.5米，四周围以0.95米高的水泥刻花栏杆。塔四面共开四门，门顶为圆拱形，从下到上围以“卐”字花纹护

边。

进入塔内，抬头可见第一层顶部横竖各为3块共9块方格，每块内里均彩绘云龙与仙鹤，周饰寿纹图形，以寓伪政权“江山永固”。底层一角设固定钢质盘旋式立梯，可容一人攀登。我穿着呢大衣拾级而上，穿过天井式的方口到二层，见顶部亦彩绘有4只仙鹤及如意图案。二到三层亦如前。可是三到四层仅有在壁上嵌进几根横档式的铁杆，要手足交替上爬，虽只有3米多高，却颇不易。我好不容易登上去，见内里不是杂物，即是野恭，颇令人扫兴。但室外却另是一番景象：南边是新近落成的科学馆，北边是树木葱郁的市政府机关大院，西即为鸡鸣寺，药师佛塔高耸于寺西山颠。这一组古今建筑倒也相映成趣，空气清新，难怪老人喜来此处聚会。至于汪逆的事嘛，人们是不屑一提的了，就让这座塔永作见证吧。

1991年2月于“方志楼”
（责任编辑 惠 兰）



管理所大门外景

南京鼓楼区 环境卫生管理所



荣誉证书和奖状
由创建卫生城市立功单位



鼓楼中央路公厕



中国南京环卫服务公司经理
南京鼓楼区环境卫生管理所所长王文学

该所环境保洁车、冲水车、三轮机动车在清扫保洁



清凉山集装箱式垃圾中转站

祝贺南京进入全国“十佳卫生城市”行列

南京市玄武区城镇建设

综合开发总公司

总经理戈仁泉、副总经理董正谋在珍珠饭店作开业巡查



珍珠饭店室内装饰



鱼市街办公大楼



后宰门小区



屋顶花园



珍珠饭店